

## 目 录

序.....	3
前言.....	4
第一章 坦桑尼亚民族的由来.....	萨顿 7
第二章 1800年以前的内地.....	伊萨利亚·基曼博 24
第三章 沿海地区和商队贸易的发展 .....	爱德华·阿尔珀斯 53
第四章 十九世纪的政治变革.....	安德鲁·罗伯茨 84
第五章 德国人的入侵和坦桑尼亚 非洲人的抵抗.....	吉尔伯特·格瓦萨 123
第六章 改良和分化的时代 (1907—1945年).....	约翰·艾利夫 175
第七章 思想交流(1850—1939年) .....	特伦斯·兰杰 230
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胜利 .....	阿诺德·特穆 269
第九章 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 .....	约翰内斯·莫萨雷 303
第十章 从独立到自力更生.....	莱昂内尔·克利夫 335
参考读物.....	358

---

译名对照表	367
插图	32—33, 76—77, 210—211, 255—256
地图:	
一、坦桑尼亚古代历史遗址	16后
二、坦桑尼亚早期部族分布情况	22后
三、沿海地区和商队贸易的发展	52
四、坦桑尼亚的部族和地区	82后

## 序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自 1967 年 1 月以来曾为历史教师组织过多次讨论会,为他们提供有关新的“学校正式课程大纲”某些方面的新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些讨论会是由国民教育部、教育研究所和坦桑尼亚历史协会主办的。本书收集了提交给 1967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讨论会的论文的修订稿。

上述这些机构的帮助和合作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希望本书不仅对学校而且对公众都有所裨益。我们对参加会议的教师们表示感谢,他们的讨论对本书各章撰稿人是有帮助的。我们还要感谢坦桑尼亚国家档案局的管理人员允许我们引用国家档案资料。

## 前 言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坦桑尼亚还是在其他国家,许多人早就希望能看到一部成文的坦桑尼亚历史。这不仅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书,而且因为大部分已经出版的片断材料不是忽视了就是歪曲了非洲人自己的历史。因此,作为第一部坦桑尼亚历史纲要,本书力求多少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本书试图探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历史,这种探讨要联系范围更广的东非和非洲历史——从奥杜瓦伊峡谷发现的古代文物为佐证的石器时代,直到以《阿鲁沙宣言》为标志的最近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可以称为从奥杜瓦伊到《阿鲁沙宣言》时期的坦桑尼亚史。

这项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一些成员在研究工作中开始发现了新的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说明,本书决不是一部确定不变的坦桑尼亚历史。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更多材料的发现,对本书提出的观点加以重新解释、改正和发挥将是必要的。可是很清楚,现有材料已经使得本书撰稿人能够主要根据非洲人的生活,以及非洲人许多世纪以来为影响和掌握自己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努力,而写出一部历史。

一个民族的全面历史最好由一个人执笔,因为这样做可

以自始至终地突出一个或几个主题，把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贯串起来。由于迫切需要向学校和公众提供已有的新知识，同时，由于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采取的方法（正如本书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本书不能不成为集体创作。不过，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看不出中心思想的著作。本书始终贯串的一个中心是：人们在对付他们遇到的问题时，是如何取得成功或者遭到失败的；这些问题的产生，或者是由于敌对的环境，或者是由于同一部族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由于他们同本部族以外的其他部族成员之间日益扩大的关系。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论述方法，使全书有可能显示坦桑尼亚人民的历史是多么生气勃勃。本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论证了一个民族的长期历史中必然不断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

我们已经指出，不能期望本书成为一部确定不变的坦桑尼亚历史，因为本书只是刚刚开始的研究工作的结果。同时还必须指出，用论文集的方式来编写历史纲要的尝试，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空白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是有两个空白点是有意留下的。第一，我们没有打算要写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的全面历史，而是把论述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关系的发展作为重点。我们所以侧重坦桑尼亚大陆，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这一事实，对于本书作出上述决定也是有关系的。

第二，我们没有打算要写殖民地统治结构。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非洲人自己。非洲人在实现社会变革中的反应和

首创精神，是本书的主题。因为这是非洲历史中过去受到忽视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希望本书的做法能够带动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坦桑尼亚各族人民的历史。

伊萨利亚·基曼博、阿诺德·特穆

1969年8月于达累斯萨拉姆

## 第一章 坦桑尼亚民族的由来

萨 顿

坦噶尼喀的疆界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欧洲人对非洲人的瓜分才开始形成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则是在1964年奔巴岛和桑给巴尔岛合并进来之后成立的。因此，人们可能会问：现在试图研究殖民时期以前坦桑尼亚和坦桑尼亚人民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它是同这个国家的现代史和当前事务多少有点关系呢，或者只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课题？这种想法是非常肤浅的。坦桑尼亚民族不是一夜之间凭空出现的。它不单单是民族主义斗争和取得独立的结果，也不是殖民主义者的创造。它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曾在非洲这一地区定居的各种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

如果有一幅一百年前的坦桑尼亚地图，它就会标明当时存在的许多部族和分散的政治单位。有一些是复杂的民主政体，有一些是小酋长国，还有一些则已经建成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制王国。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去看这些部族或单位，也不应当把它们看做是互相隔绝的单位，各有自己的历史，各有自己的部族祖先和发源地。这种部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沒有意义

和非历史观点的。不仅如此，同常见的一些说法相反，部族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所有的部族都是发展的和相互影响的。同和平的和好战的毗邻部族的接触，同远近地区的通商，为寻找新的土地而进行的扩张和移民——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各个民族和部族以及各种文化和思想之间的互相混合和同化。部族就是这样形成、变化和瓦解的。但是人民继续在前进。我们必须以此为背景来恢复坦桑尼亚历史的本来面目和追溯坦桑尼亚文化的起源。只有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才能够了解坦桑尼亚的现代史，坦桑尼亚人民对外来殖民统治的反应，民族主义的发展，独立的坦桑尼亚的诞生以及它对未来的理想。

在非洲，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比其他多数大陆要密切得多。例如，欧洲的古史和考古学作为学术研究和推动文化知识的发展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处理当代事务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哥伦布以前的美洲，许多地方的历史尽管可能激动人心，基本上是考古学家探讨的对象。但是在非洲，对殖民时期以前情况的知识，却是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当前问题的基础。

人们常问，在沒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是不是可能研究非洲早期的历史。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已经回答了这种疑问，这些著作表明，通过对各种学科提供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是能够概述过去的历史的。这些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有：口头传说，这是世代相传的回忆和故事；考古学，它研究地面和地下保存的人类活动的文物；各种语言的比较；最广义的人类学，



它包括文化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我们追溯的时间越久远，我们就越要专门依靠考古学及其有关的科学。正是这些方法使我们能追溯人类社会的起源。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伊峡谷因为发现了已知的最早人类骨化石及其遗址上的粗石器而闻名了。这些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某些激烈的争论。但是分歧被夸大了，这种夸大特别反映在通俗的报刊上。必须强调指出，以奥杜瓦伊和其他地方的文物为根据而得出的关于人类进化的总的看法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分歧主要在于细节问题和侧重点。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但是新的发现很难完全动摇老的信念，而往往是加强和发展了总的看法。现在已经充分肯定，人类并不是从类人猿或猴子进化而来的——事实是，类人猿和人类在大约两千万年以前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两者起源于共同的祖先；但是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变，发展了各自适应不同环境的专长。类人猿作为攀缘类动物适应森林生活，而人类成为在开阔地面上生活的动物。因此，原始人<sup>①</sup>就面临着如何维持生存和如何同地面上其他动物竞争的严重斗争。原始人不能象羚羊那样飞速逃避猛兽，也没有狮子那样的力气来保卫自己或捕杀肉食。他既没有猫的利爪，也没有鬣狗那样有力的牙齿，不能够切开死亡动物的皮取肉。原始人以他的适应能力和机智，运用智力和发展工艺来克服这些缺陷。原始人能够在地面上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他逐渐学会了两脚直立和行走的技能。这就使他站得比较高，因而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他的

<sup>①</sup> 原文为 emergent man。——译者

锐利的视力,同时还解放了他的双臂,可以用来掌握和携带合适的木头、骨头和石头作为防御和狩猎的工具或武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生理的进化,腿的进化使他可以更有效地行动;手的进化使他可以更好地使用工具并进而制造工具;头的进化增加了大脑的容量和增强了智力,从而使人能全面掌握文化和发展工艺。原始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制造木头和骨头工具,并终于学会制造石器,他们用石头相互敲击,做成有刃的薄片。最早的石器(有时称为“小圆石工具”)无疑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例如做木工、挖掘、采集野菜生果和剥皮切肉。最后这一项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人既然能够得到更多的肉食,就不再是几乎完全依靠野生植物和果实为生了。食物范围的扩大和取得食物的方法的增多,使人更能够适应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地形。这样,人类就能够繁殖和扩展到更多的地方。这种直立的、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出现,是一个长达数百万年的渐进过程,但它标志着人类的黎明。再者,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通过合作、学习和传授知识(大概借助于刚开始出现的有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人类。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类发展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阶段。在奥杜瓦伊发掘到两种类型的南方古猿骨化石。他们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有各自的名称和绰号,一种叫“东非人”(Zinjanthropus)或“啃硬果的人”,另一种叫“能人”或“灵巧人”(Homo habilis or Handy Man)。利基(Leakey)认为,只有后一类人的脑和手能够制造石制工具,他们是“聪慧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他认为,对比

来看，“东非人”只不过是稍微偏离人类血统的“近人类”(near-man)，而且是注定要最后灭绝的。其他的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这些“真正的争论点”的看法，不象利基这样绝对。他们或者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者强调“东非人”和“灵巧人”都是“南方古猿”，并认为他们在某个阶段上开始了向现代人进化的过程。

尽管南方古猿是现代人的祖先，他们和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能够活到现在的话，我们不会把他们看作只是另一个种族，而会看成是另一种动物。他们个子矮小，虽然也有两只脚，但体态略为弯曲。他们擅长奔跑而不善于步行，因为他们的下肢骨和脚骨还没有充分发展到现代人“跨步行走”的程度。他们的手虽然能够制造“小圆石工具”，但却不能做精细的活。最后，他们的脑子还不到我们的一半，所以智力较低。但是改进体质和智力的道路已经敞开，这就是近两百万年的全部历史。

这两百万年来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人们可以有理由怀疑奥杜瓦伊和远古的南方古猿对于坦桑尼亚民族的形成具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且，必须认识到南方古猿并不是单单生活在坦桑尼亚。南非也发现过这种古猿的遗物。很明显，他们曾经漂泊于非洲的许多或大部分草地和大草原地区。我们不清楚，南方古猿的起源地到底在那里，但很可能是在非洲。那种认为人类起源于奥杜瓦伊的流行看法，完全是误解。奥杜瓦伊只不过是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人类遗迹的地方，而这是由于那里的文物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以及通过利基的

不倦努力而被发现。奥杜瓦伊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对世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遗址。认真保护这个历史遗址，妥善保管在那里发现的文物，并在最严格的科学管理下继续进行研究，这是坦桑尼亚对世界各国应尽的义务。因为南方古猿(不论是“东非人”还是“灵巧人”)不是最早的坦桑尼亚人，正如他们不是最早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或欧洲人一样。他们是全人类的祖先。正如利基雄辩地指出的，奥杜瓦伊告诉我们，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今天世界上可以看得见的种族和肤色的差异，相对来说，是最近的事，是表面的现象，只具有微不足道的生物学意义。

南方古猿时代可能持续了好几百万年，但是到了五十万年前，人的体质和智力已发展到人类进化的“直立人”(Homo erectus)阶段，这是南方古猿和我们之间的中间阶段。由于有了大的脑子和较为灵巧的手，就能够制造更有效的石器，其中以手斧最为典型。“手斧”并不是真正的斧头，而是作为剥皮、准备食物、挖树根和做木工等各种用途的工具。正如直立人是从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直立人的手斧也是逐步地从南方古猿的“小圆石工具”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是通过集中精力于制造成一种较长、较直和较为锋利、形状较标准的工具而实现的。这个演变过程在奥杜瓦伊得到极好的说明。在奥杜瓦伊峡谷的两侧发现了许多地质层，其中大部分是近二、三百万年以来各个时期内由火山喷射物在古代湖泊中沉积而成的。在靠近底层的早期地质层中，发现有南方古猿的骨化石和小圆石工具。在那上面的那些地质层，小圆石工具不见了，

代之出现的是同直立人有联系的比较粗糙的早期手斧。再往上,在更后期的地质层中,由于生产技术和精细手艺有了重大发展,工具的式样和效用不断得到改进,比较后期的,即大约五万年到十万年前的“阿修尔期”<sup>①</sup>的手斧和劈刀,有些十分精美。在坦桑尼亚的其他历史遗址也发现了手斧和劈刀。世界上保存着最珍贵的文物的地方之一是伊西米拉,它是伊林加附近大路旁边一条由于雨水冲蚀而形成的大沟。数以千计的工具之所以能够聚集于一个地方,是因为当时在伊西米拉有一个湖泊(正如在奥杜瓦伊一样),许多大动物到这个湖泊找水和青草,在旱季尤其如此。这是打猎和采集的人群活动的理想环境。这些队伍在附近扎营,并使用石头和木制长矛打猎,也许还先把兽类赶进泥沼甚至陷阱。人们看到的手斧、劈刀、刮刀和刀子等石器,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家庭用具。到这个时候,人的体质、智力和技能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手斧时期临近结束时,人类已经越过直立人的阶段,开始进入“聪慧人”或“现代人”(modern man)的阶段。

即便在大约五十万年前的“直立人”阶段,人类已远远越过非洲的边界,分布到欧洲、亚洲和远东的广大地区。到了“聪慧人”阶段开始的时候,猎人兼采集者的原始群已经稀疏地分布到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当时的人还没有足够的征服环境的能力,不能移居到亚洲和欧洲的北部比较寒冷的地区或比较高的山区。在这些时期,即使在当时一直是人类世界和技术进步中心的非洲人,也仍然是草地和大草原的动

<sup>①</sup> 阿修尔期(Acheulian)是初期旧石器时代中的一个时期。——译者

物。他不仅避开缺食和缺水的最干旱地区，而且也要避开潮湿的林地和森林。进入林地和为适应林地而作的斗争，仅仅是大约四、五万年前才开始的新发展。这些新发展或者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或者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和旷野猎获的野兽稀少造成的。非洲的史前学家正是把人类开始具有这种不受气候和地域限制而移居的特别能力，作为划分旧石器时代（包括小圆石工具时期和手斧时期）和中石器时代的界线。

对于中石器时代，虽然已经知道一些值得调查的历史遗址，但在坦桑尼亚还很少进行研究。然而，通过同相邻地区得到的证据相比较，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大致的面貌。当某些猎人兼采集者的原始群正在适应林地环境的时候，继续留在草地和大草原的原始群变得更加擅长于猎取大的和中等的野兽了。他们学会制造精致的石矛，再装上木把，这比起旧石器时代的手握石器和木矛（矛尖可能是用火烧硬的）来，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林地的居民也开始制造有柄的工具，特别是打猎或捕鱼用的长矛头。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植物如浆果和其他野果，当然还有可以用棍棒和石锄挖掘的野生根茎和球根类植物。他们还发展了式样更多、效率更高的木工工具。虽然中石器时代的一些工具显得粗糙笨重，但是有一些工具却是非常精致的。由于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改革和脱离了使用手斧的旧传统，这个时期的工具同前一时期比较起来，一般都较小、较薄，因而效率更高。也许还没有到这个时期，非洲人就已经开始用火在晚上取暖和烹煮食物了。因此，在中石器时代，人类的智慧、技能、文化的进步和多样化都发展了，与此

同时,人类征服了更多的地区,人口也增长了。

这种进展一直继续着,到了大约在一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进展的速度无疑地加快了。如同史前时代的一切划分一样,这是一种武断的划分,因为变化当然是逐步的。但是这个时期有些进展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表现在石制工具体积更小和更精致了。最典型的是制造精致锋利的刀片,然后加工成小型工具,再嵌入或固定在木柄上。可以把几块刀片排列起来,制成削刀、锯子和各种工具,以加工食物、做兽皮衣或制造建筑材料;也可以把刀片安装在木制箭杆上作箭头或倒钩。虽然弓箭的发明是在人类历史的后期,但对于新石器时代和近代的打猎方法与生产的改革和现代化,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坦桑尼亚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最著名的一些遗址都有巨大突出的岩石作掩蔽,打猎的人群可以用来作宿营地,觅取食物的家庭在迁移途中也可以用作临时性住处。这些岩石掩蔽地既是作坊又是住处。人们在这里制造石制工具,加工兽皮和木材,修盖大概是单斜面屋顶的小屋。人们在这里烧饭、宴乐,无疑有时还举行舞会,特别是在打猎胜利之后。在许多这样的掩蔽地,尤其是坦桑尼亚中部的那些掩蔽地,都装饰着野兽和狩猎的壁画。有些壁画一定是记录了机智勇敢的人们在打猎中用狙击、陷阱以至伪装等方法取得成功的事迹。有些壁画可能只是描绘猎人想要狩获的野兽。这些壁画可能含有巫术的或者甚至是宗教的意义。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壁画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们清楚地表明当时人们依赖

643849

自然和打猎胜利求得生存,以及人们喜爱肉食。然而,即使在最富裕的猎区,人们的食物中也有一部分是植物。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坦桑尼亚猎人和采集者在体格和智力方面,都不次于我们现代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属于布什曼<sup>①</sup>种族系统,他们在人种和语言方面都同非洲南部的布什曼人和霍屯托人有关系。生活在坦桑尼亚中部主要岩石壁画区附近的桑达维人,直到最近还是靠打猎和采集为生。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科伊萨”(或“格利克”<sup>②</sup>)语系。住在埃亚西湖畔的哈德扎族(或廷迪加族)猎人大概也用这种语言。除了这两种人之外,从未听说过东非还有其他人会讲这种布什曼人和霍屯托人特有的语言。从这个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桑达维人(也许还有哈德扎人)是一度在非洲东部和南部草原和稀疏林地从事打猎和采集的布什曼型人的残存者。他们可能就是许多现代部族传说中的那种现已绝迹的矮个子猎人。

这些后期的猎人兼采集者实际上绝迹的原因,在于近三千年来那些文化和经济更先进、因而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部族进行了迁移和扩张。在这以前,人类的生活完全靠打猎、采集和捕鱼从自然界取得食物。这时,人类的基本经济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用耕作和畜牧来克服自然界的限制,生产食物。这种支配和改变植物与动物的进程,虽然对于现代人类

---

① 布什曼(Bushman)意即丛林人,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南部某些部族的侮辱性称呼。——译者

② “格利克”(click),指霍屯托人的一种发音。——译者



的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把坦桑尼亚近三千年的情况同那以前两百万年的人类生活相比较，它的历史却并不太长。然而粮食生产起了真正革命的作用。它使定居生活代替了游牧生活，它可以更多地和比较有规律地提供食物，这就导致人口的增加、分工的扩大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带来了文明。打猎和采集的部族人民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或者是与耕作粮食的部族通婚而被同化，或者是被赶到条件较差的地方去。

坦桑尼亚最早生产粮食的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种，他们的外貌大概类似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的语言属于库什特族<sup>①</sup>语系。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他们为了寻找播种谷子和其他农作物的新土地和放牧牛羊(绵羊和山羊)的新牧场，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向外扩张。当然，在有野兽的地方，他们还打猎。他们在肯尼亚高原找到了理想的土地，并从那里进入坦桑尼亚北部。在乞力马扎罗附近的恩戈罗恩戈罗以及在北部高原和大裂谷等地方，曾经发现这些早期粮食种植者的遗体 and 遗物。很可能就是他们开创了兴修水利的传统(虽然它的实际年代还不能断定)：他们为耕地建造了灌溉工程，为供草原畜群饮水修筑了水坝和水井。但是这些早期的库什特人缺少制铁的知识。他们使用的锄头和斧子等工具仍然用木材和石头来制造。这就限制了耕种的效率，同时他们也无法砍伐森林。他们没有扩展到坦桑尼亚的南部或西部，那些地方大约在此后的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仍然是猎人和采集

<sup>①</sup> 库什特(Cushitic)，古代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部族。——译者

者的天地。即使在北部地区，当时库什特语也只局限于少数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伊拉库(或叫温布卢)部族，因为许多库什特人在近一两千年内被其他种植粮食的部族同化了。这些部族是较晚进入坦桑尼亚的。他们都属于黑人种族，但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班图语系和尼罗特<sup>①</sup>语系。然而，同这些新来的人通婚并采用了他们语言的库什特人，并不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坦桑尼亚北部(还有肯尼亚)现存的尼罗特部族和班图部族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许多方面就是来源于古老的库什特部族。这是一个种族同化的过程，而不是种族消灭的过程。

现在回头来谈谈班图人和尼罗特人，有必要指出，他们都不是通过一次移民或征服进入坦桑尼亚的。这两个部族都是由许多三五成群的小部落所组成，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扩张、同化、适应和定居的过程，其中有的在将近两千年以前就开始这个过程了，有的则直到上一个世纪才开始。因此，目前各部族的状况，是许多世纪以来合并和分化的结果。

至于班图人，他们一般是从西部，也许是从南部移入坦桑尼亚的。第一批来到坦桑尼亚的班图人把迄今只有猎人兼采集者居住的地区开辟为耕地。基本上可以断定，考古学家在历史遗址上发现的所谓“凹底”和“刻纹”的陶器以及其他同类的器皿等文物，应该是属于这些早期扩张的班图人的。这一类遗址遍布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广大地区，从肯尼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湖区、卢旺达和刚果东部，直到开赛、赞比西和

<sup>①</sup> 尼罗特(Nilote)，原意为尼罗河流域的居民。——译者

林波波。这种陶器在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帕尔和桑巴拉山区的边缘,中部的桑达维,西部乌干达边界上的乌文扎以及靠近赞比亚边界的卡兰博瀑布,都有发现。这种非常分散的分布情况肯定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在考古学家进行了更多的勘查和发掘工作之后,可以期望在其他地区会发现许多新的遗址。现有的放射性碳年龄表明,这种陶器是在公元一至十世纪间制造的。这些地方的居民不仅种地,而且还锻造和使用铁。这同语言学证明的情况是一致的,即早期的班图人拥有冶炼和打铁的技术。使用铁器不仅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而且在比较潮湿、肥沃、适宜于种植香蕉之类作物的地区,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铁和香蕉,要开发象农圭、布哈亚和乞力马扎罗南部坡地等现在坦桑尼亚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铁器代替石器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它还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它也促进了班图人的发展。

这些早期铁器时代的班图垦殖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在他们的遗址上没有发现外来的物品。然而,制铁事业即使只是局限于本地区范围内,也必然要引起某种分工和交易。另外,盐这种稀有商品也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在西部的乌文扎发掘的两个古代盐井的最底层,发现了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虽然乌文扎的盐只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正规商队发展以后才大量开发,但是这个发现确实表明,盐和铁的贸易以及地区之间的接触起源于铁器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另一个古老的盐场遗址在鲁夸湖附近的伊伏纳。费根

在那里没有找到早期铁器时代的物品，但是他发掘到的一些迹象表明，采盐业大约有七百年的历史。

进入坦桑尼亚的尼罗特人，在某些方面同班图人形成对照。他们从肯尼亚经过草原地区通道南下，比较偏重游牧生活，而且他们扩张得比较快并且较多地使用暴力。由于北部高原和大裂谷地区已被库什特人占据，即使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尼罗特人，当时也被迫争夺土地。尼罗特人的一些集团比另一些集团更为成功些，但一般说来，他们往往控制和同化库什特人。在肯尼亚，他们完全控制和同化了库什特人。在坦桑尼亚北部，他们控制和同化了许多美好的草原地区的库什特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较好的军事组织，而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虽然如此，有许多尼罗特人不是被班图人（他们近几个世纪生活在北部高原边缘地区的周围）就是被其他尼罗特人的部族所同化，或被迫更多地从事农业。

尼罗特人分为三大支和许多分支，他们之间的差别要比班图人内部的任何差别都更带根本性，存在的时间也更长。东非的第一批尼罗特人属于“高原”支系。他们今天的主要代表是肯尼亚西部高原的卡伦津人。大约在一千年前，他们由于同化了早期的库什特人而成为在肯尼亚占统治地位的语言集团。有些“高原”尼罗特人向坦桑尼亚北部扩展，他们的后裔就是塔托加族（也称曼加蒂族或塔图鲁族）。塔托加人在同库什特人竞争（无疑地也同他们互相融合）之后，终于在大约两世纪前败于来自肯尼亚的更有组织的新入侵者，而且失败得很惨。这些新入侵者就是马萨伊人。他们也是尼罗特人，但

属于“平原”支系。塔托加人分散为零星小股躲到各个库什特部族和缓慢地发展的班图人内部或他们之间的空隙地方。在姆布卢、辛吉达及其邻近各县，虽然有一些塔托加人至今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而存在，但其余的塔托加人则被讲库什特语的伊拉库人所同化，可能还有更多的塔托加人已经或正在“班图化”，正如在坦桑尼亚中北部同一地区，残余的讲科伊萨语的猎人兼采集者以及许多讲库什特语的人所遇到的情况一样。

虽然伊拉库人在姆布卢县的大部分地区守住了自己的地盘，但他们也被从北方地区来的马萨伊人往后赶。恩加鲁卡看来很可能(虽然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证实)是伊拉库人居住过的地方。这是大规模的、突出的铁器时代的遗迹，位置在马尼亚拉湖和纳特龙湖之间的大裂谷陡坡脚下。有一些关于恩加鲁卡的报道是不确切的或者是夸大的。它肯定不是一个拥有数以千计的人口的“城市”，而是一个集中的灌溉农垦区。这里的遗物包括住宅、畜栏和广阔的田园体系。由于坦桑尼亚文物局最近进行勘查和挖掘的结果，这些遗物的意义就更明显了。这些遗物的年代还不清楚，因为放射性碳测量的结果是从公元五世纪左右到现代。一个具有这样规模和灌溉潜力的遗址，按理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或者是几个不同的时期中应该有人居住，但是考古学上的证据却根本不能证明这个遗址住人的时间有这样长。有一组遗物的放射性碳年龄是在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这可能就是恩加鲁卡住人的主要时期。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坦桑尼亚有一个地区的班图族不但没有前进，实际上反而被迫后退了。这个地区就是维多利亚湖东部的北马腊。这里的洛族人属于尼罗特人的第三支系（称为“河—湖”尼罗特人），他们在过去一百年内从肯尼亚方面进入坦桑尼亚，同一些本地的班图人通婚并同化了他们。

上述这一切表明，坦桑尼亚是一个种族极其复杂的国土。住有讲科伊萨语、库什特语、尼罗特语和班图语的居民的坦桑尼亚中北部，事实上是整个非洲大陆语言最复杂的地区。坦桑尼亚的其余地区则完全讲班图语。现今的坦桑尼亚人，95%是出身于讲这种或那种班图方言的家庭，而全部班图方言有一百种以上。但是种族和部族的多样化，并不是坦桑尼亚历史的唯一特征。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种族和部族之间的区别经常被种族同化和文化融合所抵销。同样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而得到的发展，正在发生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上全面融合的过程。斯瓦希里语本身就是一种班图语。它早期的发展是在沿海一带。由于沿海地区与阿拉伯、印度和印度洋沿岸其他地区有着长期通航和贸易联系，这里逐渐“非部族化”了，需要一种通用的混合语言。斯瓦希里语自然吸收了许多外来语，特别是阿拉伯语。但是它的基本结构和词汇仍然完全是班图语，沿海一带的斯瓦希里语的每一种方言都反映着同内地的联系，这些联系有助于使斯瓦希里语保持着必要的坦桑尼亚风格。此外，虽然来自阿拉伯和其他地方的外国商人在沿海定居和通婚，并帮助传播某些文化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他们

并没有使沿海地区“阿拉伯化”，相反，他们如同内地的老一代居民同新来者合为一体一样，也被斯瓦希里人同化了。由于十九世纪沿海和内地联系增加，到了二十世纪又进一步地结合在一起，采用斯瓦希里语作为超越坦桑尼亚历史上语言和部族差异的国语就更为适当了。它不再仅仅是沿海地区的语言，它正在吸收内地各种方言的词汇，以适应发展中的现代国家的需要。

## 第二章 1800年以前的内地

伊萨利亚·基曼博

直到最近，十九世纪以前的东非历史被当作沿海城邦及其与印度洋贸易关系的历史。在坦桑尼亚，人们主要注意基尔瓦和桑给巴尔。这并不是因为内地无人居住，而是因为历史学家们只寻找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而沿海地区恰好有一些这样的材料，有的是编年史，有的则是早期到过沿海地区的旅行家们的记录。内地的人民固然有他们自己的历史，但还没有写成文字，因此历史学家们在处理这一类材料时，感到难于胜任。不过，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已经有人作出努力来表明，只要小心地使用口头材料，也可以得到与文字记载材料具有同等价值的历史知识。事实上，奥利弗教授在《东非史》(第1卷，1963年牛津出版)一书中大胆地泛论坦桑尼亚内地时，就是想使历史学家注意这个事实。

不幸的是，搜集坦桑尼亚口头传说的工作还做得很少，我们从考古学和语言学得到的资料也是有限的。就许多种族来说，甚至连人种学知识也是缺乏的。奥利弗教授的大胆著作多半是根据殖民地行政官员所搜集的“地方志”上记载的情况。可是最近对口头传说所进行的认真和科学的搜集工作，开始证明“地方志”所提供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有些记



裁尽管准确,却又太肤浅了,不能反映坦桑尼亚内地早期的情况。即使加上最近搜集到的新材料,我们关于内地的知识仍然是贫乏的。我们对大部分种族还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本章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然而首先要指出,奥利弗教授的论述现在看来是过于简单化了。

要描画出整个坦桑尼亚政治组织的结构是不可能的。现有的少数事例所显示的复杂情况,又使我们不能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因此,本章的表述将显示出我们的历史知识只限于局部地区,而且是不平衡的。同时,我们还将研究通过这种讨论可能得出的结论。

### 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形势

在谈到坦桑尼亚民族的由来时,我们曾经指出,大约95%的人民是讲班图语的。同时我们还认为,讲班图语的人早期向雨量大的地区扩展并在那里种植香蕉。因此,到了公元十世纪的末期,这些地区基本上成为讲班图语地区,而公元十世纪以后班图人的移动,就是从这些人口集中的地区分布到其余地区的。到1500年时,这些多雨地区在向稳定的社会演变的道路上已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样的社会在以后的许多世纪里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变化。

现有证据表明,到1500年时,至少在三个地区,即坦桑尼亚东北部、布科巴和南部高原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成为这些地区以后发展特征的主要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的主要特

点就是形成了由某些王族控制的小酋长国，这些王族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祭祀和礼仪而不是行政管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北帕尔区的格韦诺族，<sup>①</sup>根据那里的口头传说，格韦诺人在十六代之前<sup>②</sup>就已经建立了由铁匠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了。铁匠的权力中心在于他们控制铁的供应，铁被用来制造赖以获得繁荣的工具和农具，以及制造保卫本部族的武器。围绕着这些活动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同保证部族的延续性和成功的祭祀与礼仪活动联系着的。但是与此同时，铁匠不得不把大部分行政职权交给指定的平民和氏族长老，他们不受中央的严格监督。这个时期各个氏族拥有自己的强大组织，而酋长国的权力只是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才受到尊重。关于这个地区其他部族的早期历史了解得不多，在乞力马扎罗和桑巴拉族地区可能也有类似的社会演变。据说当基林迪家族于十八世纪来到桑巴拉的时候，桑巴拉是在铁匠家系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的名字是图里或图利。<sup>③</sup>

而图利……受到大声喝采，他显示了他的打铁技能和他的口才，他赞美他的熔铁炉的火焰，夸耀他如何用长矛杀死帕尔人，如何锻造箭、剑、斧、刀和矛，而且还能打制锡子……。

在布科巴县和比哈拉穆洛县，口头传说提供的证据也表

① 详细情况可参阅基曼博：《(1500至1900年前后)坦桑尼亚帕尔区政治史》，1969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

② 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趋向来看，一代的时间约为三十年。因此十六代前的时间约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

③ 《基林迪情况》，1962年内罗毕出版，第36页。

明,在希马统治者来到这个地区之前(可能在十六世纪的某个时候),在从事农业的部族中已经形成了若干世袭统治家族。例如,卡拉圭有巴西塔家族;布津扎有在欣达王朝建立之前掌权的巴赫塔家族。<sup>①</sup>在上述地区以南,欣达王朝势力已经渗入的哈族地区,据说巴特科家族一直到现在仍保持掌管祭祀和礼仪的职权和控制土地的分配。所有这些例子看来可以说明,这个地区的政治组织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的发展是同这些部族社会在其特殊环境中的需要相适应的。正是这种早期的发展为150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的进一步革新和演变开辟了道路。

我们关于南部高原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莫尼卡·威尔逊<sup>②</sup>指出,尼亚库萨和恩贡德的两大酋长家族系统,自称是从利文斯敦山区的金加移来的,时间大概是在十六世纪。尼亚库萨家族更是在迁离金加地区之前就已经延续了八代之久。<sup>③</sup>这些传说同时表明,这些统治集团的一些祖先在回到尼亚库萨—恩贡德地区之前还到过比萨地区。我们对于金加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使事情更加复杂化的是,尼亚姆万加统治家族(铁匠)自称他们来自比萨地区,有些传说甚至说,他们的祖先穆西亚尼曾经和另外三个来自卢巴—隆达地区的人同

---

① 汉斯·科里:《布科巴地方志》,1958年姆万扎出版,第17页;泰勒:《西部湖间地区的班图人》,1962年伦敦出版,第144页。(B. K. Taylor:《The Western-Lacustrine Bantu》)

② 《尼亚萨—坦噶尼喀走廊的部族》,1958年开普敦出版,第12页。(《Peoples of the Nyasa-Tanganyika Corridor》)

③ 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人的宗族礼仪》,1958年伦敦出版。

行，他们是：班巴的奇蒂穆库卢，恩贡德的基温古和兰比亚的卡梅内。根据贝弗利·布罗克<sup>①</sup>的看法，尼亚姆万加酋长家系的建立可能是在1500年以前。而根据班巴的历史，奇蒂穆库卢时期则要晚得多。<sup>②</sup>这一切看来表明，到1500年时，这一地区的某些部族已经为以后的革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他们已经演进为稳定的农业社会，拥有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其他地区相似的小酋长国。虽然卢巴—隆达地区的统治集团后来迁入这个地区，但是关于这个地区在十六世纪以前同比萨和班巴有联系的说法，可能是后来因为这两个集团在近期拥有势力而编造出来的。

### 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发展情况

150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部族社会扩展到在那时以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的地区，同时，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期中，又采取了维持和管理现有部族社会的新的方法。坦桑尼亚这个时期的历史过去被过分地简单化了。因为，人们很容易或者把十九世纪看做是变化的时期和把1800年以前的时期看做是坦桑尼亚许多部族社会停滞不前的时期，或者虽然承认1800年以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有变化

<sup>①</sup> 《非洲编年史和家谱概览：走廊地区》，1966年7月伦敦非洲编年史会议出版，第17页。（《Survey of African Chronology and Genealogies: The General Corridor Area》）

<sup>②</sup> 安德鲁·罗伯茨：《刚果的移民（公元1500至1850年）》，载布赖恩·法根主编《赞比亚简史》，1966年内罗毕出版，第105页。

甚至有“改进”，但却认为这种变化是由某些具有专门“知识”的“优秀”种族集团创始的。

虽然可以把促进这个时期发生许多变化的因素归之于新的部族集团到达那些已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下面提出的一些例子将阐明三个要点：第一，并不是由那一个单独的集团把这种变化和“改进”的思想传播到坦桑尼亚的所有地方。第二，即使一个地区的思想传播到了另一个地区，本地的首创精神也改变了从外地传来的思想并使之适应本地部族社会的需要。第三，在部族内部实行变革不是儿戏，而是作为解决日益复杂的部族社会问题的手段。因此，人们不能坐等其他个人或集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自己在他们的部族内部找到了解决办法。为了阐述以上各点，本节分为四个小节：（一）西湖地区；<sup>①</sup>（二）“恩特米”地区；（三）东北地区；（四）南方地区。

### （一）西湖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布科巴县、卡拉圭县和比哈拉穆洛县，还可能延伸到哈族地区。这个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是同当时乌干达西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事情有联系的。有人认为，1500年以前，在布尼奥罗建立了一个大王国，它的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卡格拉河。这个王国叫做基塔拉王国，统治者的称号是巴奇维济(Bachwezi)。据说，这个王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一种特别的等级制度为基础，把人民严格划分为不同

<sup>①</sup> 指坦桑尼亚西北部的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译者

阶层，并明确规定了各个阶层的义务和职责。从事游牧的希马人是最高的阶层，统治者就是从这个阶层产生的。他们下面是巴伊鲁，从事农业并对希马人承担各种义务。关于巴奇维济和布尼奥罗的基塔拉王国的大部分传说都很象神话。至今还不能从如此古老的传说中重新勾画出比较清楚的概貌。但是我们对于西湖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则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因为看来它是后来才扩展到这个地区，并持续到更接近于现代的历史时期的。根据布尼奥罗的传说，一个称为比托的被同化了的洛族集团在1500年左右当了权，<sup>①</sup>巴奇维济人被赶出了布尼奥罗。据说他们向南方撤退。有人认为，他们的南下把等级制度推广到了哈亚族、津扎族，可能还有哈族。据说这个制度差不多在同一时候还推广到卢旺达和布隆迪。后两个地区的牧民称为图西或巴图西，农民称为巴胡图。

这个时期建立的哈亚—津扎族土邦被称为欣达土邦，因为人们认为欣达土邦是由一个名叫鲁欣达的人建立起来的。据说他是瓦马拉的兄弟，瓦马拉是布尼奥罗的基塔拉王国的最后一个巴奇维济族的国王。他在西湖地区的首府是卡拉圭，但是据说他曾经把他的“帝国”扩展到其他哈亚族土邦和布津扎族地区。从另一个传说看来，鲁欣达的统治还曾经扩展到布哈。<sup>②</sup>鲁欣达“帝国”同卢旺达与布隆迪的关系还不清楚。在西湖地区，看来新的制度是在当地农民已经准备好了的政治

① 奥戈特：《南部洛族史》，1967年内罗毕出版，第46—47页。（B. A. Ogot: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uo»）

② 比吉利马纳：《乌图姆瓦家族史》（斯瓦希里文版），1963年出版。（R. B. K. B. Bigilimana: «History ya Familia Kutokana na Utum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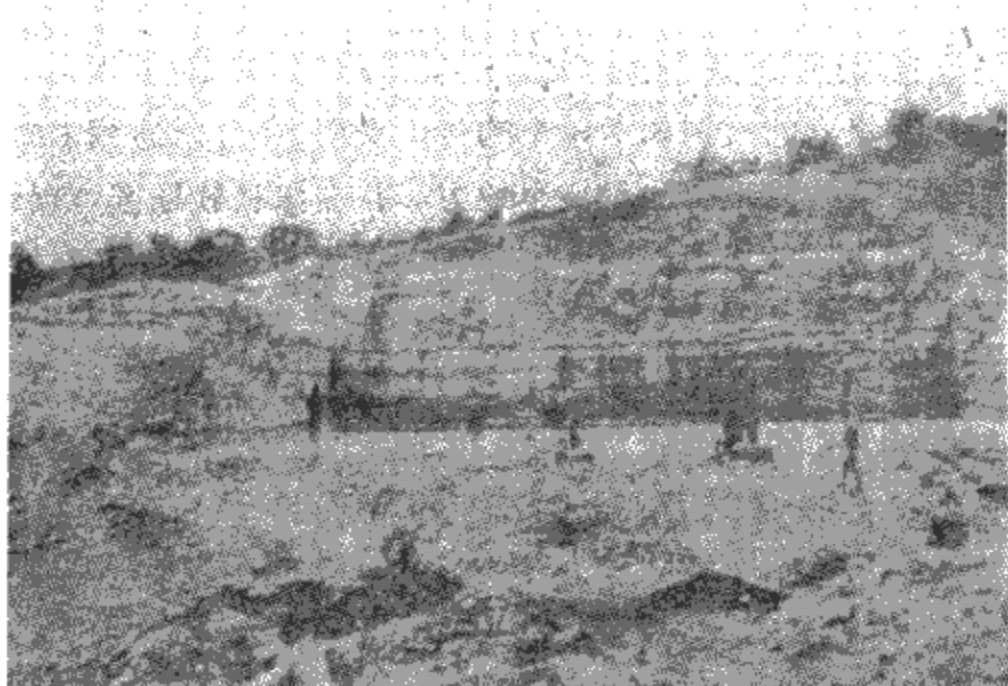
基础之上建立的。例如卡拉圭的传说表明，在鲁欣达到来时，巴西塔氏族的诺诺统治着这个地方。在布津扎族地区，据说鲁欣达征服了那里的统治者巴赫塔氏族的桑萨马。在别的土邦还可以听到类似的故事。只有在基齐巴，当地的统治者恩图姆瓦被另一个新从布干达来的人所推翻，他留下来的名字叫基比，据说他是鲁欣达的母亲恩朱娜基的另一个“儿子”。<sup>①</sup>还不清楚希马人是如何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这个地区的人民的。有人说是征服的，有人说是用诡计骗取的。<sup>②</sup>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是在当时扩展到布哈，那末征服的说法看来是缺少根据的，因为那里原来的统治者巴特科人仍然保持优势，能够控制新酋长的就职和土地的分配。<sup>③</sup>

互相接受新制度的情况可能比已经知道的要多。新来的人有两种东西使他们容易受到尊重。第一，他们拥有牛群。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人都知道，“安科累”种的长角牛是由希马人带到这个地区来的。但是汉斯·科里说，卡拉圭原来的居民是班扬博人，他们“饲养一种短角平背的牛，这种牛一直流传到现在”。在这个地区，今天可以看到短角驼峰的“泽布”（Zebu）牛。但是许多人会说，这种牛是最近从苏库马族地区带来的。尽管如此，目前这个地区的牛群绝大多数是“安科累”牛，其他品种的牛是为数不多的。第二，新来的人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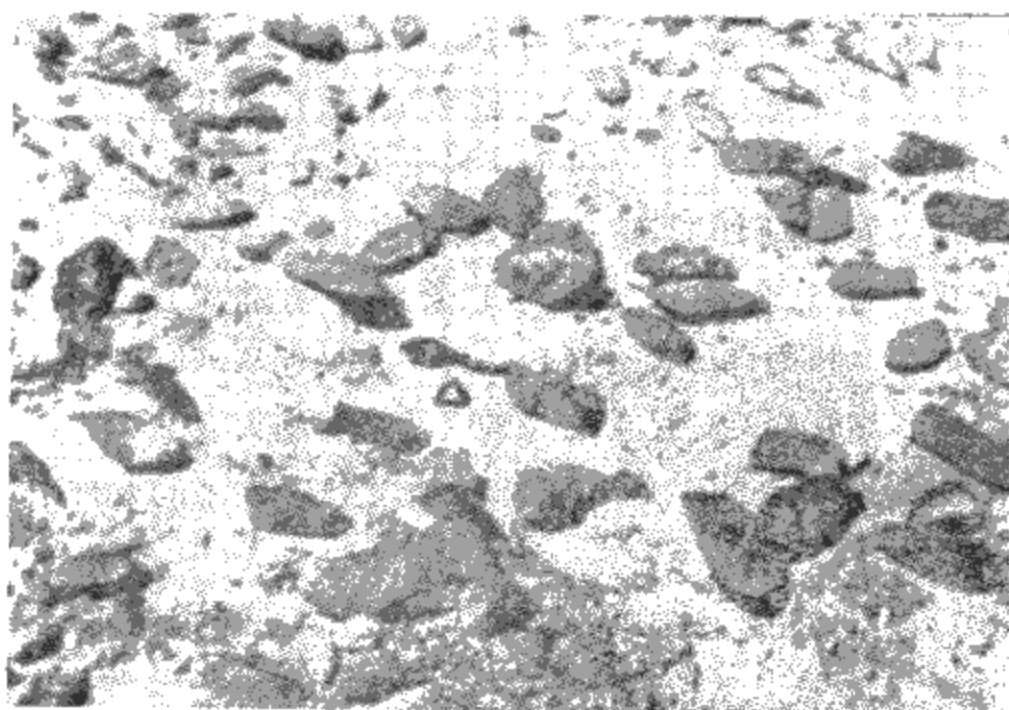
① 汉斯·科里：《布科巴地方志》，第69页。

② 科里的上述著作提供了这个地区最容易得到的传说（应当批判地利用）；福特和霍尔：《卡拉圭史》。

③ 托尼：《布哈的赫鲁酋长国的标记和礼仪》。（J. J. Tawney: *Insignia and Ceremonies of the Heru Chiefdom of Bu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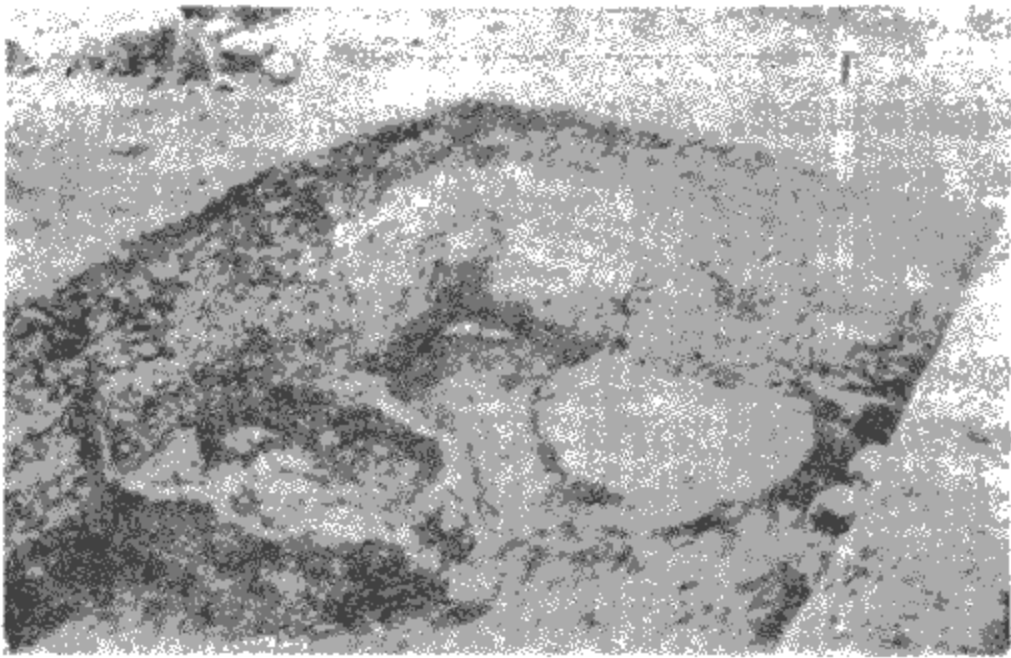


(一) 奥杜瓦伊峡谷河床之一：图为被发掘的“东非人”的遗址，在这些古老的河床中埋藏着一两百万年以前的骨化石和人类最早期的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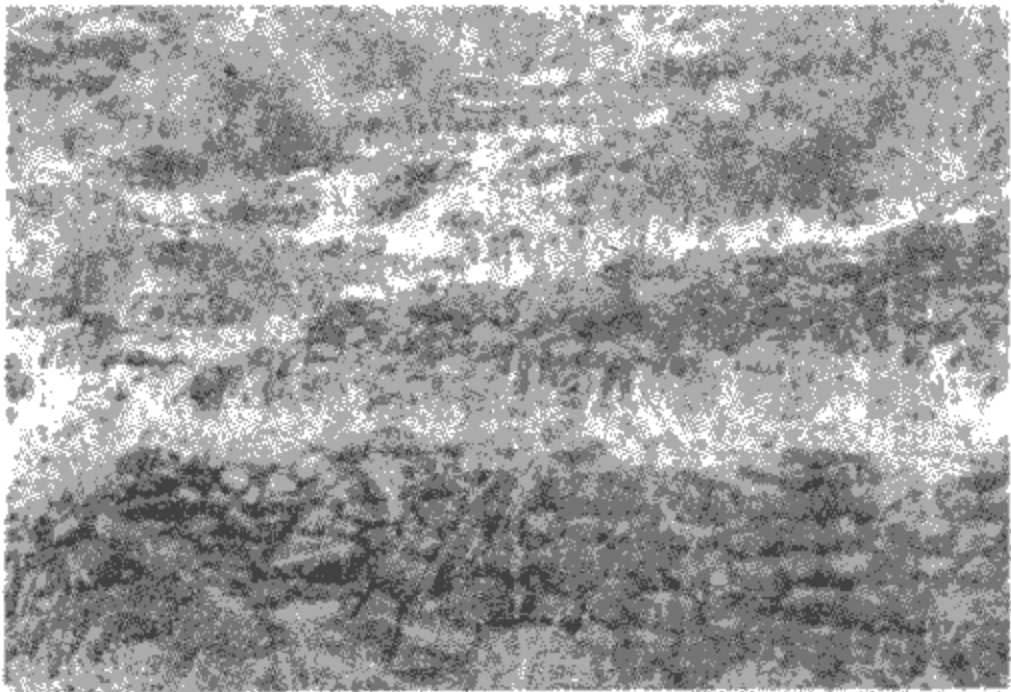


(二) 伊林加附近的伊西米拉：距今约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手斧和劈刀（图正中△处有一个现代瓦工用的五英寸长的泥抹子，可供比较）。





(三) 在乌文扎发掘的古老的盐池。图中所示盐池是泥土造的，供貯放盐水之用，池内有炉石、破罐以及在蒸发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残渣。这一层是十九世纪发掘的。下面还有一千五百年前的更早期的盐池遗迹。



(四) 恩加鲁卡：用石头砌成护坡的田地，现早已废弃。

王权的特别标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室的鼓。拥有财富和某种王权的标记，包括使用这些标记的思想，就成为这个新制度的基础。

大多数人比较强调种族在等级制度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牧民阶层的身体特征表明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是这种特征是否存在，却是可疑的。还有人想用这种特征来证明有一个高人一等的“含族”曾经在这个地区普遍建立政治组织，但是现在应当看到，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神话。这种思想不仅是陈腐的，而且丝毫无助于说明这个地区发生的情况。由于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属于班图语系的部族，这种等级制度就应当被看做是对于维持这个制度起有利作用的一种意识形态。它规定了一种使各个阶层互相隔离的社会结构，借以使某些阶层永远保持优越感和使另一些阶层永远保持自卑感。但是同时它通过保护制<sup>①</sup>提供了一种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安全的手段。西湖地区的等级制度似乎没有象卢旺达—布隆迪或安科累那样严格。哈亚族的保护制在统治者和农民之间，以及在统治者和希马牧民之间起着更直接的作用。这意味着牧民对低于他们的阶层进行剥削的机会少了。这也许就是农民为什么声称“穆卡马”<sup>②</sup>给他们牛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希马人不可

---

① 保护制(Clientship)是这样一种制度，即地位较低、财富较少的个人，向别人提供服务，以换取某些权力如母牛使用权、军事保护权等。见马奎特：《图西统治问题》(J. J. Maquet: «The Problem of Tutsi Domination»), 载西蒙和波埃贝·奥登堡合编：《非洲文化和社会》，1960年纽约出版，第312—317页。(Simon and Phcebe Ottenberg [ed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Africa»)

② “穆卡马”，斯瓦希里语，意为土王或酋长。——译者

能比其他地区的希马人少很多。这一切可能意味着西湖地区原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十分牢固，要把它完全排除掉是不容易的。统治者在执行这个制度的许多重要职能方面对农民的依赖程度，证实了这种假设。<sup>①</sup>

这个地区的主要政治变革是实行了王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不仅是一个掌管祭祀和礼仪的领袖而且是行政长官。所有为“穆卡马”服务的人都是依附于他的侍从。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只是依附于主管县区的王室人员（“巴孔古”），但也常常有人依附于各县和宫廷的平民。事实上，宫廷的大部分重要职务，包括“卡蒂基罗”<sup>②</sup>在内，是由平民担任的。而且，这种体制是在原有的氏族制和家族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氏族和家族的领袖在本氏族和家族中保持着他们的权力。据说一些势力较大的氏族甚至在“穆卡马”宫廷中保持着永久的官邸。因此，在殖民统治时期采用了一些氏族的名字（例如布科巴和哈亚）是并不奇怪的，但也许是不自觉的。

关于1500至1800年期间这些土邦的详细情况仍然不清楚。的确很难说，在鲁欣达统治时期整个地区统一到什么程度。但是所有这些土邦的传说一致肯定，鲁欣达死后，各邦都独立了。卡拉圭直到十九世纪还拥有比其他各邦高一些的地位。例如，据说布津扎曾经把他新任命的酋长们派到卡拉圭举行就职典礼。<sup>③</sup>还有人认为，布尼奥罗的比托王朝一直试图

① 泰勒：《西部湖间地区的班图人》，第132—147页。

② “卡蒂基罗”(Katikiro)，斯瓦希里语，意即首席顾问或首席部长。——译者

③ 泰勒：《西部湖间地区的班图人》，第145页。

控制欣达的各个土邦，但没有成功。据说，快到十八世纪末，当恩塔尔六世统治卡拉圭的时候，布尼奥罗曾经入侵卡拉圭。<sup>①</sup>在这期间，布哈可能是一个强大的酋长国，因为正是在它的帮助下，恩塔尔才赶走了入侵者。

因此，到1800年时，西湖地区有许多酋长国，但是由于从外面传来了等级制度以及采取了更为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制度，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在农业部落社会里推行了贯串于整个价值体系的畜牧业，经济制度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初看起来，人们可能把整个等级观念看做是使欣达酋长国在本章探讨的这个历史时期得以延续下去的主要因素。然而更确切地说，是保护制使这个新制度能够依靠这个地区的农业部落社会存在下去，而且正是这种保护制赋予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

## （二）“恩特米”地区

“恩特米”地区包括坦桑尼亚整个西部和中部，那里的统治者叫恩特米或穆特米。一般说来，恩特米同西湖地区的土王或酋长并无区别。他必须拥有某种神圣的象征；他必须主持某些宗教礼仪，最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幸福被看成就是他的酋长国的幸福。在某些地方恩特米的地位更多的是属于宗教礼仪方面的，而在另一些地方，他在政治上起更积极的作用。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在部族里掌权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是以恩特米的名义行使职权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政治组织的

<sup>①</sup> 福特和霍尔：《卡拉圭史》，第6页。

规模。因为这个地区的环境与种植香蕉的地区不同，它依靠耕种谷类作物和养牛的农业部族不断地扩大他们的住区。同时，因为这种经济只能抽出较少的人力来行使官僚的职责，它能抽出来供养这些官僚的财力物力甚至更少，因而这类酋长国具有不断分裂和组成新的单位的趋势。

据估计，这个地区可能组成了两百到三百个酋长国。环境的因素可能是使得政治单位越来越多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地区的北部、南部和东部是多雨区。当多雨区出现人口增长的压力时，就可能向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扩展。这样，这个地区的居民虽然存在着组成单一语言集团的趋势，但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促进了许多酋长国或酋长国集团的形成，特别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个时期，每一个新的移民集团都倾向于建立他们自己的酋长国。

沿坦噶尼喀湖一带，在哈族和尼亚姆维济族的一些土邦，以及在乌季季、文扎和菲帕等酋长国中，流传着关于图西家族在十八、十九世纪从布隆迪（可能还从卢旺达）进行扩张的故事。然而这种扩张并没有使西湖地区的等级制度往南推广，因为这种扩张只不过是个人或家庭的迁移。虽然这无疑地意味着西湖地区的政治制度向南推广了，它包括以下的内容：鼓是王权的象征；酋长既是祭祀和礼仪的主持者，又是行政长官；酋长的部属都要对他直接负责等等。至于其他方面，南方的制度同恩特米地区相似。因为这里有一些酋长实行母系继承制，不同于西湖地区的父系继承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为了了解这些所谓图西家族是怎样扩张的，让我们考察一下菲帕族地区的事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sup>①</sup>根据威利斯的说法，菲帕族地区最早的统治者是米兰西家族，他们可能在1675年至1725年之间从西南来到菲帕族地区的中部。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属于从卢巴—隆达地区进行扩张的一般类型。菲帕族的传说表明，这个地区原来居住的是猎人，米兰西家族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批定居的或从事农业的集团。据说他们还带来了炼铁术，所以是闻名的铁匠。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手艺，不让后来移入这个地区并接管政权的特瓦家族或特瓦奇家族学会这个手艺。从有关解释这个变化过程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和平地进行的，证据是，当时的解决办法保留米兰西家族在祭祀和礼仪上的优越地位，使米兰西族长能够控制原有的宗教礼仪中心，同时充当整个地区的“牧师”。新的酋长的上台仪式必须由他主持。这种变化大概发生在十八世纪的中期。传说的第二点是关于母系继承制问题。这种传说把北方新来的人说成是两三个妇女。这可能表明米兰西家族一向是父系继承制，母系继承制是在新的王朝到来之后才实行的。

有些作者报道，苏库马族、尼亚姆维济族和金布族也实行酋长职位的母系继承制。亚伯拉罕斯在他的《北尼亚姆维济

---

① 威利斯：《菲帕族地区的传统历史和社会结构》（《Traditional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Ufipa》），载《非洲》杂志第36卷第4期（1964年10月出版）。同一作者所写的关于菲帕族的更完整的历史，载安德鲁·罗伯茨编《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七个地区的历史》，1968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

区酋长的继承问题》<sup>①</sup>一文中指出，母系制和父系制的酋长国同时存在，虽然由于十九世纪长途贸易的影响而使一些母系制的酋长国后来变为父系制的酋长国。汉斯·科里也说到苏库马族中同时存在着父系制和母系制的酋长国。由于存在这种母系继承制，某些作者就认为，在希马人到来之前，酋长制可能是从湖间地区推广到尼亚姆维济—苏库马族地区的，而且当时大部分湖间地区大概是实行母系制的。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有一些迟至十七世纪才建立的酋长国（我们在金布族地区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仍然是母系继承制。

另一个更言之成理的假设，认为母系继承制是另一种政治观念。在西湖地区，等级制提供了一种可以使这种政治制度永久存在下去的手段。在恩特米地区，母系继承制起着同样的作用。在北尼亚姆维济的卡姆巴酋长国<sup>②</sup>和南金布的尼桑巴酋长国，<sup>③</sup>统治集团形成了一个贵族阶级，但是母系继承制只适用于酋长的职位。头人和其他职位则实行父系继承制，这个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平民。这个办法使一切享有世袭官职的人不能竞争酋长的职位。由于贵族妇女结婚后仍留在本家族中，这也就保证了统治“阶级”能够继续存在。

---

① 载 J. R. 古迪编《高级官职的继承问题》（《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196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27—141页。关于苏库马地区，科里在《恩特米》一书中也支持这一论点。

② 亚伯拉罕斯：《尼亚姆维济的政治组织》，第130页。

③ 肖特神父：《金布人》（Fr. A. Shorter: 《The Kimbu》），载罗伯茨编《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

为什么有些酋长国需要这种(母系继承制的)保护而有些酋长国就不需要,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在不排除这方面的有些做法的偶然性的同时,我们在现阶段可以提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当然还需要关于这个地区各种政治单位的更多材料才能够得到证实。比较可能的是,酋长继承者需要某种安全措施来保证以前掌权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仍然保留了某些权力)不再觊觎酋长的职位。亚伯拉罕斯写道:在卡姆巴酋长国中,设有“恩加贝”的官职,据说担任这个官职的人是酋长继承制的监护人。这无疑是科里描述苏库马族制度中所谈到的同样的官职。<sup>①</sup>根据苏库马族的传说,恩加贝又称为恩特米—恩霍扎。在举行新酋长的就职仪式时,由恩加贝带领游行队伍,把一副矛和盾授给新任命的酋长。根据当地人民的回忆,他们酋长国的原来统治者的称号是巴特米·巴霍扎。这些统治者虽然放弃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但仍保有掌管祭祀和礼仪的重要职权。

事实上,恩霍扎的意思是恢复健康。因此,这个部族认为占据这个职位的人的健康和满足关系到他们酋长国的繁荣幸福。当一个恩特米—恩霍扎死后,其继任者的任命方式同任命一个酋长是一样的。唯独金布族的做法不一样。但即使在那里,尼桑巴人也承认,当他们来到这个地区时,那里已经有别的部族,虽然他们用口头传说中常见的陈词滥调来描述这些比他们先来的人,说这些人住在洞穴和小茅屋里,看到新来的人就逃走了。

<sup>①</sup> 科里:《恩特米》,第3,21—23页。



为了说明恩特米地区的酋长国是怎样形成的，让我们对金布族地区作一简短的考察。在十七、十八世纪，那里建立了三个酋长国集团。首先是尼桑巴部族，大约有十八个酋长国。虽然肖特神父曾经力图把他们的发源地追溯到远至西北部的苏布瓦族区，但他们的传说表明，他们来自戈戈族地区西部的尼安格威拉族地区。他们可能是在十七世纪末来到金布族地区的。这些酋长国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似乎有高低之分，而以威坎古卢为中心。有意思的是，尼桑巴酋长国的王室标记不是西湖地区那样的鼓，而是一个精心雕刻的木制魔号。其次是尼图姆巴族，他们可能是在十八世纪来到这里的，在尼亚姆维济族地区建立了十一个酋长国，在金布族地区建立了八个酋长国。据说，尼图姆巴族是从东部（桑加拉族地区）来的，而且曾经带来了炼铁术，还带来了一种酋长的新标记：从印度洋得来的圆盘状蚌壳。这两个部族把他们的标记分发给来自南方（伊林加）和来自鲁夸湖彼岸的其他部族，建立了一些从属于他们的酋长国。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据说有另一个部族从乌萨加拉地区来到这里，人们通常称他们为伊古尔威比人。他们在金布、尼亚姆维济和伊兰巴—伊姆比地区建立了酋长国。关于伊古尔威比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自称在原籍是猎象的。这可能是一个旁证材料，说明在十八世纪末期，象牙贸易正在成为开辟恩特米地区和沿海之间长途贸易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来自四面八方的部族是怎样组成许多酋长国的。金布族地区的情况只不过是整个恩特米地区的

一个例子。虽然多数酋长国是独立的，但它们往往通过亲戚关系或者通过分发王室标记来建立附属酋长国，从而联结为酋长国集团。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标记是轻易分发的。事实上，在经济制度无力维持大的政治单位的地区，解体和分割的整个过程是有好处的。戈戈族地区的酋长国变得非常小，以至于穆特米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氏族的族长。

### (三) 东北地区

本节所说的东北部是指包括桑巴拉山区、帕尔山区和乞力马扎罗在内的高原地区。前面已经说过，在十六世纪以前很久，班图语系的部族就已经在这个地区定居。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又有许多部族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区。有的从南方恩古鲁山区越过庞加尼平原来到这里；有的则来自东方，通常是经过泰塔山或者来自卡姆巴地区；有的则来自马萨伊草原。来自南方的移民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恩古鲁山区属于同乌萨加拉联接的地区，那里的人是向四面八方迁移的。人们认为，这可能是尼亚姆维济—苏库马地区的政治思想传入东北地区的途径。现在应当清楚了，那种笔直的捷径是找不到的，因此应当修正这种传播论者的观点。从我们所知道的帕尔人的情况（他们自称是从恩古鲁山区迁移来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乌萨加拉和汉德尼之间地区的居民，曾经向各个方向迁移。不幸的是，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关于移往东北高原的行动，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在恩古鲁山区

和桑巴拉区或帕尔区之间有一片半干燥的平原，它对农业居民没有吸引力，因此那些往北迁移的人自然注视着前面的山区。有意思的是，在南帕尔区，发源于恩古鲁山区的所有氏族都是平民氏族，而掌管求雨的王族则发源于不存在王权传统的泰塔山区。<sup>①</sup>

关于恩古鲁山区统治者的迁移，唯一知道的情况是，基林迪家族在一个名叫姆贝加的人领导下，在十八世纪的某个时候迁到桑巴拉区。前文已经说过，桑巴拉区有一种由铁匠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前文还说过，在十五世纪结束之前，格韦诺区（北帕尔）曾经建立过类似的制度。甚至象乞力马扎罗，我们对于那里十八世纪以前的情况几乎什么都不了解，然而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各个小酋长国显然都在竞相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sup>②</sup> 如果比较一下桑巴拉区的状况和格韦诺区发生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姆贝加的“入侵”的意义。在这两个地区，铁匠控制下的松弛的政治制度，已不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部族社会的需要。在乞力马扎罗，建立在山脊上的小单位看来较为可行，而格韦诺区和桑巴拉区等较大的单位则需要更有效率的统治机器。基林迪家族的到来推动了桑巴拉区的变革。在格韦诺区，大约在十六世纪初（十六代前）从内部开始了类似的改革。<sup>③</sup>

格韦诺区的“革命”是由平民氏族（瓦苏亚）发动的，它的

---

① 基曼博：《坦桑尼亚帕尔区政治史》，第3章和第5章。

② 斯塔尔：《乞力马扎罗地区查加族史》，1964年海牙出版。

③ 基曼博：《坦桑尼亚帕尔区政治史》，第4章。

一个成员当时主持朝政。许多瓦沙纳(铁匠)在内战期间被排除了，而瓦苏亚族只经过一代的时间就牢固地掌握了大权。这次革命是由一位名叫安戈维的人领导的，但是改变整个王国面貌的改革则是由他的儿子姆兰加创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坦桑尼亚，必须把姆兰加作为最先进的改良者之一来纪念。他创建了一种中央集权化的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首先，他把原来由各氏族分别掌管的启蒙制度改为集中管理，使这种制度成为既是一种有用的教育制度，又是一种有用的政治制度。格韦诺区的启蒙学校同其他许多地区的这类学校不一样，它不但规定儿童入学，也要求成年人入学。这样，学校就往往成为执行许多政治处分的一个渠道。

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二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每个部门由一名“大臣”领导。在这方面，姆兰加也是富于改革精神的。他创设了一个“大臣”级的职位，以指导农业和鼓励人们按时耕种。这位“农业大臣”在每个县都有若干名助手。第三项改革是创立了各级参议会，有县一级的，也有整个王国的。统治家族的成员逐步地被派到各县担任统治者。整个北帕尔高原在四代的时间内被置于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下。格韦诺王国一直到十九世纪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事实表现了上述制度的稳固性。

根据传说，桑巴拉是从姆贝加到达后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然而，正如《基林迪情况》所指出的，这个传说有若干可疑之处。例如，图里被描绘成一名有势力的统治者：

不管是谁踏上桑巴拉的国土，

必须承认他是图里的臣民。这个氏族  
掌管着这个国家，因为上帝赐给他们  
炼铁的才能和作战的本领，  
于是他取得了这块国土。(第 36 页)

可是，据说姆贝加是和平地接管这个王国的，因为图里听说布姆布利人拥立了这位勇敢的“猎人和魔术师”(即姆贝加)，于是图里就邀请他到伍格哈，把酋长的职位让给他。这是不大可能的。的确，从香巴族人在这期间被赶往帕尔山区这个事实来看，那次的接管似乎并不是和平地进行的。但是，下面这一点倒可能是真实的，姆贝加最初得到那些对原有制度不满的人们的拥护，而正是在这些支持者的协助之下，姆贝加和他的部下才能够从布姆布利打进伍格哈。

据说姆贝加开始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办法是：他从每个主要氏族中至少娶一个妻子。生下的儿子随后被派回去管理各省。姆贝加的一个儿子布格赫创建了由平民组成的大参议会和官僚机构。凡是由基林迪人统治的县，必须有一名非基林迪人的代表驻在宫廷，借以监督王族的成员。布格赫是十八世纪最后十年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布格赫建立了一支军队并开始把王国扩张到齐古阿族地区。不幸，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他所进行的扩张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金韦里·耶·纽姆巴伊来完成，关于他的事迹将在本书的另一章加以叙述。这里我们应当指出，格韦诺区和桑巴拉区的“革命”都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它们所实行的改革使原来的政治制度得到了改进。

在十七、十八世纪期间,还有两个非班图语系的部族来到这个地区。第一个部族是姆布古族,萨顿博士曾经指出,他们是讲库什特语的部族。帕尔人的传说指出,姆布古族大约在十二代之前从庞加尼河对岸来到帕尔山区。这些传说是要说明他们的迁移同马萨伊人可能在1650年至1700年之间向大裂谷的扩张有关系。<sup>①</sup>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留居帕尔山区的姆布古人已被帕尔人完全同化了。而那些从帕尔山区迁往桑巴拉区的人现在也正处于“班图化”的过程中,迅速忘掉了自己的语言。许多讲库什特语的部族一定也是这样被别的部族同化了。

第二个部族是马萨伊族。虽然大部分马萨伊牧民留在大裂谷地区,但是许多称为“克瓦维”的从事农业的马萨伊人却迁移到距离大裂谷很远的地方。人们认为,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克瓦维”人的部落已在庞加尼河以东游牧了。据说乞力马扎罗东部的著名统治者之一奥龙博(他大约在十八世纪末叶上台)曾经在乞力马扎罗平原同马萨伊人长期作战,直到他在一次战斗中死去。毫无疑问,马萨伊人在这个地区的出现引起了冲突和袭击,因为班图语系各部族也有牛群,需要放牧的平原。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始终敌对的。据说从马萨伊人同这个地区的班图语系部族接触的时候起就实行过和平合作。例如,马萨伊人需要帕尔人炼的铁,而帕尔人则看

---

<sup>①</sup> 见阿兰·雅各布斯《马萨伊牧民的传统组织》一书,牛津纳菲尔德学院哲学博士论文,第21—82页,1965年7月。(Alan H. Jacobs: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Pastoral Masai»)

重用铁交换来的牲畜。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和平共处的益处，才使得那些在平原上设有祭祠的帕尔人开创了留一份肉给马萨伊人的传统，而马萨伊人在屠宰牲畜时也拿出一部分肉送到帕尔人的祭祠还礼。这几乎使人产生这样的概念，即帕尔人的祭祠也就是马萨伊人的祭祠。在帕尔山西部平原，从马卡尼亚到尼乌姆巴—亚—穆恩古一带也可以找到这类祭祠的所在地。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历史，是人们不断往这个地区迁移的历史；是已经在那里定居的部族社会的发展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对早期的政治结构实行革命改造的历史。帕尔区和桑巴拉区的例子说明，如果试图从一个方向去探索这类政治思想的传播，那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传播对于桑巴拉区的变革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比格韦诺族所作的努力具有更大的意义，后者逐步实现了一种同样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制度。

#### (四) 南方地区

在这一节，我们将讨论位于南部高原和鲁伍马河之间的坦桑尼亚整个南方内地。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1500年以前，农圭县的周围可能已有部族定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个地区所了解的情况没有超过两位威尔逊的论述，<sup>①</sup>而且正如

---

<sup>①</sup> 戈弗雷·威尔逊：《恩贡德的政治制度》，罗兹—利文斯敦学院第3号论文，1939年(Godfrey Wilson: "The Constitution of Ngonde")；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人的宗族礼仪》和《尼亚萨—坦噶尼喀走廊的部族》。

我们先前已经指出的，他们的历史材料只涉及少数部族。因此，不可能全面介绍 1500—1800 年期间南部高原所发生的事情。尼亚库萨—恩贡德地区的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同龄村”，即同龄的人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村。不清楚这种居住方式是什么时候采取的，虽然有人认为它可能起源于一种永远不准翁媳见面的禁律。不论它的起源如何，这种居住方式可能是在土地很充裕的古代开始的。

不清楚的是这种社会制度同政治制度的关系。尼亚库萨族保持了小酋长国制度；根据莫尼卡·威尔逊的说法，他们的酋长国在 1935 年时多达一百个。<sup>①</sup>据说同龄村制度在尼亚库萨人中要比在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制的恩贡德王国更为牢固。这样，就产生了说明社会结构和政治集权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人们知道，恩贡德的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个国王即基温古，据说他是开国英雄的代表。根据戈弗雷·威尔逊的说法，当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大约在 1780 年），当政的是第十个基温古。可是他又认为基温古的集中权力是来自他对对外贸易的控制，这无疑是矛盾的。人们知道，尼亚库萨也有一名代表开国英雄的官吏，但他的职责一直是掌管祭祀和礼仪，而政治权力则集中于各个小单位的酋长手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历代基温古是依靠外来势力掌权的说法。我们需要了解在头十个基温古统治期间这个地区的更多的历史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尼亚库萨发生的情况作有益的比较。

<sup>①</sup> 《尼亚萨—坦噶尼喀走廊的部族》，第 12 页。



关于南部高原其余地区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就更有限了。我们只知道这一类的小酋长国遍及整个地区，而且可能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末。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较为中央集权化的土邦如赫赫和桑古，应当看作是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往南发展了。当加斯珀·博加罗在1616年经陆路从太特旅行到基尔瓦的时候，他曾经把鲁伍马以北的地区说成是从属于某个部族的领地。<sup>①</sup>阿·博加罗关于加斯珀·博加罗此行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从这条鲁伍马河到大海之间的这片土地是曼汉加统治的……曼汉加给了博加罗一个象牙，并把他从梅林德海岸得来的布匹作为礼物送给穆祖拉，因为这个“卡菲尔”<sup>②</sup>服从穆祖拉的命令。

……加斯珀·博加罗带着曼汉加给他的向导一道旅行……他们走了七天，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遭到了津巴人的蹂躏……过了七天之后，他们到达了曼汉加的兄弟奇朋达的村庄。……

据说博加罗还访问了朋德村、莫伦古埃村和“摩尔人的村庄布古里”，然后才到达基尔瓦。不可能辨明博加罗提到的姓名和村庄是指鲁伍马与基尔瓦之间地区的那些地方，但是从这个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个地区的情况和南部高原地区

① 弗里曼—格伦维尔编：《东非海岸》，1962年牛津出版，第165—168页。

② “卡菲尔”(Kaffir)，指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班图人，是白人对非洲黑人的一种鄙称。——译者

的区域性酋长制相似。看来这个地区无疑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有待探索。

无论如何，这个地区的人民（马康迪族、马库阿族、瑤族等）在一个方面是不同于南部高原人民的。一般说来，除了莫罗戈罗地区的一些地方，以及我们已经谈过的恩特米区部分地方的母系酋长继承制外，坦桑尼亚的大多数部族实行父系继承制。但是，在鲁伍马地区，通行的是母系继承制，人们不是按父系而是按母系来数自己的祖先。这种类型的母系继承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存在于横贯中非直到刚果的许多部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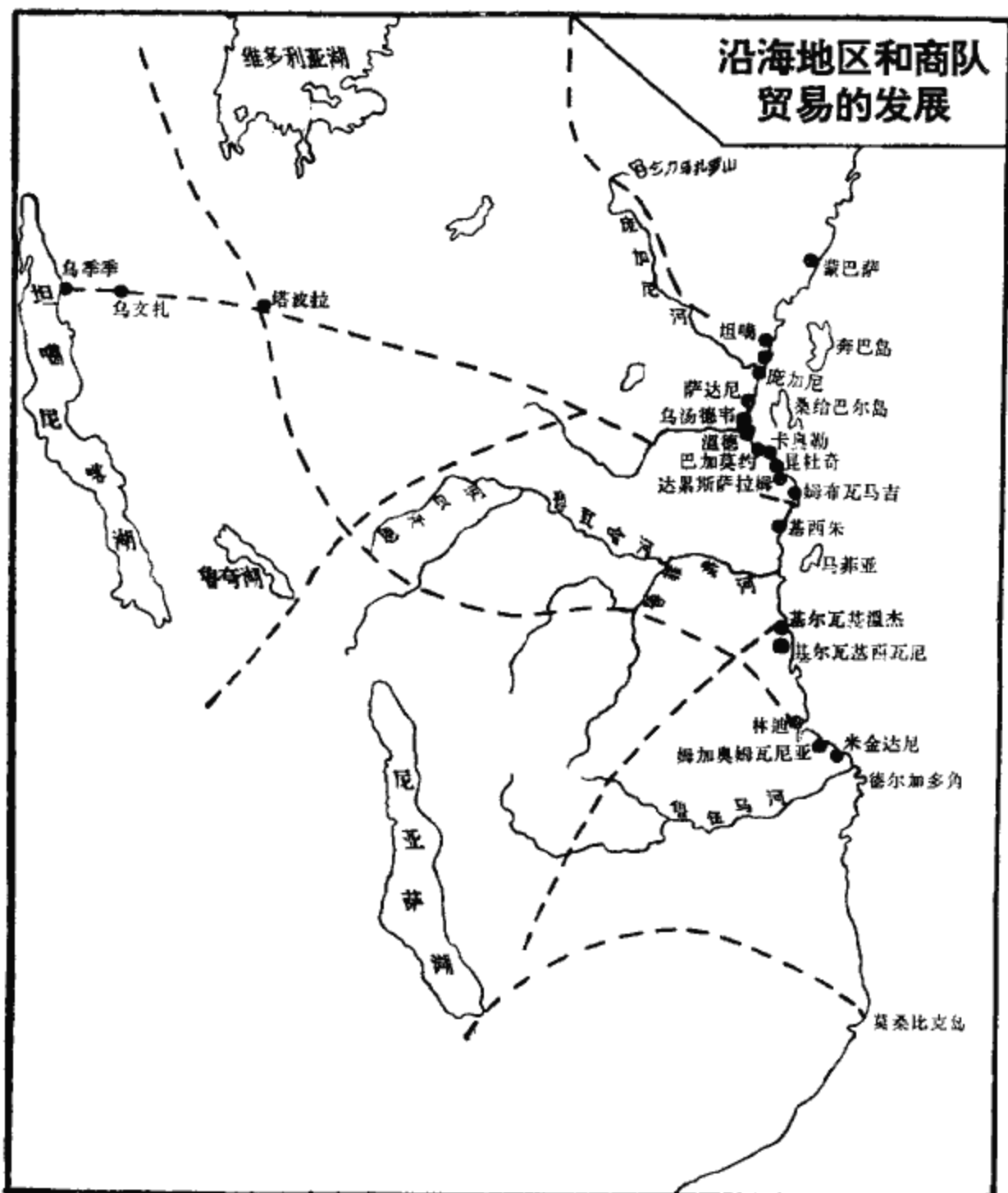
## 结 束 语

本章说明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它表明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 1800 年以前坦桑尼亚内地的情况知道得多么少。它向那些关心重新发掘我们自己历史的人们间接地提出了任务。如果说我们不得不把口头传说作为历史材料的主要来源的话，那末这项工作就更为迫切了，因为有关的权威人士一旦死去，他们知道的材料也就会随之失传。

第二，必须承认坦桑尼亚人民那怕是在遥远的过去所作的努力、他们的首创精神乃至他们的成就。那种把坦桑尼亚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归因于外界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越来越清楚，那个时期的坦桑尼亚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要比在那个时期以后允许他们得到的权力大得多。他们能

---

够创造适应当时的环境和需要的政治思想体系。今天坦桑尼亚人正在致力于发展一个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他们必须认识本民族历史上的成就，从中吸取鼓舞的力量和勇气。



照原图译制

### 第三章 沿海地区和 商队贸易的发展

爱德华·阿尔珀斯

对于坦桑尼亚人民来说，1964年4月26日发表的联合共和国宣言是向前迈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首先，这个联合是经过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一设拉子党长期友好合作，在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革命以后形成的。但是，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联合的实现有其更久远的历史根源。因为革命以及非洲一设拉子党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之间的密切联系终究都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更具体地说，正是由于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建立了殖民政权和以大陆非洲人的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为1964年的戏剧性发展准备了舞台。关于革命和联合的更为直接的背景，莫萨雷先生和克利夫先生将在本书后几章里加以论述。我在这一章想考察一下导致早期沿海和内地结合的历史进程，这种结合在十九世纪末叶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建立殖民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在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自始至终强调沿海和内地部族社会之间能动的互相作用，以及在各部族社会内部独立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

我们了解的关于坦桑尼亚沿海最早的情况，既是片断的，

又是不确切的。根据公元120—130年左右的希腊商业指南《红海航行要览》和托勒密的《地理学》(该书关于东非部分大概叙述到四世纪末)的记载,在伊斯兰时代以前,沿海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叫做拉普塔。几乎所有的权威都认为拉普塔应当是在坦桑尼亚沿海某地,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辨明拉普塔现今的地理位置。拉普塔极有可能是在坦桑尼亚北部海岸,大概靠近庞加尼河出海口,但也可能是在南部鲁菲季河三角洲。我们对拉普塔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它是阿拉伯商人控制的出口象牙的贸易中心。上述两本书都没有说明这种象牙的来源,因此我们无从了解拉普塔同内地的联系究竟是多还是少。《地理学》一书提到拉普塔的内地有一座白雪覆盖的大山。如果这是指的乞力马扎罗,那么现有的证据也太少,不足以构成把庞加尼河流域联结在一起的贸易网。因此,在考古学家们还未能向我们提供有关拉普塔的更多情况之前,这个古代商业城镇暂时还是沿海地区历史上的一个谜。

尽管坦桑尼亚人十分关心拉普塔,但是看来它对坦桑尼亚沿海地区后来的历史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段历史的中心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教城邦。在葡萄牙侵占时期以前,这些城邦中最重要的是基尔瓦。早在公元十世纪,桑给巴尔和奔巴就已有了重要的穆斯林居民区。根据奇蒂克最近的研究,尽管基尔瓦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居民点,但直到十二世纪末,它才成为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基尔瓦之建成为一个强大的城邦,应追溯到来自索马里南部(或巴纳迪尔)海岸的已经东非化了的“设拉子”移民。这些“设拉

子”人不仅在基尔瓦,而且还在基西马尼—马菲亚建立了统治王朝,这两个地方不久就成为比任何沿海居民点(除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外)都更加重要的地方。无论是基尔瓦还是马菲亚,在下一个世纪里都未能在南方占据明显的统治地位,尽管从基西马尼得到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它在贸易上更为重要。奇蒂克认为,基尔瓦王朝的创建者阿里·本·哈桑可能是以基西马尼为首府进行统治的。<sup>①</sup>

促使“设拉子”人从巴纳迪尔海岸往其他地区移民的原因是什么?从以后沿海的历史来看,最合乎逻辑的回答似乎是,他们想要控制作为所有这些城镇的生命线的海上贸易。特别是,新建立的基尔瓦和基西马尼—马菲亚联合王国的“设拉子”商人统治者大概想要夺取有利可图的黄金贸易,这种黄金来源于赞比西河以南、莫桑比克海岸的索法拉。据说摩加迪沙曾经是第一个同索法拉通商的城镇,它当时据有的支配地位显然是依靠它控制着通往索法拉的航道。关于阿里·本·哈桑及其“设拉子”追随者的起源,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我们除了以上概括的叙述之外,不能有别的猜测。从基尔瓦得以发展成为整个东非海岸最大贸易中心的一些情况看来,上述假设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基尔瓦的“设拉子”王朝建立后不久就同香加人进行了一场斗争。奇蒂克认为,香加人住在基尔瓦基西瓦尼以南几英里的中桑杰岛上。最初,香加人占了

<sup>①</sup> 奇蒂克:《设拉子人对东非的殖民地化》,载《非洲历史杂志》1965年第6卷,第3期,第275—294页。

上风,甚至还在一个短时期内夺取了基尔瓦的王位,但是最后基尔瓦终于战胜了它的邻邦。虽然同香加人发生冲突的原因不清楚,但是这里再一次表明,经济竞争看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据说在十三世纪下半叶或十四世纪初,基尔瓦已取得了对索法拉黄金贸易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可能就是这两个部族争夺的目标,而且肯定是基尔瓦强盛的基础。

基尔瓦不象是完全垄断了同索法拉的通商贸易,但是苏丹显然控制了索法拉本身,从而任何别的沿海城镇同索法拉的贸易都必须向他的金库交纳某种税款。基尔瓦的财富在这个时期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生动地反映在建筑的迅猛发展,建造了大小堡垒,并完成了扩建大清真寺的重要工程。大约在这个时候,基尔瓦王朝也发生了更迭。奇蒂克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表达了他的一个信念,他几乎可以肯定,来自也门的阿布尔—马瓦希布的新统治者使基尔瓦成为强大的城邦。当阿拉伯的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于1332年访问东非时,他选择的两个城镇就是文化中心摩加迪沙和商业中心基尔瓦。

接近十四世纪末的时候,基尔瓦的盛况稍为有所衰退,然而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它又兴盛起来,开始了石头建筑的新时期。到十五世纪末,由于面临着新兴的蒙巴萨城邦的竞争,基尔瓦很难保持它在商业上的支配地位。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这一带地区时,基尔瓦仍然是最重要的沿海城镇之一。可是,那时基尔瓦的苏丹看来已失去了对索法拉的控制特权,因



为葡萄牙人 1505 年在索法拉所遇到的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对比起来，这个时期的蒙巴萨要比基尔瓦更强大。

在考察葡萄牙入侵的影响及其对内地人民所造成的后果之前，让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期间基尔瓦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的性质。早期的一些调查材料，以及后期研究东非沿海历史的一些知名作者，都谈到一个以基尔瓦为中心的幅员辽阔而宏伟的“桑给帝国”。但是大部分现代学者当即拒绝这样一种假设，因为它没有任何现实的根据，而只反映了一种对非洲历史极度浪漫主义的观点。沿海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基尔瓦的历史，是成就和发展的动人记录，它是不需要经过粉饰才有研究价值的。关于葡萄牙时期以前的所谓“桑给帝国”的神话，应当从此再也不去提它了。

关于基尔瓦以及这个时期多数大城镇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建立在海岸附近的岛屿上。基尔瓦基西瓦尼的意思是“岛上的基尔瓦”。它是由那些完全面向西印度洋而不是面向非洲大陆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些岛上的居民同阿拉伯和波斯湾的联系，比他们同东非大陆的联系密切得多。即使是建立在非洲人基础上的基尔瓦的财富，也不是来源于坦桑尼亚内地，而是来自它对通往索法拉的航道的控制。索法拉当时是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进行黄金和象牙贸易的转运口岸。没有迹象表明在葡萄牙入侵以前有一条联络津巴布韦和基尔瓦的陆路商道。1511 年，一个葡萄牙观察家评论这一情况时说，“只有少量的象牙来自基尔瓦，大量的象牙是来自

索法拉的”。<sup>①</sup> 基尔瓦的政治霸权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除了索法拉以外，基尔瓦似乎还控制着马菲亚岛、莫桑比克岛，也许还有克林巴岛（在德尔加多角正南）；但是大陆则不在基尔瓦苏丹的管辖之内。

关于基尔瓦同坦桑尼亚大陆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所了解的唯一情况表明，这种关系是不太友好的。伊本·巴图塔认为，基尔瓦人民“从事‘圣战’，<sup>②</sup>因为他们和异教徒津给人相处于同一个大陆上……他（哈桑·苏莱曼苏丹）经常参加对津给人领土的远征，进行袭击和掠夺战利品”。<sup>③</sup> 在这些袭击中俘获的人大概被送去基尔瓦种植园当奴隶。这种情况无助于任何建设性的货物交换。基尔瓦除了本岛生产的粮食外，可能还从马菲亚岛输入一定数量的粮食。在这个历史阶段，基尔瓦还不是坦桑尼亚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把基尔瓦看做仅仅是一个外国殖民地，那是十分错误的。早在伊本·巴图塔时代，基尔瓦的居民多数就是“肤色漆黑的津给人”。<sup>④</sup> 当基尔瓦的阿拉伯统治者同大陆生活还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斯瓦希里社会的基础已通过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非洲籍臣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而缓慢地建立起来了。

① 《关于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和中非的文件集(1497—1840年)》，1963年里斯本出版，第2卷，第5—9页。（《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ses em Mocambique e na Africa Central, 1497—1840》）

② “圣战”(jihad)，穆斯林护教战争或护教运动。——译者

③ 吉布编译：《伊本·巴图塔亚非之行》，1962年剑桥出版，第2卷，第380页。（H. A. R. Gibb[trs. and ed.]: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in Asia and Africa》）

④ 《伊本·巴图塔亚非之行》，第2卷，第379页。

无论如何，不要以为基尔瓦是葡萄牙入侵以前坦桑尼亚海岸上唯一的城镇。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期间，在以下几个地方还有较小的居民点：汤戈尼，位于坦噶以南，是小土邦姆坦加塔的中心；乌汤德韦，位于瓦米河以南；卡奥勒，位于巴加莫约正南；昆杜奇，位于达累斯萨拉姆海岸北部；拉斯—马利贝，靠近姆布瓦马吉；基西朱，位于（达累斯萨拉姆）海岸至鲁菲季河出海口之间。汤戈尼的口头传说暗示它可能对基尔瓦有过松弛的从属关系；而桑给巴尔和乌汤德韦两个统治家族之间在十七世纪早期的联系，可能表明这两个城市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有了交往。桑给巴尔事实上是在十五世纪时强大起来的。1454年，桑给巴尔苏丹甚至曾经试图让他的候选人登上基尔瓦的王位。此外，关于上述坦桑尼亚城镇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知道得就不多了。但是，在基尔瓦形成斯瓦希里社会的那种演变，也同样发生在其他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

在十六世纪初，沿海的居民点肯定属于不同于内地部族社会的另一个世界，而且两者之间看来未曾有过什么重要的接触。可是在这以后的三个半世纪的过程中，沿海和内地即使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至少也已经密切地联结起来了。这种联结是怎样实现的呢？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发展了从内地到沿海的远途象牙贸易，后来又有奴隶贩卖。但是，如同所有的简单回答一样，这种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了解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力，我们必须对1500年以后的沿海和内地作更仔细的考察。

先谈沿海地区，这就立即遇到一个问题，即怎样判断十

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统治东非的影响。上个世纪末写的关于这个时期的详尽的经典著作,强调这样一个结论:葡萄牙的统治“对这个国家没有产生任何持久性的影响,即使东非历史上未曾有过葡萄牙统治时期,今天的东非也会是现在这个样子”。<sup>①</sup>就沿海的文化史来说,这个结论是对的。然而这个结论不适用于沿海的经济史和政治史。葡萄牙入侵东非的经济影响确实在南方内地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应。

我不想详尽地重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件,这些事件从1498年瓦斯科·达加马进入东非海域开始,到1698年葡萄牙人被赶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而结束。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够了,葡萄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控制沿海达两个世纪之久,是在于以下两个基本因素:一、葡萄牙的海军技术和武器的优越性;二、沿海城邦缺乏团结,从而使葡萄牙人能够各个击破并利用它们之间过去存在的对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葡萄牙人的统治从来就不是绝对的,由于沿海各城镇接连不断地为摆脱外国的统治和剥削、重获独立而进行斗争,葡萄牙人不得不连续不断地应付沿海一带此起彼伏的起义。在坦桑尼亚的各部族社会中,奔巴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曾经发生了多次反对葡萄牙的起义,它同最有战斗性的沿海城镇蒙巴萨有着密切联系。1631年,奔巴同蒙巴萨合作推翻了葡萄牙人的统治。1652年阿曼人侵入东非海域,使通常亲葡萄牙的桑给巴尔和乌汤德韦的统治者乘机重申独立,而奔巴

<sup>①</sup> 贾斯特斯·斯特兰德斯:《葡萄牙统治东非时期》,沃尔沃克译,柯克曼编,1961年内罗毕出版,第320页。

的统治者则对基尔瓦发动了海上袭击，因为那里的苏丹和统治阶级宁愿留在葡萄牙阵营。到了1694年，即在阿拉伯人最后围攻蒙巴萨的耶稣堡之前不过两年，奔巴再次起义反对葡萄牙人。此外，葡萄牙人同许多城镇的上层统治者达成的地方协议，不单纯是这些沿海统治者同敌人盲目勾结的问题。这种地方性的协议同时也是同盟关系，虽然这种同盟势必意味着它们暂时接受葡萄牙人的统治，它却使比较弱小的王朝可以取得势力和财富，削弱它们在沿海地区的传统敌人。

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在这一章里更关心的是葡萄牙对坦桑尼亚的经济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谈基尔瓦，才能了解葡萄牙人来到东非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葡萄牙人夺走了基尔瓦同索法拉的海上贸易。150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基尔瓦，并在岛上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和派驻了卫戍部队。同年，他们控制了索法拉，并开始严禁穆斯林商人到那里经商。葡萄牙人的打算是完全垄断传说中有名的索法拉黄金贸易。没有几年，葡萄牙人就认识到，被剥夺了同索法拉贸易的基尔瓦对他们是无价值的，而他们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也无法维持对基尔瓦的占领。1512年，葡萄牙人从支离破碎的基尔瓦撤出了驻军，宁愿从远处来控制这座城市。

只能自谋出路的基尔瓦怎么办呢？基尔瓦以往财富的来源地索法拉已不再向它的商人开放了。一个解决办法是从侧面绕过葡萄牙人紧紧控制着的索法拉，从赞比西河口向上游前进，然后再南下至津巴布韦，沿着赞比西河南岸各商业城镇做买卖。另一个办法是开始同毗邻的内陆人民做买卖。基尔

瓦后来的声誉是依靠第二个办法建立起来的。

如同十九世纪以前的其他许多重要发展一样，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说明基尔瓦和内地开始通商的情况。但是十六世纪的一个唯一记述，使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能有相当清楚的概念。1571年，耶稣会派教士蒙克拉罗在基尔瓦住了一个月之后写道：

这些摩尔人同科摩罗群岛有一些商业来往，并在内地经营象牙贸易，他们从卡菲尔人手里购买象牙，然后卖给常住这个地区的葡萄牙人，或者卖给上述(东非)海岸的船长的代理商，并从那里运来大宗的蜂蜜和蜡。<sup>①</sup>

在1551—1575年期间，基尔瓦和它附近内地的商业联系大概是更加地方化的粮食贸易。这种粮食贸易自从伊本·巴图塔访问这里的时候起就兴起了，当时沿海同大陆的关系是不大和睦的。在葡萄牙人夺占了索法拉以后，基尔瓦商人可能开始向内地人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借以刺激他们供应更值钱的出口商品。其中主要的一项可能是象牙，做蜡烛用的蜂蜡、犀牛角和兽皮可能也是他们同内地人交易的新项目。最晚不迟于蒙克拉罗统治时期，这些产品的主要收购者是葡萄牙人，他们在整个十七世纪一直控制着这个市场。

同基尔瓦通商的内地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是考察沿海的贸易史，我们能不能说

<sup>①</sup> 弗里曼—格伦维尔：《东非海岸——从一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文件选集》，1961年牛津出版，第138页。

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长途商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基尔瓦附近内地是哪一个部族。我们只能指出一点：他们无疑是班图语系的部族。他们的社会组织可能非常近似现今姆特瓦拉地区的居民，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过去两百年来从莫桑比克北部迁移到这个地区来的。但是看来正是这些人建立了基尔瓦和内地之间最重要的商业网。这个商业网的形成看来只是全部过程的一个阶段，因为在1600—1625年期间，通往基尔瓦的商队贸易的主动权显然由离海岸很远的人所掌握，他们没有参与建立这个沿海和內地的贸易系统。他们是莫桑比克北部的瑤族，其中许多人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就移居坦桑尼亚南部的图恩杜鲁县。他们来到基尔瓦的方式有力地表明，除非我们把注意力从海岸转向内地各族人民的历史，否则就无法了解通往海岸的长途贸易的发展情况。

有文字记载的瑤族传说谈到瑤族人远在同沿海发生接触之前，就已经在瑤族地区内部有了一个活跃的贸易系统。最重要的贸易项目是铁和铁制器具。瑤族历史的这个时期，炼铁和锻铁仍然由一个叫做西西的部族所控制，他们把这两种技术带到了瑤族地区。所有的瑤族人都很想得到铁制工具，特别是铁锄，于是西西人就到农村各地建起熔铁炉，用他们制造的铁器同人们交换当地的产品。瑤族是通过西西人参与沿海贸易活动的。这里最好还是让传说记录来说明情况：

内地有一个县，位于通往沿海的道路上，那里没有锄

头，阿奇西人没有到那里去出售他们的锄头；……这个县的人带了粮食去卖给住在海岸附近的人，然后从那里买了一块白洋布。他们拿了这块白洋布前往阿奇西人逗留的村庄购买一把锄头。当他们(阿奇西人)到另一个村庄做买卖时宣扬了这件事。就这样，白洋布的名声传布四方……传遍了整个瑶族地区，有的人还花钱去看一看这块布；于是瑶人所到的地方，白洋布的名声就传开了……当初瑶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做买卖的，他们一直走到海岸……到了姆奇温扎—姆奇尔瓦(基尔瓦)，所以海岸的这一部分是我们瑶族人最喜欢的地方，因为从古时候起，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了。<sup>①</sup>

上面这段引文几乎无需加以评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地区性贸易网联结到了一起。一个贸易网集中在基尔瓦海岸附近的内陆。这是1505年以后葡萄牙人在东非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当时基尔瓦采取了抛开海洋、转向大陆的新的贸易方针，从而促成了这个贸易网。另一个贸易网出现在瑶族地区。这是瑶族经济本身对于铁锄的需要的结果。对于非洲一切传统的自给农业社会来说，这种铁锄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促成上述两个贸易系统实际结合的原因，是瑶族人渴望直接买到在基尔瓦进口的外国货——不仅是布匹，还有念珠和其他外来的装饰品。这种结

---

<sup>①</sup> 约汉纳·阿布达拉：《瑶族》，桑德森编译，1919年臧巴出版，第26—27页。(Yohannah B. Abdallah:《The Yaos》)



合在 1616 年就已经实现了,当时有一个名叫加斯珀·博加罗的葡萄牙探险家,从赞比西河中段的大特镇沿着陆路直接穿过瑤族地区到达基尔瓦。在十七世纪末以前,瑤族人也从自己的家乡到东边的莫桑比克岛和西边的马拉维境内去做买卖。

葡萄牙人入侵东非对基尔瓦产生的经济影响,看来不同于对沿海任何其他地方的影响,并肯定不同于对坦桑尼亚的影响。事实上,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坦桑尼亚沿海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看来已经衰落了。蒙巴萨正在奠定类似基尔瓦那种进展的基础,而尼卡人则在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贸易网。但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同后来控制了蒙巴萨和吉库尤族地区之间贸易的坎巴人有什么联系,或者表明蒙巴萨曾经通过泰塔山同乞力马扎罗建立了联系。因此,人们知道的十七世纪期间东非唯一重要的远途商路是在南部内地,它把基尔瓦和莫桑比克岛同马拉维湖<sup>①</sup>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联接起来。大概在下一世纪的过程中,又开辟了两条或更多的商路,把坦桑尼亚的中部、西部以及庞加尼河流域同沿海联接起来。每一条商路的形成过程都反映了如同产生南方瑤族商队贸易一样的生气勃勃的总形势。

自从 1698 年蒙巴萨的耶稣堡从葡萄牙人手里落到阿曼的阿拉伯人手里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沿海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由于著名的阿布·赛义德王族统治者萨伊德·赛义德苏丹(1804—1856 年在位)在桑给巴尔建立了阿曼国,它对这个人

<sup>①</sup> 即尼亚萨湖。——译者

时期的历史起着支配作用，只是由于外力强加的殖民统治才使这一时期宣告结束。在阿曼统治的前半个世纪，正在衰落中的亚鲁比王朝，<sup>①</sup>由于过分虚弱和四分五裂而顾不了它在东非的势力范围。当时阿曼在东非的政治和商业势力是微不足道的。瑤族人把象牙贸易从基尔瓦转移到莫桑比克的重大行动中，可以反映出这些年代沿海经济的衰退。<sup>②</sup>1741年，亚鲁比王朝终于被阿布·赛义德家族推翻，1744年以后，阿曼统治者开始更加积极地关心东非。直到1828至1840年赛义德来到桑给巴尔并在那里最后定居的时候，阿曼对沿海城镇的政治控制从来就不是很稳固的。但是从十八世纪中期起，阿曼的经济影响对斯瓦希里城镇开始起作用。

桑给巴尔是阿曼商业活动的中心，它很快就成为整个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交换站。随着阿曼国在波斯湾的势力和财富的增长，桑给巴尔的商业活动也相应地发展了。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对东非财富的新要求(主要是象牙和奴隶)，桑给巴尔对岸许多长期沉睡的城镇或者复苏了，或者被新涌现的居民点所代替，它们成为同内地发展贸易的转运口岸。十九世纪称作姆里马海岸的所有商队贸易城镇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坦噶、庞加尼、萨达尼、温德、巴加莫约、达累斯萨拉姆和姆布瓦马吉。在鲁菲季三角洲以南，

① 指阿布·赛义德王朝以前统治阿曼的王朝。——译者

② 详细情况参阅阿尔珀斯《马拉维人和瑶人对变化中的外部经济势力的反应，1505—1798年》(《Malawi and Yao Responses to Changing External Economic Forces, 1505—1798》)，刊载在奇蒂克和罗特堡合编的《东非与东方：殖民时代以前的文化综合问题》，剑桥和马萨诸塞出版。

基尔瓦沿岸,也就是(内地人称作)姆韦拉海岸,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城镇有基尔瓦基温杰,它大约在1810年至1840年之间取代了基尔瓦基西瓦尼的地位,此外还有林迪、姆加奥姆瓦尼亚(蒙加洛)和米金达尼。十分清楚,桑给巴尔和这些城镇的商业活动的高潮开始于赛义德统治时期,赛义德是比他的父亲或祖父都更名副其实的商人国王。

新的统治者积极鼓励他的臣民在东非做生意,借以增加他的王国的财富。他们的反应是如此令人鼓舞,东非的吸引力是如此迷人,以致赛义德于1828年决定更加直接地亲自过问这部分领地的事务。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如果他的首都更靠近帝国财富的首要来源地东非的话,他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和开发这些财富。因此,赛义德在1840年把他的王宫从马斯喀特迁至桑给巴尔,大批阿曼移民和亚洲资本家也随着他涌入了桑给巴尔。在他的领导下,桑给巴尔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依靠丁香和来自大陆的奴隶劳动这两根支柱形成了一个阿拉伯人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地社会。一直到1964年革命以前,这种局面在整个欧洲殖民统治时期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对桑给巴尔特别关心的是沿海和内地贸易的发展,而不是从内地到沿海的商队。为此,我们必须考察沿海城镇对内地贸易的由来以及桑给巴尔经济的金融机构。正是由于桑给巴尔拥有大量资金,才使得十九世纪的庞大的阿拉伯商队能够深入到遥远的内地进行极其广泛的贸易。这个贸易系统的关键是亚洲商人和亚洲资本。

由于东非沿海历来是西印度洋商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亚洲商人在葡萄牙时期以前活跃于沿海城镇是不足为奇的。斯特兰德斯写道，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以北的所有东非港口”都遇到过班扬人<sup>①</sup>和信伊斯兰教的印度商人。葡萄牙人曾经力图打破亚洲人对东非和印度的贸易控制（当时沿海城市的整个经济都依靠对印度的贸易），但总是不能成功。<sup>②</sup>关于十八世纪亚洲人在东非的作用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同前几个世纪相比，不太可能会有很大变化。据说桑给巴尔的亚洲商人在1811年“掌握了大部分的贸易”。但是亚洲资本是在赛义德的积极鼓励下才在东非建立起真正巩固的地位的。赛义德比他的葡萄牙同行看得更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人民既没有技术又缺乏资本来发展东非的贸易经济。他在波斯湾建立起阿曼的势力时，曾经竭力把亚洲商人吸引到马斯喀特来。在他把王宫迁往桑给巴尔之前，已经有一千多班扬人住在马斯喀特。在桑给巴尔，他对于亚洲资本家的热心保护并没有减弱。1835年，一个到桑给巴尔的旅客估计那里的亚洲人大约有三、四百人。十年后，亚洲人已超过一千，1850年增加到将近两千人。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桑给巴尔的亚洲居民大约有五千人以上。随着人数的增加，小店主（而不是资本家）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前者大多数是伊斯兰教徒，大商行则为班扬人所控制。在沿海的许多城镇还有一些人数很少的亚洲人聚居，他们中间既有本地的零售商，也有桑给巴尔比较重

① 班扬人(Banyan)，指信婆罗门教的印度商人或手工业者。——译者

② 斯特兰德斯：《葡萄牙时期》，第90—93，174页。

要的商行代表。<sup>①</sup>

桑给巴尔的班扬人大资本家在十九世纪扮演了双重角色。对桑给巴尔和沿海进出口贸易征税的人员是由苏丹决定的。这样,桑给巴尔苏丹就能保证每年有一大笔现金收入,他可以从中取得经费来供给他自己派遣到内地去的远征队以及其他活动,同时又不用建立一个由国家出钱的税务局来执行征税任务。更重要的是,大商行以商品的形式向那些要率领商队深入内地收购象牙和贩卖奴隶的阿拉伯私商提供大量信贷,这是一项很冒险的投资,因为不能保证这类远征会得到成功。即使这些阿拉伯冒险家们拿他们在桑给巴尔的产业作为信贷的抵押,也消除不了这种相当大的冒险因素以及因所有债户在同一时候都不能还债而导致经济破产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纪的桑给巴尔,只有班扬大商人能够承担这种预料得到的风险。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例子是贾伊拉姆·修吉及其继承人经营的商行,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一段长时期内根据合同控制了桑给巴尔的关税。据当时的英国领事说,修吉本人大约在1860年间曾经立了一个遗嘱,留下大约“三百万元的硬币”。<sup>②</sup>象他这样的人才能有充裕的财力提供长期信贷。这

① 库普兰:《东非及其从最早年代到1856年赛义德逝世期间的入侵者》,1938年牛津出版,1961年再版,第182,300—303,484页(R. Coupland:《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贝内特和小布鲁克斯合著:《非洲的新英格兰商人:通过文献看历史,1802—1865年》,1965年波士顿出版,第375,467,532页。(N.R. Bennett and G. E. Brooks, Jr.:《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Africa: A History through Documents, 1802 to 1865》)

② 引自库普兰《东非及其入侵者》,第325页。

种信贷是阿拉伯大商队必不可少的经费来源，这些商队是在1820年过后不久开始进入坦桑尼亚内陆及其以外地区的。由于有了这种亚洲人投资的通用制度，甚至在内地也能够借到大笔贷款。那里有许多商人如塔波拉的非常有钱的科扎人穆萨·姆朱里，他大约在1825年第一个从沿海来到塔波拉，此外还有许多靠象牙贸易发财的阿拉伯人。例如著名的阿拉伯商人蒂普·蒂卜，在贝纳最高酋长姆特马·姆坦格拉的城镇（现为赫赫族地区）一次就借到了价值四千到七千元的产品。<sup>①</sup>

因此，从沿海地区的情况来看，沿海到内地的大规模阿拉伯商队贸易在十九世纪兴起的最重要因素，是赛义德想要开发东非内地财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得到赛义德及其继承者鼓励和保护的亚洲人的雄厚资本势力在桑给巴尔的出现。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关于早期基尔瓦和南方内地之间长途贸易的发展一样，如果只从沿海这一方面来考察，我们只能了解到情况的一半。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过程，我们必须根据已知的事实力求弄清在内地起作用的是什么力量。

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沿海附近的地区性贸易网的发展。姆里马海岸的斯瓦希里历史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苏迪人的斯瓦希里历史中则包含着一些很有启发的材料。苏迪人虽然不是一个重要部族，但他们却是更纯粹的斯瓦希里人，他们继承了马康迪族占压倒优势的姆加奥姆瓦尼亚镇。据说苏迪人

<sup>①</sup> 《蒂普·蒂卜自传》，怀特利译，1966年东非文学局出版，第13页。

出售他们的部分食物来购买商品和银币(钱)。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银币之后,他们就用来购买奴隶。他们使用这些奴隶在种植园里耕作。他们的另一项职业是猎象。他们得到象牙后就卖掉象牙换取银币或商品,然后去购买奴隶,把他们安置在种植园进行耕种。

《苏迪族史》还告诉我们,他们时常向当地商人借取商品到内地旅行,“到他们的老家”去交换象牙和奴隶。<sup>①</sup>姆里马海岸的城镇也可能发展了同样类型的地区性贸易。例如庞加尼据说就有齐古阿血统的人。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姆里马海岸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部分地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形成的。

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历史都提到卡姆巴人的入侵使姆里马海岸的一些城镇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城镇的人民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卡姆巴人,而不得求助于扎拉莫族酋长帕齐。帕齐同多埃族人结成联盟打败了卡姆巴人。此后,帕齐和他的继承者要求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每年进贡,作为这次援助的代价。当桑给巴尔苏丹接管了这两个城镇时,他也就承担了进贡的义务,称为“帕齐的贡税”。1935年克雷莱出版的扎拉莫传说,证实了卡姆巴人入侵的梗概,而且补充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细节。根据扎拉莫族的传说,帕齐不是扎拉莫族人,而是库图族的统治者,名叫帕齐·基拉马,或称基巴曼杜卡,住在鲁伏河流域的卢克勒勒。他在猎取大象和狮子方

<sup>①</sup> 弗里曼—格伦维尔:《文件选集》,第231页。

面的名声,可能是沿海人民向他求助的原因。他们派了一个使团带了盐和其他礼品去见帕齐。但是直到帕齐对盐的质量表示满意时,才接受请求去驱逐卡姆巴人。战斗胜利以后,海岸附近的内地就建立了许多库图族居民点。这就是扎拉莫人声称他们和库图人属于不同部族的由来。这个过程也说明了为什么沿海城镇要向扎拉莫人缴纳“帕齐的贡税”的原因。

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十分难以断定的。在沒有更多证据以前,我们无法说明帕齐是否既是出名的猎象者同时又是有名的象牙商人。从他曾经细心检验从沿海带来的盐的质量来看,他确实可能富有贸易经验;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盐是坦桑尼亚(非洲其他地方也一样)大陆贸易的一项重要物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练不一定表明他过去曾经带着货物到沿海去换盐。然而沿海地区的人却直接或间接地听说过帕齐·基拉马,因此,在卡姆巴人入侵以前,沿海和内地人民之间一定有过至少是某些有限的交流。此外,沒有任何具体材料可以表明这次入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巴加莫约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历史把这次入侵的时间放在赛义德上台和尼亚姆维济人开展象牙贸易之前。从斯瓦希里人的观点来看,赛义德的统治大概从1804年算起,但是直到1828年赛义德首次访问东非以前,他个人在沿海人民的集体记忆中同样可能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另一方面,尼亚姆维济的第一批商人大概是在1800年左右来到海岸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个人认为卡姆巴人入侵巴加莫约—达累斯萨拉姆海岸一带的日期,极有可能是在十八世纪末叶。



关于近海内地和姆里马海岸城镇的历史的这些假设，完全是推测性的。这些假设只不过是想要了解这一重要进程的动力的初步尝试。要获得更加可靠完整的了解，尚有待于今后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当前关于遥远内地的现代历史研究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也仅仅是开始。因此，我们在谈论坦桑尼亚中部和庞加尼河上游地区性远途贸易的发展情况时，就能比谈论近海内地更有把握。

坦桑尼亚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性贸易，是以铁和盐为基础的。<sup>①</sup>这一带只有很少几个铁工场，大半在西北部，而且只有几个家族掌握炼铁的专门技术。如同瑤族地区一样，铁锄是这一带地区贸易的主要项目。在尼亚姆维济族和金布族地区，铁锄也具有可以作为流通货币的独立价值。从坦噶尼喀湖到萨加拉地区，铁锄的主要买卖者是尼亚姆维济人，虽然金布人也积极做这种生意。同样，盐也不是这个地区到处都能得到的产品。质量最好的盐产自著名的乌文扎盐池。在十九世纪，从尼安扎湖南端到坦噶尼喀湖南端，从刚果东部直到鲁瓦哈河流域，都行销乌文扎的盐。在坦桑尼亚中部，盐的另一个来源是戈戈族地区。戈戈族地区的盐次于乌文扎的盐，但是即使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戈戈族地区仍然是萨加拉族地区西部和尼亚姆维济族地区东部所需食盐的重要供应地，因为它靠近这些地区。铜是地区性贸易中需求广泛的第三项商

<sup>①</sup> 以下段落是根据罗伯茨著《十九世纪尼亚姆维济人中等级差别的扩大》(1968年1月东非大学社会科学讨论会)和罗伯茨编《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1968年内罗毕出版)一书中罗伯茨(关于尼亚姆维济)和肖特(关于金布)所写的章节。

品。从十九世纪初期起，加丹加铸成的铜条由苏布瓦族和加拉甘萨族商人向北运到坦桑尼亚西部。在那里，由哈族、苏布瓦族和西部地区金布族的工匠制成装饰品和铜丝，然后运往尼亚姆维济族全区。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庞大的贸易网是在阿拉伯商队从沿海渗入坦桑尼亚中部之前不久的几年中发展起来的。但是阿拉伯人主要关心的是这个地区的象牙和奴隶买卖，而不是铁、盐或者铜。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们已经同桑古族地区的尼亚姆维济人和金布人以及伊桑加和伊森加的姆亚（金布）酋长国有了联系。

这些地方的象牙贸易是怎样开始的呢？从金布人的传说看来，这是由于十八世纪后期从伊兰巴来的伊古尔威比族的移民，把象牙贸易第一次推广到金布族地区和尼亚姆维济族地区。肖特神父的很不成熟的设想是，伊古尔威比人可能是从苏布瓦商人那里懂得了象牙的价值；但是他自己和罗伯茨博士立即指出这些假设纯属猜测。这里最需要的仍然是能够说明历史过程的事实。无论如何，看来确有理由肯定的是，在1800年过后不久，打先锋的苏布瓦商人卡富库和他的同行、加拉甘萨人基兰加巴纳，就从尼亚姆维济族地区带了象牙到沿海去。

由于坦桑尼亚中部和西部在原来的土产贸易之外又增加了象牙，这就促成了把沿海和遥远内地联结起来的大规模长途贸易网。与此同时，地区贸易也就成为国际商业活动的支柱。铁、盐、铜和象牙的贸易大约在同一时期汇集于尼亚姆维

济族地区，一种商品的交换刺激了另一种商品的交换。罗伯茨博士指出，加拉甘萨人过去习惯于在乌文扎盐田连续劳动几个月，把盐作为劳动报酬，再用盐去进行交易。然后加拉甘萨人从乌文扎北上到布云古，用盐来购买锄头，接着他们携带象牙前往海岸，沿途就用这些锄头向戈戈族人购买食物。这类联系一直进行到近海内地，扎拉莫人常常向过路商队征收用铁锄交纳的“贡税”。

这里的情况看来也同南方一样，是两个不同的地区性贸易网联结到一起，一个是从坦噶尼喀湖往东伸延到萨加拉族地区；另一个则把东部内地和沿海联接起来。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是这两个系统当初是怎样汇合在一起的。萨加拉族地区是怎样同扎拉莫族地区实际上联接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有关恩特米酋长制扩展到金布族地区等其他问题（基曼博博士已探讨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就在于萨加拉人和他们的近邻。

姆里马南部海岸并不是金布族通商的唯一出口。肖特神父也指出，在1800—1825年期间，通往海岸的主要商路分出了第二条商路到姆布瓦马吉，然后往西南经过贝纳族地区，沿乌兰加河流域直下，到达基尔瓦以南的姆韦拉海岸。从海岸开始的这两条道路在恩冲贝河河源附近的伊隆社会合，靠近赫赫族地区的边界，位于金布族酋长国境内。斯瓦希里文的《林迪古代史》对这一情况加了一个有趣的脚注，讲到某一个来自姆加奥姆瓦尼亚的沙瓦亚苏丹（在《苏迪族史》中没有提到这个人），从旁经过林迪，“到内地的鲁瓦哈去见加迪苏丹，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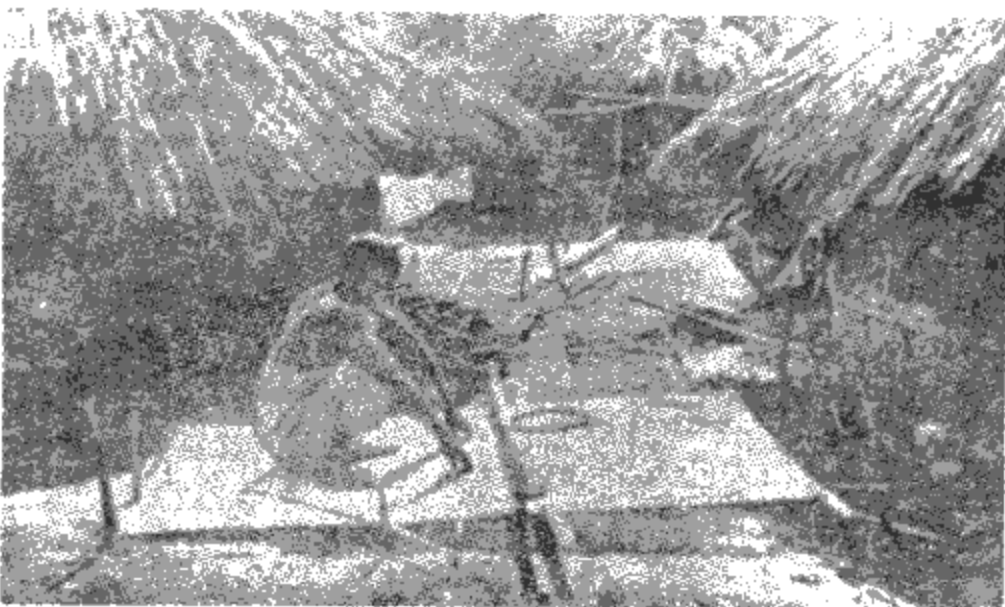
(五) 基尔瓦基西瓦尼：礼拜五清真寺的圆顶走廊，筑于1300年左右。



(六) 在伊库努恩戈的米兰博，1882—1883年。（本图借自达累斯萨拉姆国家博物馆）



(七) 殖民主义占领时期: 1897年恩格尔哈德中尉向恩戈尼族地区的酋长们展示他的武器。



(八) 殖民统治时期以前的家庭工业: 1897年乌萨夫瓦的织布机。

了加迪的情妇，她是戈皮的女儿，名字叫姆瓦娜·姆库鲁”。<sup>①</sup>对于这些人物，如同沙瓦亚一样，我们都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根据来确定沙瓦亚旅行到鲁瓦哈的日期。但是，从姆韦拉海岸得到的这个证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许能够提供关于沿海和內地的商队贸易发展的重要资料。

我们想要考察的最后一个地区是庞加尼河流域。这条商路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在程度上不及中部或南部內地的商路。同后两条商路相比，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庞加尼河流域没有相同于瑤族人或尼亚姆维济人的非洲人部族。不论是查加人、帕尔人还是香巴人，尽管他们向这些商队提供大量的食物、象牙和奴隶，看来他们都不大参加日益增多的从內地到沿海的商队。在这里，主动权掌握在斯瓦希里人和阿拉伯人手中。欧洲人有关庞加尼河流域商队贸易的最早报道都说，在十九世纪中叶，那里的贸易牢牢地控制在沿海人手中。尽管情况是这样，从桑巴拉族地区直到马萨伊族地区，还是有着重要的地区性贸易联系的。我们在考察这些地区性贸易网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庞加尼河流域各族人民中间从来没有出现关于商队贸易的传说。

早在十七世纪后期，随着一些香巴族移民来到帕尔族地区，南帕尔人和香巴人之间的贸易可能已经开始了。<sup>②</sup>香巴族有一种关于长子出世时的宗教仪式(叫作“乌雷齐”)，需要一

① 弗里曼—格伦维尔：《文件选集》，第 228 页。

② 以下段落是根据费尔曼提供的材料；基曼博的《坦桑尼亚帕尔区政治史》(1969 年东非出版社出版)和斯塔尔的《乞力马扎罗地区查加族历史》(1964 年海牙出版)。

张小羚羊皮作为仪礼的不可缺少的物品。当地唯一可靠的小羚羊来源是帕尔南部平原，于是香巴族的父亲们开始到那里去猎取小羚羊。在桑巴拉区流行起来的这种偶然集聚的打猎队，最后发展成为这两个地区之间进行小羚羊皮、山羊皮、山羊和牛的定期贸易。也许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个别香巴人也开始通过类似的仪式到沿海贩卖酥油、牲畜和烟草，以换取供某些宗教仪式用的贝壳。香巴人换取贝壳的性质使费尔曼教授认为，这种贸易可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基林迪王朝建立之前。他还指出，这种贸易是出于个人意愿，同政治没有联系，它同十九世纪斯瓦希里人与阿拉伯人控制的商队贸易是同时并存的。但是，我已经指出过，正如同一时期在坦桑尼亚本土各地发生的情况一样，香巴人同沿海和帕尔区的传统贸易，看来都是没有什么发展余地的。

然而，快到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在格韦诺族地区，开始了同马姆巴的查加族酋长国买卖铁的重要地区性贸易。这是从格韦诺族地区原有大量铁的买卖发展起来的。基曼博博士认为这种买卖始于十五代以前，大约在十六世纪的姆兰加酋长统治时期。马姆巴的铁匠常到格韦诺族地区去，用牛交换铁，因为那里的铁非常多。在女统治者马希纳酋长的控制下，马姆巴的铁匠为大山以东的所有查加族市场铸造铁制武器，这个市场西边的界线一直延伸到基博肖。他们还到阿鲁沙去贩卖铁矛。大约在1800年，凯尼的奥龙博酋长开始购买格韦诺族地区的铁。基博肖甚至有着比马姆巴更广泛的贸易联系。十九世纪初，马查梅的伦瓜酋长进攻了基博肖，他曾经向住在

山下平原的马萨伊人购买枪矛。在这次进攻之前，基博肖的查加族人经常往东旅行到肯尼亚的塔维塔和泰塔，往西旅行到卡赫、下阿鲁沙和上阿鲁沙。在帕尔区和乞力马扎罗周围进行的贸易项目，除铁以外，还有农产品、盐、烟草、牲畜以及给人买来当妻室的妇女。

可是，不论是查加人还是格韦诺人都没有到沿海去。人们可以争辩说，乞力马扎罗地区互相竞争的酋长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斗争，很可能使那里无法有效地组织商队贸易。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种形势正好是刺激商队贸易发展的催化剂。同时，尽管格韦诺族地区不是这种情况，帕尔人参加商队贸易的活动也只限于向平原上各个中途站供应食物。直到1850年左右，当格韦诺族地区的恩戈菲山成为象牙贸易中心的时候，格韦诺人才开始旅行到南帕尔区去买象牙，然后带回格韦诺族地区出售。至于香巴人，他们只是在1869年左右金韦里去世之后，才在商队贸易中取得了一些主动权，当时西姆班韦内·森博扎首先把他的总部从山上的沃加搬到平原去。在这之前，香巴拉族的基林迪统治者只限于利用他们在庞加尼河流域所据有的重要位置，向所有路过他们王国的商队征税。

即使庞加尼河流域的部族组织过自己的商队到沿海去的话，也不会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可能的答案是香巴人不愿意同他们的邻族发生任何重要的贸易关系。费尔曼教授指出，他们虽然在两个方向同他们相邻的部族进行交易，但从来不超过一个部族去同另一个部族做买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他们之所以没有商业活动的意



愿，归因于他们是山区居民。因为，在森博扎最后迁往平原之前，香巴人的一切重要活动只局限于桑巴拉山区，而将山下的平原让给别人。正是这些平原提供了联络庞加尼河流域几个山区的最便利的道路。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以外，香巴人似乎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高地。因此，可以认为，他们不能承担坦桑尼亚近海内地其他部族已经明显地完成的联络任务。这样，就使得斯瓦希里人能够在沿海象牙的需求激起内地的积极反应之前，向内地迁移。这件事发生的年代大概同我们在南方内地观察到类似现象的年代是相同的。因为基勒马的查加族传说清楚地指出，斯瓦希里人是在十八世纪后期经由泰塔族地区同庞加尼，可能还同蒙巴萨发生联系的。<sup>①</sup>

虽然本书前文没有谈到贩卖奴隶的任何细节，但这种买卖在好些方面是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sup>②</sup> 首先，奴隶贸易和它以前的象牙贸易一样，是促使沿海和内地结合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其次，更重要的是，奴隶贸易把人当作商品，这个事实对十九世纪坦桑尼亚社会的形成增加了新的内容。在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在沿海的城市和种植园，在塔波拉、乌季季以及较小的内地贸易中心——凡是有大量奴隶的地方，都为新的社会关系打下了基础。这些新的非部族化的城镇居民多半成为穆斯林，并被逐步地并入斯瓦希里社会，这是坦桑尼亚现代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住在海岸和沿

① 斯塔尔：《乞力马扎罗地区查加族历史》，第 307 页。

② 阿尔珀斯在《东非的奴隶贸易》（坦桑尼亚历史协会第 3 号论文，1967 年内罗毕出版）的著作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奴隶贸易问题。

海岛屿上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成为把这些地区同东非和中非内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其结果是，沿海城镇人口的种族成分变得更加混杂，各色人都有。的确，现在塔波拉和乌季季的居民大部分已经不是坦桑尼亚人的血统，而是刚果人的血统；他们与其说是尼亚姆维济人或乌季季人，不如说是曼耶马人。在桑给巴尔，那些受奴役的大陆人的子孙，在支持反对少数阿拉伯人统治的革命以及支持桑给巴尔与坦桑尼亚大陆联合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在这一章试图分析那种导致沿海与内地长途商路形成的富有生气的过程。通过考察葡萄牙入侵以前、葡萄牙统治时期和阿曼统治时期沿海贸易的类型和组织，我们已经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力量促使沿海城镇重新改变他们的贸易方向，从完全靠印度洋过日子，转变为同东非大陆的经济生活建立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也看到，局限于内地的区域性贸易网如何逐步地扩展，从而使内地人民终于受到国外的新的经济影响。我们还注意到，这两个过程如何互相发生作用，有时是内地带头，有时则是沿海带头。但是我们决不可认为贸易系统的扩大是坦桑尼亚商队贸易发展的总的结果。首先，这些商路不仅把坦桑尼亚内地各族人民同沿海各族人民联结起来，而且把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同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安哥拉、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各族人民联结起来。正如兰杰教授在他写的那一章中所指出的，不仅是商品，而且思想也沿着这些商路通往四面八方。又如罗伯茨博士写的那一章所论证的，象牙和奴隶的长途贸易的发

---

展，对于坦桑尼亚许多部族的社会政治历史有着更直接的重大影响。但是，商队贸易的发展对于坦桑尼亚后来历史的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在参与商队贸易的人们中间撒下了团结的种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就是从这种萌芽状态的团结意识中历史地产生的。

## 第四章 十九世纪的政治变革

安德鲁·罗伯茨

### 引 言

本章讨论十九世纪坦桑尼亚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中间发生的政治变化，他们已经有了或者正在开始发展某种形式的地方酋长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变化可以看作是非洲部族社会对于内地和沿海之间发展贸易的反应，也是对于采用新武器以及出现取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新机会的反应。因此，我将考虑阿尔珀斯博士叙述的各种发展对于基曼博博士谈到的某些部族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还有其他重要的外部影响，最明显的是恩戈尼族从非洲南部的入侵。而且，正如基曼博博士所着重指出的，单凭外部因素不能说明非洲部族社会的政治发展，就好象单凭外部因素不能说明其他社会的历史一样。非洲的领袖们和别的地方的领袖们一样，总是要处理他们社会内部组织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他们的雄心同他们为实现这种雄心所需要的社会力量或经济资源之间经常存在着鸿沟。

十九世纪坦桑尼亚的政治历史同它以前历史的主要差别，只是促进变革的外部因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当然，我们在看待十九世纪历史时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理由很简单，关于十九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一般说来，十九世纪的口头传说比以前的要丰富得多；而且，我们可以开始从能写作的旅行家特别是 1850 至 1900 年欧洲旅行家的记录中读到关于内地历史的大量材料。因此，各个领袖的性格和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从西纳、米兰博或姆克瓦瓦等人物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思考和追求政治利益的方法，同其他各地的统治者是很相象的。

关于十九世纪坦桑尼亚政治变化的性质，可以作出十分简短的概括。那就是，军事力量已经代替宗教力量而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基曼博博士曾经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一些地区掌管祭祀和礼仪的领袖如求雨巫师已开始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成为地方酋长，对一定地区的人民拥有司法权。在十九世纪，这个过程加快了。日益增长的对外联系，大大地增加了领袖们取得人力和武器的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并不是任何其他地方都出现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未必都是“进步的”。它常常包含着大量的战斗、袭击和暴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不受这种趋势影响的部族（如伊拉库人或伊兰巴人）的遭遇可能反而更好一些。不管是好是坏，总之，十九世纪的坦桑尼亚，特别是通过象牙和奴隶贸易的发展，同外部世界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老的、小规模的组织形式已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那些企图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旧的宗教和亲属关系实行统治的人们，并不都是投机分子和土匪。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有些

人却是受到尊重的真正革新者。他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并宁愿由他们自己尽力来掌握这一变革，而不把主动权让给外人。

为了了解这些领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简略地研究一下他们所继承的东西。如同其他非洲地区一样，大多数坦桑尼亚部族的政治组织都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不论是氏族还是酋长国，领导权是世袭的；一个人能够继承某个权力职位，是因为他的父亲、哥哥或者叔伯在他之前担任这个职位。这种世袭制有严重的缺点。它不断引起继承权的争端，因为它很少明确规定哪一个家庭成员享有最优先的继承权。于是，酋长国往往由于争夺继承权的暴力冲突而分裂。在这种斗争中，一方可能从外面招来某些势力作为同盟者，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些外来人而不是原来竞争的任何一方赢得真正的统治权。争夺继承权的另一个结果是，受挫折的对手可能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酋长国。当一个酋长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扩大了版图时，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一个领袖征服了附近的某个国家，他常常把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他的一个或几个亲属，这种方法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削弱可能发生的对主要酋长地位的争夺。但是一旦这些亲属自己有了辖地，他们又很可能决定独立。而且他们本人既然是酋长的后裔，也容易得到公众的承认和拥护。

因此，那些比较有远见的领袖们总是努力设法使主要酋长国强于它的任何附属国。这个问题有三个主要方面：需要有军事上的优势；需要有某种行政上的控制，以保证附属国继

续服从和进贡；还需要确保统治的延续性，使统治机构在统治者死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让我们先来研究第一个方面，即军事上的优势。拥有一批忠于最高酋长而不是忠于任何其他人的战士显然是很重要的。这些战士最好是实际上不承担任何其他任务的职业军人。可是，正如基曼博博士指出的，坦桑尼亚的自给经济，充其量只能供养很少量的专业人员；大部分地区简直不可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同时供养种地的人和一批脱离生产的人。因此，为了维持能够称得上常备军的一支队伍，通常需要发展贸易，首先是发展诸如牛、谷类和其他粮食的地方贸易。地方贸易也可能供应兵器，因为即使在采用步枪之后，矛仍然是经常使用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武器。一旦组织了一支战士队伍并且能够依靠地方产品来维持时，就可以用它来扩大长途贸易，例如劫取奴隶或者强迫人们向酋长进贡象牙。这种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持续地生存下去，因为奴隶和象牙可以交换到枪支、布匹和其他制成品，用来武装和奖赏一支部队。

下文将会说明，十九世纪的一些酋长就是用这个方法在东非内地获得权力的。但是这种军事力量的增长只会给统治带来更多的问題：怎样才能确保被征服的地方或者附属国继续接受最高酋长的统治并为他的利益效劳。有些酋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他们把一些地区委托给平民甚至外国人，而不是委托给自己的亲属。这些平民或外国人只是依赖酋长的善意才有权威（如同基曼博博士所叙述的，在十九世纪初，西湖地区的一些酋长国或王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有些酋长试图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他们让原来的统治者继续统治并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就近监督他们。有些酋长根本没有真正处理这个问题，而是依靠征伐和依靠战士的凶猛来胁迫别人屈服。当然，在实践中，许多酋长是根据权衡自己地位是否巩固，军队的强弱，以及他们所要统治的地区距离首府的距离，而决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办法的。

非洲领袖们面临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统治延续的问题，也就是要在统治者去世之后，不论是酋长国、王国、君主国还是帝国，确保国家组织能够继续保持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建立行政管理结构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地方首领是没有世袭统治权的人，而只是酋长的代理人，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转而效忠于他的继承者，因为这是他们得以保持权力的最好机会。但是，如果那里的权力是掌握在酋长家庭的其他成员手里，或者掌握在被征服地区原来的地方酋长手里，这个组织就很可能破裂。如果对中央酋长职位的继承问题发生了长期争执的话，那就更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就是十九世纪坦桑尼亚领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坦桑尼亚各个不同地区作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来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



## (一) 东 北

### 桑巴拉族地区

坦桑尼亚历史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是桑巴拉族地区的金韦里·耶·纽姆巴伊。<sup>①</sup>十九世纪初期,他在基林迪首府伍格哈继他的父亲金亚希成为狮子国王。金亚希曾经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他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使自己比附属于基林迪的任何酋长更有势力,虽然他未能打败十八世纪建立的独立酋长国姆希威。金韦里刚就位时,就对政府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巩固国王的地位,使国王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成为最高统治者。所有的附属酋长国都由他的亲兄弟和堂、表兄弟统治。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想自己当国王,因而容易被怀疑为不忠。与此相反,金韦里可以更信任他的儿子们,因为香巴人很害怕父亲的诅咒。因此,金韦里设法立自己的儿子们做酋长。这些儿子的母亲都是来自平民氏族,金韦里就利用她们和她们的兄弟来监视他的儿子们,并向他报告他们是否暴虐或无能。金韦里不满意的酋长往往被降级调到其他次要的酋长国去。此外,王室的参事全都是平民,他们是防止基林迪王朝可能出现暴政的又一道防线。金韦里就这样成为一个以强大和仁慈闻名的统治者,虽然他对王国心脏地区的控制必然要超过他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他的声望增强了他的实力,因为许多奴隶

<sup>①</sup> 本节系根据史蒂文·费尔曼的《香巴人》(《The Shambaa》),载安德鲁·罗伯茨编《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七个地区的历史》(1968年内罗毕出版)。

和其他难民都跑到伍格哈来寻求保护。他把这些人连同其他因为玩弄妖术而被判罪的人，以及在他审问的案件中作为罚金交付给他的奴隶，一并编入他的军队。到了1850年，金韦里在南帕尔山区和沿海的庞加尼之间征收贡税，桑巴拉境外的广大地区，例如邦德族地区，则由他的儿子统治。

然而，金韦里的王国由于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出现裂痕。金韦里急于同到内地来寻找象牙和奴隶的沿海地区商人做生意。到1857年时，他已经用滑膛枪装备了一支四百人的队伍。<sup>①</sup>他力图垄断对外贸易，借以阻止其他酋长获得步枪和火药。但是他无法制止他的一个儿子森博扎参予庞加尼河流域的贸易，因为主要商路恰好经过森博扎的酋长国马津德，而金韦里的首府伍格哈却在远离这条商路的山上。因此森博扎得到了大量枪枝，而且同其他和沿海通商的部族特别是同北边的秦塔人和南边桑巴拉区的齐古阿人结成了联盟。

当金韦里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去世时，按照他的愿望由他的孙子谢库瓦伍继承王位。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谢库瓦伍比附属的酋长们都年轻，他就企图用侮辱他们的办法来行使权威。森博扎请来秦塔的士兵，并在他们的援助下击败了谢库瓦伍。谢库瓦伍在1869年被杀死了。于是森博扎接管了伍格哈，但他自己没有当国王，而是让他的儿子金韦里·马古伍当国王。因为森博扎的实力基地在庞加尼河流域商路上的马津德，这对他说来，远比伍格哈国王享有的那种神秘的宗教权威来得重要。因此桑巴拉区的真正权力中心移到

① 伯顿：《桑给巴尔》，第2卷。（Burton: <Zanzibar>, II）

了西部边界。这就使得这个王国的东部更容易受到袭击，而自从谢库瓦伍死后，他的兄弟都逃到了那里。他们立即支持邦德族人的一次起义，图谋对新国王进行报复。当时基林迪王朝在邦德的统治非常残酷。邦德人屠杀了住在邦德的基林迪人，重新获得独立。谢库瓦伍的兄弟未能撵走新国王，但是他们控制了桑巴拉的东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国。就这样，桑巴拉区和外界联系发展的结果导致了金韦里王国的瓦解，以及森博扎统治的新型国家的出现，这种国家的基础不在于国王的传统宗教权威，而在于它能从外面得到货物、武器和盟友。

### 齐古阿人

贸易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桑巴拉区以南的齐古阿族地区可以看得更清楚。香巴人的国王从来未能征服齐古阿人，因为后者容易从沿海得到枪枝。人们的确可以这样说，森博扎由于把首都建立在齐古阿人旁边的马津德，自己变成了齐古阿人，从而解决了香巴人政治中的“齐古阿问题”。大约在1850年，齐古阿人控制了沿海的巴加莫约和庞加尼以西一度强大的多埃族地区。多埃人曾经把卡姆巴人赶往北方，现在则要向桑给巴尔苏丹派驻萨阿达尼的长官纳贡了。<sup>①</sup>齐古阿人的主要活动就是抢劫奴隶，用来换取来自桑给巴尔的

<sup>①</sup> 伯顿：《湖区》，第1卷，第123—124页（《Lake Regions》）；弗尔登：《斯瓦希里人的远征》，第139—140页（Velten：《Safari za Wasuaheli》）。参阅本书阿尔珀斯博士所写的第3章。

枪枝。<sup>①</sup>一些齐古阿人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最著名的是伯瓦纳·赫里，他后来坚持了阿布希里发动的反抗德国人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齐古阿人没有实现政治统一是并不奇怪的。许多掠夺奴隶的酋长在同阿拉伯竞争者打仗的同时，还互相攻打，没有几个酋长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或者把权力传给他们的继承者。存在时间较长的齐古阿酋长国事实上不是在齐古阿族地区，而是在更西边的卢古鲁族地区。这个酋长国是基萨本戈建立的。他是齐古阿人，大约在1850年前后，他在沿海附近成为一群逃亡奴隶的领袖<sup>②</sup>（1857年伯顿听说坦噶以北也有一个这样的集团，他们对香巴人和迪戈人都保持独立<sup>③</sup>）。基萨本戈激怒了桑给巴尔苏丹，因为他公然蔑视苏丹的权威，窝藏逃亡奴隶。基萨本戈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向西迁移到金加卢的地区，金加卢是卢古鲁族三位主要的求雨巫师之一。如果把酋长理解为同时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统治者的话，那么基萨本戈的确是卢古鲁族地区第一个真正的酋长。他对来往塔波拉的商队征收很重的通行税，并侵袭周围地区，抢劫奴隶。他住的城镇叫西姆班韦内（位于现今的莫罗戈罗附近），有数千居民，斯坦利在1871年很赞赏它的高大的石墙和了望塔以及雕刻精美的木制城门。<sup>④</sup>不久，这个城镇

① 伯顿：《湖区》，第1卷，第125—126页。

② 伯顿：《湖区》，第1卷，第88, 185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374页。

④ 斯坦利：《利文斯敦》，第115—116页。

遭到洪水的严重破坏,<sup>①</sup>但是基萨本戈的后裔金戈在1890年仍然占据着这座城镇。由于他曾经拒绝参加阿布希里反抗德国人的斗争,所以德国人允许他向过路的商队征税。<sup>②</sup>

## 帕 尔 人

帕尔族地区位于桑巴拉区的西北,它包括两个主要的地理区域:萨梅以北的北帕尔山区和南帕尔山区。<sup>③</sup>十八世纪的时候,北帕尔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在山区的北端,有一个单独的氏族居于优势地位,建立了格韦诺酋长国。格韦诺区的酋长们通过对割礼<sup>④</sup>的控制和传播关于移民的传说,在他们的臣民中间培植了某种集体观念。但是在十八世纪后期,桑吉族聚居区造反并且分裂出去了。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格韦诺对其余几个区的控制也开始被外来力量削弱了。沿海地区的象牙和奴隶贩子开始经常来找桑吉人和格韦诺几个区的酋长。格韦诺首府远离主要商路,所以格韦诺的最高酋长不能分享他的部属和邻族所得到的新的机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现在第一次搞到了枪枝。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不仅格韦诺各个区多少有些独立性,而且抢劫奴隶的盛行开始威胁

① 斯坦利:《利文斯敦》,第646—647页。

② 施图尔曼:《同埃明帕夏一起在非洲的心脏》,1894年柏林出版,第21—27页。(F. Stuhlmann: «Mit Emin Pascha ins Herz von Afrika»)

③ 本节系根据伊萨利亚·基曼博《帕尔人》,载《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1968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

④ “割礼”是非洲许多部族的传统仪式。男女少年到达成熟年龄时,长者为他们举行“割礼”,并传授男女关系的知识。参加这种仪式后,他们就成为成年人了。——译者

到任何形式的政治控制。

为了维护中央的统治，格韦诺酋长根德瓦采取了两项重要革新措施：建设了一个有牢固防御工事的新首府和一支常备军，其中还包括他的私人卫队。这支军队由年青人组成，他们的给养是特地从根德瓦臣民中征集来的牛。根德瓦恢复了对北格韦诺的控制，但是由于缺乏枪枝，他不能有效地对付南部一个拥有枪枝的酋长的抵抗。于是根德瓦寻求外援，同莫希的查加族酋长林迪结成联盟。根德瓦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可以直接接近当时聚集在乞力马扎罗山南坡的商人。但是林迪也同这些商人打交道，并且也和根德瓦一样野心勃勃。两个统治者都受到抢劫者和敌对酋长对边境的骚扰，他们都需要至少在一条边境上确保和平以减轻压力。可是双方都必须控制一段通往沿海的商路，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冒险坐视对方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根德瓦干了一件不明智的事情：邀请查加族军队来帮助他镇压南方地区。他在这些军队的帮助下进行了几次惩罚性的抢劫，带回了大量的牛分配给他的部下。但是查加族人很快就发现，单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可以多么轻易地袭击格韦诺族地区。过不多久，他们就侵入格韦诺族地区。抢劫了根德瓦集聚在他的首府周围的牛群。根德瓦的臣民因为他强迫征牛而敌视他，不给他任何支持，结果根德瓦本人被杀，作为他的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源泉的牛群大部分被查加人夺走了。南方地区再度独立，北格韦诺则由于根德瓦的兄弟和儿子们之间的纷争而长期陷于分裂。

因此，在格韦诺区，尽管有一个统治者想方设法要加强

中央酋长的地位，沿海商人的到来终于带来了分裂的后果。与此相反，在南帕尔，沿海贸易却导致了真正的统一，尽管这个统一是点滴地逐步实现的。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分为许多小的政治单位，它们又经常分裂成更小的单位。但是到了1870年，有一个统治者曾经在一片相当大的地区取得了经济上的（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统治权。他就是姆舍瓦（在姆巴加地区）的马松博。他曾经是泰塔的商人，他从那里得到了获取权力的主要工具。第一个工具是新的占卜术，它不同于通常的占卜术，其盛行地区远远超出了姆舍瓦。这种称为“恩德姆瓦”的新占卜术，既应用于普通的诉讼案件，也应用于巫术事件。后者尤其盛行，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巫术是在普遍动荡不安时期使许多人遭受不幸的原因。马松博应用这种测验方法，能够在一大片地区内发现被认为是巫师的人。他把他们带到宫廷，不判处他们死刑，而是把他们编进他私有的军队（姆希威的香巴拉酋长国的统治者大约与此同时也是这样做的）。这支“巫师军队”由于增添了在泰塔招募的雇佣军而加强了。马松博有了这一支军队就能够肆意袭击广大的地区。他死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生前没有试图强制实行任何形式的政治统一。但是正如基曼博博士所说的，“在分裂力量如此强大的时期，他的一生应当被看作是一支团结力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帕尔地区的特点是许多小单位互相敌对，而在姆巴加这种情况已转变为对唯一统治者的真正敬畏。”而且就某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在马松博死后还继续存在。他的侦察巫术的技术“恩德姆瓦”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并且是在动

乱时期确保某种程度的社会管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鼓励不同氏族的人们把嫌疑犯送交姆巴加的占卜师，而不是自己私行治罪。

### 查 加 人

十九世纪期间，乞力马扎罗南面和西面山坡的一些查加族酋长国曾经为了扩大政治组织的规模而作了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尝试。<sup>①</sup>最早的一次是奥龙博于1800年左右在乞力马扎罗东部创建的“帝国”。奥龙博是一位没有世袭统治权的年青人，他的兴起不是借助于同沿海的贸易，而是借助于同北帕尔的贸易。以前，查加族东部的人只有最简单的武器配备，但是奥龙博从帕尔得到了铁矛来武装与他同龄的人。他率领他们劫掠牛群和奴隶，使用奴隶在凯尼建造了巨大的石头城堡，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它的残址。奥龙博以这个首府为中心，把周围的氏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并从他的所有辖地征收妇女作妻室。奥龙博在一次同马萨伊人作战时被打死，他的“帝国”立即瓦解，统治权回到了许多氏族领袖手里。奥龙博的一生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查梅地方的伦瓜十分近似：伦瓜的兴起也是靠有了铁矛，从而获得大批牛群，他死后也没有留下继承人。无论如何，奥龙博至少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虽然龙博地区长期处于主要的变革潮流之外，在十九世纪，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奴隶的来源地而受到重视，但是奥龙博却继续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所以接近十九世纪末，当马兰古的马雷尔勒占领

<sup>①</sup> 本节根据凯瑟林·斯塔尔《查加族史》。



龙博的时候，他采用了奥龙博的头衔“基拉米亚”(征服者)。

最成功的查加酋长国是基博肖。1800年左右，奥里奥氏族曾经设法控制了它的邻邦。到1850年时，奥里奥的酋长塔图亚已经威名远扬。阿拉伯和斯瓦希里的象牙商人曾经访问过塔图亚，塔图亚及其以后的酋长们派了特使到桑给巴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塔图亚的继承者洛基拉抢劫奴隶，向他的邻邦勒索贡品，并且打败了莫希的林迪。因此，当西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即位时，基博肖已经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西纳在他的首府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基博肖的版图。周围广大地区的青年被迫住到西纳的坚固的石头城堡里去。战士们在这里进行操练，他们吃抢劫来的牛，穿进口的布，装备着进口的武器、枪枝和投枪。这种投枪是由附近的马姆巴酋长国的铁匠们用从帕尔进口的铁制造的。西纳自己也有铁匠，他用铁镣把他们囚禁起来，独占他们的劳动，好象是叫他们制造短刺矛。为了供养首府众多的人口，西纳要他的臣民生产更多的粮食，这对于肥沃的乞力马扎罗香蕉园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西纳用他抢劫来的牛肉犒赏这些劳动者。

由于得到了泰塔的有特效的作战药物，西纳的军队越过乞力马扎罗山坡两侧向东面和西面同时出击。基博肖遇到的唯一厉害的对手是莫希的林迪，然而林迪决定缔结一项盟约而不冒再次被打败的风险。西纳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他还把他征服的许多领地置于一定形式的行政管理之下。他亲自指定代理人在基博肖酋长国周围设置了一个进行直接统治

的中央核心。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从当地的统治家族中亲自挑选人员担任酋长，同时指派他的特使（“瓦苏”）到各个酋长的首府加以监督。西纳用这些办法保持对他的庞大帝国的控制，直至1891年为止。那时，德国人到达这里并且带来了一种甚至连西纳的军队都无法匹敌的武器：马克辛机关枪。

在基博肖东边，林迪酋长把莫希建成乞力马扎罗政治斗争中的另一支主要势力，但是他采用的方法和西纳截然不同。当林迪于1860年左右即位时，莫希酋长国在它的邻国中已取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卓越地位，但是与当时在塔图亚统治下的基博肖相比仍相形见绌。看来林迪在早期就已决定不依靠军事手段来获得权势，相反，他建立了经过精心选择的联盟，旨在尽可能地孤立基博肖。林迪首先得到阿鲁沙袭击者的支持，他们供给他牛，让他引导他们去袭击山区。但是林迪也和当时其他野心勃勃的酋长一样，需要一支自己的军队。他通过向逃亡者、孤儿和其他因为战争和抢劫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保护的办​​法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有了这批追随者之后，他就能够劫掠象牙和奴隶，从而鼓励斯瓦希里商人把莫希作为一个基地。不久，在林迪的首府就有了斯瓦希里人的小聚居区。林迪自己也学习斯瓦希里语，并雇了一名斯瓦希里人当文书，以便能够同沿海的大人物和桑给巴尔苏丹通信。

部分地由于这些接触，欧洲旅行者很快就知道了林迪的名字。林迪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乞力马扎罗最强大的国家是莫希而不是基博肖。虽然事实上他既没有达到西纳所享有的

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甚至连他自己的战利品也没有多大的控制权，但是许多欧洲人还是把他当成乞力马扎罗的“最高酋长”。正因为这样，在1885年同德国殖民地开拓协会签订条约并允许基督教差会<sup>①</sup>建立传教点的是林迪，而不是西纳。当殖民统治最后确立时，莫希比它的邻近地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德国人把他们的地区总部设在莫希，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 (二) 坦桑尼亚中南部

### 恩戈尼人

坦桑尼亚的中部和西部同东北部一样，象牙和奴隶贸易的发展对当地的政治组织起了重大的冲击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外部因素，即恩戈尼人<sup>②</sup>。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些恩戈尼战士从南非的纳塔尔北上，一直打到坦桑尼亚西南部的菲帕族地区。大约在1845年，他们的领袖赞根达巴就死在那里，队伍随着分散了。一部分恩戈尼人最后定居于马拉维和赞比亚东部，另一部分恩戈尼人在姆潘加拉拉和姆坦巴利卡的率领下，向北面维多利亚湖方向推进，到了尼亚姆维济族以西的地方。1850年前后，一群恩戈尼人在南苏布瓦的一个

① 基督教和天主教派往国外的传教机构“mission”和“missionary station”，按中国教会过去的习惯叫法，称为“差会”和“差会驻地”。——译者

② 本节根据格利弗《桑格阿—恩戈尼历史》(Gulliver: «History of the Songea Ngoni»); 并参阅汤姆·普林斯:《马关瓜拉历史》。(Tom von Prince: «Geschichte der Magwangwara»)

酋长国布冈巴定居。<sup>①</sup>另一支恩戈尼人即关瓜拉部族在祖鲁·加马的率领下，从菲帕区往东南迁移，到了马拉维湖以东的山区。他们在那里同马塞科的恩戈尼人汇合，这是早在恩戈尼人到达赞比西之前就已经分裂出来的一个部族。这两个部族最初建立了不稳定的联盟，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很快爆发为公开的战争，关瓜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部分马塞科人越过鲁伍马河南逃，其余的则往东逃跑，其中有些人到基隆贝罗河以东的姆本加附近避难。

当时关瓜拉人内部又分为两支：由奇佩塔领导的一支在现今桑格阿以北建立了姆肖佩王国；另一支则在更往南的地方建立了恩杰卢王国。这两个恩戈尼王国共同在莫桑比克北部和坦桑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实行恐怖统治。姆肖佩的战士于1882年在马萨西捣毁了一个传教点，他们甚至还侵入到北面的扎拉莫族地区。东南部那些不好战的小部族很少抵抗或根本没有抵抗恩戈尼人。由于姆肖佩的恩戈尼人把抓来的俘虏编入自己的军队，或者作为奴隶卖给来自基尔瓦的阿拉伯人，整个地区变得荒无人烟。

大部分的恩戈尼人之所以称为恩戈尼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和行为，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血统。他们是由各个部族成员混合组成的，是在移民和战争过程中抓来的俘虏，被迫服从共同的纪律。他们实质上是专业士兵，主要靠抢劫为生，特别是抢劫牛群，而鄙视种地。因此，他们显然为那些力图扩大自

<sup>①</sup> 伯顿：《湖区》，第2卷，第75—76页；斯坦利：《黑暗大陆》，1880年编，第319页。

己军事力量的酋长提供了仿效的榜样。很清楚,从香巴族、帕尔族和查加族的历史来看,建立职业军队的想法并不是恩戈尼族所特有的;同样清楚的是,恩戈尼人的榜样对于坦桑尼亚中部和西部的野心勃勃的酋长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对于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几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仿效恩戈尼人,要么就受他们的蹂躏。

### 桑古人和赫赫人

桑古族、赫赫族和贝纳族的历史说明了上述的论点。<sup>①</sup>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桑古族的领袖穆尼古姆巴控制了鲁瓦哈平原的各部族。他大概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枪枝,这些阿拉伯人早先曾经率领他们的远征队,沿着鲁瓦哈河和恩冲贝河流域上游西征,进到桑古族地区和金布族地区南部。然而,当来自菲帕区的恩戈尼人向桑古人进攻时,桑古人被迫往东撤退,进入赫赫族地区的西部。当恩戈尼人分散到北部和东南部时,桑古人又回到这里,并开始按照恩戈尼人的方式建立军事组织,由若干正式命名的团组成,配备着尖矛和椭圆形兽皮大盾牌。

1860至1880年间,赫赫族成为一支不次于桑古族的强大力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恩古鲁赫的一个酋长穆尼古姆

---

<sup>①</sup> 本节系根据阿利森·雷德梅因的《赫赫族》(《The Hehe》),载《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又见雷德梅因博士的《姆克瓦瓦与赫赫战争》(《Mkwawa and the Hehe Wars》),载《非洲历史杂志》1968年第9期;马西亚·赖特:《梅雷雷酋长和德国人》(《Chief Merere and the Germans》),载《坦桑尼亚札记和记录》,1968年第69号,第41—49页。

巴(他大概取了桑古族酋长的名字)迫使卢根巴酋长国接受他的统治。然后,他又进攻东圭族地区,并征服了赫赫族地区北部各酋长国。经过一段时间,赫赫族的许多酋长或者向穆尼古姆巴屈服,或者干脆逃跑了。穆尼古姆巴的成功,除了他本人的突出才干以外,看来还有两个主要因素。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因为他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桑古人以及后来的恩戈尼人的侵犯。正如桑古人仿效了恩戈尼人的军事技术一样现在赫赫人也从桑古人那里学会了这种技术。当时桑古族的威信很高,以致他们的语言对赫赫族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影响。

穆尼古姆巴大约死于1879年,他的儿子姆克瓦瓦不仅保持并且还扩大了他的版图。姆克瓦瓦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就成功的。他首先必须打败和杀死对他的权威进行较量的一个隶属酋长姆瓦姆班贝。姆克瓦瓦只是由于同桑古族酋长梅雷雷结成了暂时的联盟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同时姆克瓦瓦还同恩戈尼人进行激烈的斗争。1881年赫赫人和姆肖佩的恩戈尼人之间爆发了战争。由于双方损失太大,因而他们一致同意在他们的儿子长大以前不再打仗。这就是赫赫人和恩戈尼人的关系(“乌塔尼”<sup>①</sup>)成为讲笑话的用语的由来。

姆克瓦瓦不断地打仗。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他的权力主要是靠军队而不是靠政治组织。他的统治方式同穆尼古姆巴一样,一部分是通过他亲自任命的人特别是他的家族成员,一部分是通过原先独立的酋长。为了使他们继续效忠于他,他必须向他的战士提供武器和报酬,为此他不得不去抢劫。到

<sup>①</sup> “乌塔尼”(utani),斯瓦希里语,意为亲戚关系。——译者

赫赫族地区的商人寥寥无几，因为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桑古战争以来，通往西部的主要商路已经北移，经过戈戈族地区。赫赫人在基洛萨附近的穆孔多亚同阿拉伯人做生意，但为了得到布匹之类的商品，姆克瓦瓦还袭击经过萨加拉族地区和戈戈族地区的商队。萨加拉族和戈戈族互不团结，不能击退赫赫人从这方面的进攻。赫赫人对北方的袭击，使他们同马萨伊人发生了冲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萨伊人数次抢劫了赫赫人的牛群。但是赫赫人制止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萨伊人接连不断地穿过坦桑尼亚往南的扩张。赫赫人对这条主要商路的进攻也造成了同德国人发生冲突。姆克瓦瓦后来就因此而垮台。

### 贝纳人

贝纳族的地区位于赫赫族地区东南，它是遭受姆克瓦瓦袭击的许多部族之一，但他们也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就和实现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sup>①</sup>大约在1860年，乌特米克威拉酋长国的基纳曼加王朝成为贝纳人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同时受到穆尼古姆巴领导的赫赫人以及恩戈尼人的严重威胁。当时的基纳曼加酋长不善于打仗，所以长老们决定只让他掌管祭祀和礼仪，而将政治和军事领导权交给他的弟弟姆坦格拉。姆坦格拉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护本部族和在乌兰加上游的沼泽地区避难的其他部族，使他们免受恩戈尼人的侵犯。到1858年，阿拉伯商人来到贝纳族地区购买象牙。大约在1863

<sup>①</sup> 本节系根据卡尔威克的《江河地带的贝纳族区》。

年，蒂普·蒂卜从桑给巴尔前往赞比亚北部的途中曾访问了姆坦格拉。<sup>①</sup>

然而赫赫人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恩戈达姆蒂图战役中，穆尼古姆巴经过激战之后打败了姆坦格拉。结果，基纳曼加酋长国撤离了他们最初的首府所在地西部高原。姆坦格拉往东迁移，定居于乌兰加流域。这意味着旧的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种稻子和捕鱼代替了种谷子和养牛。姆坦格拉的部族这时能够更多地见到来自基尔瓦的阿拉伯商人，他们前往马拉维湖的途中要渡过乌兰加河上游。于是贝纳人得到了许多枪枝，不过一部分被用来同他们的西面邻族交换铁器。他们最好的武器大概是素来著名的乌木矛。<sup>②</sup>姆坦格拉能够供养十一个正式命名的连队，这些连队由职业士兵组成，他们在青年时期受过专门训练。这个组织大概是仿照恩戈尼军队建立起来的，它有效地保护了贝纳人，直到姆坦格拉在1884年去世时为止。姆坦格拉之死导致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战争，姆肖佩的恩戈尼人在查布鲁马领导下进行了干预。新的酋长基万加没有力量反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人的侵略。

<sup>①</sup> 伯顿：《湖区》第2卷，第269—270页；《蒂普·蒂卜自传》，第13页；以及阿尔珀斯博士在本书前面所写的一章。

<sup>②</sup> 冯·普法伊尔伯爵：《乌兰加地区考察记》，1886年出版。（Count J. von Pfeil: 《Die Erforschung des Ulanga-Gebietes》）



### (三) 坦桑尼亚西部

#### 阿拉伯势力的侵入

在坦桑尼亚西部,除恩戈尼人外,还有另一个产生重要政治影响的入侵力量,这就是来自沿海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sup>①</sup>在坦桑尼亚东北部,这些商人的主要作用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商品和武器,从而使那里的酋长们及其臣民增加了发财致富和扩大势力的机会。而沿海商人在坦桑尼亚西部的地方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大得多。到1850年,他们的买卖已遍及尼亚姆维济族地区的大部分;他们也和尼亚姆维济人一样,北到乌干达,西南到加丹加和赞比亚东北部。为了维持这样广泛的商业网,沿海商人必须在内地有一个贸易基地。1852年,他们在乌尼亚尼耶姆贝的尼亚姆维济酋长国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后来称为塔波拉。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斯韦图酋长和封迪基拉酋长领导下的乌尼亚尼耶姆贝曾经是尼亚姆维济族地区最重要的酋长国之一。阿拉伯人之所以在那里定居,就是为了得到有效的保护。但是到1860年时,由于塔波拉的阿拉伯人随时可从沿海运来高效能的枪枝,他们已经强大到能够赶走封迪基拉的继承人姆恩瓦·塞勒,而代之以他的堂兄弟或表兄弟姆卡西瓦,从而达到免缴过境税的

<sup>①</sup> 关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尼亚姆维济人和米兰博人的几节,是根据安德鲁·罗伯茨著《尼亚姆维济人》,载《1900年以前坦桑尼亚》一书。还可参阅同一作者所写的《尼亚姆维济的贸易》一文,载格雷和伯明翰合编的《殖民时期以前中非和东非的贸易》,1969年伦敦出版,第40—74页。

目的。从此以后，乌尼亚尼耶姆贝不再有什么重大的扩张，尽管它有时也向西面的一些酋长国进行抢掠和袭击。

同样，如果认为在坦桑尼亚西部的阿拉伯人一心想要建立一个政治帝国，那也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桑给巴尔的苏丹既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人力物力来支持这一事业。甚至在沿海城镇，他的代理人主要关心的是向商人征收关税；他们对于诸如齐古阿或扎拉莫这样的沿海部族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苏丹任命了一名总督（“瓦利”<sup>①</sup>）管理以坦噶尼喀湖畔乌季季为基地的阿拉伯人。但是远在桑给巴尔的苏丹很难对这样远的地方行使权力，因此，1881年塔波拉的总督职位空缺时，他就懒得再指派新的“瓦利”。这时候，苏丹委派一个斯瓦希里代理人姆特瓦纳在商路上的姆巴杜洛担任头人，负责保护来自戈戈族地区西部的商人，但是不久这个代理人（他本人也是商人）脱离苏丹而独立，自行征收过境税。<sup>②</sup>

在内地的沿海商人，确实是非常不团结的，除了在少数孤立的村庄外，他们代替不了非洲人酋长。来自阿曼的阿拉伯人同来自沿海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最重要的阿拉伯商人蒂普·蒂卜和米兰博的关系，要比他和米兰博的死敌、塔波拉的阿拉伯人的关系好得多，蒂普的主要利益毕竟不在坦桑尼亚，而是在坦噶尼喀湖对岸的曼耶马。阿拉伯人在那里无疑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可是在坦桑尼

① “瓦利”(wali)，斯瓦希里语，意为地方长官或头人。——译者

② 贝内特：《姆特瓦纳头人》(《Mwinyi Mtwana》)，载《东非历史研究》。

亚西部，当地酋长的势力却比较强大。阿拉伯人需要同他们合作才能有效地开展贸易。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阿拉伯人的经济地位由于欧洲人占领了沿海地区和渗入内地而开始受到威胁时，一些有势力的阿拉伯人才开始认真地考虑在内地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 尼亚姆维济人

阿拉伯人在塔波拉的出现，以及从塔波拉分出来的商路，既为尼亚姆维济族的领袖们提供了机会，也是对他们的挑战。他们力求分得一部分商业利益，不论是由他们供应象牙和奴隶，或者是单纯地向来往商队征收很重的过境税。与此同时，他们力求建立自己的实力，借以获得更多的象牙和奴隶去出售，以及防御恩戈尼人和人数虽少但是装备很好的沿海商人队伍。这种野心有时可以导致政治上的巩固和扩张；但是如同前文所说的坦桑尼亚东北部的情况一样，这种野心有时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酋长的对手也因而更加容易武装自己和宣布独立。在十九世纪的坦桑尼亚西部，许多人准备追随任何一个领袖，只要他看来能够存在下去和供应商品。由恩戈尼人(的袭击)以及象牙和奴隶贸易所造成的移民和社会分化，使得许多人同特定地区或传统权威都只有比较松弛的联系，他们习惯于只为物质报酬而服役。这一类的雇佣兵来自战俘、逃亡的奴隶、开小差的搬运夫、无业游民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但是，他们讲“义气”，并且仿效恩戈尼人的作战队伍建立了铁的纪律，因而能结合在一起。

有一批领袖就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实行割据。1830年前的某个时候，基兰加巴纳在尼亚姆维济族地区西部某酋长国夺权失败，就到萨加拉族地区自立为酋长，这个地区位于通往沿海的商路上，在尼亚姆维济族东部边缘。伯顿于1857年发现他的继承者过着阿拉伯式的生活，并使用他的士兵向过路的商队勒索过境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苏布瓦头人的儿子恩加伦瓜(后来称为姆西里)沿着铜器商人的道路来到加丹加，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利用从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枪枝，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帝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阿拉伯人废掉了乌尼亚尼耶姆贝的姆恩瓦·塞勒酋长，他的兄弟西姆巴就到西南的科隆戈地区建立了酋长国。乌尼亚尼耶姆贝酋长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尼温古·亚·马韦于1874年分离出去，征服了东南的许多金布人。与此同时，有利于这种迁徙和割据的各种势力，同时也可以有利于地位巩固的各个酋长国的统治者。米兰博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尼亚姆维济族东北部的另一个世袭酋长，即松戈区的姆廷金亚，他也曾利用十九世纪后期的变化使之有利于自己。此外，乌尼亚尼耶姆贝的姆卡西瓦的继承人伊西凯首先给阿拉伯人、后来又给德国人造成了许多麻烦。

### 米 兰 博

这些领袖究竟怎样保持他们的权势，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但是我们对其中两个人，即米兰博和尼温古·亚·马韦的情况却有足够的了解，因而可以看出新的条件和

机会使尼亚姆维济族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米兰博可能是在布冈巴的恩戈尼人中间度过了他的部分青年时代。十分清楚，他很快就懂得了恩戈尼型军队的潜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米兰博用一小队战士控制了他自己的乌约瓦酋长国周围的一些酋长国。从1870年到1884年他去世的这段期间，他曾经带队出征到更远的地方——布哈和布隆迪，到西边的文扎和汤圭，南边的平布韦和科农戈，东边的尼亚图鲁、伊兰巴和苏库马，北边的苏库马和苏布瓦。米兰博控制了从塔波拉直达乌季季的商路；他打败了塔波拉的阿拉伯人，并在1876年迫使阿拉伯人在使用这条商路时向他纳贡。米兰博还力图控制通往乌干达的道路，并于1876年和1881年派遣使节去见布干达的穆特萨。他还渴望同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他很快就认识到苏丹并不是桑给巴尔独一无二的势力。他急切希望能从沿海得到更多的火器，而塔波拉的阿拉伯人则企图阻止他得到这种供应。他还欢迎欧洲传教士，因为他们能够给他的人民传授有益的知识，同时能帮助他扩大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甚至对比利时人杰罗姆·贝克说，他希望东非内地能建立几个大王国，因为这是有助于传播欧洲知识和影响的最好办法。

但是米兰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根本不清楚，他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统治他曾经征伐过的广大地区。我们知道，米兰博的惯用手法是用当地酋长家族的成员来取代那些反对过他并被他们打败的酋长。他强迫这些隶属的酋长向他进贡象牙并提供青年人来扩充他的军队。如果他所征服的领土同一

个强大的敌对酋长国交界，他有时也把他的少数部下留在那里。1882年，一位旅行到乌干达的传教士报告说，尼亚姆维济族北部的恩萨拉拉酋长国是受米兰博管辖的。传教士来往于塔波拉和维多利亚湖之间可以免缴过境税，因为米兰博下令对他们免税，他的命令在那个地区是有效的。但是他很少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新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让许多附属的酋长自成中心。米兰博显然同姆克瓦瓦一样，必须使他的军队经常行动，以使用惩罚性的袭击来恐吓他的邻邦，同时使他的战士有事可干和得到大量的战利品。事实上，米兰博看来并不怎么信任他的部下。他的王国之所以能保持完整，靠的是他个人的声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他个人的忠诚和敬畏。米兰博于1884年去世，由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姆潘达沙洛继位，后者既缺乏米兰博那样的见识，又缺乏米兰博那样的军事才能，他的王国就开始瓦解了。

### 尼温古·亚·马韦

尼温古·亚·马韦领导下的“雇佣兵帝国”（“鲁加鲁加帝国”）是比较统一的。<sup>①</sup>1870年至1880年间，尼温古和他的战士征服了塔波拉以东和以南的大部分金布族地区。他以基韦勒为根据地，骚扰通往沿海以及从塔波拉到坦噶尼喀湖和菲帕族地区的商路。尼温古在他征服的酋长国中设置官员，名

<sup>①</sup> 本节系根据艾尔沃德·肖特的《金布人》，载《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还可参阅肖特神父的《尼温古·亚·马韦和鲁加鲁加帝国》（《Nyungu ya Mawe and the Empire of the Ruga-Rugas》），载《非洲历史杂志》1968年第9期，第235—259页。

叫“瓦特瓦勒”，直接向他负责。凡是向尼温古降服的酋长可以继续留任，但是对于那些进行反抗并被打败的酋长则很少委任别的人代替，而是让酋长的职位空着。无论在那一种情况下，真正的统治者都不再是酋长，而是瓦特瓦勒。酋长们丧失了收集和处理象牙的权利，而由瓦特瓦勒将象牙直接送给尼温古。瓦特瓦勒统治的地区主要根据军事需要划分界线，而不是按照传统的界线。这样的地区总共不超过六、七个，它们的边界往往穿过金布族原有的三十来个酋长国。而且，瓦特瓦勒始终不过是官员，不可能成为酋长和取得掌管祭祀和礼仪以及实行有效政治统治的双重权力。

尼温古和米兰博一样是在1884年去世的，但是他的继承人接管了一个牢固得多的王国。鲁加鲁加帝国不仅在尼温古去世以后还存在，而且到1892—1893年时还继续存在。当时他的继承者(他的女儿)击退了姆克瓦瓦领导的赫赫人的进攻。只是在德国人(他们被当作反对赫赫人和乌尼亚尼耶姆贝的同盟者而受到欢迎)诱使新的酋长和她的参事从他们自1875年以来征服的地区撤走所有的瓦特瓦勒官员时，这个王国才告结束。事实上，被德国人破坏的这个制度同德国人后来用以统治坦桑尼亚许多地方的“阿基达”<sup>①</sup>制度并没有多大差别。

## 菲 帕 人

金布族的南面和西面有好些部族——科农戈人、本德人、

---

<sup>①</sup> “阿基达”(Akida)，斯瓦希里语，指受德国殖民当局雇用的地方长官或代理人。

平布韦人、菲帕人、布恩古人和尼哈人。长途贸易的发展、火器的扩散和恩戈尼人的侵略对这些部族也有很深的影响。这里我只谈谈菲帕人。基曼博博士已经叙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sup>①</sup>。大约在十八世纪末，菲帕族地区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两个敌对者争夺十八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特瓦酋长国。失败的一方后来又在南边建立了第二个酋长国，叫做连加利莱。此后许多年，连加利莱和原来的特瓦酋长国(分裂后改名恩坎西)之间不断发生战争。1840年过后不久，恩戈尼人侵略菲帕族地区，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据说当恩戈尼人在菲帕族地区抢劫牛群时，特瓦的酋长们躲到洞穴里避难。<sup>②</sup>恩戈尼人的领袖赞根达巴大约死于1845年，他被埋葬在菲帕族地区。正如前文已经说过的，他的部属向四面八方溃散。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菲帕族开始受到火器扩散的影响，当时他们的东部邻族布恩古人已经使用火器了。在恩坎西发生内战期间，布恩古人前来援助酋长的反对者。酋长的部下仅仅拥有枪矛和弓箭，不是他们的对手。那个时候，有许多阿拉伯商人和尼亚姆维济商人在前往赞比亚和加丹加的途中经过菲帕族地区。有一些阿拉伯人住在恩坎西酋长的宫廷里，于是恩坎西酋长也开始用象牙和战俘交换枪枝来武装自己的部下。

在卡普乌菲统治期间(1860—1891年)，恩坎西有一个相

---

① 本节系根据罗伊·威利斯的《菲帕人》(Roy G. Willis: «The Fipa»), 载《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

② 伯顿:《湖区》,第2卷,第153页。



对和平繁荣时期，尽管它的北部地区在 1880 年丧失给平布韦族酋长卡索格拉和尼亚姆维济族的军事首领西姆巴。<sup>①</sup>菲帕人开采铁矿和炼铁，用来制造工具，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卖给鲁夸湖一带的居民，以交换用当地棉花织成的布。1880 年，探险家约瑟·汤姆森对于菲帕人从事农业的能力有深刻印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菲帕人就以生产谷物闻名，他们生产的谷物足够卖给南邻的隆古人以换取奴隶，然后再用这些奴隶去换取沿海的进口货。<sup>②</sup>卡普乌菲从农业和贸易中所获得的盈余，不仅够供养他的私人卫队和边界上的军事长官，而且还能够供养一批行政官员。恩坎西分为十六个区，每个区由酋长任命一名官员管理，他负责把命令传达给当地民选的村长。

菲帕族南部的连加利莱酋长国按类似的方法进行统治，但是它较多受到外界的干涉，特别是赞比亚东北部强大的本巴人的干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酋长皮卢拉·菲帕得到一位桑古族探险家基马拉温加的帮助。基马拉温加以前是一个猎象者，他由于从事用象牙交换枪枝的贸易而成为鲁夸湖一带的有势力的军事首领。有一个时期，基马拉温加保卫了连加利莱，但后来他又进攻皮卢拉的继承者。连加利莱的尼哈人在反对基马拉温加的战争中打得很好，但基马拉温加保住了他在鲁夸湖以西的萨卡利洛根据地，一直到 1893 年他被德国人打败时为止。

① 汤姆森：《中非湖泊》，第 2 卷，第 229—230 页。（Thomson: «Central African Lakes»）

② 斯旺：《在中非同奴隶猎取者作斗争》，1910 年伦敦出版，第 98 页。（A. J. Swann: «Fighting the Slave Hunters in Central Africa»）

#### (四) 西北部

十九世纪初,坦桑尼亚西北部有少数几个相当大的王国,它们的统治者是图西和希马牧民的贵族阶层。但是由于王朝内部的纠纷,哈族和津扎族的一些王国在十九世纪终于瓦解了。哈亚族的卡拉圭王国不但存在,而且它的势力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1880年以后,它内部也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长期纠纷。这种内部问题由于外界的干预而加剧了,因为这个地区夹在北方和南方几个强大部族王国的中间。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恩戈尼人一再侵扰哈族人和希马族人;稍后,米兰博又给他们增添了困难。由于当时布干达从水陆两方面沿着连接塔波拉和东海岸的南方商路逐步扩张它的势力,津扎族和哈亚族的王国还日益受到布干达的影响。

#### 哈 族

1800年左右,在布哈有两个大王国。北部的王国控制了苏布瓦族西部一些较小的酋长国。这些酋长国大概是在十九世纪初摆脱了哈族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尼亚姆维济族西部则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哈族势力的控制之下。<sup>①</sup>大约在1840年左右,北部国王鲁哈加同他的女婿、布隆迪的恩塔尔二世打仗,因

<sup>①</sup> 基索索:《苏布瓦情况》(Mwami Kizozo:《Habari za Usumbwa》), 1959年8月;格拉夫·戈岑:《从东到西横越非洲》(A. Graf von Gotzen:《Durch Afrika von Ost nach West》), 1895年柏林出版,第78页;罗伯茨:《野外工作笔记》(A. D. Roberts, fieldnotes), 1967年出版。

为恩塔尔二世把布尤戈马省并进了他那迅速扩张的王国。<sup>①</sup>不久鲁哈加去世,他的儿子们把王国分成两个独立的地区:穆汉布韦和布云古。<sup>②</sup>差不多与此同时,大约在1850年左右,南部哈族王国发生叛乱。国王恩塔尔被打败,他大约在1855年去世。此后,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为三个酋长国:赫鲁、布辛戈和卢古鲁。<sup>③</sup>

过不多久,布冈巴的恩戈尼人侵略和蹂躏了赫鲁酋长国,因为那里的牛群对于恩戈尼人有最大的引诱力;赫鲁酋长有一个时期不得不到布隆迪避难。<sup>④</sup>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米兰博占领了卢古鲁并协助布云古试图收复被布隆迪占领的布尤戈马省,但没有成功。<sup>⑤</sup>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穆汉布韦和布云古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sup>⑥</sup>1884年米兰博去世之后,尼亚姆维济人撤离了卢古鲁,但在这以后的十年中,卢古鲁被争夺继承权的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在这期间,继承权的争夺者

① 卡普斯:《哈族地区和乌隆迪传教纪事》(R. P. Capus: «Eine Missionsreise nach Uha und Urundi»), 1891年。我感谢简·范西纳教授让我参考了他的即将出版的《布隆迪史》。

② 摘自《基邦多地方志》,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

③ 格兰特:《坦噶尼喀的哈族地区》(C. H. B. Grant: «Uha in Tanganyika Territory»), 载《地理杂志》第66期,第416页,1925年出版;伯顿:《湖区》(关于恩塔尔去世的日期),第2卷,第76页。

④ 伯顿:《湖区》,第2卷,第76,78—79页。

⑤ 魏斯曼:《在德国旗帜下》,1889年柏林出版,第249页(H. von Wissmann: «Unter Deutsche Flagge»);卡普斯:《巡回传教》,第123—124页(Capus: «Missionsreise»);索顿:《尼亚姆维济……的历史》(Southon: «History …of Unyamwezi»),载贝内特编《东非历史研究》,第88页。

⑥ 摘自《基邦多地方志》;福克斯:《铁路经济调查》,1907年柏林出版,第178页。(P. Fuchs: «Wirtschaftliche Eisenbahn Erkundungen»)

都从尼亚姆维济人那里得到了枪枝。<sup>①</sup>这种贸易在哈族人当中是少有的,他们一般不参加塔波拉、乌季季和乌干达之间的商队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主要关心的是扩大牛群。而且,因为哈族人索取很重的过境税,所以远途商人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去,然而这些商人却无法逃避南部文扎族酋长向他们征收的过境税。<sup>②</sup>

### 津 扎 人

1800年,以卢欣达为称号的国王统治着维多利亚湖西南角的津扎人。他通过他的亲属统治了北至金万尼(在卡拉圭以东)的大片地区,并向南边的苏布瓦人征收贡赋。<sup>③</sup>但是到了1830年左右,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纠纷,结果是西部的鲁苏乌比从东部的乌坎加分离出去。卡拉圭的国王恩达加拉调解了这次纠纷,鲁苏乌比成为卡拉圭的属国。<sup>④</sup>到了1870年左右,西部的其他地方也都分离出去了。<sup>⑤</sup>1875年斯坦利

---

① 洛伊:《哈族地区(德属东非)》,1901年出版。(A. Leue: «Uha [Deutsch-Ostafrika]»)

② 斯坦利:《利文斯敦》,第379—396页;《黑暗大陆》,1880年版,第305,318,324页;伯顿:《湖区》,第1卷,第407—410页;还可参阅罗伯茨的《十九世纪的乌文扎》(«Uvinz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阿扎尼亚》1968年第3期,第64—68页。

③ 基索索:《苏布瓦情况》;李希特:《布科巴地区》;戈岑:《横越非洲》,第78页。

④ 斯皮克:《探险日志》。库利写的《恩亚西地理》(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45年第15期)一文表明,在1830年左右鲁苏乌比和乌坎加是两个独立的王国。

⑤ 施图尔曼:《埃明帕夏》,第125页。

来到这里的时候，津扎族地区大约有十个独立的小酋长国。津扎国王的正统继承者卢沃马的统治地区局限于最东部的布卡拉，位于(维多利亚湖的)史密斯桑德湖岸上。<sup>①</sup>

尽管津扎族东部有条件参与维多利亚湖的贸易，而且津扎族铁匠对坦桑尼亚西部地区性贸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up>②</sup>但是沿海的商队却很少到这个地区来。这大概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在政治上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不仅由于旧王国的四分五裂，而且由于外界的干涉。到1875年，津扎族东部不仅遭到米兰博的袭击，而且也遭到恩戈尼人的袭击，后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占领了南面布科累的许多地方。<sup>③</sup>但是当时这一带的真正强国是布干达；它的大独木船队控制了维多利亚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干达占领了布图恩德韦和布干多；1884年，在乌古卢拉的帮助下，他们又从布卡拉的卢沃马那里夺取了上千头的牛；1887年，他们又支持卢沃马对乌古卢拉进行报复。<sup>④</sup>

① 斯坦利：《黑暗大陆》，1880年版，第157，171页；D. A. 洛：《1840至1884年的北方内地》，载奥利弗和马修合编的《东非史》，第1卷，第330页；参阅科尔曼的《维多利亚湖》，1899年伦敦出版，第108—109页。(P. Kollmann: «The Victoria Nyanza»)

② 斯皮克：《为什么要去探险》，第298页(Speke: «What Led to the Discovery»); 格兰特：《非洲之行》，第130—131页(Grant: «Walk across Africa»); 包曼：《经过马萨伊族地区到尼尔格勒》，1894年柏林出版，第211—247页；施图尔曼：《埃明帕夏》，第117—118页；科尔曼：《维多利亚湖》，第110—111，158页。

③ 斯坦利：《黑暗大陆》，第157页；施图尔曼：《埃明帕夏》，第118—119页；包曼：《经过马萨伊族地区到尼尔格勒》，第71页。

④ D. A. 洛：《北方内地》，第344页；施图尔曼：《埃明帕夏》，第125页注②。

再往西,干达的影响更大。到1858年,鲁苏乌比的雷萨鲁拉由于向来往于塔波拉和布干达之间的商队征税而变得富强起来。他还向乌希隆博的苏布瓦人索取贡赋。<sup>①</sup>1861年,雷萨鲁拉受到恩戈尼人的进攻,终于把他们打退,从而制止了他们的北进。<sup>②</sup>然而他的几个邻国都比他更加强大。他的王国是卡拉圭的属国,又不得不向布干达纳贡,1875年他的兄弟曼科隆戈在恩戈尼人的援助下废黜了他的王位时,他为了恢复王位而接受了干达的援助。<sup>③</sup>尽管雷萨鲁拉和布干达结成了联盟,曼科隆戈仍然当上了鲁苏乌比的统治者。在干达人的帮助下,曼科隆戈或他的儿子卡萨苏拉在1883至1884年劫掠了布科梅,在1887至1888年废黜了金瓦尼酋长,并征服了苏布瓦人的两个酋长国:布萨姆比罗和乌约伍。<sup>④</sup>

### 卡 拉 圭

长时期来卡拉圭在欣达土邦中,如果不是年代最久的土邦,也是最重要的土邦。<sup>⑤</sup>在恩达加拉统治时期,它的势力达

① 伯顿:《湖区》,第2卷,第176—177页;斯皮克:《探险日志》,第126—127页。

② 斯皮克:《探险日志》,第215,238页;戈岑:《横越非洲》,第93页。

③ 斯皮克:《探险日志》,第184页;斯坦利:《黑暗大陆》,第157页;D. A. 洛:《北方内地》,第330页。

④ 施图尔曼:《埃明帕夏》,第125页注②;斯坦利:《在黑非洲》(《In Darkest Africa》),1890年伦敦出版,第2卷,第384页;李希特:《布科巴地区》,第82页。

⑤ 本节系根据福特和霍尔合著的《卡拉圭史》,还可参阅伯顿的《湖区》中关于卡拉圭的概述(根据商人的报道),见该书第2卷,第177—185页。我十分感谢R. B. 斯托克兰夫人(露丝·伯杰)让我参考了她1961—1962年关于卡拉圭的研究资料。

到最高峰。恩达加拉是在 1820 年左右继位的。他在同基齐巴的战争中，同基亚姆特瓦拉、伊汉吉罗、鲁苏乌比甚至同卢旺达的战争中，打过许多胜仗。这些战争可能不是很激烈的。据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进行的对卢旺达的战争，主要是靠巫术(就象同一时期布隆迪的恩塔尔二世和北布哈的鲁哈加之间的战争一样)。战争的主要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征服土地，不如说是为了占有牛群。因为这一带的统治者是通过控制牛群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来保持权力的。恩达加拉从这些战争中获得的利益使他能够改组他的政府，以欣迷的王子来取代各地的世袭酋长。每个王子各有自己的一小支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替国王打仗来报答王室借给他们牛。在恩达加拉统治的后期，阿拉伯商人开始来到卡拉圭。从 1844 年起，有些阿拉伯商人继续前进到布干达去。<sup>①</sup>

恩达加拉于 1853 年左右去世。印度商人穆萨·姆朱里用大量象牙作礼物引诱布干达国王派军队打败了同恩达加拉的儿子鲁马尼卡争夺王位的卢韦吉拉，才使鲁马尼卡得以继承王位。<sup>②</sup> 卢韦吉拉继续作战，鲁马尼卡越来越依赖布干达，定期向布干达进贡。然而这两个王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干达国王一度曾经把他刚从布尼奥罗夺来的一个地区委托给鲁马尼卡管理。<sup>③</sup> 此外，布干达没有反对阿拉伯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卡拉圭首都附近的卡富罗建立殖民地。鲁马

① D. A. 洛：《北方内地》，第 323 页。

② 伯顿：《湖区》，第 2 卷，第 183, 224 页；斯皮克：《探险日志》，第 93 页。

③ 斯皮克：《探险日志》，第 265—267 页。

尼卡本人沒有对阿拉伯人提出重大要求，至少沒有直接提出过，因为他从南方邻邦鲁苏乌比征收的大量商队过境稅中分到了一部分。<sup>④</sup>

1880年左右鲁马尼卡去世时，布干达被迫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以确保它在卡拉圭的利益。鲁马尼卡的几个儿子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的一个儿子卡科科成为摄政者，但他不得求助于干达以反对鲁马尼卡的老对手卢韦吉拉。当时干达的士兵开进了卡拉圭，以保护那里的贸易并向居留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征税。1887年，卡科科被年轻的国王尼亚姆库巴杀死。1888年，鲁苏乌比丧失了长期以来一直是爭夺对象的布希姆巴省。1891年和1892年，卡拉圭遭到牛疫、天花和沙蚤的灾害。卡拉圭的牛群几乎全部死亡。这就毁掉了在卡拉圭总人口中占少数的游牧部族希马人和破坏了整个政治制度。因此，德国人于1896年占领卡拉圭时，能够在那里为所欲为，是不足为奇的。

## 结 束 语

本章对十九世纪政治变化所作的考察，是很不全面的。它仅仅涉及我们现时较为熟悉的一些地区，大半是最近调查研究的结果。本章过多地注意较有势力的统治者而忽视了各族人民，例如坦桑尼亚中北部较少卷入这个时期主要潮流的各个部族，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本章的目的是集中力

<sup>④</sup> 斯皮克：《探险日志》，第93页。



量探讨有助于使各地的历史多少能成为一个整体的几个问题，因为殖民时期以前的坦桑尼亚史就是由这些地方史组成的。

我在本章开始时已经提出，十九世纪的主要变化在于军事力量代替了宗教力量而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一过程的内容。政治组织的规模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扩大了，同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变得更加专门化了。这是在外部压力由于象牙和奴隶贸易以及恩戈尼人入侵而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为了克服传统的政治结构的局限性而作出努力的结果。各部族的领袖们不但认识到需要扩大领土和加强统治，而且还探索实现这些目标的新机会。他们有时运用巫术，如帕尔人的“恩德姆瓦”，有时则采用新的武器和战术。他们往往建立常备军，不论是由“巫师”还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常备军。他们越来越依靠专业人员——雇佣兵、铁匠、象牙搬运夫、行政官员。他们有时也能够利用文字——这是统治方法的一次真正的革命。不仅是莫希的林迪，还有香巴拉的金韦里，桑古的梅雷雷，以及米兰博的继承者姆潘达沙洛，都雇用了阿拉伯人或斯瓦希里人当秘书。有的领袖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已经开始以才能和忠诚、而不以出身作为任命官员的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依靠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转变为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后来的事实将会证明，这种转变为二十世纪更加迅速和深刻的变化作了重要的准备。

当然，没有一个坦桑尼亚领袖曾经阻止欧洲人强加于他

们的统治；只有桑给巴尔苏丹设法取得了近似布干达王国在乌干达的那种特权地位。十九世纪的坦桑尼亚历史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混乱和破坏的时期，是奴隶猎取者或恩戈尼族武士队进行袭击掠夺的时期。战争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残酷，给普通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和损失也更大。许多统治者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了这是既有组合又有分化的时期。人民的眼界和雄心都迅速扩大了。他们正在学会(尽管是痛苦地)在比较大的单位里共同生活，这种比较大的单位能够更多地得到外部世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内地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讲斯瓦希里语和开始到沿海工作的。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在内地流通的。的确，同大部分非洲国家比较起来，今日的坦桑尼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十九世纪开始形成的，这不单纯是由于沿海影响的扩大，而且还由于这个国家当时有那么多的地区在努力寻找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以适应这个日益发展的世界。

## 第五章 德国人的入侵和 坦桑尼亚非洲人的抵抗

吉尔伯特·格瓦萨

### 一、导 言

用非洲人的观点来观察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工作。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把非洲人看成人类社会的次要成员。他们抹煞非洲人的抵抗，认为这种抵抗仅仅是愚蠢的、疯狂的、倒退的行为，一句话，是野蛮人的行为。这种谬误的历史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错误地用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待非洲人的抵抗运动。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对非洲人抵抗运动的这种旧观点。本章试图证明，首先，非洲人的抵抗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欧洲人推行殖民主义，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的。本章的作者估计，只要比较切合实际地把抵抗运动同它在当地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上述的两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本章有四个论点，中心的论点是，非洲人对于德国人入侵坦桑尼亚大陆的反应和抵抗是遍及全国各地的，总起来说他们采用了四种做法。有些部族同德国人进行武装斗争，本章

把这种做法称为积极抵抗。但是，有些部族采取了不服从或者勉强服从德国人的态度。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应当加以说明的。他们拒绝合作，并且希望尽可能不同德国殖民者发生任何关系。这种做法可以称为消极抵抗。第三，有些坦桑尼亚部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顺应这些新来的人，或者设法利用他们。我们把对德国入侵的这种反应称为非洲人的适应方式。最后，有些部族把德国人来到坦桑尼亚看作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做买卖的机会。这些人是地道的商人，他们追求的是金钱和赃物。这种反应方式可以称之为市侩手法。

本章的第二个论点是，不同形式的抵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影响了坦桑尼亚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一定地区的抵抗运动有可能从一种方法转变为另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各种抵抗运动是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它在马及马及起义<sup>①</sup>时达到了顶点。因此，抵抗运动体现了坦桑尼亚历史的连续性，这是本书各章的作者们所一贯强调的一个论点。与此有联系的第三个论点是，不能把历次抵抗运动当作坦桑尼亚历史上孤立的插曲来研究，同时，由于它们是坦桑尼亚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它们也就成为坦桑尼亚民族主义重要的基本主题之一。最后的一个论点是，本章认为在评价或者确定坦桑尼亚非洲人抵抗运动的地位以前，必须较为全面地了解坦桑尼亚的历史。<sup>②</sup>

一般说来，坦桑尼亚历史同它的邻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① 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译者

② 本章提到的“坦桑尼亚”，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指坦桑尼亚大陆。

在东非三国<sup>①</sup>中,坦桑尼亚作为一个整体,遭受阿拉伯势力和奴隶贸易的危害最深。<sup>②</sup>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东非的欧洲势力开始发动侵略的时候,坦桑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进入东非其余地区的大门,有时还成为进入中非的大门。例如,访问布干达穆特萨国王朝廷的大多数欧洲传教士或探险家都要经过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没有象布干达或者布尼奥罗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大王国。尽管如此,唯有在坦桑尼亚爆发过一次最广泛和最猛烈的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马及马及起义。这个事实说明,建立了国家制度的地方,未必总是比尚未形成国家制度的地方更厉害些或者更强大些。只有坦桑尼亚受到过德国和英国两个殖民主义主子的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又严重地损害了她的经济和人民。肯尼亚和乌干达所受的损害则比较小。由于坦桑尼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了新型的领地文官制度,她大概是东非建立全领地性政治团体的第一个国家。在肯尼亚和乌干达,早期的政治团体普遍存在地方利己主义。坦桑尼亚却没有非常强烈的地方主义,这个情况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构成了坦桑尼亚后来产生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基础。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成为重新取得了在十九世纪丧失给外国人的政治自由的第一个东非国家。但是,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仍然在议论并且大概相信坦噶尼喀的独立还远未完成。这多半是因为同

---

① 指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译者

② 阿尔珀斯:《东非的奴隶贸易》,坦桑尼亚历史学会论文第3号,1967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

她的北方邻国相比，她的经济和教育前景仍然是黯淡的。桑给巴尔革命之后，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1964年4月26日合并成为坦桑尼亚，使许多人又大吃一惊。坦桑尼亚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国家。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力求用坦桑尼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德国或英国殖民者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这些令人吃惊的事情。这也是本书应做的事情。仅仅根据上面描绘的简单轮廓，就已经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确定非洲人抵抗运动在坦桑尼亚历史中的地位是可能的。第二，为了重获已经失去的独立，在不同时期分别采用过不同的方法。因此，在坦桑尼亚历史上占有它的地位的非洲人抵抗运动既是这个历史的动力之一，也是重新赢得独立的方法之一。然而，为了理解非洲人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的性质，有必要对1880年前后坦桑尼亚的形势作一简要的考察。

## 二、抵抗运动的背景

十九世纪下半叶，坦桑尼亚各地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有些部族还处于无领袖的状态。在哈亚族、苏库马族、尼亚姆维济族、哈族和戈戈族等部族中，建立了王国形式或称为恩特米的政治制度。在尼亚姆维济族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凭借军事征服而兴起的伟大的军人恩特米米兰博。1870年，米兰博控制了通向布科巴西部和北部的商路。斯坦利甚至把他看作是“中非的拿破仑”。但是就在德国人到达前

不久，米兰博去世了，他的帝国也随之覆灭。否则的话，米兰博有可能会适应德国的殖民主义，借以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因为他终生都是欧洲技术知识的狂热崇拜者。

在北部，金韦里曾经建立了一个有效力的军事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缺乏能使它继续存在下去的机构，因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金韦里的去世而灭亡了。在德国人到达时，香巴拉族已经在衰落，帕尔族已经严重地分裂。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先香巴拉族的军事渗透，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受到了经济衰退的打击，以及宗派斗争的加剧。当德国人来到帕尔族地区时，帕尔族已经由于经济上的对立而分裂了。这种对立很快转变为非洲人争夺德国效忠证书的政治竞争。德国人在这里也象在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不懂得非洲政治的本质。<sup>①</sup>十九世纪末叶，查加族也已建立了酋长制度。从十九世纪初起，查加族各个酋长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互相征伐。这些统治者的兴衰取决于他们的智慧和军事实力。在德国人到达时，基博肖酋长国的西纳通过战争征服了其他酋长，成为乞力马扎罗地区最强大的酋长。莫希的林迪或曼达拉成功地使德国人和某些历史学家相信他是查加地区的最高酋长。乞力马扎罗的酋长们互相之间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对立状态。

在南部，十九世纪恩戈尼人的侵入，在不好斗的各部族中引起了分裂和混乱。1845年，恩戈尼人的领袖菲帕去世之后，恩戈尼人就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北上，不断袭击布哈、

<sup>①</sup> 基曼博：《1900年以前的帕尔族政治史》，1968年东非出版社出版。

卡哈马和商路沿线，在那些地区造成了混乱。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米兰博和德国的鲁加鲁加。<sup>①</sup>另一个集团南下到桑格阿和更远的地区。直到今天，恩金多族还怀着痛苦的回忆谈论恩戈尼族的抢掠所造成的浩劫和恐怖。<sup>②</sup>在好战的各部族中，恩戈尼人的侵入推动这些部族建立起较大的政治单位。例如，赫赫族先后在穆尼古姆巴和他儿子姆克瓦瓦的领导下，统一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正是赫赫族的极盛时期。

以血缘和氏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大部分集中在坦桑尼亚南部。由于这些部族间的相互效忠通常总是比不上对本氏族的忠心，这些部族没建立大的政治单位。南部的这些氏族政治单位在马及马及起义时使德国人大为头疼。这次起义是德国人统治坦桑尼亚时范围最广的威胁。

第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按年龄建立起来的组织，它严格地按照年龄等级分配每个人的工作。例如，在马萨伊族中，“莫兰”(moran)负责国防；长老主持政治仲裁；“莱邦”(laibon)主管祭祀和礼仪，是后来欧洲人把莱邦误认为政治首领。德国人到达的时候，马萨伊族已经由于霍乱和天花的流行而削弱了。自相残杀的战争消耗了他们的集体力量，从而使他们在当时比较容易被征服。

到1880年时，东非的贸易改变了方向。原来是由诸如尼亚姆维济族和瑤族等商人从内地运货到沿海，这时变成了从

① 鲁加鲁加(ruga ruga)，斯瓦希里语，意即雇佣军。——译者

② G. C. K. 格瓦萨的实地调查，1967年7月至11月。



东往西的贸易，因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宁愿自己到内地去。在德国人到达时有三条通往内地的主要商路。一条从巴加莫约经过姆普瓦普瓦和塔波拉到乌季季和姆万扎—布科巴地区，另一条从基尔瓦或林迪到马拉维湖地区，第三条从坦噶或庞加尼通往乞力马扎罗。到1880年时，第三条商路折往北方沿着大裂谷进入肯尼亚高原，同蒙巴萨—坎巴区—吉库尤族地区商路<sup>①</sup>会合。看来，德国人就是沿着这些商路侵入内地的。后来修筑的铁路大体上也以这些商路为基础，只作了一些小的调整。非洲内地的贸易仍然是繁荣的。例如，苏库马人经营埃亚西湖出产的盐，查加人同马萨伊人进行木器和铁器的交易，基邦多的哈族用山羊同哈亚族进行交易。优质象牙的产地逐渐西移。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优质象牙都来自坦噶尼喀湖地区，而且往往来自后来的德属东非境外。斯瓦希里人、班扬人和阿拉伯人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象牙和奴隶贸易。

整个说来，坦桑尼亚沿海各部族在1880年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伊斯兰化了。然而，伊斯兰教却很少渗入内地，特别是很少渗入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以外的地区。1850年以后，探险家开始进入坦桑尼亚，接着是手拿圣经的基督教传教士来了。威廉·麦金农爵士<sup>②</sup>那样的租让权追求者很快也跟

<sup>①</sup> 奥利弗和马修合编：《东非史》第1卷，第10，11章，19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sup>②</sup> 英国殖民主义者，1888年成立的英国东非公司创始人之一。1887年，他强迫桑给巴尔苏丹签订为期七十年的所谓“租让”桑给巴尔全部主权给他及其公司的不平等条约。——译者

着来了，而且人数相当多。要求签订条约的英国人一般都找桑给巴尔苏丹，因为经过约翰·柯克爵士<sup>①</sup>的努力，英国的势力已经在那里占了压倒优势。但是，德国的租让权追求者看来却绕过了那个苏丹。1884年过后不久，德国开始入侵坦桑尼亚。非洲人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抵抗。现在我们就来更详细地谈谈这种抵抗运动。以上是德国人入侵坦桑尼亚和非洲人进行抵抗的舞台背景。

非洲人对德国人各种形式的反应和抵抗受到当地条件，特别是受到各部族社会结构的性质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他们如何斗争或如何反应，同时他们还根据自己衡量事物的标准、社会道德观念以及宗教和其他信仰，来解释由德国人入侵而造成危机的前因后果。总之，非洲人正如其他人民一样，要求成为本身安全的真正保护人。换句话说，为了确保他们能够管理和指导自己的生活方式，非洲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全随便委托给外国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安全包含着社会生活的各种形式，特别是政治和文化。为了重获或者保持非洲的自由，非洲人的抵抗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也有的是适应性的。此外，还应当提到非洲雇佣军。

令人遗憾的是，研究非洲人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一直对消极抵抗这个题目保持沉默。然而，坦桑尼亚确实有一些部族没有参与任何反对德国人的行动，也没有在任何对抗行动中站在德国人一边。换句话说，这些部族既不赞同德国人的统治，也不诉诸武力解决。现阶段的研究工作仍然很难确定

<sup>①</sup> 英国殖民主义者，1887年以后，任英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译者

消极抵抗的性质、范围及其具体原因。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可以证明,本章关于消极抵抗的设想是有根据的。首先,从纯粹的人类心理学观点来看,不能说坦桑尼亚任何一个酋长或统治者会心甘情愿地欢迎德国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剥削。这个一般性的论点本身虽然不能证明所有没有进行战斗的非洲人都反对德国人,但是它可以为存在消极抵抗的设想提供旁证。更重要的事实是,有些部族是准备进行战斗的,但是由于害怕被德国人的武力消灭,就转而采取消极态度。据说,汉加扎族曾经改变了同德国人进行战斗的主意。<sup>①</sup>汉斯·科里认为有些布哈亚族酋长“认识到抵抗是无济于事的”。<sup>②</sup>换句话说,某一个部族是否采用某一种反抗方法,取决于这种方法有多少胜利的把握和希望。有些部族实际上是被迫进行消极抵抗的,这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社会结构的性质,或者是由于它们所处的生态学环境所决定的。一个遭到疾病和瘟疫侵袭的部族往往是不会进行积极抵抗的。善战的马萨伊族如果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被削弱的话,就很可能进行积极抵抗。

事实上,甚至当欧洲人的行政机构严重地干涉马萨伊人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也没有起来进行战斗。1904年和1907年,肯尼亚殖民当局两次强占马萨伊人的土地,而马萨伊人两次都限于合法起诉。哈亚族进行抵抗的力量不是被战争而是被疾病和瘟疫破坏的:1890年末,布科巴和卡拉圭地区沙蚤

① T. 恩索洛个人书信,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② 汉斯·科里:《布科巴地方志》。

成灾，牛瘟使 90% 以上的牛死亡，天花使许多人丧命。瘟疫和流行病削弱了哈亚族及其邻近的各部族。基尔瓦的斯瓦希里人拒绝参加马及马及起义，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没有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能力。他们声称：“我们象女人一样。”<sup>①</sup>

另一个事实证明，德国人入侵的强烈程度及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遥远的内地，德国人的力量显然是很薄弱的，在它占领的初期，情况更是如此。除了距离远近之外，德国人还根据他们在一个地区现有利益有多大来决定在那个地区建立多大效能的统治。例如，他们认为桑巴拉和乞力马扎罗北部的高原适合种植园经济，于是在征服了沿海的阿布希里族以后，就立即加强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势力。德国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经济剥削。彼得斯的中心目标是把坦噶尼喀变成种植园殖民地。第一任总督冯·索登男爵（1891—1893 年）主张通过绥靖通往内地的商路来逐步占领坦噶尼喀。事实上，驻在巴加莫约的“保护军”指挥官在那以前就已经向控制通往内地各条商路的所有知名统治者发出备忘录，提出了由德国提供保护来换取他们承认德国统治的建议。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人抵抗运动的前线也就是德国人入侵的边界。德国人首先占领沿海地区，抗德运动首先就在沿海地区爆发。德国人的占领区沿着商路向内地扩大，大多数早期的抵抗运动也就沿着同

<sup>①</sup> 基尔瓦基温杰的哈桑·本·姆卡贝长老，基尔瓦（口述）本，1966 年 6 月访问记。

样的道路向内地延伸。在十九世纪中，德国人在马及马及起义地区的势力比较小。换句话说，除了其他因素以外，非洲人进行什么样的抵抗同德国人对某一地区进行什么样的入侵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坦桑尼亚西部，也就是现在的卢旺达以及布隆迪的广大地区的消极抵抗，看来是同德国人在那里的势力恰好比他们在乞力马扎罗、梅鲁或桑巴拉等地区的势力较为薄弱有关系的。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人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轻易在边远地区使用枪杆子的。由于交通不便，同时也由于德国人没有足够的财力、士兵和人员来控制遥远内地的广阔地区，因此，德国人力求在布哈亚、卢旺达和布隆迪等王国设立代表机构。德国人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实行间接统治，主要是出于权宜之计。欧洲人企图利用非洲人的机构来为非洲以外的势力服务。从下文可以看到，那些没有遭到严重侵犯的部族，就因为上述原因而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例如，首先我们就不能说参加马及马及起义的各部族接受了德国的统治，下文将会说明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消极抵抗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全部消灭德国人，于是就装出顺从的样子，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的独立不至于进一步受到损害。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例如，在基尔瓦基温杰及其周围的沿海地区各部族，尽管在 1894 至 1895 年曾经在哈桑·奥马里·马昆加尼亚的领导下进行过有力的抵抗，他们在马及马及起义时，一直保持消极态度。但是德国人在马及马及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中，并没有放过沿海地区的这些部族。

有些部族希望用拒绝同德国殖民主义者合作的方法，而不是用勉强顺从的方法来保持独立。例如，在1902至1904年之间，马坦戈族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不服从运动来反对德国人。德国人怀疑一个名叫曼达瓦的在煽动人民反对他们，就派雇佣兵去抓他。但是德国的雇佣兵发现村子是空的，因为所有的居民都已撤离村子隐藏起来了。德国的雇佣兵离开以后，村子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了。德国人后来收到的情报表明，他们担忧人民的反抗是有道理的。于是又派了一队雇佣兵到曼达瓦的村子里去。这一次，马坦戈族动员起来了，并且同德国人进行了一场全面战争。<sup>①</sup>这个例子表明，消极行动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转变为积极抵抗。本书的其他部分将会说明这一点。例如卢古鲁族就在1955年进行过积极抵抗，反对当局的农业政策。消极抵抗在殖民统治时期一直持续进行，人们把这看成是证明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性的一种方式。这种看法起源于十九世纪，而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政治策略中又重新出现了。如果说，大多数非洲人曾经在什么时候接受过欧洲殖民主义，那都是错误的。这种论点是对非洲人的理性和自由观念的最大的侮辱。这里所要说明的一个观点是，消极抵抗在某种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同时，对积极抵抗的成功和失败的回忆及其以后非洲人争取独立的策略又充实了消极抵抗的内容，使消极抵抗成为坦桑尼亚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

<sup>①</sup> 佩拉米霍档案中的基贡塞拉编年史。我要感谢约翰·伊利夫博士为我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总之，看来可以这样说，消极抵抗指的是，非洲人或者拒绝服从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政策，或者勉强服从这种政策。后一种做法只是在权衡了别的策略的许多不利因素之后才采取的。非洲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希望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然而他们失败了。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看清楚必须采用长久以来生根于坦桑尼亚历史中的民族主义策略。

历史学家常常把非洲人站在欧洲人一边积极作战反对非洲同胞的过程称为通敌。有时候这种行为被称为同欧洲殖民主义合作。还有人争辩说，通敌者同其他非洲人一样是想要保持独立的。通敌这个词显然是不适当的。这个词之所以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缺乏更好的词汇；用通敌论来解释历史的人一般都承认用词是一个问题。第二，这个概念可能是从缺乏足够证据的所谓通敌的基本事实产生的。把非洲人同欧洲殖民主义的勾结看成维护非洲自由的基础的观念，是无力的和不现实的，并且是一种需要加以说明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反对通敌论的主要意见是，产生这种行动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这个词的涵义。从字面上说，通敌就是非洲人迎合殖民主义（在坦桑尼亚就是同德国人狼狈为奸）。这是一种自觉的和经过考虑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引起义愤的行为。最后，通敌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中自觉地进行选择的行为。如果所谓的通敌分子的行为和动机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他们的前途肯定是极为黯淡的，而且很难看出他们想用什么办法来保持独立。下文将会看到，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保持这种独立。因此，非洲人在行动中站在欧洲人一边

作战的这种做法，看来比单纯的通敌更为严重。

德国人侵略的三种方法之一是同地方上那些自称“承认”德国统治当局的强大的或者有势力的酋长结成同盟。德国人同某一集团友好，会导致酋长之间的不和。德国人采用的结盟方法有时候使他们自己成为地方权术的受害者，不仅没有减少德国占领当局的困难，反而增加了爆发抗德战争的可能性。在当地的政治形势下，非洲酋长们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不是当德国人的“朋友”，就是德国人的敌人。当德国人同某一酋长的对手结盟时，德国人自己也就卷进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会动脑筋的非洲人就在当前的政治竞争中利用德国人。换句话说，他们设法把德国人卷进去，而且要做得既能消灭自己的对手，又能得到德国人的友谊。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这种应付方式称为适应方式。在查加族地区，凯瑟琳·斯塔尔充分地叙述了关于使欧洲人的利益适应非洲人的过程。她说：

酋长们是惯于掌权的独裁者。他们喜欢奉承而不喜欢听反对意见。他们利用新进入乞力马扎罗的每一种东西和各种各样的人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表现了非常灵活的政治手段……他们利用雇用的告密者来提供政治情报，利用另外一些特务来巧妙地及时地发表经过缜密思考的政治预言。<sup>①</sup>

<sup>①</sup> 凯瑟琳·斯塔尔：《查加族史纲》，载《坦噶尼喀纪事》，1965年3月出版，第39页。（Kathleen Stahl: «Outline of Chagga History»,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这里，查加族的传统政治同干达族的政治有一些近似之处，两者都可以叫作“权术政治”。西纳继位时使用了典型的干达族方法来消灭他的对手。在查加族地区，如同在布干达一样，非洲人运用了原有的政治权术来抵抗欧洲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查加人并不是同入侵者勾结，而是运用他们固有的政治权术去对付德国人，以便保住或者扩大他们自己的（查加人的）利益。德国人刚一露面，莫希的酋长就使他们陷入了他所设置的圈套，被他利用来打倒了他的对手、当时乞力马扎罗地区最强大的酋长西纳。德国人不懂得这种权术政治的奥妙复杂。不久以后，他们就同原来的盟友、莫希的酋长作战了。这一次是马兰古的酋长马雷尔勒对德国人玩弄阴谋。德国人要使他们同酋长结盟的方法在乞力马扎罗取得成功，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懂得当地的政治权术。但是德国人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有好几次被用作非洲政治斗争中的卒子。

德国人侵略的另一个方法是镇压那些强大到有危险性的部族。德国人有时候实行火药外交：他们炫耀军事实力，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括机关枪、大炮和士兵列队穿过村庄；或者举行军事演习来显示欧洲武器的杀伤力。这种用恐怖手段胁迫别人归顺的方法是典型的马基雅弗利<sup>①</sup>式的方法。德国人通过打击那些有危险性的部族借以教训他们的方法，迫使有些部族或统治者采用适应德国人的手段。当德国人进攻某一酋长的敌人时，这个酋长要么同德国人并肩作战，要么就为他的敌人而战！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统治者宁愿利用外国人

<sup>①</sup> 马基雅弗利是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权术政治家。——译者

作为工具来反对本地的敌人。例如桑古族酋长梅雷雷欢迎德国人是因为他们反对姆克瓦瓦，后者正从根本上威胁着他的帝国的存在。又如，马亨格族酋长基万加的头号敌人是姆克瓦瓦，早先他险些被姆克瓦瓦征服，而姆克瓦瓦也是德国人的敌人，因此，在马及马及起义时，他就站在德国人一边。<sup>①</sup>同样地，德国人有时迫使某些统治者对他们进行积极抵抗。例如，同某一个酋长结盟就会招来这个酋长的敌人的攻击。基博肖的酋长西纳起初对于新来的外国人是采取友好态度的。因为他们带来了贸易和外交接触的前景（西纳以为德国人是被一个象他一样的酋长派来的），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除了同这些外国人作战以外，没有别的选择。<sup>②</sup>因此，看来所谓的通敌应当是指用相同的手段来达到相同的目的。但是非洲适应者的目的同欧洲人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非洲人是为了利用欧洲人的力量去反对他们的新仇旧敌，从而能够确保独立，既不受当地敌人的统治，也不受新来外国人的统治；也是为了既使他们的敌人害怕，同时又赢得重要的欧洲人的友谊。简言之，白人统治非洲和非洲人；而那些为了地方利益而适应欧洲人的非洲人，虽然确实能够得到暂时的友谊和眼前的物质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丧失了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乌干达的巴干达族勾结了英国人。他们的国王（姆万加王）被驱逐以后，一些暴发户通过典型的基干达式的权术政治上台了。

① 1967年11月，G. P. 库南比酋长个人提供的情况；以及威廉·阿宁博士的《东非的骚乱》，载1905年9月《德意志殖民杂志》，第37页。（Dr. Wilhelm Arning: «Zu den Unruhen in Ostafrika», in «Deutsche Kolonialzeitung»）

② 马利亚：《西纳》，大学学员研究论文，达累斯萨拉姆1968年打字本。

英国人同意使用这些人。有一个时期，这些巴干达人以为他们已经胜利了。但是阿波罗·卡格瓦怀着沮丧和失望的心情而死去。塞梅·卡昆古鲁成为乌干达的巴马拉基独立运动的奠基人，他在逝世时痛斥了一切欧洲人连同他们带来的西药。

然而真正的通敌者是有的。这里指的是欢迎德国人的统治而不拥护非洲独立的那些个人或小组，这种人大多数是已经脱离原先所属的部族，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或其他的独立性需要维护。因此，德国人在同非洲人的大多数冲突中，利用了“鲁加鲁加”雇佣军。这些士兵是德国人从非洲其他地方用金钱招雇来的雇佣军。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人来说，德国的侵略提供了掠夺和袭击非洲同胞的机会。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他们只要受到雇用去反对非洲反抗者，就会进行掠夺和袭击。看来，德国人的确是让他们的雇佣军在非洲人的村子里为所欲为的。必须指出，真正的通敌者为数是很少的，而且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总之，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的性质看来是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第一，当地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当地的传统权术和习惯；第二，德国人入侵时当地的力量对比和部族间原有的对立；第三，德国人侵略那个地区所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方式和激烈程度。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这些就是决定抵抗运动进程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广义的非洲人抵抗运动就是指非洲人公开地或秘密地对于欧洲殖民主义侵略作出的集体反应。这种反应受非洲当地具体条件的影响。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要谈到积极抵抗。这样做有几条理由。首先，大部分历史

学家在谈到非洲抵抗运动时，脑子里想的是战斗。然而，本章提出的种种论据已经否定了这种想法。其次，由于上述的情况，关于积极抵抗的文字记载是最丰富的。但是现有的大部分材料需要重新加以考虑，特别是因为非洲人没有留下回忆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早就应该进行的。然而在考察积极抵抗运动之前，还应当比较深入地分析一下德国入侵的性质。

德国的入侵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别人物的活动：探险家、地理学者、传教士和商人。这个阶段的活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全面展开。汉萨同盟<sup>①</sup>的商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桑给巴尔活动。到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控制了桑给巴尔25%的贸易。1876年以后，由于德国国内正在建立一些非洲社团，到东非来的德国人数目也随着增加了。在1884年以前，德国本土也已经成立了几个这样的社团。到1884年时，卡尔·彼得斯又创立了“德国殖民地开拓协会”。这个协会的目标是为德国取得殖民地，它的宣言写道：

德意志民族发现自己对于瓜分世界没有发言权，这种瓜分自从十五世纪以来就已经在进行了。欧洲所有其他文明国家都占有世界其余部分的领土，能够在那些地方灌输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可是德国的移民在越过帝国的国境以后，就成为外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德国人流了大量鲜血才实现了统一，使德意志帝国得以强大起来。

---

① 中世纪德国北部各城市的政治性和商业性的同盟。——译者

德国移民的巨流已经在外国消失好多年了……为了挽救这种可悲的局面，已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团体，它将坚决地、积极地着手执行开发殖民地的各种计划，并将支持具有同一宗旨的各个团体的努力。<sup>①</sup>

这就是卡尔·彼得斯创建的协会的宗旨。他建立这个协会是要使它成为“德国殖民地协会”的有力竞争者，后者是由德国贵族领导的，讲究体面，因而彼得斯认为它远远不能适应德国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彼得斯的另一个目的大概是要寻找某些方法促使德意志帝国政府实行占领殖民地的政策。

有一位作者形容卡尔·彼得斯是一个“冒险家、暴徒、梦想家、雄辩家、骗子和帝国主义分子”。<sup>②</sup>非洲人一般称他为“姆科诺—瓦—达穆”，意即“双手沾满鲜血的人”。

卡尔·彼得斯和他的朋友朱尔克、普法伊尔和奥托在1884年9月离开德国。他们在旅途中使用假名，伪装成机械师。1884年11月4日他们抵达桑给巴尔。接着，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往内地。11月10日他们离开萨达尼，雇了三十六个搬运夫。他们经过齐古阿族地区，沿着瓦米河进入卢古鲁族地区，沿路伪造了许多条约。人们在说到这些条约时，常常引用萨加拉族地区姆索维罗土邦曼古恩戈苏丹的例子。彼得斯同曼古恩戈签订的条约写道：

---

① 斯蒂尔：《对德属非洲的看法》，1939年伦敦出版，第249页。（G. L. Steere: 《The Judgement on German Africa》）

② 斯蒂尔：《对德属非洲的看法》，第250—251页。

姆萨加拉<sup>①</sup>的姆索维罗土邦曼古恩戈苏丹和卡尔·彼得斯博士。

曼古恩戈同时代表其全体臣民，彼得斯博士代表其现在和将来的同事，特此签订永恒友好条约。

曼古恩戈将其全部领土和全体臣民献给德国殖民地开拓协会代表卡尔·彼得斯博士，专供德国全面开拓殖民地之用。

卡尔·彼得斯以协会名义……声明，他愿意接管曼古恩戈苏丹管辖下的领土及其一切属于姆韦尼<sup>②</sup>萨加拉现有的宗主权供德国殖民地开拓协会之用。

据此，曼古恩戈苏丹将其继承的或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全部姆索维罗领土永远割让给卡尔·彼得斯博士；与此同时，将其全部权利移交给他。

卡尔·彼得斯博士以协会的名义保证，……在其开拓萨加拉殖民地时，对姆索维罗给予特别的……照顾。

本条约已由翻译拉马赞清楚地转述给曼古恩戈苏丹。双方已经在乌萨加拉签字和举行有效的正式手续。苏丹在答复直接的询问时声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隶属于桑给巴尔苏丹，甚至不知道后者的存在。

卡尔·彼得斯(签字)

曼古恩戈(签字)

本条约业已在大量证人面前完成法律手续，永远有

① 又称乌萨加拉，即萨加拉族地区。——译者

② “姆韦尼”(Mwenyi)，斯瓦希里语，意即首领、业主、占有者。——译者

效，立此为据：

克瓦加金加(画押)，曼古恩戈苏丹的儿子戈洛拉(画押)，曼古恩戈的二儿子德拉曼(画押)。格拉夫·普法伊尔，奥古斯特·奥托。翻译拉马赞的画押等。卡尔·朱尔克博士

1884年11月29日于乌萨加拉的姆索维罗<sup>①</sup>

彼得斯搞的条约就是这个样子。曼古恩戈苏丹或者任何一个非洲统治者，会把他的权力和国家奉送给象彼得斯这样一个外国人是很有问题的。曼古恩戈不象会阅读和书写德文。条约的本文表明，翻译也可能根本不会阅读和书写德文。而且拉马赞是卡尔·彼得斯雇用的，他必须按照彼得斯的指示办事。

1885年2月7日，卡尔·彼得斯带了十多份条约回到德国。彼得斯利用这些条约在1885年2月27日弄到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一份特许证，认可他在非洲攫取的权利。换句话说，伟大的俾斯麦宰相改变了他以前宣布过的政策，不再反对德国获取殖民地。历史学家关于俾斯麦突然改变政策是有争论的，并且也许他们还将继续争论下去。这里简要地叙述一下俾斯麦改变政策的几个原因：

常常有人争辩说，俾斯麦是真诚地和突然地转而采取殖民政策的。但是这种论点不仅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改变只持续了两年，而且不能说明他为什么要改变。也有人认为俾斯麦要殖民地是为了使德国货得到保护市场。这种推论存在的

<sup>①</sup> 斯蒂尔：《对德属非洲的看法》，第250—251页。

问题是，德国在 1879 年实行保护关税制时，它的关税条例并没有提到殖民地市场。俾斯麦为什么要等到 1885 年，即过了六年以后才改变政策呢？有人认为英国在 1875 年吞并萨摩亚和斐济群岛触怒了俾斯麦。这种论据也是无力的，因为俾斯麦直到 1885 年才实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而 1885 年和 1875 年之间是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另一方面，德国自从 1871 年实现统一以后，工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它越来越需要热带原料。这种论点可以从德国在坦桑尼亚强调生产经济作物的政策得到证明。有一个时期，德国政府采取的方法是建立种植园，然后出售给移民经营。除此以外，俾斯麦的行动似乎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从 1871 年起，俾斯麦一直担心法国会因为失去了富庶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而进行报复。到 1884 年时，俾斯麦又因为英国在外交上似乎对德国冷淡而不安。俾斯麦既想平息法国的愤怒，同时又想阻止法国同英国或俄国结盟。由于俾斯麦已经和意大利缔结条约而建立了三国同盟，<sup>①</sup> 他就想使法国也支持这个同盟。在俾斯麦看来，实现他的目的的最好方法是在法国面前以英国的共同敌人的姿态出现。俾斯麦的态度在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上表现得很清楚。俾斯麦有一次甚至说过：“我的非洲地图是在欧洲（原文如此）。这里一边是法国，另一边是俄国。”<sup>②</sup> 第二个原因是民族主义和威望问题。这一

① 指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同盟。——译者

② 泰勒：《1848—1918 年争霸欧洲的斗争》，1963 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 12—15 章。（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点在 1884—1885 年时，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很多德国人移民到美洲去了，而许多人认为这是德国的损失。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在寻找种植园殖民地，以便吸引德国移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德国正是在这个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和威望都很高。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当时鼓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可能联合进步党人击败俾斯麦。最后一个因素是当时威廉二世奄奄一息，继位者将是接受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这个精明的政客就抢先采取了行动。简单地说，这些就是德国入侵坦桑尼亚的国内背景。帝国特许证的颁发，结束了德国入侵的第一阶段。

彼得斯搞的那些条约和随后颁发的帝国特许证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德国的入侵加快了。1885 年以后，德国侵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1887 年，彼得斯把他的协会改组为德国东非公司并自任经理。这个新公司是按照和英国东非公司相似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接着，经过彼得斯改组的这家公司派出远征队到内地去伪造更多的条约，并为德国移民和开发种植园收集有关的资料。后来又设立了一些分公司以便扩大经济剥削。在这些分公司中，东非种植公司和德国种植者公司分别在庞加尼河和乌姆巴河流域建立了贸易站。到 1888 年下半年时，已经有了三十家分公司，而且已经向德国出口一些烟叶。斯蒂尔对德国人的入侵作了一个恰当的结论：

德国在彼得斯引导下，以举世无双的速度，把一块它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殖民地置于它的主权之下。<sup>①</sup>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许多领导者是和彼得斯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的人员和资金都很少。他们到一个新的国家工作，对那里的土地和农作物、季节和雨量，都不很了解。那里也没有大量现成的对外贸易，只有象牙大概是例外。但是在1885年，优质象牙贸易的产区已经转到僻远的内地，并且被亚洲人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勒索、剥削和舞弊现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彼得斯的活动使德国入侵非洲成为国际事件。颁发帝国特许证引起了德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害冲突。1885年4月25日，巴加什苏丹打电报向德皇提出强烈抗议。几乎与此同时，巴加什派遣军队到萨加拉族地区、乞力马扎罗和威图，同德国人对抗。彼得斯的代表朱尔克博士紧跟在巴加什苏丹部下的马修斯上校后面到达乞力马扎罗。莫希的林迪或曼达拉邀请了他们双方。德国和阿拉伯的冲突自然会把英国人带上舞台，因为这个苏丹是英国人的朋友。左右为难的英国同德意志帝国政府交换信件。经过双方协商，1886年建立了划界委员会来确定苏丹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巴加什在德国要采取海军封锁的威胁下，于1885年8月退却了。1885年8月19日缔结了一个条约，把达累斯萨拉姆割让给

---

<sup>①</sup> 斯蒂尔：《对德属非洲的看法》，第249页。

德国人。1886年11月1日，划界委员会根据条约，规定苏丹的辖地为沿海十英里宽的狭长地带，同时确定了目前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边界。1890年的黑利戈兰条约确定了坦桑尼亚同乌干达的边界。同年，德葡条约划定了坦桑尼亚南部同莫桑比克的国界。

1887年5月，彼得斯的公司开始了德国对坦桑尼亚的实际占领。第二年，桑给巴尔苏丹同意把沿海地带让与德国半个世纪。德国实行占领之后，就同沿海各部族发生了冲突。沿海的抵抗运动威胁着德国在东非的存在，促使德国政府派遣部队来挽救德意志的名誉。1889年5月，冯·威斯曼被任命为帝国政府驻德属东非特派员，前往镇压抵抗运动。德国人决定结束德国东非公司的统治。

德国入侵东非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891年1月，当时德意志帝国政府接管了坦桑尼亚的行政机构。东非公司仍然存在，并基本上保持了垄断贸易的权利。公司的人员并没有撤出行政机构，原来的那批流氓继续留任和大发其财。彼得斯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后来他因为滥用职权而被提起公诉。

德国行政当局的最高领导是总督。他执行法律、皇帝的敕令和宰相的指示。他统率军队并有权制定地方法令。总督之下是地区专员，他们负责主管所辖地区的一切事务。地区专员征收捐税，主持审判和定罪，任命和罢免本地酋长和德国代理人，并指挥警察和地方部队。由于德国缺少行政官员，他们在沿海地区仿照原来的政治机构建立统治。德国人的这种占领方法是谋求利用原有的阿拉伯统治制度，即阿基达和琼

贝制度。<sup>①</sup>这是德国人用来占领坦桑尼亚的三种方法之一。

从多方面的情况来看，德国人建立行政中心的地点是由四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为了要控制贸易和交通，沿商路的古城成为德国人的行政中心。坦噶铁路早在1891年就开始修建了。中部地区商路上的城镇，例如姆普瓦普瓦、塔波拉和乌季季，成为德国人的中心。第二，能够提供劳动力的人口稠密地区吸引着德国当局。桑巴拉族地区和乞力马扎罗就是这样的地方。第三，经济潜力大和适合移民的地区是德国人决定建立据点的地方。在多数情况下，人口稠密的地区也就是经济潜力大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德国人往往把非洲人赶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在乞力马扎罗和梅鲁地区，德国人就曾经用这种手段把人口集中起来，因而引起了二十世纪的骚乱。同梅鲁土地事件有关的政治斗争就是一个例子。最后，德国人还为了要控制已经存在的和潜在的抵抗势力而挑选驻地。例如德国在基萨基的兵站，特别是在马亨格的兵站，曾经为进攻姆克瓦瓦的殖民主义者补充给养。德国人占领伊林加后不得不立即修建防御工事。根据非洲人抵抗运动的发展情况，德国人曾经几次进出莫希。德国人在姆万扎和布科巴建立基地，是为了一旦爆发战争时可以用它们来进攻或者反击北方的英国人。在有些情况下，德国人设法把驻地设立在靠近传教中心的地方。至少第一任总督冯·索登为了实现和平的经

---

<sup>①</sup> 琼贝(jumbe)，斯瓦希里语，意即酋长或头人。德国人入侵坦桑尼亚后，他们被德国人雇用，成为德国殖民统治在各地的代理人。——译者

济扩张，曾经想利用传教士作为德国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他试图利用柏林路德教派和德国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在姆贝亚地区建立德国人的势力。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德国人的驻地。

在大部分地区，非洲人多于德国人及其部队。德国人对非洲人抵抗运动一直恐惧不安。就在帝国政府从卡尔·彼得斯的公司接管了权力的时候，坦噶尼喀好几个地方爆发了抵抗运动。这次抵抗运动集中发生在1891年和1898年之间。随后有一段相对和平时期，直到1905—1907年发生马及马及起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高峰的欧洲事态的发展，终止了德国在非洲的统治。

### 三、抵抗运动

这一节将把非洲人的抵抗运动分为四个地区来加以研究。这四个地区是：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区、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但是，在详细探讨这些地区的抵抗运动之前，有必要先观察一下德国人在夺取殖民地过程中所面临的几个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德国人从一开始就着重经济开发。这种政策在坦桑尼亚遭到了两大挫折。没有足够的投资流入坦桑尼亚，这有四个原因。（一）卡尔·彼得斯为了使公司受他本人控制，把股东的数目限制得很小。（二）德国的大金融资本家对东非知道得比较少。（三）由于国内工业日益发展，在德国本土投资显然有利可图。（四）其他负债公司陷于破产，使

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家感到沮丧。德国想迅速攫取经济利益的政策第二个挫折是，他们不能找到和控制当地有利可图的贸易。原有的贸易制度本来就不能满足德国的经济欲望，又受到桑给巴尔籍的印度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的严密控制。1892年桑给巴尔成为自由港以后，就成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转运口岸。如果要想缩小桑给巴尔的作用，那就必须有效地控制联接沿海和內地的交通线。但是对于一个殖民强国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前途的交通线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德国人鼓励开发农业。但是要完全实现这一政策，需要先进行农业方面的研究，德国人首先试图利用非洲劳动力发展热带种植园。这个尝试失败了。以后，政府鼓励欧洲人在高原地带直接经营农场。于是欧洲移民就在生产潜力大的地区抢占土地。1895年德皇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土地都归德皇所有。但是这个法令没有发生效力，人们继续抢占土地。最后，德国政府迫使非洲人（有时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为了向德国供应非洲原料。

东非的非洲人抵抗运动的传统要追溯到很早以前。葡萄牙人的掠夺行为激起了非洲人的抵抗。他们在抵抗葡萄牙人时，利用了阿拉伯的干预。但是当葡萄牙人被赶到南方去以后，非洲人立即发觉他们被人利用来推行阿拉伯帝国主义，而不是实现非洲的民族独立。同样，采取适应方式的非洲抵抗者谋求利用德国人的干预来反对本地的对手，但最后却发觉，一旦本地的对手被消灭，他们自己正在被德国人利用来增进德国人的利益。

### (一) 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有两次大的抵抗运动。一次是在北部开始的，领导人是阿布希里·本·萨利姆和伯瓦纳·赫里。这次运动席卷了宽达四十英里的整个沿海地区。第二次斗争是以基尔瓦为基地，但是没有扩展到这么远，因为这次斗争几乎是在萌芽时就被掐死了。<sup>①</sup>

阿布希里·本·萨利姆·哈斯原先曾被桑给巴尔驱逐出境。1888年，他在庞加尼周围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伯瓦纳·赫里曾经是桑给巴尔苏丹的部下。1882年，他击败了苏丹的军队后取得独立。到1888年，他在萨达尼一带聚集了相当多的支持者。1888年8月，德国人到庞加尼来建立统治，这时骚乱开始了。只有在德国军舰摩威号驶进港口时，那里才能升起东非公司的旗帜。它离开后，骚乱就再次发生。桑给巴尔苏丹派马修斯将军率领巴卢奇部队来援助德国人，但无济于事。德国人在进入所有沿海地区时都遭到了同样的抵抗。巴加莫约人同庞加尼人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人。巴加莫约的“利瓦利”<sup>②</sup>曾经试图运用他的影响加以阻止，但是失败了。1888年9月25日，在巴加莫约爆发了一场激战。坦噶人在9月8日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东非公司在那里的职员被扣押，后来他们被救出来，送到桑给巴尔。9月20日米金达尼遭到了洗

<sup>①</sup> 罗胡斯·施密特：《阿拉伯人在东非的兴起》，1892年出版。(Rochus Schmidt: «Geschichte des Araberaufstandes in Ost-Afrika»)

<sup>②</sup> “利瓦利”(Liwali)，斯瓦希里语，意即由政府委任的阿拉伯籍官员，负责处理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的事务。——译者

劫，冯·布洛乘船外逃，后来在基尔瓦基温杰一带的海面上得到摩威号军舰的援救，才保住了性命。在基尔瓦市内，东非公司的两名代表被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他们没有服从，结果被杀掉，脑袋挂在德国分公司门前的旗杆上。1888年10月，东非公司的其余职员被禁闭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巴加莫约。这次沿海地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就是阿布希里·本·萨利姆·哈斯和伯瓦纳·赫里。德国派冯·威斯曼少校来帮助镇压抵抗运动，挽救德国的名誉。

冯·威斯曼少校沿途招募雇佣军：六百名努比亚人，五十名索马里人，三百五十名莫桑比克的祖鲁人和二十名土耳其警察。<sup>①</sup>因此，镇压从一开始就成为国际性的了。英国人用海军封锁沿海地区来援助德国人。德国人还得到了葡萄牙人的配合。

1889年5月至12月，冯·威斯曼在北部镇压抵抗运动。他先攻下了庞加尼，很快又占领了达累斯萨拉姆以北的其他城镇。阿布希里本人从沿海逃到内地，开始是六英里，后来是四十英里。他牺牲之前不久曾经袭击姆普瓦普瓦。两个德国官员之一尼尔逊被打死。他的朋友格里塞逃到沿海，讲了这件事情。威斯曼对姆普瓦普瓦的讨伐徒劳无功，因为没有接触到阿布希里及其部队。但是他在姆普瓦普瓦派驻了军队。最后，阿布希里被萨加拉族地区的马加亚头人出卖。1889年12月15日他在巴加莫约被绞死。威斯曼在南部的行动甚至

<sup>①</sup> 邓达斯：《德属东非史》，1923年达累斯萨拉姆政府印刷局出版，第9页。（C. C. F. Dundas: *A History of German East Africa*）



更快。他的部队在基尔瓦基西瓦尼登陆，迅速占领了基尔瓦、林迪和米金达尼。到了1891年1月，威斯曼已经确信那里不会再有骚乱了。

1889年1月，齐古阿族的伯瓦纳·赫里击退了德国人的多次进攻。1889年6月9日威斯曼炮轰萨达尼后，伯瓦纳逃到内地。他在内地不断地修筑堡垒，因为德国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摧毁了他的堡垒。据说伯瓦纳·赫里从塔波拉和乌季季的穆哈默德·本·卡西姆那里得到了大约六百名士兵。<sup>①</sup>后来伯瓦纳·赫里投降了。1894年3月，他试图再次起义，但被德国人打败，他就逃走了。没有证据说明他是被绞死的。看来，伯瓦纳·赫里抵抗德国人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不一定是同阿布希里共谋的。对于后者，他多少保持着独立性。

这次早期抵抗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于德国对各地上层人物的威胁。上面已经看到，阿布希里和伯瓦纳·赫里分别成为他们所在地区的领袖，后者的这种地位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德国的侵占从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威胁着他们的权力。沿海地区的所有部族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一定是为了确保个人的繁荣，而是为了在外国侵略面前维护独立。

1894年，哈桑·本·奥马里·马昆加尼亚领导了一次对基尔瓦的袭击。6月，两连德国军队进攻他。他的城堡被摧毁了，他逃往内地计划发动第二次进攻。当时守备基尔瓦的德军正在同赫赫族作战，因此基尔瓦是非常空虚的。但是哈桑进攻基尔瓦的计划泄漏了，德国当局出动了仅有的少数警

<sup>①</sup> 罗胡斯·施密特：《阿拉伯人在东非的兴起》，第184页。

察来守卫这个城镇。哈桑的进攻被击退了，不过德国人显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到这一点。后来，在1895年10月，德国人派了四个连去攻击哈桑·本·奥马里·马昆加尼亚。哈桑跑掉了，但后来他于1895年11月15日在通往林迪路上的马伍吉被俘。他被绞死在基温杰城的一棵芒果树上。在那以后，这棵树被德国人用来处决过许多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这棵树称为姆韦姆贝—基尼翁加，即绞刑吏的芒果树。

其他抵抗运动规模比较小。马图姆比族拒绝缴税，1898年，他们在离巴加莫约不远的地方同德国人打仗，这场战争称为“南瓜战争”。<sup>①</sup>萨加拉族酋长马钦加在1890年10月同施密特博士作战，12月同拉姆赛上尉作战。拉姆赛上尉的部队有七人死亡，十八人受伤。但是马钦加终于在1891年3月屈服了。马西图族虽然在1889年被打败，他们仍然不断地袭击巴加莫约、达累斯萨拉姆和近海内地。1891年8月和1892年德国人同马西图族作战。马西图族终于在1893年在扎拉莫族地区的一次战役中被镇压下去了。

即使在这个阶段，上述抵抗运动的事例表明，非洲人并不是无能的，而且殖民主义占领是有困难的。欧洲人并不总是能够调集足够的军队和财力来对付一个新的国家和一个新的民族的挑战的。欧洲的强权也不一定就是武力。事实上欧洲人不得不依靠非洲的政治傀儡来为其利益服务。因此，如果欧洲人要有效地增进他们的利益，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就必须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而不能有其他选择。沿海地区的抵抗

<sup>①</sup> G. C. K. 格瓦萨现场调查，1967年8月。

运动是内地武装抵抗的先驱。

## (二) 北 部

北部地区各部族根据具体情况，交替采用了适应方法和积极抵抗方法。德国人在乞力马扎罗中过查加族的计。但是查加族的酋长们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企图利用德国人来加强个人的独立地位。然而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失去了独立，因为老一套的政治权术不能漫无止境地应付新的危机。到了最后，连可以使用这种权术来愚弄的对象也没有了。

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弗利曼—格伦维尔和巴塞尔·戴维森，仍然认为在欧洲人来到时，莫希的林迪或曼达拉是乞力马扎罗的最高酋长。<sup>①</sup>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人来到以前，林迪曾经进攻乞力马扎罗最强大的酋长西纳。林迪遭到了惨败。他认为他成为伟大人物的唯一障碍是基博肖的西纳。德国人刚到达时，西纳正准备对林迪发动一次进攻。<sup>②</sup>林迪知道他不能击败西纳，而且他急需援助。因此，当约翰斯顿、马修斯将军以及朱尔克等先后来到时，林迪对他们全都表示欢迎，并力求同他们建立友谊。他当即把自己打扮成为最重要的酋长。他能说会道，使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上了他的当。林迪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独眼的林迪早就想开展外交关系，他想把地方权力建立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他不让欧洲人到基博肖去。他从蒙巴萨的弗雷尔镇基督教差会聘请教员。他

① 奥利弗和马修斯合编：《东非史》，第1卷，第445页。

② 马利亚：《西纳》。

同桑给巴尔的英国总领事约翰·柯克爵士、英国女王以及德皇威廉二世保持外交通信关系。德国人匆匆忙忙地在许多地方横冲直撞，但从来也不研究一下那里的权术政治。

林迪对朱尔克博士的做法产生了三个结果：（一）乞力马扎罗在 1886 年划界条约中保留在坦噶尼喀境内。（二）德国代理人进驻莫希。（三）立即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德国人成为林迪的客人以后，就成为林迪的主要对手西纳的潜在敌人。林迪的精明的外交手腕在他死后还继续起作用。他的首府先是德国人的首府，后来也是英国人的首府，英国人并把它迁移到现今莫希的所在地。今天，莫希是乞力马扎罗地区的首府。在林迪的旧首府莫希老城有一所原来的国立中学。

林迪散布谣言说，西纳为了侮辱德国人，扯下了德国的国旗。威斯曼立即决定惩罚和征服西纳。1892 年 2 月，林迪充当了征讨基博肖的德国讨伐队的主人。这支军队包括五百名努比亚人和祖鲁人。林迪提供了一千名配备着长矛和四百支枪的士兵。2 月 11 日，对西纳的全面进攻开始了。西纳的首府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在首府四周挖掘了壕沟，使得德国人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才攻占这座城市。西纳的部队为保卫这座城市进行了两天的战斗。西纳逃走了。后来他被劝说同德国人谈判。德国人答应在两个条件下同西纳讲和：他必须把两个区划给林迪，同时必须释放他监禁的乌鲁族酋长。就这样，德国人在林迪的挑动下同意去进攻本来很想同德国友好的西纳。从表面上看，林迪取得了成功。但他的成功是短暂的。无论是他本人或者他的继承者都没有象他曾经希望

的那样成为查加族各酋长的最高首领。

马兰古的马雷尔勒是另一个大外交家。林迪于 1892 年去世之后，由一个无能的儿子继位。马雷尔勒利用这种情况再一次对德国人施展了传统的权术。他破坏他的所有对手的名誉，自封为乞力马扎罗的大人物。德国人吞下了他的诱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设下了圈套，使德国人把林迪（或曼达拉）的继承者、莫希的梅利看成是杀害冯·布洛的凶手。从马兰古派到莫希去的信使在莫希—基鲁亚边境被杀。马雷尔勒把这次凶杀事件归咎于梅利。于是冯·布洛由沃尔弗勒姆中尉陪同，出兵讨伐。这支讨伐队遭到伏击。沃尔弗勒姆和冯·布洛以及大量雇佣军被打死。残存下来的人回到马兰古，那时，德国的司令部已经移到那里。于是德国人收拾行装撤离了乞力马扎罗。在一段时间中，德国能否继续保持对乞力马扎罗的统治权成了问题。后来，马雷尔勒写信请求德国人回来恢复和平和秩序。冯·谢尔率领第二支讨伐队到乞力马扎罗进攻梅利。西纳部下有八百人同冯·谢尔一道进攻莫希，这是不足为奇的。梅利遭到了惨败，而马雷尔勒在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成为德国人的无可争辩的盟友。马雷尔勒继续利用德国人。到 1900 年，他使德国人相信，基博肖和莫希的酋长们以及他的其他对手图谋反对德国当局。这个策略使十九个酋长被处决。

帕尔族的抵抗运动是比较弱的。帕尔族内部四分五裂。因而难于对他们的共同敌人采取有效行动。但是他们也使用很多查加式的权术。例如：比较弱小的桑吉人设法得到德国

人的援助去反对他们的头号对手姆巴加人。许多小军事头目在德国人面前把自己说成是传统的统治者。德国人听信他们的话，并且发给他们德国旗帜。<sup>①</sup>

在查加族的抵抗以后，北部的抵抗运动就少了。1896年8月，由于两个传教士在梅鲁族地区和阿鲁沙被杀，约翰内斯就进攻这两个地区的各个部族。1898年，梅鲁族及其邻近的部族进攻了莫希的德国人；1899年约翰内斯就进攻他们。他在阿鲁沙修筑了一个哨所。伊拉库族在1906年进行过战斗。

### (三) 西 部

比较说来，西部的积极抵抗运动更弱一些。这个地区的抵抗运动大多数是小规模的，而且是分散的。积极抵抗运动的中心是塔波拉。1885年，在塔波拉的尼亚姆维济族酋长伊西凯建立了一支很好的军队。到姆万扎、乌季季的贸易以及从遥远的内地到沿海地区的贸易大都要经过塔波拉。伊西凯向那些经过他的领土的商队征收关税，名为“洪戈”。1886年，德国人吉泽克在尼亚姆维济族地区被杀死，显然是因为他做买卖时进行诈骗。伊西凯没收了吉泽克的财产，并在1889年把白衣神父驱逐出基帕拉帕拉。从那时以后，伊西凯对欧洲人的仇恨加深了。1890年，有经验的雇佣军人埃明帕夏<sup>②</sup>由威廉·朗海尔德和弗朗茨·施图尔曼陪同，带领一千多人的

<sup>①</sup> 基曼博：《1900年以前的帕尔区政治史》，第11章。

<sup>②</sup> 帕夏原来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高级官员的称号，后来成为一种封号。  
——译者

军队，进入了塔波拉。8月1日埃明帕夏同塔波拉的阿拉伯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允许阿拉伯人选择他们自己的“瓦利”，但是要承认德国的宗主权。伊西凯被迫缴出两门大炮并且支付一批象牙作为赔款。埃明帕夏接着离开塔波拉前往维多利亚湖，伊西凯因受屈辱而激怒。

1892年4月，伊西凯的儿子伏击了一支德国军队。德国人进行报复，攻击了他在伊普利的碉堡。尼亚姆维济人被打败了。1892年6月，德国人进攻伊西凯，遭受重大伤亡，8月派出的一支德国讨伐队几乎全部被歼灭。同时，伊西凯下令封锁所有通过他的领土的商路。德国人派遣了增援部队。冯·普林斯率领讨伐队进攻伊西凯。1893年1月9日至12日德国人和尼亚姆维济人之间发生了激战。伊西凯的城堡被摧毁。伊西凯不愿蒙受战败和被外国人俘虏的耻辱，他点燃弹药库炸死了自己和他的全家。伊西凯死后，其他的尼亚姆维济人只进行了分散的小规模的抵抗斗争。

戈戈族给德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埃明帕夏在1890年6月经过戈戈族地区时，用典型的彼得斯方式镇压了戈戈族的抵抗运动。他犯下了暴行，实行了焦土政策，洗劫了戈戈族的人民，然后才到塔波拉去。1890年年底，彼得斯从乌干达远征失败归来时，把一个去向他致意的酋长的儿子毒打一顿。由此引起了战争。彼得斯使用了前所未闻的残暴和掠夺手段。他鞭打妇女和儿童。1891年，彼得斯作为驻乞力马扎罗的帝国政府特派员，赤裸裸地显示了他的残暴本性。他以所谓行为不端的罪名将一个青年及其情妇打死。这就是以彼

得斯为代表的德国人的入侵。这种入侵既威胁着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威胁着非洲人的生命。

戈戈人不断地在基利马廷德和塔波拉之间骚扰德国人。冯·普林斯进攻并打死了一个酋长基戈勒。在乌尼亚格威拉地区，一个德国军士被杀。普林斯从塔波拉出发，打败了这个地区的军事头目之一姆布瓦纳，但在这以前他损失了三十名搬运夫。1893年8月，德国人企图消灭西尼安加罗苏丹的武装部队，但是失败了。弗利斯巴赫中尉在激战中被打死。基利马廷德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德国人的肉中刺。1894年，德国人在那里修筑了一个碉堡。

尼亚图鲁族地区发生了一些小的骚乱。德国人在那里想利用当地军事头目作为代理人来扩大他们的势力。1902年，尼兰巴族和尼桑祖族的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到1908年，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卷入这次动乱的有尼亚图鲁、尼兰巴、尼桑祖、塔图鲁、姆布格韦以及这一带的其他部族。这次动乱称为图鲁起义。据说它是由姆布卢的一个酋长的儿子吉达茅萨煽动起来的。德国人生怕它成为另一次马及马及起义。这次抵抗运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德国人并不满足。他们命令在姆卡拉马、阿鲁沙、塔波拉和基利马廷德的全体部队出动，列队走过图鲁地区。这是典型的火药外交。他们期望通过军事示威来吓唬非洲人，迫使他们继续臣服。

看来，苏库马族对德国人的反抗较弱。在东部的津扎族中，卢沃马从1892年起始终反对德国人，直到1895年他在同德国人战斗中牺牲为止。姆万扎附近有一群叫做“马斯韦图”



的武士或以抢劫为生的人，他们在 1898 年德国人攻进他们的石头堡垒以前一直不屈服。此后，抵抗斗争沿着德国人入侵的道路展开。在比哈拉穆洛，桑比罗族地区的卡勒梅拉被德国人的武力压倒了。施图尔曼摧毁了两个堡垒，打死了一百六十三名非洲人。德国讨伐队抢走了一百四十五名妇女和一百三十五头牛。<sup>①</sup>但是后来在 1906 年，姆万扎的马孔戈洛苏丹使德国人坐卧不安。当时正处在马及马及起义期间，德国人害怕这一起义可能扩大到全部占领区。他们急忙派了一支海军部队经过蒙巴萨和基苏穆到达姆万扎。<sup>②</sup>马孔戈洛失败后逃走了。

在布科巴，一个酋长对待德国人的态度，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还取决于当时各酋长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埃明帕夏于 1890 年 11 月 1 日到达布科巴。基亚姆特瓦拉族的奥穆卡玛（即酋长）对德国人表示欢迎。这个酋长名叫穆科塔尼。他“诽谤”基齐巴族的奥穆卡玛穆塔坦布瓦。埃明帕夏以及后来的里希特和冯·卡尔本进攻基齐巴族，并大肆抢劫。由于德国人怀疑穆科塔尼同偷盗布科巴堡垒枪械的案件有牵连，他们同基亚姆特瓦拉族的盟友关系就终止了。1895 年，穆科塔尼逃出了他的领地。德国人把他的一部分领地划给基安贾族的卡希吉。当时卡希吉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他的势力增长了，因而同基齐巴族发生了冲突。卡拉圭地区的德国人废除

① 巴隆戈：《坦噶尼喀政治斗争》，1966 年东非文学局出版，第 12 页。（E. B. M. Barongo: «Mkiki Mkiki wa Siasa Tanganyika»）

② 戈岑：《德属东非暴动史》，1909 年柏林出版，第 131 页。（Graf von Götzen: «Deutsch-Ostafrika im Aufstand. 1905/06»）

过一个酋长，那里的抵抗运动是微不足道的。<sup>①</sup>

西部其他地方的武装抵抗是比较弱的。1905年在菲帕族地区有过一些战斗。在哈族地区，赫鲁酋长在1896年和1898年同德国人（他们于1896年占领了乌季季）打过仗。几年以后，布云古族酋长也反抗过德国人，因而被判处十年徒刑。有些斗争一直延续到1912年，但这些斗争并不是哈族的联合行动。在哈族地区的西面，乌克雷韦教会被烧，大约五十名基督教徒被打死。<sup>②</sup>

#### （四）南 部

坦桑尼亚南部无疑是积极抵抗运动的最大发源地。瑞族酋长马钦巴几次打败了德国人。1890年10月，德国人派了三个连去进攻他，被他打败了。后来德国人又派去四个连，也同样被他打败了。马钦巴继续藐视德国人，拒缴房屋税。1899年6月，德国人向马钦巴发出最后通牒。他没有接受。德国人派部队对他进行讨伐。1899年7月，德国人占领了马钦巴的城堡，并且囚禁了他的部下，但是马钦巴本人逃往莫桑比克。其他领袖后来也逃到那里。

在十九世纪，对德国当局的最大挑战来自精明能干的领袖姆克瓦瓦领导下的赫赫族。赫赫族在穆尼古姆巴统治时期已经团结起来了。后来，姆克瓦瓦完成了他父亲的事业。赫赫族的统一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恩戈尼族侵略的刺激下促

① 科里：《布科巴地方志》，第121页。

② 邓达斯：《德属东非史》，第10页。

成的。他们甚至采用了恩戈尼族的长矛和投枪。他们在 1882 年打败了恩戈尼族，接着打败了南尼亚姆维济人以及戈戈、马萨伊和萨加拉等部族。当德国人到达时，桑古族酋长梅雷雷正在担心姆克瓦瓦会侵入他的王国。从沿海地区到塔波拉及其以西地区的商路都经过姆克瓦瓦的王国。他向那些过境的或者在他的国境内做买卖的商人征收关税。前面已经提到，德国人最关心的是能够沿着原有的商路和平地、自由地进入内地。德国人收到关于姆克瓦瓦及其下属征收重税的报告后十分恼火。他们要使姆克瓦瓦受他们摆布。导致德国人同赫赫族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态发展过程最好不过地说明，德国人不能了解和掌握非洲人的政治和实践的实质。起初，姆克瓦瓦希望友好地解决他同德国人的分歧。西纳也有过同样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立即破灭了。德国人似乎曾经想取得和平解决。然而好几起事件使姆克瓦瓦深信德国人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他。对于一个独立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侮辱。这种轻蔑表现在威斯曼把他召到沿海地区去时所采用的方式，以及他的使节所受到的待遇。有一段时期，德国使节对他采取如此不尊重的态度，以致他拒绝接见他们。如果姆克瓦瓦按照习俗给德国人送礼，他们并不还礼。这是违背姆克瓦瓦的期望的，也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为了报复，姆克瓦瓦封锁了巴加莫约和塔波拉之间的商路。他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寻求同恩戈尼族酋长查布鲁马建立联盟。查布鲁马拒绝了，因为他还为过去同姆克瓦瓦打过仗而记仇。查布鲁马后来为他的这个决定悔恨终身。姆克瓦

瓦向塔波拉的伊西凯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也没有成功。姆克瓦瓦已经认识到，对付德国人干涉的有效方法在于非洲当权者的联合行动。德国人不能容忍封锁商路的措施，他们决定进攻姆克瓦瓦及其部族。

1891年6月，泽柳斯基率领一百名士兵从基尔瓦基温杰出发开往赫赫族地区。他在科洛格洛越过鲁菲季河向赫赫族地区前进。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姆克瓦瓦仍然希望和解。因此，当德国人接近赫赫族地区时，他派了一些非武装人员，带了丰盛的礼品以求同德国人和解。然而，德国人看到姆克瓦瓦派来的和平使节接近时惊慌失措，把他们杀了。作为回答，姆克瓦瓦布置了一次严格保密的伏击。1891年8月16日，埃米尔·冯·泽柳斯基的部队遭到伏击。这次战果辉煌。包括泽柳斯基本人在内的十个欧洲人和三百名左右的其他士兵死亡。残余士兵慌忙逃回沿海地区报告这次战役的经过。此后的三年，姆克瓦瓦保持着独立并且加强了她的城堡。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首都四周修筑了八英里长、十二英尺高和四英寸<sup>①</sup>厚的城墙。<sup>②</sup>

与此同时，姆克瓦瓦的军队在1892年运用杰出的战略进攻基洛萨要塞。要塞驻军全部被打死。冯·普林斯上尉对此印象很深。他因此研究了赫赫族的传统作战方法。1894年，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作好充分准备。第二次进攻的战略是由

① 疑为四英尺之误。——译者

② 朱迪斯·利斯托韦尔：《坦噶尼喀的形成》，1965年伦敦，查托、温达斯出版，第25页。（Judith Listowel: 《The Making of Tanganyika》）

姆克瓦瓦的一个叛徒向冯·普林斯建议的。冯·普林斯从托萨马甘加进攻卡伦加。经过两天战斗，德国人不能攻下姆克瓦瓦的王宫。第三天，即1894年10月30日，经过了一场逐屋的激烈肉搏战，冯·普林斯攻占了卡伦加。姆克瓦瓦逃出以后坚持了四年游击战争。德国人多次企图捕获姆克瓦瓦都落空了。德国总督冯·莱伯特悬赏五千卢比要姆克瓦瓦的人头。在姆克瓦瓦的最后日子里，他只剩下两个随身侍从。1898年6月，当德国巡逻兵梅凯尔中士接近他的隐蔽所时，处在病中和孤独的姆克瓦瓦开枪打死了他的一个侍从后自杀了。梅凯尔割下了姆克瓦瓦的头颅。这个头颅被送到德国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姆克瓦瓦的头颅应当归还给赫赫族。但一直到1955年，它才归还。）与此同时，德国人解散了赫赫族酋长的议事会，下令放逐抵抗运动的领袖，并且向曾经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斗的赫赫族群众勒索巨额罚款。

桑古族酋长梅雷雷是采用适应方式对付德国人的例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梅雷雷王国的领土面积是很大的，但到九十年代却由于姆克瓦瓦的侵入而大大缩小了。在德国人到达桑古族地区时，他就乞求他们的援助。德国人不断收到报告说梅雷雷是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又渴望打击姆克瓦瓦，因而对桑古族首领抱有好感。1893年，梅雷雷要求参加德国的讨伐队去征讨鲁夸湖地区，因为他在那里的部下变得不听指挥了。鲁夸湖讨伐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出征的不愉快结果动摇了梅雷雷对德国人的信任。但是到了1893年后期，梅雷雷改变了态度。他要打击姆克瓦瓦的愿望在那时实现了。在征讨姆

克瓦瓦的战斗中,冯·谢尔接管了全部指挥权,冯·普林斯只负责指挥一部分军队。在赫赫族战争的整个期间,梅雷雷一直表示要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直至战争结束。<sup>①</sup>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在十九世纪末,南部地区很少有抵抗运动。德国人怀疑波戈罗族的酋长们反对欧洲人。于是向波戈罗族地区派遣了一个讨伐队。图纳利亚西泽酋长被认为是反德情绪的代表人物,他在1898年的战斗中牺牲。大约在1899年,尼亚库萨族展开了一些抵抗斗争。原先的计划是所有尼亚库萨酋长都起来反对德国人,但是内部发生了分裂。这次抵抗运动被称为伊松戈—英达西,意即过去的捐税。<sup>②</sup>恩金多族曾经欢迎德国人,因为他们希望利用德国人作为盟友来反对恩戈尼族的入侵。但是下面将会看到,恩金多族很快发现德国人也威胁他们的独立。关于反对马图姆比族的“南瓜战争”,前面已经说过了。从那时起,直到1905年伟大的反抗斗争之前,南部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

#### 四、马及马及起义<sup>③</sup>

1905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以前

<sup>①</sup> 马西亚·赖特:《梅雷雷酋长和德国人》,1967年10月打字稿,作者藏。(Marcia Wright: «Chief Merere and the Germans»)

<sup>②</sup> 根据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D.姆瓦普韦勒的资料,同时参阅英国政府情报部门1916年出版的《德属东非手册》第24—113页。(«Handbook of German East Africa», Intelligence Division, H. M's Government 1916)

<sup>③</sup> “马及马及”是斯瓦希里语 maji maji 的音译。“马及”的意译是水。传说参加马及马及起义的人相信一种神水,吃了这种水可以枪弹不入。因此这次坦桑尼亚人民反对德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称为马及马及起义。——译者

的积极抵抗运动。十九世纪的武装抵抗几乎都是依靠传统战术来反抗德国人的侵略的。对比之下，马及马及起义则把分散的传统战术扩大为一个富有活力的运动。坦桑尼亚南部为什么和怎么会对那些当时坦桑尼亚其他地区仍在采用的战术作出重大的改变呢？对于这个问题难以冒险作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前面已经指出，姆克瓦瓦在认识了这种改变的必要性以后，曾经试图争取查布鲁马和伊西凯参加他的斗争，但未能达到目的。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要说明为什么马及马及起义局限于它自己的境界以内就更加困难了。为什么马及马及起义地区以北和以西的各部族没有采取这种显然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斗争策略呢？以前的反抗斗争多数是紧接着德国人的侵入而发生的，而且往往是德国人主动进攻引起的结果。与此相反，马及马及起义是在德国入侵很久以后才爆发，而且是非洲人采取主动的。非洲人首先进攻。他们向德国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说明为什么德国人入侵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生起义的原因，也是困难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迟至 1905 年才爆发起义？在所有的武装反抗中，马及马及起义是最受传统信仰和对于新世界向往的影响的。这一起义在许多方面受到千年至福说的影响。这种千年至福说认为，死去的祖先将在恩加兰贝复活，上帝派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来，要把人民从德国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

自从独立以来，对马及马及起义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在殖民地时期，它被许多人看作是殖民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非洲人的盲目狂热的插曲。马及马及起义象一场梦魇，使当时

的许多官员，特别是马及马及地区的官员日夜不安。只要粗略地翻一翻官方记录，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独立以后，马及马及起义在人们心目中坦桑尼亚历史中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把它看作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部史诗，认为它是争取重获独立斗争的一个起点。换句话说，马及马及起义同其他一切抵抗运动一样，是走向“乌呼鲁”<sup>①</sup>的一种动力。让我们在这里肯定，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较为现实的态度。尼雷尔总统最先在一个国际组织中提出了这个论点。尼雷尔在联合国用这一点作为争取坦桑尼亚独立的论据。与此同时，他指出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将要吸收马及马及运动的思想，而不是它的具体策略。1956年12月20日，他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说：

我国人民从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得到证明：试图用武力赶走他们的“主人”是无效的（原文如此——作者）。人民进行战斗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白人有权统治黑人和开化黑人。他们揭竿而起不是由于某种恐怖主义运动的胁迫，也不是由于害怕某种迷信的誓约，而是响应自然的召唤，精神的召唤。这种召唤每时每刻响彻在一切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心坎里，号召他们反抗异族统治……。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任务不是制造这种造反精神，而是阐明这种精神，并用新的战术来显示这种

<sup>①</sup> “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意为自由或独立。——译者



精神。<sup>①</sup>

英国政府把尼雷尔的讲话说成是“对于历史的歪曲”，但是它承认马及马及起义是“一次反对压迫、要求自由的努力”。<sup>②</sup> 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用尼雷尔的话说，马及马及起义和新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有联系的。独立以后，在马及马及起义的重要遗址建立了纪念碑。1965年，在米库库尤姆布的纪念碑扩建了，那里是卡西安·斯比斯及其伙伴被杀害的地方。在桑格阿，当时鲁伍马地区的专员马丁·豪尔倡议在马及马及战士公墓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美观的纪念碑。1967年10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姆万扎举行会议时，曾经要求代表们默哀悼念马及马及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因此，这次起义毫无疑问地在坦桑尼亚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图姆比族和恩金多族在马及马及起义之前，即1904年末，开展了一个叫作朱吉拉或杰威拉的抵抗运动。人们互相秘密传递消息说，在恩加兰贝找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姆甘加”（巫医）和能够削弱白人的药物。还传说祖先们并没有死去，他们受到上帝的照顾，上帝将使他们在那些来到恩加兰贝的后代面前显灵。朱吉拉运动传布得非常快，随即有许多人到恩加兰贝去朝拜。派驻恩加兰贝的一个名叫穆哈默德·恩

<sup>①</sup> 尼雷尔：《自由和统一》，第40—41页。

<sup>②</sup> 《对于尼雷尔先生在联合国第四委员会上的讲话的几点评价》，1957年坦噶尼喀政府出版，第6—7页。（《Some Comments on Mr. Nyerere's Speech at the Fourth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加诺加·尼梅克瓦科的报信者描述到恩加兰贝朝拜的人们时说：

我告诉你，这简直象一个婚礼队伍！当他们到达恩加兰贝时，他们就在那里留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分队（利塔波）里跳利金达舞。第二天早晨，他们拿到药后就回家了。<sup>①</sup>

利金达是一种军事训练的形式，由一个分队或小组（利塔波——斯瓦希里语为塔波）的领导人进行教练。在恩加兰贝，姆甘加（巫医）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要求所有的朝拜者回去替德国人工作，一直到他向德国人宣战。但是从现有证据看来，马图姆比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想法激怒德国人——向德国人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决定在南代特的头人种植园中拔掉一些棉苗。

据说，姆特曼加尼头人把有人拔掉棉苗的事报告了基巴塔的“阿基达”（地方长官）。南代特人民在拔棉苗以后动员起来了。夜行信使把消息传给了马图姆比族地区的所有首领们。这些首领包括基巴塔地界以外的姆图姆贝依的恩戈米勒和庞古蒂尼的恩戈戈塔。阿基达派出的信使被人穷追，跑步逃回基巴塔。但是在他们到达以前，驻在马图姆比族地区的士兵迫使他们在离卡巴塔<sup>②</sup>大约两英里的姆万多山上进行第

① 格瓦萨和约翰·艾利夫合编：《马及马及起义纪事》第一部分，1968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Records of the Maji Maji Rising》）

② 疑为基巴塔之误。——译者

一次交锋。头人的一个奴隶卡普恩古·马尼亚尼亚被打死，他是马及马及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这件事发生在1905年7月末。从此以后，阿基达被赶出了基巴塔，同时所有欧洲人的聚居中心都遭到袭击。姆图姆贝依的一个种植园主霍弗被打死。另一个德国人在姆邦布韦的丘莫附近被打死。马图姆比人把战争从他们的地区扩大到莫霍罗。基齐族在马图姆比族的支援下把战争引入太特族地区，袭击了那里的阿基达。然后战争看来经过纳马特瓦和穆欣杰而转入恩金多族的领土。马图姆比人转而向恩金乔进发，攻击卡皮利马头人。在大约六个星期内，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基洛萨之间的中心线以南，和从基洛萨向南至马拉维湖一线以东的整个地区，陷入一片混乱。1905年8月15日，利瓦勒城堡被攻陷。最大的一次袭击是8月30日对马亨格的进攻。8月27日至29日之间，在卢库勒迪河谷的传教会受到洗劫。1905年9月初恩戈尼族参加了起义。冯·戈岑总督惊慌失措。这时他已经下令从德国调遣增援部队。在这以后，雇佣兵大批涌入坦桑尼亚，同时还从德国运来了更多的武器和军队。

德国人从1905年11月开始对起义进行有计划的镇压。到1906年3月，在马图姆比族地区已经沒有或者只有小规模的战斗了。各地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非洲人涌入德国人的堡垒投降。起义的领导人继续被追捕，他们有一个时期被关在姆根德。这些领导人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到莫桑比克。虽然到1906年底已经沒有有什么战斗了，但是德国人直至1907年8月才撤销戒严令。这大概标志着积极抵抗运动时代的结

束。但是人们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绝对。因为，举例来说，1955年，卢古鲁族为了反对农业种植计划就进行过积极抵抗。

马及马及起义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饥荒。德国人实行了肆无忌惮的焦土政策，以致在战后没有种子来种植新的农作物。马图姆比族境内南代特的一位老人卡梅利厄斯·基安戈生动地描述了这次饥荒：

连续发生了三年饥荒。那些幸存者靠了上帝的恩惠才活下来。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饥荒，人们抛弃了妻子和子女……无论是马及马及起义以前或是以后都没有过这种景象。人们大量地死亡……而狮子(野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吃掉。<sup>①</sup>

这就是战争的后果，而这也是马及马及地区的发展落后于国内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

对于马及马及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人们必然要问到有关它的组织和起因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次运动主要是以传统的作战方法和按照传统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领导为基础开展起来的，并由于在恩加兰贝散发的巫药而得到加强。起义使得各方面的人都参加了领导。换句话说，不同地区的地方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赶走所有欧洲人。当各族人民在本地区领导人的领导之下参加战斗时，他们认为这些领导人由于获得了金吉基蒂勒的巫药而变得强大了。也就是说，马及马及起义的效果是精神上的，而在

<sup>①</sup> 格瓦萨和艾利夫合编：《马及马及起义纪事》，第27—28页。

实际战争中仍然保持传统的作战方法。它和以往斗争的不同，在于它是集体地应用这种方法来反对德国人。

正如尼雷尔所指出的，爆发起义的内在原因，是重新赢得独立的必要性。马图姆比族地区人民之所以产生独立的要求，看来主要是由于强加在人民头上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残酷压迫，特别是为推行棉花种植计划而强加的残酷压迫。棉花种植园的劳动条件异常恶劣。棉花种植计划的实施，摧残了马图姆比人的经济，特别是由于剩下的土地极少，因而不得不用最大限度的劳动来生产生活资料。棉花种植园把无法忍受的沉重劳动和体罚强加在马图姆比人的身上。恩金多人对于德国人的暴行和种棉计划并没有保持沉默，而对于德国人的雇佣兵和仆从侮辱他们的妻子则反应更加强烈。这种行为对于恩金多男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恩金多族对于通奸是要用武力来惩罚的。这是因为根据恩金多的习俗，娶妻子要经过冗长和烦琐的手续。因此，人们认为，导致马及马及起义的原因和起义的组织一样，是多种多样的。

总而言之，本章试图用实例来说明抵抗运动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全国规模的过程。把每次抵抗运动看作孤立的行动是错误的，理由有二：首先，所有的抵抗运动都以反对外来统治和维护独立为目标。其次，各次抵抗运动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坦桑尼亚各族人民中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开展抵抗运动期间，各部族之间还继续相互影响。关于姆克瓦瓦抗德斗争的情况前面已经说了。至于马及马及起义时所显示出来的各部族之间的团结趋向就不需要

重复了。这些抵抗运动对于坦桑尼亚后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德国人入侵的后果是相当大的。许多人死了。坦桑尼亚的边界定下来了，而德国人占有坦桑尼亚增加了坦桑尼亚参与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德国人开始实行培养非洲文官的教育制度以后，建立了反对地方主义的全领地范围的文官制度。英国人抄袭了这种培养文官的教育措施。塔波拉学校就是为酋长们的子弟设立的。这种措施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读书做官的思想在非洲人中间发展起来了。今天，这种思想在全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第二，这种措施在一个过去强调部族成员平等的社会内部造成了特权阶层。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属于本章论述的范围。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种现象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它导致了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反对德国人入侵的非洲人抵抗运动，向后一代提供了某些值得思索的事情，提供了在有必要为重新赢得独立而斗争时可以仿效的榜样。坦桑尼亚人在过去运动的成就和错误的基础上加强了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进程。最后，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还应该指出，不能说这个过程只需要短短几年的努力就能完成。这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过程，它经过了许多年代才逐步地成长起来，直至找到能够成功的战术，从而有效地和一劳永逸地夺回丧失了独立。因此，必须把非洲人反对德国人入侵的抵抗运动，作为这本叙述争取民族独立过程的书中的一章。坦桑尼亚非洲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所留下的遗产就在于此。

## 第六章 改良和分化的时代 (1907—1945年)

约翰·艾利夫

### 改良和分化

尼雷尔总统在他的《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的论文中指出，“传统的”非洲社会有两个显著的弱点：一个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另一个是贫困。他论证说，第二个弱点“只是两件事造成的：第一是无知；第二是行动的规模”。<sup>①</sup>无知和不团结确实是殖民地时期以前坦桑尼亚存在的问题。本书的前一章表明，坦桑尼亚各部族抵抗德国人入侵之所以遭到失败，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他们的无知，指的是技术上处于劣势；斗争的规模小，使他们只能单独作战而被各个击破。马及马及起义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尝试。起义的领袖们企图依靠纯粹信仰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他们的马及<sup>②</sup>使他们有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实现团结，而且使他们相信可以使欧洲人的武器失去作用，从而克服技术上的劣势。信仰确实暂时达到了实现较为广泛的团结这个目的。但是起义证明，仅仅依靠信仰并

① 尼雷尔：《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1967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第3页。

② 见本书第5章第166页注③。——译者

不能克服技术上的弱点。马及马及起义以后，坦桑尼亚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法，寻求比长矛更有效的东西。

本章论述的是，在马及马及起义以后的年代里，坦桑尼亚人为了解决不团结和无知问题，做了那些事。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解决无知问题上。他们试行了许多方法，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改良”这个词概括起来。这就是说，努力使人民和各部族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同时又要使他们更有能力以平等的地位同他们的统治者打交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重点是教育、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的现代化。它不象马及马及起义那样带有戏剧性，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不如马及马及起义那样引人入胜和英勇壮烈。马及马及的英雄是武士和预言家；而改良时代的英雄则是乡村教师、店主、办事员和棉农。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经验驱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部族社会在技术上比欧洲人差。因此，他们想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使欧洲人强大起来的东西给予他们的部族社会。如果这种做法不是意味着抵制殖民主义，而是加剧殖民主义对他们部族社会的冲击，那么他们也愿意这样做。有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要模仿欧洲人。但通常他们是比这种单纯的模仿更有鉴别力的。然而这两种做法都使他们难于同殖民统治进行公平的较量。实际上，尽管坦桑尼亚人也许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实践中却被迫承认殖民统治的存在，并致力于在这个统治的范围内改善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能够在多少有成功希望的时候再向它挑战。他们必须为后代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然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是有限



度的。即使那些最热衷于在殖民统治范围内发展自己的人们，也决心对这个进程保持某些控制。他们要求保证学校教必要的东西，或者要求按照正确的方针改革经济。同殖民主义者相比，他们往往要求改良实行得更快一些，而这就会引起冲突。在这一时期，尽管没有公开的战争，然而坦桑尼亚人不是消极的。通过学校寻求出路的人不是消极地接受殖民统治。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欧洲人使非洲人得到改良，而是非洲人自己努力实现改良。

有些部族比别的部族有较好的条件改善自己。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学校和找到理想的职业，或者他们的土地比较肥沃和接近铁路线，因而他们能从种植和出售农作物获取较大的利润。在改良的时代，有些坦桑尼亚部族积累财富和接受西方教育的速度比其他部族快得多。结果，坦桑尼亚各部族发生了分化。此外，在同一个部族内部，有些人比起别人来有较好的机会和更大的抱负。他们住在学校附近，或者他们的父母已经受过教育能够教他们。他们的亲属中有掌握政治权力的酋长或头人，可以利用这种权力获取进一步的特权。他们耕种最肥沃的土地，或者能够获得这种土地。在殖民统治以前，大部分坦桑尼亚部族已经存在某种社会分化，而在改良的时代，这种分化扩大和加深了。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经济上形成阶级的迹象。无论是对部族或者个人来说，改良的时代同时也是发生分化的时代。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危险性那时还没有显露出来，因为当时人人都处在殖民统治之下。人们常常认为，任何形式的改良都是好的，不管它可能带来什么样

的不平等,因为所有这些改良都在技能总库中增添一份财富,非洲人能够用它来对抗欧洲人。然而,当时有些坦桑尼亚人,或者由于他们不是特权阶层,或者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社会觉悟,他们对于改良在非洲各部族内部引起的分化感到吃惊。兰杰教授在本书其他部分叙述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

无知不是唯一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团结。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较少,因为看来当时无知是更严重的敌人。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完全忘却曾经鼓舞马及马及起义的团结理想。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人们作出了新的努力,运用通过改良所获得的新方法和新思想来团结坦桑尼亚人。这些努力的真正开始大概是在1945年。本章从1907年早期争取团结的努力失败开始,写到1945年为止。当然,1907年到1945年不是坦桑尼亚人实行改良的唯一年代。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且将来还要这样做。因此本章有时候超出这个时期的范围,例如讲到十九世纪为克服无知而作出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对于缺乏教育事业的抨击。还要指出,有些部族对于改良措施的关注迟于其他部族,而有一两个部族则对改良从来不发生多大兴趣。不管怎样,从1907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期,改良的确是坦桑尼亚历史的中心主题,也是促使整个国家发生变化的主要源泉。

本章不是这个时期的编年史。改良的过程带有个人和地方的特点。它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以及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之间都不相同,没有一个划一的、适用于一切的模式。本章试图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当时在坦桑尼亚发

生的社会变化。它首先叙述坦桑尼亚各部族对于西方教育和传教士活动的不同反应；然后考察一下商品农业的开始以及农村地区发生的变化；接着叙述城镇的成长，特别是达累斯萨拉姆的成长，以及城镇居民建立起来的组织和生活方式。最后，本章将谈到全领地意识<sup>①</sup>的早期表现以及建立全领地性组织的努力。

### 对于教育和基督教的反应

本书前一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坦桑尼亚部族对于欧洲人的入侵作出不同方式的反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部族的后期历史说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教育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和提供的机会，作出了怎样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部族后来进行的改良有那些特点。环境和反应的差异之大，使我们不可能作出包罗万象的解释，而只能作一些概括的叙述。

传教士对于许多部族可以是有用处的。大的、集中的、没有为战争而全部组织起来的部族，往往可以从一个有文化的行政机构中得到好处，而传教士能够为这样的机构训练官员。在基督教传教士到来以前，有些坦桑尼亚部族已经利用伊斯兰教师做这项工作。因此，当传教士路德维格·克拉普夫在1848年访问乌桑巴拉的金韦里国王时，他发现国王“经常有

<sup>①</sup> 原文为 territorial consciousness。——译者

斯瓦希里人在他的身边为他写各种信件。国王有两个儿子，他们也都成了穆罕默德的信徒，而且学会了读和写。”<sup>①</sup> 尽管如此，金韦里需要更多的教育。他劝克拉普夫在乌桑巴拉定居下来当教员，并且最好有一个医生同他一起来。十九年以后，金韦里的继承者指示另一个来访的传教士讲授他的教学方法，然后允许他在郊外定居。有些传教士被看成是商人，对于他们的反应就不那么有利了。例如沿海地区，所有传教士在那里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因为那里的人民出于宗教和商业上的原因，显然是不欢迎他们的。例如1913年，柏林路德派教会在扎拉莫族地区只为三百八十二个皈依者举行了洗礼，而在尼亚库萨族地区却有二千二百二十六人受洗礼。尼亚库萨族地区主要是把传教士当作商人来欢迎的。他们在1891年到达以前，尼亚萨湖的商业系统只对那些住在沿湖地带的酋长们有利。传教士想要深入内地，在更有利于健康的高原定居。高原的酋长们把他们作为商人来欢迎。有一个传教士解释道：“迄今白人只访问了沿湖的酋长。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他这里了。因为我们（传教士）带到这里的棉布是值钱的；而更好的是，我们在这里出现也许可以制止马关瓜拉（恩戈尼）族的袭击。”<sup>②</sup> 这个解释说明了欢迎传教士的另一个理由：他们可以被看作政治上的盟友。由于这个原因，桑古族的梅雷雷酋长同路德会的传教士们热情地通信，因为他认为可

---

① 克拉普夫：《旅行、调查和传教》，1860年伦敦出版，第279页。

② 梅伦斯基：《在尼亚萨的德国劳工》，1894年柏林出版，第200页。（A. Merensky: «Deutsche Arbeit am Niassa»）

以通过他们同德国军队接触，而他正需要利用德国军队去对付他的敌人。在一个很不相同的情况下，邦德族为了对桑巴拉族的基林迪统治者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把马吉拉的中非大学传教会(UMCA)的传教士当作盟友。

不同的政治环境可以使非洲统治者对传教士采取敌对态度。例如哈亚族的酋长们长时期反对一切传教活动，可能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这种活动在毗邻的布干达造成的混乱。凡是传教士几乎和德国政府同时到达的地方，他们往往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白衣神父到达姆布卢的时候，那里刚刚爆发过一次未成功的起义。他们在一片神圣的丛林中定居了两年，一直受到抵制，然后才移居到别处去。后来，他们再次受到抵制，然而这一次他们可能还遇到了由原来的伊拉库宗教领袖领导的强大的精神对手。当时发生这种情况的事例必定比现在可能表述的要多得多。例如，路德会的传教士们在进入尼亚库萨族地区时曾经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却几乎马上同当地对于姆巴西的个人崇拜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也导致对教会的抵制，而且可能是1897年尼亚库萨族同德国当局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源。不论传教士对世俗有多大的好处，他们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许多部族抵制这种挑战，有些部族则欢迎它。不只是奴隶才感到十九世纪的迅速变化使人困惑和压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东非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而千年至福说的预言对于坦桑尼亚人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所以，内瓦拉族的马托拉酋长对他见到的第一个传教士说，他希望这位传教士从他的领地清除巫术。不仅如此，基督

教如同在它以前的伊斯兰教所起的作用一样，可以扩大坦桑尼亚人在社会上和别人接触的范围。有一段记载表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相当偏僻的尼亚库萨族地区，教会所起的这种使人们聚集到一起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在乡村教堂的布道会上，非洲牧师们反复讲到一个事实，即他们的信徒同其他部族和其他教派的信徒是在一起祈祷的。”<sup>①</sup>

早期的传教士对于他们所接触的各部族的影响比起非洲基督徒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要小。传教士经常带着非洲的教徒同行，而且很依赖他们。例如，尼亚库萨族地区的传教士在长时期中除了他们的南非和马拉维的随从以外，无法同任何人直接谈话。中非大学传教会的传教士依靠他们在桑给巴尔训练的自由奴隶，圣灵会的神父依靠从他们的巴加莫约居住点带来的自由奴隶，而本笃会<sup>②</sup>传教士则依靠他们在库拉西尼训练的人。这些人成为第一批教师。他们的才能和整个教学过程使得富有冒险精神的青年人着了迷：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另一批小孩集合在一间大茅屋里，由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坐在前面带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A, B, C, D……”我被吸引住了，以为这是在唱歌，但这实际上是我们教区的第一所学校。<sup>③</sup>

① 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部族的宗教仪式》，1959年伦敦出版，第171页。

② 本笃会(Benedictines)，意大利天主教最早的修道会，创建于六世纪。——译者

③ 《基隆吉的卡农·科伦巴·约哈纳·姆西加拉教士回忆录……始于1955年7月》，伦敦 USP G 档案，UMCA D/3。

最重要的是,由于年轻一代被早期的教会活动所吸引,他们接受教育和信仰基督教的行动往往表现为几乎是整个年青一代对老一代造反。第一批非洲教师和非洲圣经教员认为他们是新社会的先知。在布哈亚的一个圣经教员写道:长老和原来的宗教领袖的集会“只不过是心怀不满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而我的房子则是对美好将来抱着纯洁和热情期望的青年人的集合场所”。<sup>①</sup>这些热心肠的人很少懂得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后来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未来的教士清楚地回忆了他参加传教活动时的混乱的动机:

一天,我们从学校出来,我们说:“让我们继续学下去,直到我们真正学懂了。”另一个说:“让我们继续学下去,直到我们挂上十字架。”这时我们已经知道,挂十字架的人(圣经班的学生)才真正懂得他教的是什么……。第二天早晨,我们告诉这位老师,我们要他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挂上十字架。他非常高兴,并且教我们了。到了月底……我们都成了圣经班学生。<sup>②</sup>

在殖民统治确立以前就建立了传教会的地方,非洲统治者小心地保持他们自己对传教活动的控制。基林迪的国王有

① 尼哥拉斯·穆贡戈:《一个黑人传道师的回忆》,基巴拉巴拉牧师中心出版,出版日期不详。(Nicolas Mugongo:《Les Mémoires d'un catéchiste noir》)

② 曼弗雷德·马本多:《一位同生共死的非洲朋友》,英国威斯敏尼斯特出版,日期不详,第14页。

一个时期禁止邦德的传教士建筑一座永久性的石头教堂。国王最后同意了，“说他同我们没有争吵……但是他宣布，他象他的祖父一样是全王国的首领”。<sup>①</sup>在梅鲁，两个传教士由于没有取得正式批准就占有土地而被处死。这些早期传教点的统治往往是十分严酷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安全没有保障。例如，马吉拉传教点有它自己的警察，当学生在一次饥荒中对于缺乏粮食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全体受到警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赐与的，如果谁不满意，他们可以回家。”<sup>②</sup>在第一批建立的修道院中，有些是容易离开的，而许多人在感到不能忍受教规的约束时也确实离开了。另外一些就不那么自由了。例如，在邦德族的姆库齐差会驻地，许多早期学生是由他们的父亲领来的。他们的父亲接受了一笔现款，如果这些学生想要辍学，他们的父亲必须归还这笔钱。绝大多数传教士不仅有严格的教规，而且不论是从那个教会来的，都采取某种欧洲式的行为标准，并且急于要他们的信徒适应这种标准。当马吉拉举行第一次基督教婚礼时，传教士作了以下的记载：

父母亲、男女朋友们、新郎和新娘都坐在一起，在同一张桌子进餐。新郎和新娘坐在桌子的上首，新郎和新娘的父亲坐在下首。这确实是一次伟大的行动，也是一

---

① 安德森—莫斯黑德：《中非大学传教会史》，第1卷，1955年伦敦第六版，第154页。（A. E. M. Anderson-Morshead: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

② 《马吉拉地方志》（《Magila log-book》），1884年5月16日，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



个影响深远的进步。这是对许多习俗的挑战。<sup>①</sup>

早期的许多皈依者经历了第一次冲击以后，几乎同传教士一样急于要向旧习俗挑战。1895年在马吉拉召开的土著基督教徒会议宣布：“一切基督教徒都不准为死者哀悼，因为这是一种异教的风俗……。这样做的人是有罪的，他必须被逐出教门。”<sup>②</sup>

传教活动引起非洲各部族分化的趋势，在殖民统治以后建立的差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差会的发展往往比老的差会快得多。这是征服造成的明显后果之一。卢库勒迪的头人对驻在他的辖地的第一批本笃会传教士说，他不会阻挠他们，“任何人如果不了解现在的时代是属于欧洲人的，那末他就象一个儿童那样幼稚无知。因此，我通知你们，我的孩子们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按照欧洲的方式学习。我不会阻挠他们。”<sup>③</sup>在所有传教活动中获得最令人惊异的成就的，是1898年到达佩拉米霍的本笃会。他们在六个月内为第一个皈依者行洗礼，四年内为第一个头人行洗礼。到了1903年，他们的中心学校有一百五十名学生，其中包括每个最高酋长的一个儿子。这个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的活动能力，但可能也是由于恩戈尼部族具有世俗的好奇心，同时还由于德国人在1897年进入恩戈尼族地区时所进行的火力示威在恩

① 马吉拉地方志，1887年8月29日。

② 马吉拉地方志，1895年9月。

③ 西里勒斯·韦尔迈斯特：《在风暴面前》，1906年圣奥蒂利恩出版，第38页。(Cyrillus Wehrmeister: «Vor dem Sturm»)

戈尼人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恩戈尼族首领们起先对差会满不在乎,后来才认识到它会在他们的人民中造成什么样的分化。马及马及起义明显地具有反对整个坦桑尼亚南部的差会及其教徒的趋势,这是企图重新团结已经开始分裂的各部族的明证。当一个基督教教员被劝说领受马及时,他受到了这样的警告:“他们要杀死任何一个穿欧洲服装的人。”<sup>①</sup>

在1907和1945年之间,基督教在坦桑尼亚有过两个迅速扩张的时期。第一次始于马及马及起义以后,特别显著的是在南部,那里的饥荒使得许多人依赖差会的布施,同时有理由假定,本地的宗教由于起义失败而严重地失去人们的信仰。例如,1906年,本笃会在马亨格附近的奎罗,有九十三名领受圣诞节圣餐者,而七年以后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千。在马及马及起义之前不久,柏林路德派教会学校在全国有将近一千名学生;到了1913年,增加到一万二千名。这种增长不单是起义的结果。北部也有同样的增长,虽然远不如南部那样引人注目。在1903年和1912年之间,马吉拉地区受洗礼的基督徒和学生增加了一倍,尽管差会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在那里开始活动了。看来,马及马及起义后,越来越多的坦桑尼亚人只好暂时在殖民统治的范围内工作,并认识到发展教育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改良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一时期,差会的制度变得严格了。许多教徒,尤其是教士或者教师,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差会开始采取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白人集团的种族歧视态度。一位传教士叙述了这

<sup>①</sup> 西里勒斯·韦尔迈斯特:《在风暴面前》,第186页。

种歧视在本世纪初怎样引起了神学院学生的愤怒：“这些人说，英国牧师完全把他们当作佣人来对待，照这样下去牧师团是得不到发展的。他们特别气愤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内地牧师把违反教规的人交给德国人去惩办。”<sup>①</sup>当时，能力较强的人有可能找到别的职业，因此，上述做法使有些差会的许多非洲人离职。另一些教徒则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藐视态度。例如，当有人问马吉拉的一位教师如何使他的行动和他的教学相一致时，他“回答说，他并不相信他所教的许多东西”。<sup>②</sup>这是个别人的抗议，对教会机构的有组织的攻击只是在以后才出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断了马及马及以后开始的改良运动。德国人逮捕英国传教士，并且虐待他们的教徒；英国人驱逐德国传教士，并且怀疑他们的教徒。一个在邦德族地区的教士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变得非常穷。我回来时，发现连我的房屋和教堂都给破坏了。”<sup>③</sup>许多地区的少数非洲教师尽他们最大的可能维持局面。马拉维湖沿岸地带的一位教师写道：“如果我们得不到教士来领导我们，我们将写信给教皇，他也许会派教士给我们。我们因为没有教士而深感愤慨。”<sup>④</sup>不是需求减少了，而是差会不能满足要求。在佩拉米霍主持

① 弗兰克·韦斯顿给史密斯的信，1900年3月21日，中非大学传教会档案 A/1/XVII。

② 马吉拉地方志，1911年6月4日。

③ 彼得罗·利莫给邓肯·特拉弗斯的信，1922年4月2日，中非大学传教会档案 A/5。

④ 鲍尔神父友好地给了我这封信的一个抄本。这封信是加西安·荷马荷马 1919年写的。

传教事业的白衣神父战后为八百人行洗礼并且吸收了二千多人进圣经学习班，然而他们仍然感到不能满足需要。有一个人在离职时评论说：“恩戈尼族地区是另一个乌干达。”<sup>①</sup>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恢复了正常秩序以后，基督教势力的增长确实是很快的。仅仅在1924年8月份，本笃会代理主教在佩拉米霍为一千三百七十四人施坚信礼，在利图希叉为八百九十五人施坚信礼。1913年，奎罗教区大约有一千人领受圣诞节圣餐，1923年的人数相同，但到1933年增加了三倍。

就对于非洲各部族的冲击方面来说，大约从1923至1935年，是坦桑尼亚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达到顶点的时期。它的一个标志是农村小学在全国广泛地发展，“丛林小学”就是部族社会卷入改良运动的明显的象征。1929年，本笃会在坦桑尼亚南部有七百名以上的农村教师。传教会的机构是庞大的，而且仍然很少受到挑战，农村教士依然准备毕生致力于这个默默无闻的事业。一位有才能的中非大学传教会教士萨姆威尔·塞霍扎在1922年写道：

我希望我能够写一些我们关于自给自足的想法，但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使我们的人民学习的最好方法。我们试验了许多方法，同时教给他们，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方法。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试图把这一点放在首位。我希望我们最后将会获得成功。但是许多急于要看到劳动成果的人，时常在文章中表现

<sup>①</sup> 这是鲍尔神父向我提供的材料。

出他们对于这一点感到失望。我想非洲人的健忘是他们进步缓慢的原因，而且还需要很多年才能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在教会事业中所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对于这一代基督教徒的迟钝感到沮丧。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宗教、文明及其许多新的诱惑。<sup>①</sup>

对差会及其教育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攻击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非洲民族教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hurch)”(兰杰教授在本书的下一章里对它有所阐述)在1935年到达农圭。大约在同一年，恩戈尼族学生第一次公开抗议差会不为世俗中学教育提供条件。这个问题在全国许多比较先进的地区造成了人民和教会体系之间的严重冲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小学教育的巨大发展及其质量的改进，激起了继续升学的要求。大多数差会对于这个要求显然是冷淡的。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并且认为世俗中学教育只能造就一批脱离部族的和不信教的社会上层分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个问题在乞力马扎罗变得特别尖锐，因为当时查加族的酋长们开始感到小学教育已经不足以促进改良了，还因为当时传教工作再一次被战争打断了。这些酋长要求把差会管理教育的权力交给土著当局，即使由后者负担经费也要这样做。这是在坦桑尼亚第一次正面攻击“这样一个制度：它扩大差会

---

<sup>①</sup> 萨姆威尔·塞霍扎给邓肯·特拉弗斯的信，1922年9月30日，中非大学传教会档案 A/5。

对学校的所有权以及对部族的教育和生活的控制权，缩小政府和土著当局在这方面的权利。”<sup>①</sup>

争取高等教育的斗争是在改良运动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年代开展起来的。本章所要说明的是，在马及马及起义以后的年代里，改良的渴望如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使非洲各部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平衡的，因为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对传教会活动的反应是因地区而异的。坦桑尼亚的有些地区（马萨伊、恩乔姆贝、乌兰加）受教育的机会远比找职业的机会来得多，因而成为输出大量小学教师的地区。有些地区日益关心发展中等教育。另一些地区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在经历初等教育制度的第一次冲击。尽管有这些不同情况，除了最边远的地方以外，在所有地区的部族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因素，它以新的本领和新的雄心向旧秩序挑战。<sup>②</sup>

### 改良运动和部族内部的不平等

教育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坦桑尼亚得到改良的主要源泉之一。往往伴随而来的第二个源泉是商品农业，特别是为供应国际市场而种植经济作物。当然，它从来不是（坦桑尼亚）农

<sup>①</sup> 姆维托利·彼得罗·伊托西·马雷尔勒酋长给教育局长的信，1950年5月20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9/148/2/90。

<sup>②</sup> 我应当感谢我的同事约翰·麦克莱根博士和阿诺德·特穆博士，在关于教会历史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意见，当然对于我所作的结论，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业的最重要的形式。为供应国内消费和地区间交换的粮食生产始终是坦桑尼亚经济的基础。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知道得很少，尤其不了解关于粮食作物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除非历史学家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否则他们就不能真正懂得这个国家的农村地区发生了什么变化。关于经济作物的农业，他们同样也知道得不很多，然而这方面的材料终究比较多一些，至少可能指出它给农村带来的某些变化。

坦桑尼亚的商品农业早在德国入侵之前就存在了，特别是沿海一带，阿拉伯人经营的奴隶种植园和斯瓦希里语系各部族农民生产的大米、蔗糖和椰干等作物，出口到桑给巴尔和印度洋的其他市场。德国人入侵的后果之一是破坏了这个复杂的沿海经济，毁掉了许多小的港口，同样地，从欧洲和亚洲进口五金和纺织品则破坏了许多地方小工业。1907年，一个有头脑的总督写道：

在德属沿海地区从庞加尼旅行到鲁菲季，人们发现，在德国统治下只有一个地方发展了，这就是达累斯萨拉姆。……较大的几个地方如庞加尼、萨达尼和巴加莫约都衰落了。……所有的中等城镇……实际上失去了一切重要性。姆克瓦贾、温德、姆布韦尼、姆布瓦马吉、基西朱、基乌曼加奥、尼亚姆萨特、姆辛达吉和其他一些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许多石砌房屋的遗迹使人可以想见这些地方以往的繁荣景象。<sup>①</sup>

<sup>①</sup> 雷森贝格给帝国殖民部的信，1907年7月15日，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局1056/48—56。

德国人尽管对沿海起了破坏性的作用，一般说来，他们是很想鼓励非洲人发展商品农业的，只要这种商品农业不会妨碍向欧洲人的农场和种植园提供劳动力。德国的工业家感到他们在世界热带原料市场上受人摆布，因而他们尤其急切地想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找到他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原料来源。对内地的农场主来说，刺激商品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是建筑他们可以用来输出经济作物的铁路。在德国人统治时期，现代坦桑尼亚三个最肥沃的地区，即苏库马、布哈亚和乞力马扎罗开始出口商品作物。苏库马的棉花工业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一名垦殖者在内拉酋长国定居下来，并同当地的头人商定了一种分成租佃制。年轻的苏库马人在他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免费取得种籽，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他棉花。这个垦殖者然后通过乌干达铁路把棉花出口到欧洲。1906年前后，苏库马族对这种无利可图的制度感到厌倦，于是政府开始鼓励而且往往是强迫这个部族的农民种植棉花。首先从种棉花得到好处的是纳萨酋长国，然后，据一位苏库马人回忆，“其他酋长国看到种棉花有利可图，也开始要求种籽”了。<sup>①</sup>1911年，从姆万扎出口的原棉为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磅。在布哈亚，也表现了这种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这个地区早已种植咖啡，那里的酋长们举行宗教礼仪时要用咖啡豆。第一次出口咖啡是1898年。几年以后，当乌干达铁路通到维多利亚湖时，哈亚族的酋长开始大量种植咖啡。1905年，布科巴

<sup>①</sup> 《姆瓦加拉土著居民基尤姆比眼中的……历史》，载1931年出版的《马斯瓦地方志》（尼亚利库恩古地方办公室）。



出口咖啡的收入为五万一千五百六十四先令；1912年为七十四万九千零七十九先令。哈亚族的酋长们获得了早期种植咖啡的利润的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原来垄断了这种商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得到德国人的支持。这些酋长发明了一种叫做尼亚鲁班扎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从而攫取了许多最好的咖啡地，使农民变为佃户，拿走了农民收获的大部分咖啡。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改良可以扩大原有的不平等。乞力马扎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传教士把咖啡带到了乞力马扎罗。他们把咖啡苗送给友好的酋长，遍布山区的圣经教员则把这种作物传播到各个地方。这些咖啡出售给沿海来的商人，由他们运到蒙巴萨和坦噶。酋长们及其下属又获得了最好的牟利机会。莫希酋长的军事首领的儿子约瑟夫·梅里尼奥记得他是在1907年开始种植咖啡的。据说1909年酋长马雷尔勒一世在乌兰古有一万五千棵咖啡树，这个数目可能是夸大了。由此而产生的不平等的例子是，德国人许可查加族酋长分配“维汉巴”(氏族土地)，而在以前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sup>①</sup>

在英国人统治的最初年代，第一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场主开始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从他们的买主那里取得较好的价钱。例如，莫罗戈罗地区的二十一名棉花种植者在1934年组成了非洲棉花种植者协会，以便“只维持和只依靠一个轧棉

<sup>①</sup> 在这里如同本章其他地方一样，我曾经从一些没有发表过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材料，这就是：G. A. 马圭尔博士关于苏库马、R. A. 奥斯汀博士关于布哈亚以及 E. A. 基里米亚·姆塞拉和苏姗·罗杰斯夫人关于乞力马扎罗的著作。

厂”。<sup>①</sup>梅鲁和阿鲁沙的咖啡种植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就已经组织起来了。到1931年，他们的协会大约有七百名会员，并计划任用领取薪金的职员。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作物的质量和协调销售业务。香巴族的咖啡种植者于1932年组织起来，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同当地的买主谈判出售价格；建立了一个仓库，对每个会员收获的咖啡过秤，并从出售产品的总收入中付给各个会员应得的部分。1938年这个协会有二百名会员。这些种植者协会往往是农村地区最早的现代组织。这些协会由最先进的农场主组成。它们的成立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由种植者个人去推销供应世界市场的热带作物，那是不合算的。

有些酋长是这些种植者协会的重要会员，但多数酋长不是。这是奇怪的，因为酋长们往往是最早种植经济作物的人。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组了坦噶尼喀全境的部族政治制度。英国人的“间接统治”政策是想要尽可能地恢复欧洲人入侵以前存在过的部族体制，然后逐步使这种体制适应殖民统治的新需要。起初，大部分坦桑尼亚人看来是欢迎这种措施的，因为按照这种措施建立的地方政府比德国统治时期较为有系统。但是这种制度逐渐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一个原因是，英国人从“正统的”家族中选拔部族领袖，从而在每个部族内部形成了一个得到政府扶植的集团。一般地说，这个集团从改良中获得越来越

<sup>①</sup> 莫罗戈罗非洲棉花种植者协会章程，1934年，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450/12。

多的好处。例如，1925 年建立的塔波拉学校头十年只招收酋长和头人的子弟。土著当权者可能享有的其他特权有：政府发给的薪金、比较经常的农业援助、商人的优待，有时甚至得到一辆汽车或卡车。例如，当英国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把咖啡种植业引进布古菲时，他们先给了酋长一千五百棵咖啡树，给首要头人一千棵，给地位较低的头人每人七十五棵。部族领袖们借助欧洲人的这种支持，往往可以用比殖民统治以前更加专制的方式来强制推行他们的主张。结果，部族群众开始对政府扶植的那些人所享有的特权感到愤慨。进步的农场主尤其如此。他们往往在商业上同酋长竞争，而且因为他们往往还是受过教育的人，因此感到他们的才能应当比在间接统治下得到更多的尊重。于是种植者协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反对酋长特权的中心。

这种冲突在坦桑尼亚两个最发达的地区乞力马扎罗和布哈亚最为尖锐。它不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而是两个富裕集团之间的冲突。一个集团具有官方的身份，另一个集团则没有。争执的问题是，应当由哪一个集团来掌握部族的改良运动。两个集团都要求实行改良，但是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实现这种改良。这是两个相互竞争的革新者之间的矛盾。在乞力马扎罗，斗争是以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为中心进行的。这个组织建立于 1925 年 1 月，主席是约瑟夫·梅里尼奥。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早期的咖啡农场主，他也许是国内最能干的部族革新者。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主要是一个销售机构，通过单一的代理人出售（咖啡）而获得了垄

断利益。协会到 1927 年有一万零八百九十四名会员。但是这个协会也关心整个查加族的改良运动。举例来说，协会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会员未经协会许可不得将其土地抵押给任何非非洲人。协会的这种关心使它先是同政府对立，接着同酋长对立起来。1928 年，协会反对政府关于登记所有查加人土地的一项建议。政府进行报复，提出协会应当与本地的财政部门合并，这就是说要使协会从属于酋长。协会拒绝这样做，但是 1931 年这个协会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陷于破产，政府以乞力马扎罗土著合作联盟取而代之。它还是一个比较民主的机构，但是它的地方基层组织看来时常受到酋长们过多的影响。同时，世界咖啡价格下跌了。1935 年，酋长们规定乞力马扎罗种植的咖啡全部由乞力马扎罗土著合作联盟垄断。这时有些酋长国发生了骚乱，并发展为反对酋长的愤怒示威。

乞力马扎罗发生的这种冲突，生动地说明了改良时代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发生的政治行动的类型。这是争夺部族发展控制权的地方政治斗争。查加族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地区不安全时才关心全领地的事务。例如在 1929 年，由于担心同肯尼亚合并，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才要求有代表参加立法议会。地方的政治斗争是防御性的，这种斗争是查加族由于对改良运动的担心，由于有了在欧洲人统治下的惨痛经历，以及由于对欧洲垦殖者的理所当然的恐惧而被迫进行的。一位官员指出：

人们使得查加人相信，在野的欧洲人会不择手段地

力图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预期在野的多数有朝一日控制地方政府。他们无疑地害怕这样一个政府会撕毁现有的协议而开始一个新的剥夺土地的过程,为此,他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政府的干涉。<sup>①</sup>

一方面摆脱政府对他们事务的干涉,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地方事业,这是这个时期大部分部族革新者所追求的目标。

德国人对布哈亚族地区的入侵发生在1890年。他们遭到了几个酋长国的抵抗,其中包括北邻乌干达的基齐巴酋长国。但是德国人找到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基安贾族的卡希吉酋长。他想要利用德国人来扩大他的权威。卡希吉在德国人统治时期逐步地扩展了他的权力,扩大了领土,并且成为种植咖啡的巨头。所有的哈亚族酋长都试图阻止传教士进入他们的辖地,但只有卡希吉酋长得到德国人的许可,不准传教士进入。基安贾人受到宠爱,而被击败的基齐巴人则在1900年以前一直被政府所忽视。但是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外交与暴力斗争转变为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改良运动,基安贾族和基齐巴族相互间的地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基安贾族依然没有受过教育,而基齐巴族则从不受欢迎的传教士那里获得了教育。这些传教士集中力量对基齐巴族的贵族做工作。到1914年,一代识字的新贵族充实了基齐巴族的宫廷,为传教会和政府提供了人员。

1914年时,哈亚族的酋长还没有一个人受过洗礼;而到

---

<sup>①</sup> 彭宁顿:《查加人的政治倾向》,1931年1月,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126/1/24。

二十年代时，哈亚族的八个酋长已有七个受了洗礼。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布哈亚也进入了改良的时代。初级教育和种植咖啡改变着哈亚族社会。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决定实行间接统治来巩固酋长的权力和特权。英国的支持加强了酋长们的地位。但是他们就遭到一个典型的非官方的部族上层组织布科巴哈亚人联盟的反对。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布科巴的低级公务员在1924年组成的，“为了争取建立一种发展我们国家的体制和寻求一种有利于我们大家的简易途径来实现文明”。<sup>①</sup>实现文明的简易途径就是识字教育、种咖啡和机会均等三者相结合。联盟在这三个方面都同当权者发生冲突。为了寻求机会均等，联盟强烈地反对尼亚鲁班扎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使酋长们得以牺牲部族成员而发财致富。联盟认为识字教育是争取同欧洲人平等相处的关键，因此反对把布哈亚唯一的世俗中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改成蹩脚的农业学校。然而，联盟主要关心的是咖啡种植问题。联盟介入这一问题的历史，十分生动地阐明了发达地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联盟的精力最充沛的领导人克莱门斯·基扎是一个受过天主教传教会教育的齐巴贵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基扎在布科巴创办了土著贸易公司。1928年，他又办了一个咖啡豆脱壳企业。1931年

<sup>①</sup> 1924年7月13日布科巴—巴哈亚联盟的请愿书，引自拉尔夫·奥斯汀《对土著居民的政策与非洲政治：1889—1939年坦桑尼亚西北部的间接统治》(Ralph A. Austen: «Native Policy and African Politics: Indirect Rule in North-west Tanzania 1889—1939»), 1965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第324页。

他搞到了一块土地来建造一所咖啡加工厂。他估计修建这个工厂的成本为二万二千先令。这个数字表明了富裕的哈亚人当时能弄到多少资金。到1934年,基扎负债累累,他的工厂由于世界经济萧条而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时他第一次同殖民机构发生了直接冲突,因为他必须对他的土地持有完全的所有权才能得到贷款还债,而他作为一个非洲人,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种所有权。他终于得到了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但那时他发觉除非将工厂迁到别的地方,这家工厂就不能赚钱。为此,他需要一个他无力购买的许可证。这时已是1936年,在这期间,基扎还组织了土著种植者协会,部分地是为了使他的工厂得到咖啡作原料。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同年,酋长们实行了管理咖啡种植的新规定。农场主抗议这些规定。布科巴哈亚人联盟的成员领导了这次抗议运动。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骚乱,结果是联盟暂时垮台;它的某些成员被监禁。基扎失去了咖啡豆脱壳的营业执照,同时银行要求他立即偿还贷款。经过几年的挣扎以后,基扎被迫答应将他的工厂出售给他的亚洲债主,以免“终身欠债或当乞丐”。<sup>①</sup>但是,他发觉他无法把工厂卖出去,因为政府拒绝给任何亚洲人颁发经营这个工厂的营业执照。基扎经过四年的连续谈判,才终于设法把工厂卖掉了。

上面详尽地说明了基扎的经历,因为这件事很清楚地显示一个精力充沛的革新者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资本缺

---

<sup>①</sup> 克莱门斯·基扎给布科巴县专员的信,1942年3月2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71/433/140。

乏,亚洲人的商业竞争,国际经济动荡不定,官方的猜疑,组织农场主的必要性和风险,以及政府限制企业活动的清规戒律。即使象基扎那样在改良时期得到最大好处的人们,也发现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全部利益。他们也受到殖民统治结构的限制。

布哈亚和乞力马扎罗是两个发展迅速的地区,那里的地方政治斗争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应该由谁来掌握改良和从改良得到好处,而酋长们和他们的对手都是革新者。在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改良的进程要缓慢得多,那些地方的政治斗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那些地方,酋长们往往是部族中最富有、最进步和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员,例如,苏库马族和尼亚姆维济族地区通常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酋长们几乎是代表他们的部族对殖民政府讲话的唯一代言人,政治斗争的通常形式是,比较进步的酋长同他自己家族中较为保守的成员为赢得公众的支持而互相竞争。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些地区才出现一批同酋长们对立的革新者。还有一些地区没有得到什么改良,并越来越因此而感到愤慨。因为那里既有人主张改良的政策,又有人主张不要改良的政策。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所有政治斗争中最激进的政治斗争。最好的例子是帕尔族地区。

德国人、英国人和传教士由于较多地关心乞力马扎罗和桑巴拉族地区,都忽视帕尔族地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尔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地区停滞不前,而他们的邻近部族却从改良运动得到了好处。1938年上学的帕尔族儿童只占



11%，同年帕尔族地区财政中用于发展事业的全部开支只有四百英镑。最重要的是，帕尔人没有找到一种成功的经济作物。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经试种咖啡，并且加入了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但是政府断定帕尔族地区的咖啡没有前途，因而把所有的咖啡树都拔掉了。帕尔人于是被迫改种棉花，但是那里的气候条件使得种棉花的人很少有利可图。1937年，他们生产了一千二百零七吨棉花，而1938年只生产五百吨。当时的县专员发觉“不景气的乌云笼罩着帕尔族地区”。<sup>①</sup>这种不景气对于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有影响。1935年帕尔族地区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成立了一个典型的农村改良协会——乌桑吉体育福利俱乐部。起初，他们集中精力搞足球队，但是到了1940年，俱乐部会员中的教员、职员和商人对教育事业表示关心，认为需要举办成年人教育和实行某种由公家支付学费的办法，以便让更多的儿童能够上学。这个俱乐部关于下一年工作的会议记录有以下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记载：

会员们一直在考虑要解决下列问题：

(甲) 为什么我们帕尔人在开始做某些事情以后从来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呢？

(乙) 解决以下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1. 漠不关心。
2. 缺乏信心。

<sup>①</sup> 《帕尔族地区萨梅县：1938年期间的土著人事务》(《The District of Same, Upare: Native Affairs during 1938》)，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6/1。

### 3. 贫困。

### 4. 孤立(自私自利)——一种危险的疾病。<sup>①</sup>

正当俱乐部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英国当局提出了它自己的解决办法：既然帕尔人要求改良，而他们落后的全部原因就是缺钱，那么很好，就让帕尔人付钱吧，让他们向当地的财库缴纳地方税，这样就能获得必要资金来发展整个部族。

这个建议是在1941年向帕尔族的酋长们提出的，他们反应很热烈。他们还同意地方税率应当根据财富多少来分等级。为此他们援引了一个先例，即过去缴给酋长的姆比鲁贡税也是按等级缴纳的。新的姆比鲁税率是在1943年实行的。每一个帕尔人都由地方长老估定应纳的税额。这种规定立即引起了不满。有人说姆比鲁不过是实行欧洲式所得税的伪装。此外，向旧式的酋长缴纳贡税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帕尔族地区来说是不合适的，而且会使酋长们更能偏袒亲信。整个山区到处举行集会，抗议信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起草的。与此同时，县专员认为这种估税的方法是武断的，并且下令开列财产清单以便为估税提供公平的根据。这种做法特别触怒了商人和股票持有者，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调查他们的资产。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姆比鲁税并没有带来政府所许诺的发展。1944年帕尔人组织了有计划的反抗活动。他们在1945年请了一名律师，寻求肯尼亚政客的帮助，并且拒绝估产。这时，保罗·马香博成为帕尔南部地区一个受公众欢迎的领袖。

---

<sup>①</sup> 1941年8月8日《乌桑吉体育福利俱乐部的会议记录》，坦桑尼亚国家档案的缩影胶片。我要感谢格瓦萨为我翻译了这个会议记录。

他号召人们到萨梅举行抗议游行。在游行群众集合时，警察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这就激怒了群众，他们继续前进，同时山区其他地方的队伍在萨梅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一直走到县公署的外面，集合成一支强大的群众队伍，有人说有一万人。他们在那里停留下来，搭起了整齐的帐篷，他们的妻子送来食物，人们等候着。两个月之后，当他们最后决定解散时，英国在帕尔族地区的整个统治结构濒临垮台的危险，不久姆比鲁纳税制就被放弃了。<sup>①</sup>

反对姆比鲁税的示威，是武装抵抗失败以来坦桑尼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群众行动。用这个事件来结束关于部族内部改良运动的叙述是合适的。因为这次示威证明了克莱门斯·基扎已经懂得的道理，这就是殖民结构本身限制了改良的范围，而改良运动的整个前进过程最终势必导致对殖民统治的挑战。制定姆比鲁税的目的是要促进改良，但是，经受了四十年的外国人统治和轻视的帕尔人拒绝信任英国当局及其享有特权的代理人酋长们的诚意。部族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过于悬殊的程度。用老的办法实行改良再也不够了。在帕尔族地区，就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布哈亚、乞力马扎罗和全国各地一样，人们开始要求采取殖民统治所不能做到的改良方法和速度。

---

<sup>①</sup> 我要感谢基曼博为我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情况，虽然解释是我自己作的。

## 城镇居民及其福利

坦桑尼亚政治的基础是农村，是农民为争取安全、尊严和平等的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思想和组织中心是城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过去一度是渔村，到德国人统治的末期，估计有居民一万九千人。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大致上还稳定在这个数字上。但以后达累斯萨拉姆开始迅速发展，而且从来没有停顿过。1931年，这个城市有居民二万四千人，1943年估计为三万七千人。直到1943年那里还没有多少工业。那时的达累斯萨拉姆主要是首都兼港口，它的大多数居民从事服务性行业。

大体说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人是由五个不同部分构成的。人数最少的是这个城市原有的土著渔民和种植者，他们通常称自己是肖姆维人。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毗邻是扎拉莫人，达累斯萨拉姆的四郊原来都是扎拉莫族地区。他们是由非熟练的临时工人组成的流动人口，人数通常占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最早定居的城镇市民，其中有两部分人享有特殊地位。一部分是一小批退伍的非洲裔德国雇佣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苏丹人或恩戈尼人的后裔，自称为职业军人。第二部分人数比较多，他们自称为曼耶马人，祖籍是坦噶尼喀湖周围猎取奴隶的地区。定居下来的曼耶马人具有很深的宗族观念，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盖起了单独的清真寺，拥有许多房屋，

而且成为长期居民的一个重要核心。最后，还有两类来自远方的移民：一类是非熟练劳工，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尼亚姆维济人、瑯人或恩戈尼人；第二类是来自诸如坦噶、莫希和布科巴等教育中心的少数技术人员。当然，这只是过分简单的一种说法，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城市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居民的复杂性。

毫无疑问，居民们到这个城市来居住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很少。多数人大概是抱有一定目的的工人，也就是说，他们上城市去是为了挣得一笔钱来养家。从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恩戈尼族劳工的调查材料中（这是在坦桑尼亚仅有的唯一详细的调查材料）发现，绝大多数移民是为了挣钱向政府缴税。这些人主要是非熟练工人，但是技术人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的目的，即在他们就业期间储蓄一些钱，以便退休后能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地位最高的非洲官员马丁·卡扬巴，最后退休回到他在坦噶附近的家乡，成为一个养鸡场主。定居的市民是少数，但是他们自然比别人更为关心城市事务，并且容易在社会和经济组织中取得显著地位。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累斯萨拉姆被相当严格地划分为几个种族区：北部的欧洲人住宅区（一区）；行政和商业中心，其中也有亚洲人居住（二区）；以及西部和南部的非洲人居住区（三区）。这种隔离制度对非洲人的住宅区也有影响，因为非洲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不同。卡里亚库是非洲人的主要住宅区。卡里亚库的东段，特别是新街（现在的卢蒙巴街），

是人们最喜欢的居住区,因为从这里到二区上班最近。因此,那里的房租最高,许多技术工人住在那里,而且成为全市非洲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卡里亚库一直向西延伸到现在的市郊区。这个地区过去是农村,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口的增加,就成为市郊区了。最重要的郊区是伊拉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里是一个贫民区,几乎完全没有公用事业、警察或行政管理。本书写作时,昌冈贝正在成为市郊区,然而象马戈梅尼、布古鲁尼和特梅克等地区,则仍然是郊外的农村。

对于抱着一定目的移来的工人来说,问题是要找到房子和就业。达累斯萨拉姆历来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保障的地方,而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市的迅速发展,社会情况就更加恶化了。据1939年一份不大可靠的官方报告,大约六千名成年男工中有25%是常年失业的。60%的就业人口每月工资不到十五先令。全市只有一半儿童上学。大约有一千名十四岁以下的儿童被认为是就业的,除供应伙食外,每月工资二至四先令。许多公司每周工作六十六小时。二万到二万五千非洲人住在大约三千二百所房子里。此外,这个城市没有健全的行政管理。主管市政的人是一名市政秘书,他主要关心的是商业区。非洲人居住区由一个不得人心的阿拉伯利瓦利管理。在他下面的行政机构几乎年年有变化,然而最普遍的制度是由政府任命若干名市镇头人。据1939年的报告,这些头人既不代表非洲人的意见,也不履行其他职责。由于缺乏市民代表机构、有效的行政管理、社会服务、足够的住房以及就业保障,达累斯萨拉姆人民不得不创建自己的社会组织。

市民们创建的组织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离开了农村的部族社会之后,在城市里建立了俱乐部、联合会以及其他自愿组织起来的协会等新形式的社会团体。这些组织提供疾病或失业救济,使孤独的人能有朋友,并为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采取共同行动。这些组织大部分现在大概已被遗忘了。例如,足球俱乐部和舞蹈协会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录。那些现在还留下痕迹的组织大多是部族组织。城镇的兴起确实打破了部族界限,但这只是指城镇为各部族相互接触提供了新的场所。城镇并不一定会消除同一部族的人们所共有的观念。第一次来到城镇的移民往往会找到同一部族的人,也许还是亲戚。这些人可以帮他们找到住房和职业,而且向他们介绍城市生活。此外,城镇居民的某些需要,例如在城里死后的葬礼,也只有通过同部族的人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事实上,达累斯萨拉姆第一批大家所熟知的组织,就是在德国人统治时期,为埋葬死在医院中的部族成员而成立的各个部族协会。波戈罗族协会就是为此目的在1912年成立的。后来的许多组织也把送葬作为它们的一项主要工作。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1936年建立的新尼亚姆维济族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联合起来关心整个尼亚姆维济族的一切人的问题”,<sup>①</sup>但是它的实际工作是安排尼亚姆维济病人住院并去探望他们,在必要时还安排他们的葬礼。协会的会员除了每月缴纳会费五角以外,每逢一个尼亚姆维济人生病,还要缴费一角;每逢一个尼亚姆维

<sup>①</sup> 《达累斯萨拉姆新尼亚姆维济族协会章程》，1936年5月8日诺思科特给P. C. 伊斯特恩的信的附件，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450/40。

济人死去，缴费三角。达累斯萨拉姆有许多尼亚姆维济人，其中大多数是没有技术的。他们的协会是非常典型的什么都管的大规模部族组织，协会由长老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联合领导，年轻人管写信，长老则安排葬礼。人数较少的部族，可能同其他有亲戚关系的部族联合成立一个多部族协会。乌卡米联盟就是这样的协会，这个联盟“为了实现过去那样的团结”<sup>①</sup>而把克韦雷、多埃、齐古阿、库图、维东达、萨加拉和卡米等部族成员联合在一起。

达累斯萨拉姆最大的部族扎拉莫对这个城市特别关心，因为市区四周都是他们的部族地区。他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1938年，按照惯例由长老和受过教育的人联合建立了扎拉莫人联合会。它主要关心的是实现住在城市和住在农村的扎拉莫人之间的团结。它是一个“旨在使所有在达累斯萨拉姆和达累斯萨拉姆以外的其他扎拉莫族地区的扎拉莫部落结成一体”的团体。<sup>②</sup>联合会筹集了二万先令购买两辆卡车，经营达累斯萨拉姆市和四郊之间的客运和农产品运输，把它作为实现团结的一种方法。它和许多部族团体一样，声称要象一支进步力量那样采取行动，在部族地区实行改良，“建立统一”，并且在重要问题上，使扎拉莫人及其乡土“振作起来”。<sup>③</sup>到1948年，联合会声称拥有三万名会员，成为扎拉莫

① 1944年5月20日穆罕默德·卡瓦姆布瓦等人给P.C.伊斯特恩的信，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561/1/1。

② 1938年7月28日阿里·姆威尼马迪给首席部长的信，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6027/1。

③ 1948年9月9日穆罕默德·朱马给非洲事务大臣的信，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6027/1/37。



土著当局的劲敌。

其他部族团体只由少数技术工人当领导。这些团体企图保持高人一等的地位，往往倾向于不同其他社团来往。坦噶青年同志俱乐部就是这样一个组织。据1958年的记载说，“在达累斯萨拉姆，坦噶人自行脱离非洲群众，他们建立了俱乐部，在里面跳欧洲舞、姆贝尼舞或本地民间舞”。<sup>①</sup>这种上层分子的优越感，受到其他城市居民的批评。最直接关心非洲人团结的是同亚洲人争夺非洲主顾的零售商人。正是他们在1934年成立了这个城市野心勃勃的组织“非洲人商会”。这个商会是由一个名叫埃里卡·菲阿的干达族商店老板领导的，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读过美国黑人领袖马克斯·加维的许多泛非主义著作以及英国独立工党的出版物。菲阿的商会是为“从事商店和市场买卖的斯瓦希里人建立的组织”，<sup>②</sup>开始时有四十八个会员，其中店主十六人，摊贩三十二人。1935年，菲阿计划在内地建立分会。他在1936年把这个组织变成福利协会，非洲人可以按3%的利率把他们的积蓄存在协会。这个协会对于“凡是因病或因事故在医院或别的地方死亡而在达累斯萨拉姆没有亲属的非洲人，不论他们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异教徒，一律承担丧葬事宜”。<sup>③</sup>

① 登载在1938年11月4日《祖国报》上的A. B. 拉马德哈尼的来信。关于“姆贝尼”一词的意思，见本书兰杰教授所写的一章。

② 《“非洲人商会”1934年在达累斯萨拉姆的第一号公告》，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2444/1/26。我感谢J. M. 朗斯代尔博士为我提供有关埃里卡·菲阿长老的材料。

③ 1936年3月16日菲阿给诺思科特的信的附件：《坦噶尼喀非洲人福利与商业协会章程草案》，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2444/1/46—47。



(九)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席尼雷尔 1958 年在法庭上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情况。(达累斯萨拉姆非洲民族联盟总部供稿)



(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 1964 年 4 月联合共和国成立庆祝典礼上将共和国两部分（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土合在一起，象征联合的成功。(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闻处供稿)



(十一) 1967年2月,达累斯萨拉姆学生举行拥护《阿鲁沙宣言》的示威游行。(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闻处供稿)



(十二) 总统接见一群从阿鲁沙步行到达累斯萨拉姆表示拥护《阿鲁沙宣言》的青年人;已故的塞斯·本杰明(Seth Benjamin)也是这次行军的参加者,他在到达达累斯萨拉姆之前在途中去世。(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闻处供稿)

菲阿的野心不限于办理葬礼。店主的商业利益促使他很快地吸取了同一时期的克莱门斯·基扎在布哈亚得到的教训，这就是殖民制度本身对于超过一定限度的改良是一种障碍。菲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在坦桑尼亚强烈地、公开地发表这种见解的第一个非洲人。他在1937年创办的出色报纸《祖国报》(副题为《文明的关键》)，反复地向读者宣传这样的观点：有效的改良需要政权，需要经济与教育的进展。菲阿在他的福利协会章程中写道：

“鉴于立法议会中没有非洲代表，本协会作为维护坦噶尼喀领地一切非洲人福利的中心机构，将密切注视政府提出的可能影响非洲人的任何法律，经过适当考虑之后，将派出代表向政府和立法议会议员提出本协会认为符合非洲人利益的意见。……每个非洲人，无论其是否缴纳会费，都有义务服从本协会，正如他要服从政府一样。”<sup>①</sup>

菲阿反映了坦桑尼亚城市新出现的激进主义思潮，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得不到什么支持。甚至他的早期伙伴也被他的政治活动吓坏了，政府则极端仇视他。总督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个身世不明的店主……他来自乌干达，提出了玩弄权术和口气恶劣的章程，它是同个人自由和政府对人民的职责不相容的，它还流露出扩大势力和获得捐款的欲望。”<sup>②</sup>当协会无法

<sup>①</sup> 1936年3月16日菲阿给诺思科特的信的附件：《坦噶尼喀非洲人福利与商业协会章程草案》，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2444/1/46—47。

<sup>②</sup> 麦克迈克尔，1936年6月26日会议记录，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2444/1/69。

克服这种冷淡和敌意的混合物时，菲阿就在1939年放弃了它。后来，他在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工人中做工作，后者很快就成为城市政治的主要问题。

达累斯萨拉姆工人的第一批行业组织是福利会，它的性质十分类似那些以部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福利协会。例如，1937年大约有四十个码头工人（其中三人了解南非类似组织的情况）成立了“非洲人工会”。会员每月缴会费一先令，他们可以得到疾病、困难和失业补助。工会的章程要求“每一个会员学会读和写”，为此，工会将聘请一个教员，同时每一个会员必须“不声不响地服从雇主”，“为了不迟到，应当在规定的時間以前上班”。<sup>①</sup>这种形式的友谊社团在有进取心的工人当中大概要比现在所知道的更为普遍，但是它遇到了埃里卡·菲阿遇到的同样问题：殖民结构对于一个勤奋的码头工人的收入，同对于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商人的利润一样，都定下了改良的限度。菲阿的回答是要求政治代表权。工人的回答是举行罢工。

无疑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西沙尔麻农场和其他地方曾经发生过地方性的罢工。1924年有记载的一次罢工是奎罗传教会细木工的罢工。坦桑尼亚的第一次大罢工是1937年坦噶市二百五十名码头工人的两天罢工。两年后，达累斯萨拉姆、蒙巴萨、坦噶和林迪的码头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达累斯萨拉姆的罢工持续了八天。这次罢工

<sup>①</sup> 1937年8月7日姆里肖·苏达尼给首席部长的信的附件：《非洲人工会章程》，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14/14/1—2。

的主要参加者是临时工人，他们的要求包括：每日工资增加到两个先令，中午休息，疾病津贴和事故赔偿金，工头不得虐待工人。他们抗议道：“我们不愿意在劳动时间内被脚踢、手推或挨骂。”<sup>①</sup>雇主们拒绝作任何让步并以招募新工人相威胁，因而工人们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收获就复工了。四年后，码头工人再次罢工，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和更加有纪律。这次罢工遭到了殖民当局的全力镇压。罢工从1943年8月23日开始，当时有八百名工人起来要求改善待遇。临时工要求每天工资三个先令；长期工要求每月工资四十到四十五先令，生病工资照发，还有养老金，每天一顿免费午餐，每年十四天假期，按战时物价发给生活费用补贴。罢工两天后，县专员以援用国防条例相威胁，根据该条例，码头工作属于要害部门，一切劳资争端必须提交仲裁。罢工工人不顾威胁，抵制了县专员召集的第二次会议。政府当局任命了一个调查法庭，但是工人们仍不复工。到了8月28日，他们对市政府当局表现了公开的敌视。省专员写道：“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个人对着头人喊道：‘现在捣乱的是苦力，下个星期你就得对付厨师了’。”<sup>②</sup>十天后，当大多数码头工人仍继续罢工时，政府援用了国防条例开始逮捕罢工工人。一百零三人被判刑，缓期执行。与此同时，法庭提出报告，建议给熟练工人增加相当数量的工资。工人们在罢工两周之后复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sup>①</sup> 引自“达累斯萨拉姆全体苦力”1939年7月19日给达累斯萨拉姆县公署的信，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679/5。

<sup>②</sup> 引自贝克(P. C. 伊斯特恩)笔记，1943年8月28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679/32。

胜利。

码头工人的斗争精神影响了达累斯萨拉姆的其他工人。当1943年码头工人罢工还在进行的时候,一群家庭仆人也扬言,除非为他们成立一个职业介绍所,否则他们也要罢工。这个威胁没有实行,但是它使家庭仆人第一次建立了组织。1944年1月成立了“欧洲人的仆役工会”,它要求固定的工资和固定的工作时间,周末休息,给退职金和建立由工会控制的职业介绍所。3月,领导人一无所获,至于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极端沮丧和牢骚满腹。”<sup>①</sup>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于1945年2月同首席部长举行了一次会谈,这个工会的主席沙勒赫·本·丰迪在一次有二百名会员出席的会议上讲了会谈的结果:

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们的建议……他们将得到一位能够……执行他们命令的欧洲人的协助……沙勒赫继续说:“你们现在高兴吗?”群众回答说:“我们高兴。”

沙勒赫说:“是的,当局有两种处理事情的方法,一好一坏,如果他们选择后者,他们在下一次叫我们去的时候,把全体委员都监禁起来,并对我们说,我们把你们带上了邪路,你们怎么办?”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将拒绝工作。”

“不,”沙勒赫说:“如果你们不懂得,我可以告诉你

---

<sup>①</sup> 引自1944年3月13日赛义迪·库帕库帕等人给P.C.伊斯特恩的信,坦桑尼亚国家档案61/679/1/18。

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所有的人,受欧洲人和印度人雇用的仆人,应当去见首席部长,要求把你们监禁起来。”<sup>①</sup>

这是姆比鲁示威(消极抵抗)年头的做法。参加上述两次事件的人都有着新的团结精神,有着自从马及马及起义以来从未有过的群众性支持。仆役工会的章程说:“会员不得接受雇主们付给的低工资,每个人应当记得,别人遭遇到的事必然会轮到自己身上。”<sup>②</sup> 如果达累斯萨拉姆的所有家庭仆人都自愿入狱的话,英国人确实会陷于困境。

在城镇和在农村一样,改良的渴望促进了组织,组织带来了团结。人民越来越下定决心,不仅要学习和请愿,而且要采取行动。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协作和领导。

## 团结的理想

马及马及起义以后的四十年间,坦桑尼亚人为解决各部族中的愚昧无知问题而斗争。本章把这个斗争称为用教育和发展经济的手段来推动改良的运动。坦桑尼亚人认识到改良需要有组织,于是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团体以促进改良。组织起来以后,同一组织的成员之间就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戏剧性地表现在罢工以及象姆比鲁事件一样的农村示威。

<sup>①</sup> 引自情报消息:《1945年2月13日(星期二)在姆布尤尼—瓦—西姆巴—姆韦内举行的土著家庭仆人会议》,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61/679/1/32。

<sup>②</sup> 《这就是我们仆役工会的章程》,1944年1月16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61/679/1/15。(《Hizi ndizo Sheria za Chama Chetu cha Maboi》)



这些罢工和示威还表明,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争取改良的斗争使坦桑尼亚人同殖民结构发生冲突,后者越来越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障碍。但是为了促进改良而成立的组织都是地方性的小团体——几百个或千把个种经济作物的农场主,一个城市中同部族的成员,或者是同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这里,坦桑尼亚人面临着他们社会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即不团结的问题。现在是提出他们在改良时代怎样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讨论不团结的问题要比讨论愚昧无知的问题困难得多。愚昧是一个摆在眼前的切身问题。每一个人对它都多少能够有所作为。不团结的问题却是一个比较含糊和隔得远一些的问题,是不可能由任何个人来解决的。而且,也没有样板可以仿效。试图解决愚昧无知问题的人至少有殖民统治者的财富、权力和教育作为目标。而为不团结所烦恼的人,却必须在几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团结?他可以致力于本部族全体成员的团结,也可以强调一个城镇内所有部族的团结,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所有部族的团结,或者是坦桑尼亚、东非甚至非洲全体人民的团结。当然,一个人可以说,他要的是所有这些形式的团结,而且当时多数人也正是这样说的。但是,只要人们要的是所有这一切东西,那么团结就只是理想,或梦想。要使理想成为现实,人们必须组织起来;而当他们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确定组织起来的以及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团结。因为,一个想要团结东非全体人民的人,同一个想要团结全体扎拉莫族的人,他们需要

的组织是不一样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坦桑尼亚人决定了他们首先要的是那一种团结。他们决定要全领地的或民族的团结，也就是把住在受英国统治的、被称为坦噶尼喀的这块殖民地上的所有人团结起来。许多人后来还想要其他种类的团结——东非的团结或者非洲的团结，然而全领地的或民族的团结被摆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这个选择是自觉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是非这样选择不可。早些时候的坦桑尼亚人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例如，“马及马及”的呼吁，并不是作为坦桑尼亚人对坦桑尼亚人的呼吁，而是作为非洲人对非洲人，对全体非洲人和全体黑人的呼吁。它答应说：“柯列洛神会保佑他的黑人孩子们。”历史学家应当解释，坦桑尼亚人怎样和为什么决定要致力于全领地的团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特穆博士将在本书后文中谈论这个问题。本章只论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些坦桑尼亚人怎样逐渐地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殖民地看成未来的独立国家，以及他们怎样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把自己组织起来。

为了把这个殖民地看做是一个未来的国家，一个人必须有双重的经历。首先，他必须抛弃只效忠本部族的思想。其次，他必须同具有全领地规模的一些机构或组织发生密切联系，这些机构或组织把这个殖民地看做是单一的政治单位。许多坦桑尼亚人有过第一个经历。例如，奴隶一般总是脱离了他所属的部族，因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不再只效忠于原来的部族。周游甚广和感到自己属于伊斯兰教国际大家

庭的伊斯兰教教师，也会有同样的变化。非洲宗教的巫师和“马及马及”的巫师们一样，会以为神在召唤他向全体非洲人发出呼吁而不问其属于什么部族。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或甚至没有人有过第二次经历，这就是同一个全领地性的机构发生密切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唯一的全领地性机构是殖民政府。同殖民政府联系最密切的是那些为它工作的非洲公务员。正是这些公务员首先开始把坦噶尼喀当作一个未来的独立国家来考虑，正是他们首先具有领地的或民族的意识。

第一批已知的领地公务员是教师、职员和德国人统治后期为德国当局效劳的“阿基达”。“阿基达”在坦桑尼亚历史上的名声很坏。他通常被描绘为奴隶贩子的、阿拉伯人的或混血种的儿子，拿着鞭子，恐吓和剥削受他统治的人民。许多“阿基达”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马及马及”起义以前尤其是这样。但是在德国人统治的后期，“阿基达”通常是一个非洲人，一个受过教育、懂得斯瓦希里语的青年人，就象现代的分区执行官一样被调来调去。其中有些是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内地人，但更多的是沿海地区的人，因为德国政府在那里开设了训练职员和“阿基达”的学校。这些学校中间，最好的是1892年在坦噶开办的学校。在德国人统治的后期，坦噶学校训练出许多青年人当公务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全国各地的“阿基达”。例如，姆达奇·沙里富是出身在坦噶附近的塞格朱人，他到这个学校受教育。在德国人统治的末期，他成为桑格阿的“利瓦利”。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但问题

是清楚的：德国人建立了由受过教育的青年非洲人组成的领地文官制度。

关于这些“阿基达”的观点，人们知道得很少。如果德国人继续留在坦桑尼亚的话，这些人可能会是第一批有全领地观点的人。事实上，正当德国人手下的公务员在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时候，德国人被赶走了。取代他们的英国人怀疑这些公务员。而且，德国人手下的公务员只学过一种欧洲语言，他们自然是学的德语，而德语对于新的统治者是没有用处的。因此，英国人就物色懂得英语的非洲人。这种人是找得到的。他们大多数是英国教会特别是中非大学传教会训练出来的。中非大学传教会办的主要学校是设在桑给巴尔基温加尼的圣安德鲁学院，英国人雇用的许多非洲人就是这个学校训练的。基温加尼是坦桑尼亚的第一所大型学校。它建立于1869年，学生来自中非大学传教会分布在大陆各地的教区。它是为训练牧师和教师而建立的学校。学生上四年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文科课程。在1900年以前，它可能是东非条件最好的学校。学生来自许多不同的部族，他们接受英语训练，尽管他们多数是德国属民。他们又是伊斯兰教社会中的基督徒。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互相通婚，互相交往，互相成为对方子女的教父教母，并且在东非各地担任受人羡慕的工作。德国人很少雇用他们，但是当英国人接管了坦噶尼喀时，这些从基温加尼出来的人们就成群地回到这个国家来了。曾经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工作过的马丁·卡扬巴，成为坦噶省政府的主任秘书。在桑给巴尔当过

牧师的萨姆威尔·奇朋德成为达累斯萨拉姆高等法院的翻译官。在奔巴教过书的莱斯利·马托拉成为达累斯萨拉姆政府学校的首席非洲教师。他的兄弟塞西尔·马托拉原来在肯尼亚一个殖民者农场当木匠，很快也到这个学校来和他共事。到 1925 年，在英国人的文职机关中，最好的职位大多由基温加尼出来的学生担任。

这些人形成了坦桑尼亚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集团之一。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主张改革的人，专心致志于教育，深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们能说会道，见闻广，阅历多，并决心保卫公务员的集团利益。同时，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英国人。英国人教育了他们，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从德国人的俘虏营中释放出来，并给了他们职业和机会。正因为他们同英国人如此关系密切，如此高度地评价英国政府，所以他们想同新政府结成联盟来实现他们国家的现代化。1922 年 3 月，卡扬巴和他的同事在坦噶成立了一个叫做“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的组织。这是他们打算在全国各地成立的许多公务员俱乐部的第一个。这些俱乐部要通过开设图书馆、购买报纸、教授英语来帮助会员取得进步。这些俱乐部将联合起来保护公务员的利益。这些俱乐部的更大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的启蒙和改良的中心：

人们说，团结就是力量，除非非洲人终究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们的前途将是暗淡的。我们的协会将给予入会的每一个非洲公务员下列的好处：（甲）密切的友谊；

(乙)根据当代文明的伦理提供免费的阅读材料和在社会上取得进展;(丙)运动员精神。<sup>①</sup>

坦噶俱乐部成立时有会员约四十人,开辟了一个阅览室。它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达累斯萨拉姆也成立了一个分会,但卡扬巴不久发现这个协会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是一个骄傲的、野心勃勃的、正派的和非常能干的人,后来在达累斯萨拉姆秘书厅担任高级职务。1931年,他被遴选为坦桑尼亚知识界的代表,向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陈述关于建立东非领地联盟的意见。后来他再度访问欧洲。他的欧化习气以及他对本国“未开化的”同胞的傲慢和蔑视,使许多坦桑尼亚人非常憎恨他,对于象埃里卡·菲阿这样的激进派来说,

……马丁·卡扬巴在他们的记忆中将是一个在政府机关中晋升到最高地位的自私自利的非洲人,但是对他的部族却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孤立的人终于以在坦噶县喂养家禽结束了他的历史。我们并不是怀恨在心,我们只是认为他从来不理睬他的非洲弟兄,很少了解他们。……我们许多人都没有忘记,卡扬巴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一个曾经有机会去伦敦执行政治使命的人,但却把他的时间花费在游览和参加茶会……。<sup>②</sup>

---

① 卡扬巴:《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1922年度报告,坦噶》,坦桑尼亚国家档案3715/4。(H. M. T. Kayamba: «Report of the Tanganyika Territory African Civil Service Association, Tanga, for 1922»)

② 引自1940年6月29日《祖国报》。

这一段话反映了人们对于改良所引起的分裂的全部愤恨。卡扬巴的确是他那个时代的野心、精力和不平等的化身,但是他也是同时存在的团结愿望的化身。这种愿望最先是基温加尼出身的拥有特权的公务员们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卡扬巴计划成立一个由各酋长和知识界组成的全领地非洲理事会,在有关全国非洲人的各方面利益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建议。1931年卡扬巴会见英国议会委员会时,委员会问他:

可不可以说,在坦噶尼喀各地有一种爱国主义意识,或者说,除了爱他们的部族地区或部族以外,还爱作为一个国家的坦噶尼喀?

〔卡扬巴:〕我可以说有这样的感情。当酋长们来到达累斯萨拉姆会见非洲知识界时,他们一致同意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中央理事会。<sup>①</sup>

这个计划毫无结果。不久卡扬巴成了一个职位很高的文官,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了。

在卡扬巴的一生中,他那种从全领地的角度看问题的思想只有很少的拥护者,然而团结的理想依然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建立了“非洲人协会”。这是为了用一个组织来体现团结的理想而进行的努力。它是一个在坦桑尼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团体,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非洲人

<sup>①</sup> 《联合特别委员会论东非联盟》,第2卷,1931年伦敦出版。(《Joint Select Committee on Closer Union in East Africa》)

协会的发展，坦桑尼亚人才开始有国家观念。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前公务员协会会员于1929年末（时间不很确切）在达累斯萨拉姆组成的。第一任主席似乎是当时达累斯萨拉姆的基温加尼集团的领导人塞西尔·马托拉；副主席是人数众多的扎拉莫族领导人拉马达尼·阿里；书记克莱斯特·赛克斯·普兰坦同城里闻名的前非洲雇佣军的上层人物有亲戚关系。这样，协会就把公务员同达累斯萨拉姆市区的领袖人物结合在一起了。协会的成立本来是为了表达非洲知识界对于建立东非领地联盟问题的意见，但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这更重要得多的团体。协会的名称和行动都表明，它的抱负是要用现代的形式来表达团结的理想。它是非洲人的协会，它的成立是“为了维护非洲人的利益，不仅是维护这个领地的非洲人的利益，而且是维护整个非洲的非洲人的利益。”<sup>①</sup>它的章程宣称它有权以团结的名义发言。它宣称：“达累斯萨拉姆商业界的领袖有权在他们愿意的任何城市设立协会的分会。”后来的章程把这个协会的抱负说得更加具体：“所有在非洲成立的和属于非洲人民的协会，它们的父亲就是非洲人协会。”<sup>②</sup>实际上，协会在1929年至1945年之间完成了三件重要事情。第一，它使团结的理想持续下来，并且使它自己能继续成为这个理想的合情合理的体现者。第二，它同国内几个地方的改良组织进行了联系，并为争取它们的目标开始提供某种协作。第三，协

<sup>①</sup> 劳逊·瓦特茨答《坦噶尼喀旗帜报》记者问，1930年10月14日。

<sup>②</sup> 引自《非洲人协会》，该书有1933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和1935年在桑给巴尔出版的两种译文，内容出入很大。



会逐步地把力量越来越集中于全领地性的事务。因此，到了1945年，它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坦桑尼亚的机构，负有在政治上把坦桑尼亚人民组织起来的责任。协会这几年的历史总结了改良运动为这个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变化。

协会成立后头两年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活动。它在达累斯萨拉姆建立了一所俱乐部，地点就在新街，到1930年10月共招收了大约两百名会员。它力促任命一名非洲人担任城镇的地方长官以改进城市的行政管理，但没有成功。它还开始实行它的主张，要使自己成为非洲人现代政治活动的合情合理的中心，并试图同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保持接触。这个企图看来也失败了。最后，它写信给殖民大臣，想参与关于东非领地联盟问题的争论，但是当局坚持不许公务员参与政治活动。这些失败使协会于1931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只剩下一所俱乐部和少数会员。协会的孤立使它成为人们指责“上层主义”时的对象。有一个批评者写道：“非洲人协会由于会员人数太少，现在已不能代表非洲人，因此非洲人不再信任这个协会。”<sup>①</sup>协会还为了使自己有权成为公认的非洲人的真正代言人而同菲阿的组织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以后，非洲人协会还继续存在，而菲阿的组织却消失了。但是这些愤怒的和不体面的争吵，使人们更加失望了：

当我们还有非洲人协会、福利协会和非洲社团作为分散的单位进行活动的时候，我们怎能希望取得什么进

<sup>①</sup> 引自伊迪·萨林致首席部长信，1936年8月26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22444/1/98。

步呢……这些不可救药的团体，由于它们的不友好的状况和立场，已失去了所有住在达累斯萨拉姆以外的人们的承认。如果一个非洲人有理由对他的坦噶尼喀的非洲同胞鼓吹团结，那末，他也同样有理由鼓吹打碎现有的这两个“协会”……这些协会未能履行它们对社会应尽的责任。<sup>①</sup>

这个时候，非洲人协会要不是它的分会使它恢复生命的话，是会要垮台的。这些分会有的从首都调往外地工作的前委员建立的，有的是省里的头面人物被协会的名字及其自称代表全体非洲人的声明所吸引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1939年以前成立的九个或十个分会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分会如多多马分会是公务员的小集团，正如它自己所承认的，“许多人讨厌它”。<sup>②</sup>第二种类型是原为部族的组织，例如布科巴哈亚人联盟，1935年改名为非洲人协会分会。与此相对照的是巴加莫约分会，它是由三个汽车司机、一个旅馆老板、一个渔民和两个农场主组成的。桑给巴尔分会担负了恢复整个协会的任务。它成立于1934年，目的是要把受过教育的非洲基督徒同非洲穆斯林联合起来。1939年3月，桑给巴尔分会书记邀请达累斯萨拉姆、多多马、奔巴、冈多亚、辛吉达和姆普瓦普瓦等协会的主席参加5月间在桑给巴尔举行的

<sup>①</sup> 《不要打草惊蛇》（作者署名“一个艾格雷人”）载于1939年1月14日《祖国报》。（Let Sleeping Dogs Lie, by an Aggrey.）

<sup>②</sup> 阿米里·赛义迪和姆万戈西给中央专员的信，1937年5月18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325/1/55。

“非洲人协会东非地区主席联席会议”。没有任何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的材料，但是它使协会的达累斯萨拉姆总部有了新的生命。协会于1939年末宣称，“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协会)将给予它的许多捐助者无可比拟的机会，使他们在国内成为有用的和受尊敬的公民，它(协会)保证通过稳健和耐心的努力使坦噶尼喀人和他们的西非兄弟平起平坐”。<sup>①</sup>目的仍然是改良，但是要求的迫切性和同西非进行竞争的思想却是新的。另外一点新内容是强调协会的全领地规模。1940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第二次全领地代表会议，再度强调了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决议写道：

(英王)陛下政府应当考虑成立省委员会和省际委员会的可能性，使非洲人可以在这些委员会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一句话，我们现在要求在政府中有发言权。这就是，现在应当让非洲人有机会代表自己的国家说话。<sup>②</sup>

除了象马丁·卡扬巴和埃里卡·菲阿这样的个人发表的那些得不到支持的意见以外，这个决议也许是第一次真正表达了坦桑尼亚的民族觉悟。这两次会议是坦桑尼亚最早举行的全领地性非洲人会议。看来，这两次会议使协会意识到共同的苦难和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在坦桑尼亚第一次存在一个接近于全领地规模的非洲人的机构。协会刚成立时，曾

① 《非洲合作协会》，见姆恩谭博给总督的信，1940年2月26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325/2/7。

② 1940年5月11—16日决议，见姆齐·苏迪和姆恩谭博给总督的信，1940年8月3日，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28944/1。

经提出含糊的“非洲主义的”宗旨：“维护非洲人的利益，不仅维护这个领地的非洲人的利益，而且维护整个非洲的非洲人的利益。”随着协会组织上的发展，它也规定了要以它的组织所包括的地区，作为它进行活动的中心。由于它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是全国性的会议，它也就开始提出了全国性的目标。

“要求在政府中有发言权”是一回事，达到这个要求却是另一回事。这需要行动。布科巴哈亚人联盟可以对酋长的独断专横提出抗议，但只有当人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酋长们才会让步。帕尔人不喜欢累进税，但是只有群众的示威行动才能够取消它。码头工人可以对低工资感到不满，但是只有举行罢工才能够改善待遇。这就是1945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泛非代表大会所得出的结论：“今天，采取有效的行动的唯一道路就是——组织群众。”非洲人协会在同一年也开始得出同样的结论。

1945年3月，非洲人协会在多多马举行第三次全领地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基戈马、姆万扎、欣廷加、辛吉达、冈多亚和巴希。他们讨论了协会的许多例行问题：教育，农业和商业的职业教育，由非洲人担任地方长官，白人居住的地区，托管地和东非领地联盟。他们还第一次讨论了下面一个问题：“应当作出努力使全体非洲男人和女人都加入非洲人协会。”<sup>①</sup>他们的结论是不明确的，但是会议的一个文件表明了当时流传的想法：

<sup>①</sup> 引自《将于1945年3月29日在多多马举行的非洲人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议程草案》，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325/2/166。

每个省的主要城市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非洲人协会,作为该省的总部。它的责任是在全省,在每个县和每个城镇设立分会,并帮助已经建立的协会。<sup>①</sup>

这是坦桑尼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全领地范围内建立系统的群众组织。

改良的时代即将结束。它起始于试图解决非洲各部族的愚昧无知和不团结的问题。殖民统治和传教会的教育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坦桑尼亚人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它们,并利用它们来改进他们的部族和改进自己。但是他们发现,当改良超出某种限度时,就会使他们同殖民政府发生冲突。改良还使某些人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好处,人与人之间以及部族与部族之间发生了分化。但是团结的理想依然存在。在非洲人协会中,当代最有能力的一些人表达了这个理想。现在,在 1945 年,这个理想被解释为实现全领地的团结的愿望。协会开始考虑如何能够最好地把人民组织起来以实现这个愿望。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改良为非洲人实现团结提供了新的理由和新的手段,但是它也在非洲人中间造成了新的差别:教育和财富的差别;文化和信仰的差别。这些就是从 1945 年开始在坦桑尼亚创建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们所遇到的问题。

<sup>①</sup> 引自《在多多马举行的非洲人协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记录》,坦桑尼亚国家档案 19325/2/18a。尽管标题是这样,文件并不是以记录的形式发表的,而大概是由姆齐·阿里·朋达和姆齐·哈桑尼·塞勒马尼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写成的,他们大概同驻伦敦的泛非大会领导人书信往来,这是阿·穆塔哈先生向我提供的情况。

## 第七章 思想交流 (1850—1939年)

特伦斯·兰杰

一百五十年来坦桑尼亚人民的眼界无疑扩大了很多。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的世界上，并且意识到他们同这个广大世界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这些过程是坦桑尼亚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发展。

这些过程中往往出现激烈的事变。许多人由于外力而改变了生活和扩大了眼界。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奴隶，他们被强迫离开自己的部族到沿海的种植园去干活。这样的人必然要接受新的风俗习惯和新的服装，必然会扩大眼界。而且他们不仅接触到沿海文化，也同来自内陆各地的非洲人建立联系。这个过程决不是本章好意的标题“思想交流”所能充分表达的。殖民地时期发生的其他变化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工人只不过是比奴隶稍微自由一点的人。许多变革都是非自愿的和令人迷惑不解的。有些人的眼界虽然扩大了，但是他们往往并不了解更大范围的事情，甚至也不了解传统社会那个小天地里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这一切都是事实。坦桑尼亚独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

改变这种状况,要恢复和扩大了解、选择和控制,要把殖民时期的一些非自愿的变革改变过来。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坦桑尼亚人并不是完全听任入侵者(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摆布的,他们接受他们部族社会中的变化,也不是完全被迫和毫无选择或毫无主动的余地的。非洲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主动实现了许多变革和扩大了眼界。坦桑尼亚人自己创立和传播了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同时也从别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而且坦桑尼亚人所接受的外来思想,有一些并不是来自阿拉伯人或欧洲人,而是来自刚果或马拉维的非洲人。现代坦桑尼亚的生活方式,是一系列十分复杂的影响和自愿的选择与非自愿的变革所构成的混合体。

本章打算谈论思想的交流,但也绝不忽视武力的作用。当然,本章不打算谈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坦桑尼亚的所有重要思想;不谈论国家建设和军事革新的思想,这方面的问题在安德鲁·罗伯茨所写的一章中已经谈到了;也不详细谈论民族主义者及其先驱们的正统思想。本章要谈论的思想大部分是含义很模糊的和未经整理的。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宗教的思想,有的是关于如何利用一种新植物或一种新原料的具体思想,有的是关于诸如舞蹈和音乐形式之类的思想。其中有一些思想是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或非洲的巫师,或巫医的使者带来的,他们到坦桑尼亚来的目的就是传播这些思想。有一些思想则是由那些主要关心施展自己专长的人们,例如求雨巫师带来的;或者由有专门技能的各行各业的现

代专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带来的。有一些思想是装在来往旅客的行李包里带来的，这些人并不是专门想要传播一种思想，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带着思想在旅行。这方面的明显例子就是十九世纪的坦桑尼亚商人。在有些传教士、专家、商人中间有坦桑尼亚人，他们把思想传播给其他坦桑尼亚人或其他非洲人，有一些则是来自坦桑尼亚以外的阿拉伯人、欧洲人或非洲人。

但是思想不一定总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思想可以通过手来传播，更有效的是通过嘴来传播；从市场到市场，从村庄到村庄，从集团到集团。思想好比商品。我们通常认为商品是沿着坦桑尼亚在十九世纪所开辟的大商路运送的。但是商品也可以从村庄到村庄，缓慢地走过漫长的路程。思想也是这样。

因此，本章不是谈论欧洲人所说的思想史，也不是谈论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本章谈的是思想及其传播情况。

本章将从十九世纪谈起。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十九世纪以前坦桑尼亚就没有思想，或者没有思想交流。远非如此，本书前几章已经谈到早期的思想交流。在石器时代，技术革新的传播也许是最完全的。在铁器时代，来到坦桑尼亚的许多移民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动物、物资和新的观念。但是，十九世纪有两件事和过去不同，一是我们对它知道得更多了，一是出现了新的扩大眼界的形式。过去，人们常常经过长途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定居。到了十九世纪，除了上述这种移动外，留



在原来住地的人们也能够知道其他地区人们的情况，并且知道自己同他们的关系。许多人开始懂得，他们同别的社会和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自己的部族社会到远处去再回来的人，比过去更多了。住在新地区的移民同他们的家乡也保持着比以前更加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个过程的概况，本书前几章已经谈到了。我们已经知道，东非内陆的人们如何主动开辟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远途商路，这些商路不仅使现在的坦桑尼亚同沿海联系起来，而且同刚果、赞比亚、马拉维、肯尼亚和乌干达连接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坦桑尼亚各族人民怎样沿着这些商路西进，越过坦噶尼喀湖，进入加丹加，同以西海岸为起点的远途商路连接起来。我们已经知道，虽然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沿着这些商路涌进内地，然而主动权大部分始终保留在瑤人、尼亚姆维济人和卡姆巴人手中。

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所有的关于扩大眼界的证据，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来自欧洲旅行者的评论，来自口头传说，甚至来自宗教仪式。例如，利文斯敦有一篇报道谈到隆达的卡森贝王国。它位于现今赞比亚的鲁阿布拉河谷，周围居住着尼亚姆维济族移民和坦桑尼亚商人。1868年在国王的兄弟举行的一次公开招待会上，利文斯敦听到一位音乐家宣称：“我到过赛义德（桑给巴尔苏丹）那里，到过米雷普特（葡萄牙总督）那里，到过大海。”<sup>①</sup>同样，约翰纳·阿布达拉根据瑤族的传说，告诉我们十九世纪下

<sup>①</sup> 利文斯敦：《利文斯敦最后日记》，霍勒编，1874年伦敦出版，第1卷，第305页。

半叶的情况：

瑶人是伟大的旅行者，他们常说：“知道外国的人是值得结识的人。”甚至在乡村的广场，主要的话题也是旅行。人们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倾听知道其他国家情况的人讲话，人们高兴地听得入神，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有时惊奇地说：“天呀！你真了不起！啊！你见的世面真多哇！”人们会相信他讲的一切。一个没有外出旅行和到过别的国家的人，在这个广场不能参加交谈，只有一声不吭地坐着，大家会嘲笑他说：“这个家伙的名字叫留在家，他老是呆在村子里，连一个外国也不知道！”大家会把他看做是一个傻瓜，他说的任何事情都会遭到人们的反驳：“不，这个家伙知道什么国家？这是谎话，他只不过是一个草包。”<sup>①</sup>

社会学家汉斯·科里关于恩泽加县的记载说，在祭祀母系祖先的仪式上，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对异邦及其与本国的关系的关注。人们可以看到在布曼加典礼上所用的物品来自四面八方。“布曼加从东西南北得到他们的财富，有来自南方的金属，来自西方的锄头和其他工具，来自东方的布匹和来自北方的牛及其他牲畜”。主持典礼的祭司向这些地区在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代表人物祷告。他向东方的桑给巴尔苏丹祝祷说：“你，赛义德·巴加什，我们的‘坛比果’（典礼）所用的许

<sup>①</sup> 阿布达拉：《瑶族》，1919年威巴出版，第28页。（Y. B. Abdallah: «The Yaos»）

多物品,如串珠、布匹等等,来自你的王国。”他向西方的卢旺达国王祝祷:“卢欣达,你赐人以健康。从你的王国我们得到了锄头。今天,请你帮助,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他向南方召唤创造了这种仪式的一个神话中人物(据说他的坟墓在南乌菲帕):“马莱马,你住在岩石洞窟,从那里我们得到了典礼使用的工具——红铁(铜)。”<sup>①</sup>

沿着这些交通路线流动的不只是串珠、布匹、牛和铜,而且还有思想。多数的历史书使人以为,这些思想只是来自沿海;是由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从沿海带到内地来的。当然,这两种印象部分地是正确的。在十九世纪,东海岸的确名声很大,而内地那些开辟并控制着许多商路的强悍的部族,经常努力仿效沿海地区的思想。瑤族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好的例子。瑤族的传说告诉我们,马坎吉拉的人民如何模仿阿拉伯人制造独桅商船(在马拉维湖);还有,他们种植椰树也是为了使湖岸和海岸相似。瑤族的传说还告诉我们,瑤族酋长马塔卡“迁居姆洛伊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村庄,种植了在海岸生长的芒果树。芒果树发芽了,长得很好。他高兴地说:‘啊!现在我已经改变了瑤村的面貌,使它和沿海相似。现在我可以自己的家里吃到沿海的甜蜜果实了。’”<sup>②</sup>

沿海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到内地来的时候也确实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风气和农作方法。约瑟夫·汤姆森在叙

---

① 汉斯·科里:《布曼加札记》,见《科里文件》,第137,153页,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

② 同上书,第43—44页。

述坦噶尼喀湖东岸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居住的乌季季镇时，有一段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写道，这个镇“同在姆利马的海岸村庄没有什么两样”。他还写道：乌季季的房子“差不多表现了非洲建筑的各种样式——大屋顶的印度式平房，扁平屋顶的有走廊的房子，斯瓦希里人的屋前有凉台的方形小屋以及大部分土著居民的各种混合形式的蜂窝式小屋”。<sup>①</sup>

当殖民地时期进一步扩大了交流的规模时，那些熟悉沿海地区和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商路的人们确实比其他部族得到更大的好处。正是那些懂得斯瓦希里语的、到过本部族居住范围以外地方的人，被雇用来担任新秩序的主要代理人。

但是如果认为思想交流只限于一个方向进行，则肯定是不对的。举一件事来说，即使在內地的贸易中心出现新的生活方式，也决不仅仅是阿拉伯—斯瓦希里人影响的结果，而是经常来往于这些远途商路的所有部族互相混合的结果。史蒂文·费厄曼在说明香巴族的故都伍格哈同建立在商路通过的平原上的新贸易中心马津德的差别时讲得好：“伍格哈人都是香巴族。伍格哈是以传统宗教的一套原则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保持原有的文化，尽可能少作改革。在城里，人们只许建造一种古代式样的房子——蜂窝式房子。……整个城市的形状是按照宗教观念来确定的，城市的一半朝东方，一半朝西方，只有王宫朝南方。城市的中心是王室的坟

<sup>①</sup> 约瑟夫·汤姆森：《访问中非湖泊归来》，1881年伦敦出版，第2卷，第88—91页。

场。与此相反，马津德的居民有齐古阿人、卡姆巴人和香巴人，日常通用的语言是齐古阿语。酋长的院子里有沿海地区型式的房子。城市建造在一条重要的商路上，以便于贸易和结盟。……伍格哈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只允许进行最低限度的文化改革；而马津德则是为了贸易和结盟的利益而建设的，它是一个追求最新风尚的地方。”费厄曼写道，这两个城市的不同可归结为香巴人的“政治文化的转变”。但是，如果说马津德不是一个传统的香巴人城市，那么也不是斯瓦希里人的城市。这个城市的语言是齐古阿语。斯瓦希里语是“用来同那些以斯瓦希里语为第一语言的人通话的”。马津德确实是“新的多部族文化”的一个实例。<sup>①</sup>

如果说内地出现的新组织形式是沿海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那末内地各部族也确实给沿海带来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思想，同时从沿海带回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组织形式。甚至连尼亚萨湖和南坦桑尼亚的奴隶们也带去了他们的舞蹈和歌曲，割礼仪式，假面舞蹈家以及关于巫术和宗教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成为沿海地区的综合文化的组成部分。苏库马族和尼亚姆维济族的搬运工人，既是思想的运输者，又是象牙的运输者。

内地各部族对于解决随着思想交流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一些新问题也作出了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比他们对沿海生活

---

<sup>①</sup> 史蒂文·费厄曼：《香巴真相——十九世纪政治差别的扩大》，东非大学社会科学会议，1968年1月。(Steven Feierman: «Enlargement of Political Sca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hambaa case»)

所作的贡献更为重要。苏库马族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许多苏库马人被招募到沿海当搬运工人。他们接触到沿海的文化并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进入这个广阔天地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引起动荡不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是不能通过采纳沿海的思想来解决的。这方面的两个问题是：使同一部族社会继续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和同其他非洲部族建立关系的问题。人们从许多方面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十九世纪在苏库马族和尼亚姆维济族地区盛行的所谓秘密团体或舞蹈团体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这些团体是互助性质的协会，成立了这种团体的部族内部可以因而得到新的团结纽带。他们还使离开本部族外出的人在其他地区也受到欢迎，因为一个舞蹈团体的成员可以指望受到它在任何地方的分支组织的款待。在苏库马族地区，这些团体起了促进统一的重要作用。这些团体从苏库马族地区沿着商路发展。汉斯·科里写道：“有一段时期，在苏库马族地区，除了大量的舞蹈团体之外，玩蛇者、猎箭猪者、猎象者的秘密团体以及有关崇拜祖先和占卜的团体也盛极一时。虽然这些团体的起源不一定都在苏库马族地区，但是由于苏库马族拥有比较稠密和分布很广的人口这一有利条件，苏库马族能够建立最大的组织以及各部族间最活跃的联系。这个部族的上述活动并不局限于本地。单从人数多这一点，他们就能够大大地影响……别的地区。在通往沿海的商路上，许多地方都雇用苏库马人当挑夫。……欧洲人到来以后，他们成为铁路建设工程的重要工人。当欧洲人开办农业企业时，他们是最能干的劳动力。

在所有以上这些场合，他们同许多部族接触。他们的占卜术和其他魔术很快就给其他部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库马族的许多团体就是这样发展到各个地方去的。<sup>①</sup>

另一个更带普遍性的例子也说明了关于社会关系和部族关系的新思想是怎样出现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人们要经过异族地区前往沿海这个问题而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不是从沿海输入的，而是内地各部族的创造性能力的结果。这个例子就是一个部族同另一个或几个部族的所谓“乌塔尼”<sup>②</sup>关系。莱斯利讲了十九世纪“乌塔尼”产生的情况：“一个非洲移民所属的最大的部族社会就是他移动时所经过的那条‘路’。许多部族几十年来总是经过同一条路到城里去。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日子里，……这些部族由于必须通过异族地区，他们通过战争和袭击而发展了一种叫做‘乌塔尼’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某一条路上的各部族结为盟友。如果其中某一个部族的成员过路时死在另一个同它有‘乌塔尼’关系的部族的领土上，后者会把他当做本部族的成员一样埋葬。如果他病倒了或提出其他合情合理的要求，他在一定程度上

---

① 《苏库马札记》，载《科里文件》，第172页。安德鲁·罗伯茨在叙述关于尼亚姆维济族的秘密会社和舞蹈团体时也作了同样的论述：“象牙贸易提高了狩猎行会的重要性和名声，也给这些秘密会社增加了新的意义，使它们起互助组织的作用。因为它们的成员在远离家乡时，可以保证得到帮助和接待。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尼亚姆维济族秘密团体的特点是它们成为多部族的组织，这部分地是由于沿着商路发展组织的结果。”（罗伯茨：《十九世纪尼亚姆维济人活动范围的扩大》，东非大学社会科学会议，1968年1月）。

② “乌塔尼”(utani)，斯瓦希里语，意为亲戚关系，兄弟关系，或亲密的朋友关系。——译者

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的部族在他一生中对他的照料，将会和他在家乡受到本部族的照料一样。”当一个移民来到沿海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期之后，他就成为这条“路”的部族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个部族是由所有经过这条路的部族成员混杂在一起而形成的。莱斯利举了在二十世纪仍然起作用的一条“路”的部族社会作为例子，这就是古老的“中部地区那条道路上，沿着古代贩卖奴隶和象牙的商队走过的商路，……姆万扎、塔波拉、恩泽加和卡哈马的部族的人流。……尼亚姆维济族、苏库马族和苏布瓦族，有一个共同的代表驻在达累斯萨拉姆……分布更遥远的戈戈族、哈亚族、鲁恩迪族、干达族则同曼耶马族一样，由已故的丰迪·瓦卡蒂担任代表。”<sup>①</sup>

这里要说明的重点是，在十九世纪的所有动乱中间，在奴隶贸易引起了剧烈的变革和内地军事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坦桑尼亚内地各族人民用创造性的办法来处理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问题，使他们不仅同沿海而且同西部和南部的各族人民连接起来。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沿着这个交通网流传的许多思想，既不是产生于沿海，也不是产生于坦桑尼亚内地，而是产生于刚果、马拉维或赞比亚。许多秘密团体和舞蹈团体是在坦桑尼亚境外创建、从西面或北面传入坦桑尼亚地区的。许多新的宗教思想也是这样传入的。在十九世纪的坦桑尼亚，恐惧和动荡不安更加扩大了对巫术的迷信，酋长和其他首领往往

<sup>①</sup> 莱斯利：《达累斯萨拉姆调查》，伦敦 1963 年出版，第 33—34 页。



利用这种迷信来获得奴隶和佣仆。同时，十九世纪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努力，以恢复部族社会的统一和消除对巫术的恐惧，这种巫术的表现形式是以巫师或巫医为中心的宗教运动。这些运动反映着十九世纪社会的强烈需求。它们往往起源于刚果或马拉维，然后深入到坦桑尼亚和其他地区。

人们从十九世纪坦桑尼亚宗教思想交流的全貌的确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当然有一些宗教思想是从沿海传入内地的。伊斯兰教以及随后的基督教就是由传教士或商人沿着商路从沿海地区带进来的。许诺将来有一个新的美好世界的各种千年至福说和未卜先知的运动，是从西面和南面传来的。同时，在坦桑尼亚各个部族社会内部的宗教信仰也发生过变化，例如松佐族人，他们原来崇拜祖先，后来却崇拜某个英勇牺牲的烈士和相信他千年之后再生。

就思想和组织形式的交流而言，殖民地时期以前的十九世纪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关于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的压力如何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产生，并传向西部；关于来自南方的恩戈尼族的压力如何激发了军事和社会组织的新思想；关于新的粮食作物的推广；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开始扩张，所有这些，我们知道得很多。至于在内地各部族社会内部起作用的各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得就不多了，这些推动力量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显然不能把十九世纪看作仅仅是恐怖和衰退，看作是由殖民统治代替扩大中的混乱。正确地说，可以把十九世纪看作是扩大思想交流范围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殖民地时期大大地发展了，但是它早在这个时期以

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经有了一系列积极的反应。

当我们谈到殖民统治初期时，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欧洲统治者的到来显然意味着大量的强制性的变革以及传教士和教师等思想传播者人数的成倍增加。我下面再来谈这个问题。第二点是，强加于坦桑尼亚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打碎原有的联系和来往的形式，这是坦桑尼亚同东非和中非其他地方不同之处。例如，马拉维原来同东部和东北部的基尔瓦和莫桑比克岛建立了长久的联系，而在西部同比萨商人和卡森贝建立了联系，一直通到西海岸。因而在殖民统治之前，马拉维的交通和贸易系统都是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的。随着欧洲人的侵占，这种联系突然终止了。它同基尔瓦和莫桑比克的联系被打断了，它的新的经济和交通路线自南北上至夏尔河流域和尼亚萨湖。南罗得西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它同松纳酋长们和葡属东非商人的旧的贸易联系被打断了，它的经济受南非的严密控制。

在坦桑尼亚，控制着旧的贸易系统的集团同欧洲入侵者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白种人不得不镇压沿海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最后发展成为阿布希里起义。奴隶贸易被制止了。东非贸易系统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马夫被比利时人赶出刚果，被英国人赶出赞比亚。欧洲人瓜分非洲时，在坦噶尼喀周围划分的疆界切断了许多旧的通路。这样一来，原来横跨坦噶尼喀湖的大路上的中途站乌季季变成了终点站。同样地，原来把马拉维和莫桑比克北部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联结起来的旧的联系也被打断了。

但是必须看到，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旧的系统。欧洲人自己也沿着旧的商路来往于内地和沿海之间。德国人修建了从沿海到塔波拉的铁路，从而赋予旧的中央大路以新的价值。他们在打垮了沿海地区人民的反抗之后，立即转过来把他们当成建立新政府的盟友。于是，那些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和支配沿海地区思想的人，依然是某种变革的带头人。在德国人统治下，沿海的声望仍然是很高的。旅行家魏勒在1906年写道，他的厨师是一个邦德人，“当然自称是斯瓦希里人；所有未开发地区的野蛮人一旦接触到使他们眼花缭乱的沿海地区文化时，都自称为斯瓦希里人”。<sup>①</sup>事实上，沿海地区和斯瓦希里语的声望在这个时期都更加提高了。基曼博博士指出，当山区的帕尔族知道斯瓦希里语已成为白人新政府使用的语言后，他们便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讲斯瓦希里语的人集居的平原地区来学习这种语言。劳姆博士告诉我们，“不但在沿海，而且在所有殖民政权下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居民中心”，人们都受到强大的压力，要使他们与斯瓦希里文化同化。<sup>②</sup>

坦噶尼喀同本土以外地区的许多旧的联系继续存在。桑给巴尔当时已成为英国的保护地，但魏勒在1906年告诉我们，坦噶尼喀的沿海和内地城镇的“经济的和知识的交通线，

① 卡尔·魏勒：《东非土著生活》(Karl Weule: «Native Life in East Africa»), 艾丽丝·瓦纳译，1909年伦敦出版。

② 劳姆：《德属东非：在德国人统治下非洲部族生活的变化》，哈罗和齐尔弗合编：《东非史》，1965年出版。(O. F. Raum: «German East Africa: Changes in African Tribal Life under German Administration»)

今后也将永远会聚于桑给巴尔”。当时伊斯兰教正在传播到内地。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来自桑给巴尔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在访问和调查这些新的部族社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坦桑尼亚各城镇仍然是更往西的那些地区的知识中心。尽管比利时人统治了曼耶马，许多穆斯林逃入了坦桑尼亚，但是曼耶马和坦噶尼喀的联系仍旧保持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斯兰教运动在刚果东部农村地区有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称为“穆利迪运动”。运动的指导思想来自乌季季和坦桑尼亚沿海的伊斯兰教师，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斯瓦希里语在坦噶尼喀以外地区继续推广，并且由于它与新秩序有联系，从而提高了它在更广大地区的声望。在刚果人的城镇，斯瓦希里语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语言。在马拉维，欧洲传教士不喜欢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并讨厌那种认为使用这种语言会带来声望的思想。<sup>①</sup>

在殖民统治初期，沿海对内地的影响继续扩大。的确，正是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开始大规模地在内地各族人民中传播。

同时，其他方面的思想源泉，即坦桑尼亚内地各部族以及西方和南方的思想源泉并没有干涸。“乌塔尼”思想原来是对十九世纪的一种反应，这时也有了发展，适应了沿海种植园和移入沿海城镇的劳工的新情况。秘密团体和舞蹈团体继续发展，宗教革新运动在殖民统治初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盛行。

<sup>①</sup> 阿曼德·阿贝尔：《曼耶马的黑色穆斯林》，《东方通讯》第2期，1960年布鲁塞尔出版。（Armand Abel：《Les Musulmans noirs du Maniema》）

对德国人的坚强抵抗大多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崇拜先知的信仰。当这些抵抗被镇压以后,面临着现代生活的恼人的压力,仍然有着利用这种信仰来重新建立信心的巨大需要。在看来同欧洲人活动中心隔绝的坦桑尼亚其他偏僻地区,实际上同非洲人思想的交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例如西南部的乌菲帕县,在新的疆界划定后,成为坦桑尼亚最边远地区之一;按欧洲人的条件来说,交通是很不便利的。然而1919年和1920年初管理这个地区的第一批英国官员写道,来自赞比亚或刚果的宗教思想运动“年年侵入”乌菲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乌菲帕是一个真正的交通中心。

因此,殖民统治初期,并不意味着旧的联系路线和思想传播完全断绝。当然,它确实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欧洲教育的输入,基督教差会的冲击,殖民地经济制度的建立,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对于扩大眼界和传入新思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这是一个在殖民统治以前就已开始了的过程。例如在坦桑尼亚南部,中非大学传教会早在德国人建立统治以前几十年就已经在那里进行活动了。1906年,德国旅行者魏勒在同一位中非大学传教会的信徒和拥护者巴纳巴·纳坎酋长谈话时就感到不安,因为这位瑶族酋长很了解非洲以外的大事及其重要性。他谈论的外国不再是非洲的政治单位,而是欧洲和亚洲国家了。当魏勒告诉纳坎说,德国的城市有多大、德国的军队有多强的时候,纳坎提出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人被打败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sup>①</sup>

<sup>①</sup> 日俄战争中,德国是支持俄国的。——译者

魏勒记载道：“不管我多么想否认，我确实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我认为在作出肯定的回答的同时，应当立即补充说，这个失败对我们德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我们比俄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联合起来的力量还要强大得多。”<sup>①</sup>

殖民主义初期的行动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这方面的问题艾利夫博士在本书前部分已作了充分叙述，我在这里就不打算细谈了。但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我们需要对通常关于白人的首创精神的描写再作四点补充。当然，白人的首创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传教士带来的思想，行政官员和种植园经理的强制实行改革。但与此同时，其他事情也在进行着。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艾利夫博士所叙述的非洲改良者的活动，他们不仅自愿地或不自愿地受到这些变化和思想的影响，而且他们还参加了新的开发事业。艾利夫博士已充分叙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第二，早期殖民政权并不是全部由白人或坦桑尼亚人组成的。这个政权在把更多的白人引进这个国家的同时也从坦桑尼亚以外引进各种非洲人，苏丹的雇佣军，索马里的牛贩子，从马拉维来的工人。他们是从邻近的殖民地流入坦桑尼亚的非洲人和非洲思想的第一批代表。

第三，早期的殖民政权还把既不是欧洲人又不是非洲人的印度商人和职员带到了这个国家。他们的重要性在那个时候越来越显著了。这些人是新思想的一个来源，其中有些思

<sup>①</sup> 魏勒：《东非土著生活》。

想使早期殖民政权感到不安。德国人担心英属印度的臣民在德国的殖民地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国人则对于许多印度人对印度本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公开表示同情感到不安。1919年检查官的报告指出：“毋庸置疑，本地区的许多印度人同情印度较为‘先进的’运动的领袖们。鉴于最近在印度和埃及爆发的事件，我认为有必要对印度人的信件进行严密的检查。”<sup>①</sup>在英国人占领坦噶尼喀以后，坦噶尼喀的印度人也急于同他们在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同胞建立联系，并指派了驻伦敦的法定代理人。坦桑尼亚的白人认为这里的印度人集团是一种危险思想的来源，这种颇为现代化的思想是同教会所宣传的思想大不相同的。白人评论家们的说法显然带有过分夸张的成分，但是更多地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对于二十世纪坦桑尼亚历史的影响会是有益的。

最后，在殖民统治初期，不仅有各色各样的人来到坦桑尼亚，而且也有不少坦桑尼亚人外出到南方的矿区或城市找职业。这些人接触了许许多多的新思想，其中有些是同欧洲人的统治非常敌对的。坦桑尼亚人哈诺克·辛达诺事件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离开坦桑尼亚到南方去找工作。（辛达诺于1920年作证说：）“我是马姆布韦人，原来住在法属东非姆博济县的马伦格拉。1905年，我同两个白人带了牛到南罗得西亚。我在恩开尔敦住了四年，在奎奎住一年，在加图马住两年，还在其他波马人的小块土地上呆过一个短时期。我作为一个青年小伙子，开始的工作是喂养家禽，后来在井下当矿工。

<sup>①</sup> 《检查官关于印度人通讯的报告》，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

我在奎奎地方成为守望塔教会<sup>①</sup>的信徒……我在长老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卫理公会以及奎奎、加德齐马、格韦罗和开普敦的守望塔教会受过教育。我到开普敦去是为了看看那个地方。”这位走过许多地方的坦桑尼亚人后来成为独立的非洲守望塔教会的一个成员。1917年他由于在讲道时反对欧洲人而被驱逐出南罗德西亚。他当时被说成是“一个居心叵测的狂热的传道者”。英国人不让他回到由于战争而处于动乱状态的坦桑尼亚，而让他住在赞比亚的北部地区。辛达诺在那里发表了他在南方学到的思想：“上帝让（欧洲人）知道（非洲人），派他们带来了货物和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东西，免费送给我们，并把关于上帝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后，却把所有的东西藏起来，很少把关于上帝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教会我们写字，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上帝让他们免费给我们的东西给予我们。他们要我们为他们干很重很重的活，却只给我们很少的报酬。因此，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向上帝祷告，上帝将会听到我们的祷告，并会把所有的欧洲人赶回英国去。一切将属于我们，我们将会和他们一样富裕起来。”他还说：“瞧吧！那些用沉重的负担压在我们头上，把我们当奴隶一样拷打的人，总有一天会要变成奴隶……唯有上帝将受到尊敬和服从，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享受这种权利，欧洲人和本地酋长都没有这种权利。英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任何

<sup>①</sup> 守望塔教会(Church of the Watch Tower)，是1906年在中南非一带发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信徒们宣传欧洲人是“终究会被打倒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则宣传反战，宣布战争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并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消极抵制。——译者



权利，他们伪称有这个权利而侵犯了土著居民，他们是不公正的。”<sup>①</sup>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殖民统治初期，仍有各种各样向欧洲人的地位挑战的新思想在传播着：有欧洲教育本身和关于世界的知识带来的思想，来自印度的思想，来自南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同那些要和殖民地现实妥协的尝试比较起来是次要的，但是它们在坦桑尼亚政治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

德国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结束了坦桑尼亚的德国统治时期。对于坦桑尼亚来说，这次战争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例如，这次战争摧毁了德国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强固地位，从而保证了坦桑尼亚不会变成一个白人的国家；它破坏了基督教传教会所作的努力，而为伊斯兰教的推广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它使欧洲人威信扫地。一个德国传教士写道：“战争教育了土著居民，使他们以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眼光来看白人。土著居民看到白人的仇恨、虚伪、残忍、无信义和不道德。土著居民常常可以公正地说‘黑人是比较好的人’。同时，战争也造成了重大的物质破坏，使成千的人被征去当搬运工人，还留下了饥饿与疾病的余殃。”<sup>②</sup>

然而，除了上述这些事情之外，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

① 罗得西亚索耳兹里国家档案 N3/5/8 和 RC3/9/5/29；罗勃·罗特堡：《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年哈佛出版，第135，138页。(Robert Rotberg: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frica»)

② 克雷勒：《战争期间我们传教会在乌萨拉摩》，载《柏林教会杂志》第6期，1919年出版。(H. Krelle: «Our Mission in Usaramo during the War»)

往往被忽视了。战争是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民进行接触的伟大时期，是思想交流的伟大时期。肯尼亚、刚果、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的非洲人来到了坦桑尼亚，他们被征来充当入侵军的士兵和搬运工人。德国部队的非洲士兵则跟着德国部队从坦桑尼亚进入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当英国人来到坦桑尼亚的时候，成千的坦桑尼亚非洲人同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非洲人一起被强征入伍。不用说，这种大量的接触和眼界的扩大都不是出于自愿的。一个心怀仇恨的德国见证人写道：“英国人向世界宣告说，在他们到达的地方，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役停止了。但是在英国反对冯·勒托<sup>①</sup>这样一个巨大的战争事业中，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志愿搬运工人、仆人、士兵等等呢？难道英国不是由于进行战争的需要甚至连本国的义务兵役制也取消了吗？更不用说，有许多连队的德属东非黑人被迫起来在战场上反对他们的同胞。我们在这方面耳闻目睹的一切事情，使我们越来越难于理解，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够厚着脸皮自称是争取自由、正义和人道的先锋战士。”<sup>②</sup>

无论怎么说，这种接触是重要的。同一个见证人还告诉我们说，这是“各色各样的民族和部族——多种族的印度人、西非人、西印第安人、曼耶马人、黑白混血种的南非人、日本人等等的大混合”。这种混合的直接影响最容易从语言、歌曲和舞蹈看出来，但人们可以有理由假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就语言来说，这许多不同民族在战争期间的接触的一个明显

① 当时德国驻坦噶尼喀的军队指挥官。——译者

② 克雷勒：《战争期间我们传教会在乌萨拉康》。

结果是斯瓦希里语的进一步推广，因为这种语言是德军中的通用语言，而且日益成为英军中的通用语言。就音乐形式和舞蹈来说，战争的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坦桑尼亚人创建的“姆贝尼舞蹈协会”的惊人发展。“姆贝尼”是迎合新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表演者穿欧洲服装，采用欧洲人的头衔。它的音乐模仿军乐队的演奏。它的歌曲是对城市生活的机智和有主题的批评。它当然不是某种不需要认真对待的滑稽表演。这种舞蹈的起源地是坦桑尼亚，它首先是由沿海社会的青年领袖们组织起来的，他们有的是为德国人服务的“阿基达”，有的是雇佣军的著名领袖，有的是最高酋长们的儿子。它是改良时代的一种表现，表明了非洲沿海社会的创造性和适应能力。战后，从坦桑尼亚前线回到家乡的士兵们和搬运工人们把“姆贝尼”思想也带回去了。很快，在马拉维的驻军城市和南罗得西亚的矿场，在加丹加，赞比亚的产铜地带，莫桑比克北部，甚至在遥远的安哥拉，都跳起了这种舞蹈。好多种舞蹈继“姆贝尼”之后盛行起来：马拉维汤加入的“马利奔加”舞，塞瓦人和曼甘贾人的“姆干达”舞，本巴人和赞比亚比萨人的“卡勒拉”舞。今天，这些舞蹈已被看做是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部族遗产甚至是民族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它们都发源于坦桑尼亚。<sup>①</sup>

象“姆贝尼”舞蹈这样具有明显和突出特点的事物，当它传播到中非时，历史学家们是比较容易追根溯源的。对于其他思想的传播要追根究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进一步了解关

<sup>①</sup> 关于“姆贝尼”团体的材料是根据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材料。

于战争期间坦桑尼亚社会对外来非洲人的影响以及外来非洲人对坦桑尼亚社会的影响，显然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殖民当局当然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各种思想，例如 1917 年 10 月，肯尼亚省一级的行政当局就从保护地当局接到警告说：

英属东非的土著居民在德属东非地区参加战争，不管他们是士兵还是搬运工人，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与其他非洲附属国土著居民的接触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其中某些人回来时将会熟悉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泛非主义理想和阿比西尼亚的权术政治，同时在这个保护地的历史上，也许会在土著居民的脑海中第一次产生有可能实现一个黑非洲的概念。联系到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这种土著居民的思想，任何与伊斯兰教宣传有关的东西都应被看做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伊斯兰教将会起一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作用。……在东非，伊斯兰教往往把自己当做既是政治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最近可以看到土著居民有着自称为穆罕默德民族成员的倾向……德属东非是泛伊斯兰教和泛非（主义）共同活动的场所。许多在德国世俗学校受教育的土著居民都接受了伊斯兰教。德国的行政官员承认，他们担心非洲人的“圣战”——即非洲的伊斯兰教徒联合起来反对欧洲人的政治运动。这种“圣战”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在战后可能受到热烈的欢迎。

如果白种人的这种恐惧真有事实根据，那么知道这种根据究竟有多少倒是有好处的。<sup>①</sup>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圣战”的事情。战后的一个长时期中，坦桑尼亚处于明显的停滞状态，经济生活进展缓慢和与外界隔绝。比起它的邻邦来，坦桑尼亚到非洲南部矿区当工人的移民人数少得多，它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大量劳工移入坦桑尼亚。这个时期的许多历史书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坦桑尼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简直脱离了世界各地生气勃勃的发展。那里似乎既没有可以同肯尼亚的哈里·图库相比拟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可以同赞比亚和马拉维独立教会运动的猛烈挑战相比拟的事态发展。当然，差别是确实存在的，但上述印象是错误的。在坦桑尼亚发生的事情，以及坦桑尼亚同其他领地的联系，要比这些历史书所表达的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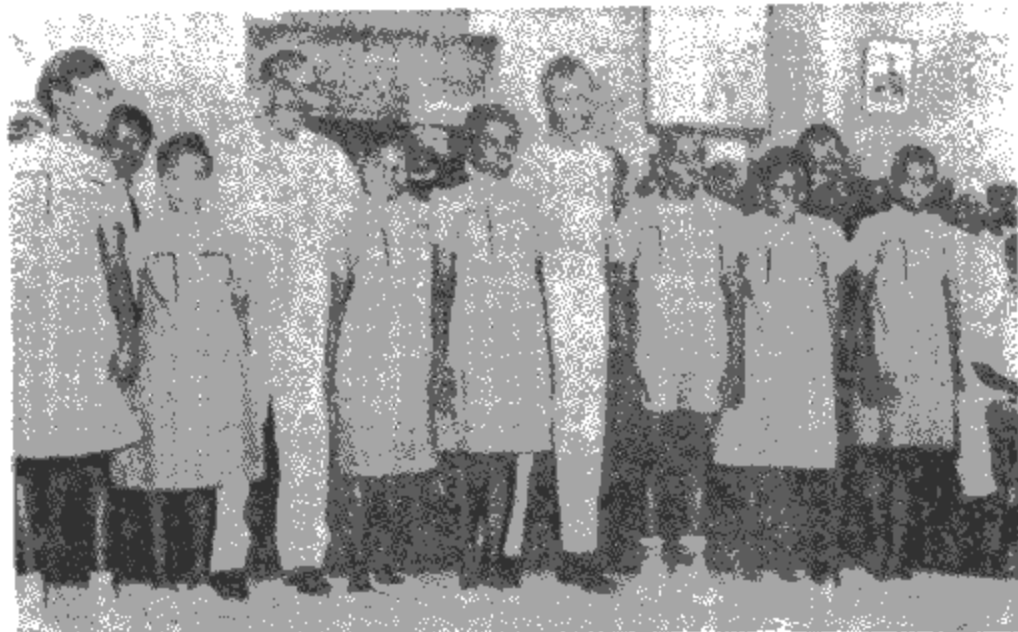
艾利夫博士关于改良时代的人们的描述中，已经说明了坦桑尼亚在两次大战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他关于这些人的思想变动及其对于坦桑尼亚政治发展的极大重要性的描述是不能写得比这更好了。但是在不同的人中间也发展了其他的思想，而且往往同改良者的思想相对抗。也许最好是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宗教思想的讨论，来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因为改良运动的批评者一般总是用宗教语言来表达他们

---

<sup>①</sup> 朗斯代尔：《东非民族主义的一些起源》，载《非洲历史杂志》1968年第9卷第1期，第119—146页。(J. M. Lonsdale: «Som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 Africa»)

的观点的。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都扩大了。起先是伊斯兰教的传播。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及战后初期是穆斯林在坦桑尼亚扩张的极盛时期。这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直到德国人统治末期，沿海地区、斯瓦希里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声誉依然很高，甚至还因为德国大肆讨好穆斯林并同土耳其结盟，它们的声誉更高了。1920年，驻在西南边远地区的英国行政官员写道：“斯瓦希里分子仍然保持着阿拉伯人的大部分声望，德国人助长了这种声望，因为他们只雇用斯瓦希里职员而不雇用任何别的人，等等，当然也因为他们后来的战争宣传。相当一部分人……无疑地在这种引诱之下，把他们的命运同他们心目中的特权阶级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另一个原因是非洲人对白人国家和白人教派互相之间的破坏性争端的反应，这种争端在战争期间给坦桑尼亚造成了巨大损害。从反面来说，战争破坏了基督教的传教工作，这也为伊斯兰教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德国人囚禁英国传教士，英国人也囚禁和驱逐德国传教士。在战争中，教会的大量产业遭到毁坏。英国人把信奉德国教会的非洲人看作是不忠，而德国人也同样把信奉英国教会的非洲人看作是不忠。有一些地区，基督教差会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恢复过来。东南部马萨西的恩丹达区就是一个好例子。这里，基督教差会很早就建立起来了。中非大学传教会和德国本笃会战前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非大学传教会的传教士和本笃会传教士先后被囚禁，



(十三) 坦桑尼亚总统和两位副总统于1968年“七·七节”(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的日子)同1954年7月7日出生的男女青年合影。(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闻处供稿)



(十四) 总统同青年一起从布蒂亚马步行到姆万扎。(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新闻处供稿)



(十五) 总统视察姆布瓦马吉“乌贾马”村的棉花农场。(达累斯萨拉姆非洲民族联盟总部供稿)



(十六) 另一个“乌贾马”村的椰子树苗圃。(达累斯萨拉姆非洲民族联盟总部供稿)



许多差会驻地遭到摧毁,信徒们的情绪受到挫伤,这就使得战后基督教在这个地区发生了危机。从基尔瓦和林迪传到内地的伊斯兰教得到很大发展。取代德国同行的瑞士本笃会传教士发现他们在恩丹达几乎不可能恢复原先的地位,而不得不把力量集中在桑格阿地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事例。那些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基督教差会驻地一度曾经是基础最稳固的。而基督教影响很大的新地区则是那些距离海岸较远的地区——农圭、南乌菲帕、桑格阿、乞力马扎罗和湖间地带。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代里,基督教的传播路线改变了。在那些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区,传教活动是由驻在它邻近领地的差会进行的,例如马拉维的苏格兰传教士和法国的白衣神父,乌干达的基督教差会,等等。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同时也说明非洲的圣经教员和一般教师从马拉维和乌干达来到了坦桑尼亚。<sup>①</sup>

所有这一切对于坦桑尼亚的历史都是重要的。在坦桑尼亚,伊斯兰教保持现代化宗教的声望的时间比在肯尼亚要长久得多。改良时代的头面人物有不少是穆斯林。因为德国人在沿海地区开设了官办学校,所以穆斯林在德国人统治下甚至还享受到一些教育上的好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后初期伊斯兰教的大发展是它在坦桑尼亚的最后一次重要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则开始复原并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巩固它的影响。现代的教育设施越来越受基督教差会控

<sup>①</sup> 纳马尼尔(Namanyere) 1919—1920 年度报告。

制。基督教徒被看作是革新派人物的榜样。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革新人物之间的竞争比较少。斯瓦希里语这时已经如此普及，甚至成为传教用的语言，斯瓦希里社会的声望已经如此牢固，以致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新上层人士被一个更广泛的、具有更普及形式的斯瓦希里社会所吸收了。

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革新人物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合作决不是两次大战之间坦桑尼亚宗教历史上的唯一主题。非洲宗教革新的老传统继续存在。在这个期间，坦桑尼亚受到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群众运动的影响。这些运动从许多方面对改良时代提出批评。这些运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独立的非洲基督教运动，它特别对(西方)差会及其信徒提出批评。一种是特有的非洲伊斯兰教运动，它反映了那些没有控制伊斯兰教领导机构的人们的观点。还有一种是既非正式的基督教又非正式的伊斯兰教的运动，这种运动以某个先知人物为中心，他们许诺要消除恐惧、社会紧张和不平等，以及消除巫术。这些运动合在一起，对于改良时代的新派人物的思想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反击，不管这些人物是斯瓦希里人还是基督教徒。

变革的过程和新思想的传入在非洲各部族中引起了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形成了受到较好教育和享有更多机会的特权集团而造成了紧张局势。许多人认为这些集团是自私自利的和背离了部族社会的逃兵。而且在农村地区，许多人不了解广阔世界的动向，他们害怕这会破坏他们自己的部族社会，而要找到某些办法回到他们能够理解的和比较平等的旧社会

中去。马及马及起义反映了这种思想，当时他们号召改信基督教的人们抛弃白人指引的道路，重新加入非洲人的社会，而且来自沿海的斯瓦希里人当时也受到了攻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思想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有时候是无组织的和不明确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根除巫术的运动就是这种情况。这些运动以一个先知为中心，他被认为具有消除巫术并从而消除社会紧张和恐惧的威力。这个先知派出使者携带他的药物到各地去。无罪的人服了这种药就会得到保护，有罪的人服了这种药如果再干坏事就会死亡。整村整村的人服了这种药，从而带来了暂时的团结。当这种信仰存在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不再互相提防。这些运动确实时常扩展到很广的地区。在坦桑尼亚，这样的运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恩金多部族和靠近沿海的有关部族，它从沿海深入到内地，遍及过去马及马及起义的整个地区或庞加尼河流域。另一类是从马拉维扩展到坦桑尼亚南部，它是这个时期一种思想传播到一大片地区的最突出的例子。这个马拉维运动叫做“姆查佩”。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从马拉维南部传入赞比亚、罗得西亚、坦桑尼亚和刚果。“姆查佩”运动严厉指责基督教差会及其信徒们未能带来仁爱和消除恐惧，指责差会的教育活动所造成的不平等。“姆查佩”的领袖说：“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摒除多年来存在的一切罪恶以便‘清洗’这个国家和拯救人民。你们的传教士大约在五十年前就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尽了他们的力量来拯救人民和教导你们不要互相残杀，结果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同情你们，因为你们失去了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因为上帝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而是因为受到这些妖魔的毒害，你们今天将会识破这些妖魔。我们遵循上帝的戒律，它说：‘不可杀人’，我们比别的宗教更加遵守和实行这条戒律。因为它们都未能拯救人民，而我们做到了。我知道你们中间的一些基督徒在争辩……但是你们决不要相信基督徒，他们是隐藏在这个宗教里头的、比任何人更坏的大妖魔。”<sup>①</sup>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传入坦桑尼亚的独立教会运动，更明确得多地表达了同类的思想。这些运动不是在坦桑尼亚产生的。原因之一是，那里的基督教刚开始真正强大起来，而且所有的这些独立教会都是从马拉维、乌干达或肯尼亚等地传进来的。这样，独立的非洲基督教就象基督教一样，是由传教士带到坦桑尼亚来的。最吸引人和人数最多的独立教会是在农圭发展起来的。来自马拉维的三个运动在那里打下了基础，并一直存在到今天。这三个运动是：“非洲民族教会”、“上帝最后教会”（the Last Church of God）和“守望塔教会”。这些教会都以不同方式指责改信基督教的非洲人背弃了本族人民。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声明是为非洲民族教会起草的声明，它在1935年传到农圭：

我们相信非洲基督教差会的使命是采取一种适合于人民风俗习惯的方法把基督精神和教育传给人民，而不

<sup>①</sup> 爱德华·沙巴：《计划中的“姆查佩”族访问简史》，1934年3月3日，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77/18/15。（Edward Shab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roposed Visit of the 'Mchapi' People»）

应当把欧洲国家的不可行的方法强加于非洲人……本教会的宗旨在于提高全体非洲人，首先提高那些目前被北方宗教及北方文明抛弃的老年人，同时争取那些由于一夫多妻制和酗酒而被认为坏人和不再具有从善的潜在品德的人；努力恢复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言行一致的、深切而自然的宗教生活的气氛。<sup>①</sup>

非洲民族教会声称它相信“上帝是父亲，人不分肤色信仰都是兄弟，相信非洲的宗教连同它的传统、法律和风俗是上帝制定的，所以非洲人可以通过他们自己身体力行而了解上帝”。当它这样宣布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不仅提出了一个宗教的目标，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社会的目标。它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已被基督教差会及其非洲信徒们所起的作用破坏了。

要清楚地了解坦桑尼亚伊斯兰教内部在这个时期发生什么事情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十九世纪起，看来在坦桑尼亚城镇中显然不断地在进行着关于坦桑尼亚伊斯兰教的性质问题的斗争。有人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使它更加“非洲化”和更加“民主化”。约翰·艾利夫叙述了1914年以前塔波拉伊斯兰社会中的一次分裂，并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加以解释。在这个城市中，以曼耶马人为主的非洲居民，反对阿拉伯寡头统治势力以及他们所批准的伊斯兰教规的性质。这一类斗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英国行政

<sup>①</sup> 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的宗教礼仪》，1958年牛津出版。

官员有许多报告谈到在布科巴、塔波拉和沿海城镇发生冲突或出现冲突危险的情况。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塔波拉的非洲穆斯林分成两派：“左手派”和“右手派”。“左手派”主张在清真寺内打鼓，主张吸收更多的妇女参加，总而言之，主张伊斯兰教更加非洲化。这次分裂可能同城市政局和非洲城镇居民为了取得某种努力而进行的斗争有关系。英国当局当然同情“右手派”，正如他们同情基督教差会及其信徒而反对独立教会一样。正象独立教会派的领袖们求助于圣经一样，非洲穆斯林的激进分子求助于可兰经原有的权威来反对他们认为是后来加进去的教规和礼仪。布科巴的县长抱着不同情的态度写道：“他们以可兰经作为行动的根据，不听比他们这些非洲人见多识广的本地各族伊斯兰教领袖的话。”<sup>①</sup>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就宗教思想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坦桑尼亚人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并不都是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有些人想在正统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里面为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进入新的殖民世界的道路创造机会。另外一些人则反对殖民世界的不平等，而且他们往往引用圣经和可兰经作为根据。改良者和平等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这些宗教争论就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许多政治上的争论，它在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批评改良者的人都盲目地反对变革。其中有些人，例如非洲民族教会也主张变

<sup>①</sup> 布科巴县官致湖省专员的信，1932年2月，达累斯萨拉姆国家档案21447。

革,但认为这种变革应当置于某种控制之下,从而不至于带来不平等和分裂。他们也要保护非洲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思想,使之免受不必要的攻击。他们用各种方式说明,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可以在经济上采取新的措施,同时仍然保留一个非洲人的本质。

今天许多人将会更加同情这种做法而不同情改良者实行欧化的企图。但是,人们从艾利夫博士和特穆博士所写的几章里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这些改良者在坦桑尼亚现代民族主义政治兴起的历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他们当然不只是某个外国政府的工具。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必须经过艰苦斗争才能获得“改良”的机会。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组织,如坦噶尼喀非洲公务员协会、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以及其他组织,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中央组织的前身,虽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也吸收了同非洲民族教会成员有类似思想的人参加。因此,任何论述坦桑尼亚思想运动的篇章都必须重视改良者成立的协会。这里我只需要对艾利夫博士的论述补充一点。

我们已经知道,来自马拉维和其他地方的“传教士”对于传播诸如“姆查佩”和非洲民族教会等运动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同样地,来自其他领地的非洲人在这些早期的上层人士组织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确实没有大批的外来工人到坦桑尼亚,但是有一些熟练工人流入了坦桑尼亚。英国殖民政府在战后立即发现非洲工作人员,如职员、外科护士、教员等等非常缺乏。为了得到能讲英语的受过训练的人员,英国殖民

当局特别呼吁马拉维的传教会供给他们一些学员。许多马拉维人，也有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非洲人被吸收到政府里工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非洲的高级文官有一半以上是坦桑尼亚以外的非洲人。还有一批人数较少的熟练工人移入坦桑尼亚在政府部门以外工作。尼亚萨和干达的一批圣经教员和一般教师被坦桑尼亚的差会所雇用。欧洲的雇主们有时也跟着这样做。此外，有一些非洲人从乌干达、肯尼亚或马拉维到坦桑尼亚来开办小型企业。其中有一些人在早期的协会组织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约翰·朗斯代尔告诉我们那样：“1926年‘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1922年3月创立）的主席和秘书都是从莫桑比克来的，一个出生在桑给巴尔，一个出生在蒙巴萨。这个组织的非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中，只有两名是坦噶尼喀出生的。……同样1930年时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许多会员……都不是本地人。”埃里卡·菲阿在某些方面是这个时期比较激进的政治家中最为突出的人，他曾经力图打破文官对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控制，他就是干达族人。<sup>①</sup>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提醒我们，坦桑尼亚的非洲政治传统并不是完全内向的和脱离邻近领地的。我已经谈到的许多事情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在坦桑尼亚有可能比在肯尼亚或乌干达较为容易地建立一个有效的全领地性的政体。例如早已建立起来的从沿海到内地交通网，以及坦桑尼亚内地各处存在着斯瓦希里城市居民集团，就是一个说明。

<sup>①</sup> 朗斯代尔：《东非民族主义的一些起源》。



与此同时，坦桑尼亚还同住在境外的人民有着重要的和悠久的传统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坦桑尼亚的近代政治同时具有泛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色。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桑给巴尔的重要性。在坦噶尼喀大陆知识史上，桑给巴尔在二十世纪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其部分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桑给巴尔是沿海的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另一部分原因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某些激进思想最先是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政治家在坦桑尼亚表述出来的，他们同中东和北非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想有接触。此外，桑给巴尔是推行一种更加本土化的激进主义的好基地。它的劳工队伍是从东非各地招募来的。在这个岛上，坦噶尼喀人和肯尼亚人、乌干达人、莫桑比克人并肩劳动，他们在这里提高了团结的觉悟，这种觉悟最近在非洲一设拉子党和桑给巴尔革命中已经表现出来。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生动地反映了在桑给巴尔发展起来的这种来自基层群众的泛非主义。

现在可以引用一段话来概括上述的论点。这段话描述了这种泛非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在本文中所论述的这个时期的末尾出现的。在1941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肯尼亚的所有土著地方理事会都收到了下面这封信，它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预示战后将发生的情况，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封信坚决地用泛非主义的观点来看坦噶尼喀：

有四个人讨论了严重的动乱问题。……

(一) 基罗圭——南非人

(二) 多罗加——尼亚萨兰人

(三) 瓦托利索——黄金海岸人

(四) 姆瓦利西——坦噶尼喀人

现在我们警告你们，你们应当对于英国人将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有所准备。

他们会说：“今后不许任何人说：这是我的地方。也不许说这是我的农庄，不，不许这样说。既然你们害怕战争和坐牢，那就不要开口。”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现在我们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今后将没有任何地方种植你们的玉米，也没有柴薪或者你们用来盖屋顶的草。如果你们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你们就不会得到这些东西。

我们要你们回答：“这是我们的土地，上帝亲自把它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要万众一心。宗教有许多种，但上帝只有一个。任何人都不要说我是基督教徒或我是伊斯兰教徒。互相谅解超过和压倒了一切宗教。

每一个黑人都是属于同一个祖先，不论他是来自南非的人，还是斯瓦希里人，或是坦噶尼喀人、姆坎巴人、吉库尤人、姆干达人、卡维隆多人、索马里人、阿比西尼亚人、埃及人或者甚至是美洲黑人。我们的这些话是对你们黑人讲的，而不是对欧洲人或印度人讲的。

无论我们走到那里，凡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人们都叫喊：英国人是掠夺者，他们使人民贫穷了。坦噶尼喀人民大声叫喊，要求德国人回到他们的国家来，因为英国人

把暴乱强加于他们,使他们沦为乞丐。

非洲人民,现在就团结起来吧,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个头脑,一个声音。<sup>①</sup>

我们现在已快要接近这一内容复杂、然而仍然十分肤浅的章节的结尾了。历史学家对于坦桑尼亚思想史的研究现在还仅仅处在极初步的阶段。今天我们能够提出的问题要比我们能够解答的问题多得多。我在这一章里认为是重要的一些事情将来也许会显得是不重要的,而我在这一章里没有提到的事也许将会显得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使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能看到,这种思想史是如何同政治史,特别是同近代政治史联系起来的。自从独立以来,在许多新的领域,主动权已转移到非洲人手里。一个非洲人的政府正在努力改造和改革坦桑尼亚的社会,而旧的殖民政府过去在这里仅仅满足于使事情多少是循规蹈矩地进行。坦桑尼亚现政府的改革深刻地吸收了坦桑尼亚非洲人所创造和保持的思想。

(尼雷尔导师在1967年8月说道:)阿鲁沙宣言首先是重申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坦桑尼亚人,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仍然希望继续作为坦桑尼亚人。无疑地,我们希望改变我们当前社会的许许多多东西。但是我们已经声明,这些改变将通过朝着一定方向的成长过程来实现。这个成长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根子长出来,而不是把一些

---

<sup>①</sup> 引自尼亚萨助理警察局长给县专员的信,1941年9月26日。我感谢隆斯达勒博士告诉我注意这封信。

外来的东西嫁接在我们的根子上……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改革将根据我们对自己的需要的了解和随时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向来决定。我们将从全人类的思想 and 各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但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承认我们的非洲特性，并且相信我们的过去有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未来是有用的。

1965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史国际大会上，阿贾义教授指出，西非政治领袖们从殖民政府的历史中很少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制定社会改革计划。他还说，当代的改革者因而不得不回头去求助于十九世纪非洲基督教改革者的思想或伊斯兰教“圣战”领袖们的思想。在今天的坦桑尼亚，正如在本文中所展开的那样，当前正在讨论和辩论的思想，同改良者和平等主义者的想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从上述这种思想的历史观点来看坦桑尼亚历史，同时也要从间接统治的理论、从受到英国法律观念和国际社会主义影响的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坦桑尼亚的历史。

## 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 兴起和胜利

阿诺德·特穆

尼雷尔总统说过，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从一开始就有必要让人民懂得，用和平斗争的手段来争取独立是可能的和能够成功的。<sup>①</sup>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尤其需要这样。在1905—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中，坦桑尼亚南部人民为了重获独立，拿起武器反对德国人，然而事实证明凭借武力是不能成功的。这些地区的坦桑尼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德国人如何用优势兵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这是有许多部族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如同早先在沿海和内地发生的分散抵抗运动一样，它同样不能把德国人赶出国境。

马及马及战争结束了抵抗和用战争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而开辟了一个勉强接受殖民统治的时期。坦桑尼亚人民放弃用武力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手段。从此，从殖民统治下争取自由的运动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当时机到来时，如果要劝说对于“赫赫”战争，<sup>②</sup>沿海地区和查加族、哈

① 尼雷尔：《自由和统一》，1966年伦敦出版。

② 指赫赫族民族英雄姆克瓦瓦在1891—1898年领导人民反对德国殖民军的武装斗争，参看本书第5章。——译者

亚族酋长和人民的被处决以及马及马及战士所受到的最残酷无情的镇压记忆犹新的那些人参加的话，争取自由的方式必须不同于 1905—1907 年的方式。早期的这些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发动坦桑尼亚人民争取乌呼鲁（自由）的方式。

人们常常错误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说成是坦桑尼亚开始出现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坦桑尼亚的民族主义是在这以前很久就开始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在殖民主义开始侵略的时候产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德国侵略的威胁下，坦桑尼亚本土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殖民侵略。人们会记得，殖民侵略是用蚕食的方式进行的。在沦为殖民地的非洲，没有一个地方的殖民统治是在殖民主义列强所划定的整个领地上按照同样的规格建立起来的。例如，德国对坦桑尼亚的侵略是从沿海一带开始的；在 1907 年以前，英国对肯尼亚的统治从来没有超出沿海地区。

以坦桑尼亚或肯尼亚为例，反抗的规模也不是一致的。坦桑尼亚各个地区的人民是在德国人威胁到他们本地区的独立时陆续起来反抗的。例如 1888—1889 年阿布希里和齐古阿族的伯瓦纳·赫里在沿海地区领导的对德国人的第一次反抗，是在 1886 年划界条约签订的两年之后，也正是德国东非公司开始侵占沿海地区的时候。在内地，姆克瓦瓦领导赫赫族反对德国人的战争从 1891 年一直打到他在 1898 年自杀，从而结束了赫赫战争。最后是 1905—1907 年的马及马及起义，那时德国人已开始在坦桑尼亚南部建立政权和征税。当

时被称为英属东非的肯尼亚的反抗也是这样的。随着“保护地”的建立，1895年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爆发了战争，然后，当英国把它的统治扩大到内地各部族时，战争又发展到内地。

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早先领导反殖民主义战争的领袖们是向后看的，认为他们领导人民背离现代化和背离上帝恩赐的殖民主义。与此相反，近代的历史学指出，早先反对殖民主义的领袖们和最近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们是一脉相承的。大约五十年前，列宁把这种反抗斗争称为民族战争或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起义。最近，恩达巴宁吉·西托莱是这样强调的：

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实行自治的愿望，是他们要结束一切外国统治的愿望。从根本上说，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的政治意志。它反对外国控制，赞成非洲人统治，它是非洲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sup>①</sup>

西托莱牧师承认实现非洲独立的两种手段，即非暴力手段和暴力手段。尼雷尔总统早就认为，如果用和平手段争取坦桑尼亚独立遭到失败，坦桑尼亚人决不会放弃斗争，相反，他们将采取暴力手段从英国统治下赢得独立。这就清楚地表明，这种战争是民族主义的表现。

无疑地，大多数殖民战争都是有利于殖民国家的，主要是

<sup>①</sup> 西托莱：《非洲民族主义和基督教》，载《过渡》第4卷第1期，1963年9月出版。（Ndabaningi Sithole: «African Nationalism and Christianity»）

因为他们拥有优势的现代武器。但是非洲人并不象人们常常以为的那样容易被打垮，而以前的欧洲中心论者就是那样说的。在多数情况下，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即使在坦桑尼亚，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德国人的优势武装压倒了坦桑尼亚人。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非洲人方面说来，失败并不意味着耻辱，而是爱国主义的象征。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坦桑尼亚的姆克瓦瓦、伯瓦纳·赫里和马及马及起义的领袖们今天已经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人民的欢呼。最近坦桑尼亚政府已在马及马及战争中一些最重要的战场建立了纪念碑，表彰那些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们。

非洲各部族之所以不能够成功地把德国人驱逐出去，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在武器方面占优势，并能在非洲各部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而不是非洲人未能联合成为巨大的政治实体。即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他们肯定能够在更长的时期内抵挡进攻，但是他们也未必能成功地打退殖民侵略，他们终究要失败的。

不过，坦桑尼亚的非洲各部族，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在捍卫独立的斗争中将会有更好的机会取得成功。我们知道，姆克瓦瓦在反对德国侵略的斗争中，曾经寻求同恩戈尼族的查布鲁马和乌尼亚尼耶姆贝的伊西凯结成联盟。再如1889年，在当时英属东非的北海岸，当地的斯瓦希里人曾经作过惊人的努力，来联合沿海的所有居民，反对一切欧洲人和保卫他们的领土。当时姆特瓦帕的首领哈米斯·本·康波曾经极力敦促“所有沿海的酋长共同携起手来，并且



和布希里(当时南海岸的人民已经举行反对德国人的起义)一起……把一切欧洲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统统赶到海里去”。<sup>①</sup>哈米斯·本·康波是蒙巴萨土著统治者的后代，是十二个部落的统治者，他看到在文化上已经统一起来的沿海地区斯瓦希里人民有可能建立联盟。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特别是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加齐的姆巴鲁克却不加理睬，查布鲁马和伊西凯也是这样。后来，当他们起来抵抗并被打垮时，才懊悔莫及。1895年姆巴鲁克与肯尼亚海岸的一些人结盟反对英国，虽然经过多次战斗，终于在1896年被打败了。当时的一个观察家、驻桑给巴尔和东非保护地的专员阿瑟·哈丁格爵士写道：

哈米斯·本·康波……代表蒙巴萨的土著统治者，在马斯喀特<sup>②</sup>到来之前，甚至在葡萄牙入侵者到来之前就统治着五个部落。他同伊斯兰教长马兹鲁伊的关系，就如同爱尔兰古代克尔特人酋长奥尼尔斯和奥布莱恩斯同帕利<sup>③</sup>的巴特勒斯和菲兹杰尔德斯的关系一样。在(英国东非)公司到来之前，他经常住在蒙巴萨，那里的斯瓦希里人与阿拉伯人不同，把他当作他们的酋长，他同斯瓦希里的多数领导人和一些阿拉伯家族有血统关系。但是当(英国东非)公司接管政府时，他由于讨厌欧洲人的

① 阿瑟·哈丁格给索耳兹伯里侯爵的信，1896年4月12日。

② 马斯喀特在阿曼半岛。这里指阿曼的阿拉伯教长赛义德·苏尔坦的入侵。——译者

③ 帕利(Pale)，指历史上英国在爱尔兰境内占有的领土。——译者

到来和统治，退居到他的家乡姆特瓦帕。<sup>①</sup>

另一个反对德国人对坦桑尼亚的殖民占领的例子，在规模和团结方面都更加广泛，并且第一次把农民也卷进来了。它突出地反映了得到群众拥护的民族主义的早期根源和表现。这个例子就是1905—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起义的领袖们在斗争中表明了他们认识到农民的作用和团结对于进行反抗斗争的极大重要性。马及马及起义把早期的组织者和以后的民族主义者联系起来。这两代人都懂得要把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才能成功地反对殖民主义，虽然第一代人的行动和组织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以后独立运动的年代，目标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外国当局对这个国家的占领并推翻它。前一代人寻求用武力来做到这一点，而后一代人接受了这种方法的痛苦经验，往往试图采用别的方法，但是他们也理解到，如果他们采用的方法不能成功，就要使用武力——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

各个殖民地在不同时期爆发了不同规模的起义，它们戏剧性地表明，没有一个非洲部族接受殖民主义。特伦斯·兰杰教授最近写道：马及马及起义仅次于1896—1898年发生的恩德贝勒和松纳起义。<sup>②</sup> 吉尔伯特·格瓦萨在马及马及起义地区搜集的口述记录比过去更加令人清楚地表明了马及马及起义的爆发主要是为了反对外国统治。同时，他还表明了口

① 阿瑟·哈丁格给索耳兹伯里侯爵的信，1896年4月12日。

② 兰杰：《1896—1897年南罗得西亚起义》，1967年伦敦出版。（T. O.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97*）

述者和起义参加者对马及马及起义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之间的联系的看法。马及马及起义的目击者马卡塔利瓦勒的姆齐·纳索罗·哈桑·基普戈说：

金吉基蒂勒运动和马及马及起义的成员象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一样到处活动。你们知道，当非洲民族联盟成立时，联盟书记和其他领导人分派到全国各地。在达累斯萨拉姆，非洲民族联盟已为人所周知。恩加兰贝族都知道金吉基蒂勒的言论，他们通过朱吉利亚和姆特梅拉把它传播到广大地区。一点不错，一种救世的源泉是不可能不为人民所知道的。<sup>①</sup>

马及马及起义正如它剧烈地爆发出来一样，被剧烈地镇压下去了。从此，坦桑尼亚人认识到，凭借武力反对拥有优势武装的德国人，或者象 1888—1889 年那样反对德国和英国的联合武装力量，是不会成功的，这种凭借武力的主张曾经支配着从 1888 年以来的整个时期。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坦桑尼亚人变得沉默了，但是他们同时试图探索重新取得独立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坦桑尼亚人转入进行自我提高和自助的组织活动，这种活动所隐含的一种信念是，教育方面的自我提高和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会使他们处于一种更有利的地位，来反对取代德国人统治坦桑尼亚的英国人。奥金加·奥廷加告诉我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成

<sup>①</sup> 格瓦萨和约翰·艾利夫合编：《马及马及起义纪事》，1968 年内罗毕出版，第 1 卷，第 29 页。

立的福利协会和联合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写道：

在洛族节约运动(Luo Thrift 原文如此——作者)的最初年代里,我相信,当我们的人民在经济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时,他们将会有更大的能力来担负政治责任。阿钱·奥内科从内罗毕回来,同我一道在尼安扎工作,我们经常争论那一项应该放在优先地位的问题。我说自我提高应放在第一位,阿钱则赞成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sup>①</sup>

这种哲学和同一时期中坦桑尼亚的哲学是相同的,艾利夫博士恰当地把这个时期称为改良时代。从部落组织到城市组织,从经济组织到纯粹的社会组织,这个时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洲人自愿组织的福利协会和联合会,它们的组织者主要是由传教会培养出来的。虽然自我提高在他们头脑中居于优先地位,虽然他们的政治目标没有象激烈反抗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群众行动那样明确,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政治目标。

必须指出,针对殖民地当局的非洲政治斗争无疑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处于不同的水平罢了。许多部落自愿地组织了各种协会。狭隘地看,这些协会似乎不过是一种救济或互助性质的团体。但是从广义的基础上来看,它们生来就带有政治性,因而它们成了早期武力反对殖民主义阶段和最近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时期之间的桥梁。所以反抗的传统是贯串于这

<sup>①</sup> 奥廷加:《尚未自由》,1967年伦敦出版,第98页。(Oginga Odinga: «Not yet Uhuru»)

一整个时期的。

在坦桑尼亚的部落联盟和协会中，最激进的组织是1924年成立的布科巴哈亚人联盟和1925年成立的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它们之所以反对酋长们，主要并不是因为这些酋长是传统的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殖民地政权的雇员，他们更多地代表殖民地政权的愿望而不代表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人民的愿望。这是间接统治的真相，其主要意图就是要遏止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发展。在坦桑尼亚，这种政策至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达到了它的目的。哈亚族、查加族、香巴族、洛族和吉库尤族(仅举这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他们成立了政治联盟，力求普选最高酋长以代替那些由殖民当局扶植起来的酋长。这些酋长要由他们选择的人来担任，这些人要能够更多地代表与支持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而不是仅仅充当殖民当局的代理人。这些运动同时标志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由得到群众拥护的新人进行努力，试图从酋长们和殖民当局的手里夺取行政管理权。毫无疑问，这些运动，尽管只局限于部落范围，它们却是政治性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从殖民当局统治下取得独立。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坦桑尼亚成立了三个全领地范围的组织。艾利夫博士在本书第六章里已谈到这三个全国性组织，即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和坦噶尼喀非洲工人中央协会(TAWCA)，也谈到它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在这一章里，必须谈谈这些协会的也许是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使这些组织，特别是坦噶尼喀

非洲人协会对于 1945 年以后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些协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的重要性显然并不在于它们在政治上取得多大成就，而是在于这些组织的名称和它们给自己规定的政治任务。他们所取的组织名称肯定包含着坦桑尼亚政治的一种新的概念，因为这些名称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动规定了领土的范围，新的政治斗争将要在这一范围内展开。新的国家将要在这一片领土上诞生。在这些协会里第一次使用了“坦噶尼喀”这个词，它规定了这一片领土上的非洲人开展政治活动和扩大团结的界限。同样重要的是，正当殖民当局竭力压制任何以反对中央或地方当局为目的的政治活动的时候，这些协会通过讨论和对话使非洲人能够继续进行政治活动。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殖民地当局的袭击下，只有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生存下来。因此这个组织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存在使非洲人能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和填补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代的政治空白，而且在于它使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得以在五十年代诞生。

以城市为主要根基和发展方向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在三十年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福利目标和宗旨，而在于它的超部落性质。正是由于它把这种非部落和非宗教的性质传给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从而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并且成为一个成功的群众运动。协会的书记强调：“……我们发现现在世界上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我们认

为联合起来互相帮助更好。”1921年成立的“吉库尤中央协会”主要是为了吉库尤族；其他的部族有泰塔族的“泰塔山区协会”，尼安扎族的“北卡维隆多中央协会”，乌卡姆巴族的“乌卡姆巴人协会”。在乌干达，巴塔卡联合会基本上是布干达人的政治协会。

1945年是坦桑尼亚民族主义历史的转折点。当时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开始发展到全国，并开展活动争取坦桑尼亚农村群众的支持，这对于以后年代的民族主义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939年它只有九个分会，到1948年就增加到三十九个，会员人数也骤增至一千七百八十人。但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向农村地区的发展。协会的姆万扎分会（同时也是省分会）提供了这方面发展的例子。这个分会由约瑟夫·冲博在1945年创立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它很快发展到（维多利亚）湖省的其他城镇。到1947年，它在穆索马、马腊和乌克雷韦都成立了分会，另外还在布科巴有两个分会。从一开始，分会就关心城市和农村的非洲人的权利、福利和进步。有重要意义的是，1947年它在布塞加创立了最早的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分会，这个地区是由纳萨城管辖的。1946和1947年间，非洲人协会的乌克雷韦分会组织了棉花过秤工作，目的是为了从印度人手里夺回对棉花过秤的控制，并保护农民不受印度购买者的欺骗。在桑巴拉山区有一个自发产生的分会，它的产生看来是由于本地的情况和压力，而同总会无关。1947年有两个地方团体合并成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一个分会，一个是乌桑巴拉协会，另一个是1946年为了要求撤换一个酋长

和反对“姆拉洛复兴计划”而成立的。它们的领导人呼吁并得到农村群众的支持，反对(殖民当局的)农业措施和反对基林迪王朝。

在这期间，乞力马扎罗也同样出现争取群众支持的活动。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分会是约瑟·基马兰多于1946年创立的。协会几乎紧接着就向西部高原地区发展，并在马查梅、基博肖、姆博科穆和下萨尼亚成立了分会。群众支持协会主要是因为担心土地被剥夺和缺乏教育，但是地方的政治纷争阻止了协会进一步向山区发展。到五十年代末，山区人民普遍增长了对“瓦依托里”(三个分区的酋长)的仇恨，这三个酋长是在1946年被指派来统治查加族的。由于“瓦依托里”不准基马兰多发展组织，所以1948年就不能再成立更多的分会了。与此同时，协会会员把他们的精力从全领地性的活动转移到地方政治斗争。乞力马扎罗公民联合会吸收了协会的各个分会。这个联合会基本上是查加族反对“瓦依托里”的一个政党。这个事件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当涉及重大问题时，地方政治比起一个联系较为松散的全领地组织来更有力量，乞力马扎罗公民联合会在群众的普遍支持下反对“瓦依托里”，它是汤马斯·马雷尔勒1952年当选为查加族最高酋长的支柱。

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1960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山区取得一个立足点。在马雷尔勒统治时期(1952—1960年)，查加族在教育 and 经济发展方面大踏步前进。他们热衷于教育并想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超过全国其



余地区。有一件事可以明显地表现他们的这种热情,这就是,他们愿意交纳每人两先令的地方教育税。然而,经济和教育的进步并没有消除不满,汤马斯·马雷尔勒变得很不得人心。为了反对他而成立的查加民主党于1960年使苏罗门·伊里乌夫(不久前还担任坦桑尼亚教育部长)接替马雷尔勒而当选为查加民主党的主席。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介入了这场斗争,支持查加民主党。马雷尔勒的失败自然意味着非洲民族联盟的胜利,因为不久它就取代了查加民主党。1961年伊里乌夫被任命为部长。

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莫希和姆万扎,省分会的创始人是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会员,基马兰多是1938年达累斯萨拉姆分会的主席,冲博是1939年的协会领地书记。在其他地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主动,他们或者把原有的福利协会改为非洲人协会的分会,或者成立新的分会。在农村方面,我们已举了桑巴拉的例子。帕尔族地区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里1935年成立的“乌桑吉体育福利俱乐部”的会员,在听到关于非洲人协会的消息后,于1946年决定加入非洲人协会。他们要求总会为他们设立一个分会,并“同意在协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设立自己的办事处以前,允许协会使用他们的一个办事处,因为几乎所有的乌桑吉体育福利俱乐部的会员同时也是非洲人协会的会员”。<sup>①</sup>

<sup>①</sup> 引自约翰·艾利夫:《非洲人协会在形成坦桑尼亚国家意识中的作用》,第21页,1968年1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社会科学会议上的论文。(John Iliffe: *The Role of the African Associ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ial Consciousness in Tanzania*)

推动非洲人协会组织工作高潮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主动性和热情。非洲人协会全领地性年会经常在个别分会的倡议下召开。这些年会当然要把领导人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针。最重要的是，这些年会强调协会是全领地性的组织（以及非洲各领地的共同组织），而不单单是体现各分会的实力和热心。这些年会虽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但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使大家认识到整个领地是一个统一体。1945年在多多马举行的第三届年会是最重要的一次全领地性年会。担任东道主的多多马分会书记阿里·庞达明确地号召组织群众。大会议程表明，大会是赞成这个号召的，因为这个议程号召，“为使全体非洲男人和女人都加入非洲人协会而努力”。<sup>①</sup>总之，大会号召把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采取政治行动。与此同时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泛非代表大会也发出同样的号召。非洲人协会和泛非大会都认识到，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获得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胜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举行了两次年会。一次在1946年，另一次在1947年。两次大会都没有采取什么重大的行动，只是到会代表表示支持1945年多多马大会提出的意见，然而在1947年发生了同桑给巴尔的分裂，在最后这一次大会上，桑给巴尔和大陆都有代表，出席人数是历来最多的。这表明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巨大发展。在这次大会上，全领地意识达到了高峰，这可以从桑给巴尔和大陆之间为争夺协会领导

<sup>①</sup> 约翰·艾利夫：《非洲人协会在形成坦桑尼亚国家意识中的作用》，第23页。

权而发生的争吵看出来。非洲人协会的这种超领地范围的性质，无疑是它的泛非思想的一个实质方面。这种思想在协会的宗旨中说得多，写得多，而付诸实践少。1946年，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同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举行领地间的协商。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派詹姆斯·吉丘鲁和弗朗西斯·卡米西同协会讨论关于成立东非联盟的可能性，遭到协会的拒绝。非洲人协会没有响应这个建议，而宁愿只关心领地的事务并以本领地为范围向英国请愿。四个月以后，协会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1946年会议上，通过决议反对建立联盟，这无疑是因为害怕外界的控制。

非洲人协会放弃泛非和超领地范围的事务，以便集中全力于本领地的组织，这不一定是倒退的步骤。同时，在殖民当局提防任何非洲政治协会，更不用说任何泛东非联盟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步骤。最重要的是，强调组织的本领地性质意味着领导人能够集中全力于开展全国范围的运动。由于本土幅员广大，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及其继承者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需要尽一切力量动员群众反对殖民政权。这就是它在1945年开始做的，同时也是它在1947年以后的唯一目标。1945年以后非洲人协会分会数目的增长是这种全国性活动的充分证明。

同桑给巴尔分裂以后，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总部的领导权转到了文官们的手里。跟着就发生反对扩大组织的反动行动。对于这种反动行动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1947年年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地方的因素构成了这种解

释的一个方面。一个更有力的理由看来是 1947 年罢工的结果。这次罢工波及坦噶尼喀的广大地区，卷入罢工的有码头工人、教员、乌文扎的盐工和坦噶的西沙尔麻工人。虽然有些码头工人赢得了若干让步，而没有全部参加罢工的公务员所获很少。由于害怕被镇压和被开除，非洲人协会的文官们甚至在罢工以后退出了战斗性的政治活动，只关心他们自己的集团，从而使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人协会陷于停顿。就某一方面来说，他们采取回避斗争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殖民当局进行镇压时，公务员必然成为第一批受害者。的确，所需要的是专职的政治领导，这一点阿里·庞达在 1947 年年会上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而无论在 1949 和 1950 年，还是在 1952 年姆万扎开始行动以前，要把政治作为专业看来是行不通的。

虽然达累斯萨拉姆总部缺乏全国性的政治意识，但是内地各分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活动却能弥补这种不足而有余。读者会记得，这些地区是农村，只有从这些地区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由于协会在各个省发展了组织，而且各省又存在着有力的领导，能够从 1945 年起到总部的反动时期结束为止，一直在农村开展活动，因此，即使没有总部的指导，协会仍能成长和发展。

在坦桑尼亚，没有一个地方比以姆万扎为省会的苏库马省更能说明这个情况。那里在 1945 年以后出现了成立协会组织的高潮，同时还建立了棉花生产者的销售合作社。保尔·博马尼在 1949 年组织了(维多利亚)湖省种植者协会，后来成

为把全省所有合作社联合在一起的苏库马维多利亚合作联合会总会。它是从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过渡到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时期和 1945 年以后争取自由时期的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合作运动力求从垄断棉花市场的印度商人手里夺取控制权。这种垄断使非洲农民受到剥削，因为印度人一贯付给他们不公平的价格。虽然合作社的目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斗争。合作社利用这种二重性目的使自己免遭封闭。例如 1945 年苏库马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被取缔了，但那里的合作社却没有被禁止。政府在战后提倡种棉花并且想要控制棉花市场，因此在 1951 年以前不准合作运动注册。但这只有促使局势恶化，并帮助保尔·博马尼唤醒农民，使他们看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并同政府更加疏远了。

合作社联合会阐明了农民在政治上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同非洲人协会所提出的意见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非洲人协会是在合作社联合会引导下向农村地区发展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湖省，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由农民组织起来销售棉花的。合作社获准注册以后，博马尼就周游农村地区，并且在 1954 年以前吸收了三万名会员参加合作运动。非洲人协会只有大约三千名会员，而且协会的总书记直到 1953 年才周游农村，比博马尼周游农村地区已经晚了一年。

博马尼在苏库马中心地区的成功的旅行，为姆万扎非洲人协会领导人周游农村地区组织群众采取政治行动铺平了道路。1952 年，博马尼、穆南卡和坎多罗成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

会的专职干部(坎多罗任省协会书记,博马尼和穆南卡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在总部选举尼雷尔总统为协会主席的前一年,苏库马的非洲人协会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博马尼在邀请坎多罗担任书记职务时写道:“因为穆南卡已经放弃了他目前的职业以便为人民的自由而工作,你也应当从塔波拉迁到姆万扎来,以便我们三个人共同为祖国的自由而工作。”<sup>①</sup>更重要的是姆万扎非洲人协会的三位领导人都不是文官,这就表明非洲人协会从此将在那些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们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这种变化的征兆就是协会建议改换名称以适应这个政治转变的新阶段。

这三位领导人立即开始在全省进行组织工作并周游农村地区。(维多利亚)湖省最重要的发展会员的运动可能是在1953年9月,当时,协会的领地书记阿巴·赛克斯同基里洛·贾弗特和坎多罗一起周游了全省。坎多罗写道:“我们走遍了农村和城镇,鼓吹和传播非洲人协会的政治主张。”<sup>②</sup>

在1952年以后的两年内,这些新的领导人成功地使乡村和城镇联合起来。到1954年初,全省的组织已健全,总部设在姆万扎,分会遍布整个苏库马。这就无怪马圭尔博士得出结论说,1954年成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时,只不过是更换名称而已。他写道:苏库马的非洲民族联盟“基本上是换上一个新名称的非洲人协会,因为非洲人协会在领导、组织工

---

① 萨达尼·阿卜杜·坎多罗:《自由的召唤》,1961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第19页。(Saadani Abdu Kandoro:《Mwito wa Uhuru》)

② 萨达尼·阿卜杜·坎多罗:《自由的召唤》,第25页。

作、作风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已经达到完整的政治运动的水平。”<sup>①</sup>

1954年7月7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年会上，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有十七个代表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农村激进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博马尼、穆南卡和基生格在1952年就已提议更换名称。我们至少从姆万扎可以明显看到，实行这种改组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只是更换名称和由新的领导人接管现有的组织。我认为，当时有待完成的任务是加强总部同各个省的联系，这一点在选举尼雷尔总统为协会主席时就已经开始了。无论如何，为了适应各个省的要求，更换名称是必要的。关于这次更换名称，尼雷尔总统对联合国说：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新的组织，但就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个老的组织。它接替了以前称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组织。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大约在十个月前接管了非洲人协会。联盟是一个政治组织，而协会是一个半社会、半政治性的组织，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新的组织。

在过去十个月内，也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组织的期间，我们努力把自己组织起来。协会的所有分

---

<sup>①</sup> 马圭尔：《坦桑尼亚走向“独立”，1945—1959年苏库马小小政治研究》，1969年剑桥出版，第132页。（《Toward 'Uhuru' in Tanzania, A study of Micropolitic in Sukumaland, 1945—59》）

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分会，这些分会遍布全国。<sup>①</sup>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取代了原有的单一政治组织“非洲人协会”，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这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众性政党进展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1955年尼雷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时承认了这一点，以后他又重申了这一点，无需多加论述。因为很容易看出，非洲民族联盟在取代一个拥有强大的省分会组织的单一的运动时，只需要给予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指导就行了。这里的关键是需要正确的领导，而尼雷尔总统的领导正是这种领导。非洲民族联盟迅速壮大的一个更为简单而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唯一目标是“乌呼鲁”（自由）。这比长篇大论更能吸引群众。在取得自由之前，对自由不需要下定义，也不需要说明在取得自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分散群众对主要目标的注意力。在动员群众方面，也许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大农村的不满。这种不满主要是针对殖民当局和酋长——酋长作为领取薪水的官员，是殖民当局的头号代理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坦桑尼亚的一个特点是，殖民政府强调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农业。在战争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而造成欧洲粮食和原料的奇缺，殖民政府就

---

<sup>①</sup>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联合国》，第30—31页，达累斯萨拉姆出版，日期不详。（TANU Katika UNO）



象他们强迫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强迫坦桑尼亚人种植更多的农作物。战后，殖民当局不但没有放松这种强迫种植供应殖民国家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了。殖民地是为殖民国家而存在的，殖民地也就继续被迫生产殖民国家所缺少的产品。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自从约瑟夫·张伯伦时期以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态度确实有了变化，尽管避免使用确切的名称，但宗主国实际上仍然把殖民地看作他们的农场。的确，坦桑尼亚的经济和所有其他殖民地经济一样，是完全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拴在一起的。正因为这样，战后为这个制度生产更多产品的需要比以往大得多了。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殖民当局加强压力，迫使坦桑尼亚人从事种植园农业和小农业生产。战后，殖民当局对每个县都提出了各种发展计划来促使小农场主和白人垦殖者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小农场主的农业生产，政府推行了姆布卢发展计划、苏库马发展计划、姆拉洛复兴计划、卢古鲁土地利用计划、伊林加药水浸洗牛羊计划以及其他许多全国性的计划。

然而，农民发展农业必然意味着农村地区的社会变化。殖民当局不得不通过土著当局制订法律来强迫保守的农民实行改革。这些规定大体上涉及三个主要方面：防止水土流失，改良耕作方法（毁掉旧的棉树、咖啡的护根措施等等）和防止饥荒。

有一些规定无疑是有价值的，但许多是不必要的和烦琐的。伊林加药水浸洗黄牛确实在四年内消灭了“东非海岸热病”，并使这个时期的牛从十六万一千头增加到十九万头。其

他地区得到的好处则不那么明显。卢古鲁土地利用计划实验的结果证明，在未植树的土地上种植水稻比在梯田上种植水稻生长得好。但是上述两种规定农民都反对。农民反对第一种规定的一个原因是把牛带到浸洗池去很麻烦，另一个原因是要他们为他们没有提出要求的服务项目付费。卢古鲁人则反对水土保持措施，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措施干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村长和指导员在执行这些条例时向他们勒索贿赂。而且卢古鲁人还怀疑政府实行垦殖计划的动机，有谣言说他们将会被迫迁出山区。在上述这些措施中，他们主要反对的是修梯田，这既是针对殖民当局，也是针对当地代理人的。这个运动扩展到卢古鲁广大地区，并且在1955年7月发生了暴动。桑巴拉山区也是这种情况，香巴人反对强迫修畦埂和梯田，1957年发生了敌对行动和骚乱，政府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在苏库马，政府通过苏库马联合委员会推行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征购黄牛和征收牛税、棉花税，药水浸洗牛羊和打畦埂。反对这些条例和反对酋长的敌对行动加剧了。苏库马人拒绝执行指示，当政府用逮捕来回答时，在1953年和1954年就发生了暴乱。

人们往往容易否定农民反对农业改革的行动，认为这是保守和向后看。人们总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说明，全世界的农民都反对改革，特别是当这种改革干扰了他们的旧的耕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时更是如此。然而坦桑尼亚全国农民之所以反对这种改革，是因为这种改革往往没有同他们商量或事先没有讲清楚就强加给他们。农民愿意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

法来使用他们的土地，而不愿意为他们所讨厌的服务项目交税。

最重要的是，这些农业技术和发展措施触及到农民所依靠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农民把这看做是对他们的经济保障、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威胁。强制性的征购牛群被农民看做是殖民当局和酋长们串通起来抢夺农民的财产，特别是把他们的牛羊征购去供应设在阿鲁沙和姆万扎的坦噶尼喀罐头食品厂。

但是，对于这种反对听起来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害怕土地被剥夺。1945年以后政府所强调的发展农业是鼓励小农场主同欧洲人的农场一样生产经济作物。1945年以前英国政府采取的土地政策是，如果不首先考虑土著居民的需要，就不得把任何土地拨给私人使用；如果没有得到非洲人的同意，就不得将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迁走。1945年以后，重点改变了。经济发展优先于非洲人的需要和取得他们的同意，现在只要有利于国家，只要土地占有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就可以征用土地。

1951年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由于在1947年提出关于乞力马扎罗—梅鲁地区重新分配土地的威尔逊报告，政府强行将三千名梅鲁人从恩加雷—南尤基地区赶走，以腾出空地给欧洲殖民者。如果说有什么单独的因素帮助鼓动坦桑尼亚非洲群众采取政治行动，从而为非洲人协会以及后来的非洲民族联盟赢得群众支持铺平道路的话，那就是梅鲁土地事件。更直接的结果是，它激发了梅鲁人的政治觉悟，并引导他

们在1951年成立了“梅鲁自由公民联合会”。1946年查加族所以采取行动，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威尔逊调查团成立之后土地会被剥夺。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基马兰多得以建立非洲人协会的县分会并在莫希山区设立了支会。

梅鲁人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建立了联系。公民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两位委员访问内罗毕之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派了弗雷德·库巴依和姆比尤·科伊南格指导他们制定行动方针。他们实际上帮助梅鲁自由公民联合会起草了给(英国)下议院的信件和给联合国的请愿书。基里洛·贾弗特代表公民联合会去联合国向这个世界组织请愿，这对于坦桑尼亚民族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激发了坦桑尼亚其他地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因为贾弗特从纽约回来以后，就周游全国，把梅鲁人土地被没收的事件告诉人民，贾弗特(他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发起人之一)和西顿写道：“这件事和向联合国请愿的结果，大大地激发了其他地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并且为民族主义的组织工作赢得了更大的支持。”<sup>①</sup>联合国访问坦桑尼亚代表团1954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个说法：

不管怎样，现存的事实是，在非洲人的心目中，土地以及使用和拥有土地的问题，是当前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对过去土地被剥夺以及担心和怀疑将来究竟会怎么样，是这个问题的最微妙和最敏感的方面。如果

---

<sup>①</sup> 基里洛·贾弗特和厄尔·西顿：《梅鲁土地事件》，1967年内罗毕出版，第9页。(Kirilo Japhet and Earle Seaton: 《The Meru Land Case》)

梅鲁事件成了全国有政治觉悟的非洲人的常用词汇，这主要不是关怀梅鲁人而是因为在这个事件引起许多顾虑，使他们怀疑从非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从欧洲来到这个领地定居的移民到底有什么用意和目的。这次夺取土地事件在北部山坡地区造成了真正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引起了政治上的疑惧，这种疑惧不仅在那里有，而且在姆万扎、塔波拉、图库尤、达累斯萨拉姆以及凡是非洲政治领袖们拥有追随者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有。<sup>①</sup>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农民的政治觉悟这样高是毫不奇怪的。在这期间，坦桑尼亚农民中存在的不满情绪完全可以把他们动员起来采取群众性政治行动。他们担心土地被剥夺，怨恨和不满发展农业的强制性法律以及捐税和印度商人的敲诈勒索。以殖民政府及土著当局或酋长为一方和以农民为一方之间的鸿沟，由于这些不满而大大扩大了。因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同当局对立的权力机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适应了这个需要，于是得到了争取胜利所必需的群众基础。

非洲民族联盟只有和农民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的要求，农民才会承认它的合法地位。的确，非洲民族联盟势必继续支持农民的事业，因为没有农民，它就没有基础。正如已经指出的，非洲民族联盟在1954年7月以后的行动方针是发展和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遵循非洲人协会已经开辟的道

<sup>①</sup> 《联合国访问代表团报告》，增刊第3号第88页，1955年纽约出版。

路，它的领导人开始把早已不满的农民组织起来。

非洲民族联盟很快同殖民政府发生了冲突。它同政府的第一个冲突地区是在苏库马，那里早在 1946 年就已开始反对自然资源法律，这个斗争在 1954 年达到了最高潮。早先，非洲人协会曾经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在那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殖民当局已注意到那里的群众斗争，但是当局采用了典型的殖民主义方式，企图用禁令来加以镇压而不是同它商谈。到 1954 年 11 月，苏库马地区发生了全面骚乱，这就给政府找到理由来取缔非洲民族联盟。据坎多罗说，关于暴乱和同政府发生冲突的消息同时来自马兰帕卡、穆索马、马斯瓦和布科巴。<sup>①</sup> 到年底，政府禁止了非洲民族联盟在(维多利亚)湖省的一切活动。

在坦桑尼亚的其他地方，例如卢古鲁已经存在不满情绪，非洲民族联盟投入了斗争，把不满的人们组织起来，为他们的要求而斗争，从而发展了会员。1955 年，那里发生了一次暴动。据报告，被杀害的人是非洲民族联盟的一个组织员。后来，非洲民族联盟在莫罗戈罗县的所有组织都被取缔了。1956 年在孔多阿—伊兰吉，1957 年在桑巴拉，1958 年在伊林加，相继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党利用当时群众的不满情绪开始组织和吸收会员，它在人民中间的声望确实是令人震惊的。非洲民族联盟在所有这些县里都同当局对抗，从而填补了由于人民抛弃殖民当局和酋长们而出现的真空。政府在这些县里取缔了非洲民族联盟。到 1958 年，十一个县的非洲民族联盟被

<sup>①</sup> 坎多罗：《自由的召唤》，第 85 页。

取缔。同时政府还颁布限制政治组织的法律。这个法律是针对非洲民族联盟的，政府希望通过法律来取消这个联盟。

亚伯拉罕斯先生亲眼看见了非洲民族联盟在北尼亚姆维济族地区基层群众中发展组织的一个更有意思的方法。<sup>①</sup>当非洲民族联盟于1958年在尼亚姆维济族地区首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时，它通过小米脱粒队在北尼亚姆维济人中间发展组织，这种小米脱粒队是一些邻居为了共同脱粒而建立的。主要的党代表和队里的党组织负责人是小米脱粒队长而不是村长。这样他在非洲民族联盟里和在小米脱粒队里具有同样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小米脱粒的工具是由党组织掌握的，参加小米脱粒队也就等于同时参加了非洲民族联盟。非洲民族联盟用这种方法在北尼亚姆维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通过小米脱粒队取得了它的合法地位。小米脱粒队用同样的办法来处分那些不入队的人和不参加小米脱粒的人。小米脱粒队长和非洲民族联盟同土著当局和殖民政府之间本来是会发生冲突的。然而由于非洲民族联盟取得了政权，这种冲突没有发生过。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工作重点和战略目标是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联盟力求取代这个国家的政权中心，即总督和殖民立法机构。民族主义者对这个中心，也就是对殖民立法机构进行攻击，并且试图取代这个机构，把这作为政治斗争的一

<sup>①</sup> 亚伯拉罕斯：《友邻组织：北尼亚姆维济的一种主要的小组系统》，载1965年4月《非洲》杂志，第143—167页。（R. G. Abrahams: «Neighbourhood Organization: A Major Sub-system among the Northern Nyamwezi»）

种策略，近日的一些作者对于这一点无疑是强调得过晚了。<sup>①</sup>这使人有点不安，因为这些作者过于轻易地把这种方式的斗争看做是衡量非洲民族主义的唯一尺度，好象没有它就意味着没有非洲民族主义。这些作者急于一笔抹煞我国民族主义的最初阶段，以这一点为根据，断言非洲民族主义是世界大战以后的现象。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这种设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政权是，或者在表面上是掌握在殖民立法机构的手中。尤其是自从四十年代后期立法机构的成员扩大到包括官员和非官员之后，情况看来更是如此。因此，更换立法机构当然意味着从殖民政府手里取得了政权。其次，这种策略也被认为是衡量殖民地人民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尺度。因为这种策略取得了成功，那些鼓吹这种策略的人们很快就把我国民族主义的最初阶段一笔勾销了。

在一种政治策略不能赢得独立时，如果坦桑尼亚人民不改变争取独立的斗争策略，那显然是怪事。例如，在独立运动的早期还没有立法机构，因此“马及马及”战士就不可能以这样一个具体事物作为进攻的目标。因而攻击的目标当然可能会有错误，而且在许多方面目标是分散的。但是如果说坦桑尼亚或其他殖民地的非洲人没有一个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作为中心目标，那肯定是错误的。重要的不是攻击的具体目标，而是民族主义斗争的内容。早期的和后期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行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希望和力图废除欧洲人的统治从而

<sup>①</sup> 主要参阅约翰·朗斯代尔的《非洲国家的诞生》。（《The Emergence of African Nations》）



实现自治，这无疑是我们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

早先，尼雷尔总统相信坦桑尼亚本土可以通过联合国取得独立。这就是为什么他于1955年在托管理事会上提出，正是坦噶尼喀而不是它的不那么幸运的邻国将会带头实行立宪改革，因为它是一个“托管领地”。<sup>①</sup>虽然这种越过殖民政府向更高权力机构申诉的可能性并不是在1954年新出现的事物，然而它似乎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能够不通过暴力而迅速实现独立的唯一途径。尼雷尔总统第一次到纽约代表非洲民族联盟和大多数非洲人向托管理事会请愿时，毫不含糊地要求“托管理事会和坦噶尼喀执行当局宣布，尽管坦噶尼喀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未来的政府应当是以非洲人为主的政府”。1956年他再度去联合国，再一次强烈要求坦桑尼亚本土的自治和独立。他两次访问联合国使他赢得了很大的尊敬和国际上的承认。

但是他很快发现必须在国内实现这种变革。他当时一定已经认识到，联合国虽然能够影响这种变革和加快走向民族独立的步伐，但是不能迫使英国政府给与坦桑尼亚本土独立。尼雷尔总统知道殖民当局的弱点和力量，但是他还必须显示他有一个团结的和强大的党来和平地代替一个多种族的党。所以他从纽约回来后，以空前的努力来组织和动员坦桑尼亚非洲人。他回国以后就辞去了在普古的教师职务，用全部时间担任党主席的工作和组织人民争取“乌呼鲁”(自由)。

坦桑尼亚殖民当局在1949年至1957年期间的政策是多

<sup>①</sup>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联合国》，第30页。

种族主义。立法议会的政策是建立在平等分配代表的原则基础上,简单地说,就是立法机构中实行种族代表制。在这个政策的背后主要是经济的因素,因为英国人认为,既然欧洲人和亚洲人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尽管这两种人都属于可悲的少数,然而他们必须同占大多数的非洲人拥有同等的代表权。这种想法的实质是认为,少数人在经济上对这个国家极为重要,所以必须使他们在国家事务中享有支配权才能说服他们留在这个国家。这种政策的问题在于,虽然政府决心实行多种族主义,但这种多种族主义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目的不仅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而且还在政治事务中都确保了少数人的支配地位。政府在理论上也说多种族主义是过渡性的,然而它并不想实行有利于非洲人的变革。因此,在殖民当局的心目中不认为非洲人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获得独立。

1957年,正当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要求当局宣布坦桑尼亚是一个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自治国家时,当局支持立法议会中的非官方议员成立了“坦噶尼喀统一党”。差不多与此同时,各省也推行多种族的县议会。由于在国内没有基础,结果统一党成为只是一个政府党加上若干在政府做官的酋长。这样一个党想在竞选中同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对抗是不能取胜的。

推行多种族的县议会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在这以前,县议会全部是非洲人。非洲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指派非非洲人参加他们的议会。他们还担心由于非非洲人有钱,议会将受

他们控制。非洲民族联盟和其他人反对非非洲人在县议会中的代表名额超过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于遭到反对，多种族县议会只在八个县实行，所有这些县的土著当局都是虚弱的。当时许多酋长参加了反对多种族议会的斗争，这个斗争使民族主义者同酋长站到一起来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联盟。

1958年，实行多种族县议会之一的盖塔县发生了暴动。在实行这种议会之前事先肯定是没有经过协商的。这个决定看来确实是县专员强加于酋长的。尼雷尔总统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之声》中把盖塔非洲人对这个问题的不满提了出来。他和保尔·博马尼于四月间来到盖塔，虽然不准他公开集会，但是他的访问对这种不满起了催化作用。人们怀疑政府在盖塔推行这种多种族议会是为了把土地给予亚洲人和欧洲人。除了这种担心之外，盖塔暴动无疑是一次群众性的人民起义，目标是反对殖民当局不经他们同意就把多种族议会强加给他们。正如尼雷尔总统早些时候说过的，暴动表明被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大大恶化，达到了爆炸点。这正是非洲民族联盟想要促成的形势。它表明殖民当局已不再得到人民的尊重，同时也表明殖民当局不依靠武力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能了。

到了1958年殖民机构看来在瓦解的时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威信有了巨大的增长。它的会员当时已发展到二十万人。1958年1月，非洲民族联盟举行年会，考虑是否按照平分制度参加1958—1959年度大选的问题，根据这个制

度，每个选区的选民必须选出三名候选人：一名亚洲人，一名欧洲人和一名非洲人。

这次年会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参加大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波克·穆南卡坚持非洲民族联盟应当抵制大选。辩论过程中使人感到非洲民族联盟有可能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从而破坏了群众运动赖以建立起来的统一原则。然而明智的意见占了上风，大会接受了尼雷尔总统关于非洲民族联盟应当参加大选的忠告。可是朱贝里·姆顿武立即开始组织“非洲国民大会”，反对非洲民族联盟，不同意按照一个多种族的宪法参加大选。得不到群众支持的“非洲国民大会”无法同非洲民族联盟匹敌。它和统一党一样在1958—1959年度的大选中没有赢得任何议席，在以后历届的大选中也是一无所获。对非洲民族联盟的团结的更大威胁要算坦噶尼喀全国穆斯林联盟在1959年提出的请愿，它要求坦噶尼喀在国内的穆斯林还没有受到更多的教育之前不实行独立。这个要求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唯有独立的坦桑尼亚才能够给全体公民带来这种进步。谁也不知道穆斯林联盟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它遭到了宗教领袖们的谴责，于是从宗教立场来分裂非洲民族联盟的威胁终于避免了，而这种威胁曾经损害过乌干达的一些政党。在1958—1959年度的大选中，非洲民族联盟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它在1960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英国人已不能再阻挠坦桑尼亚的独立了。第二年的12月9日，坦桑尼亚人重新获得了独立。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起源不是1954年，而是二十世

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怀疑了。坦桑尼亚民族主义的产生肯定要追溯到殖民主义的到来。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为非洲民族联盟提供了一个中心基地，使它发展为群众运动。非洲民族联盟从非洲人协会继承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和运动，它对于各个地区分会的非洲会员没有任何歧视。作为坦桑尼亚通用混合语的斯瓦希里语无疑是有助于巩固这种统一的。

在苏库马地区，非洲人协会的领导在五十年代的头两年就开始组织群众从事政治活动了。虽然非洲人协会自从1945年以来就一直强调群众支持的重要性。坦桑尼亚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有理由说，在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以前，坦桑尼亚就已经开始有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尽管这个运动的组织可能是松散的。随着1954年非洲民族联盟的成立，在全国开始有效地组织群众进行政治活动。

强调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人协会之间的互相衔接，决不是忽视非洲民族联盟的作用，也决不是说非洲民族联盟没有成立的必要。因为正是非洲民族联盟把以部落或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同非洲人协会溶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以取代殖民政府为中心目标的政治运动。为了使非洲人协会的新领导和觉醒了的农村人口对政治方向和组织方法有新的认识，有必要将非洲人协会改组为非洲民族联盟。这里也很有必要再次着重指出非洲民族联盟的组织方法，它把城市和乡村、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了。只要这一切都联合起来，重新获得独立就容易了。只有在独立以后，坦桑尼亚人才能解决

他们的问题，至于选择什么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并不是在 1961 年独立之后就立即解决这些问题的。

1961 年殖民政府被取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同英国人或他们的制度完全决裂。诚然，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变化只是政府和上层文官的人事更换，而不是我们的制度、态度和思想。尼雷尔总统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拥挤的集会上解释《阿鲁沙宣言》时承认，非洲民族联盟虽然从 1954 年以来就提出，“只有坦桑尼亚人才会充分关心为了坦桑尼亚人的利益而发展坦桑尼亚，也只有坦桑尼亚人才能说明这些利益是什么”，<sup>①</sup>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实现。1967 年 2 月 5 日发表的《阿鲁沙宣言》，戏剧性地阐明了我们将要通过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来发展我们自己。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宣言体现了我们的真正的独立。尼雷尔总统说，它“重申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坦桑尼亚人并希望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继续作为坦桑尼亚人”。<sup>②</sup>

---

① 尼雷尔：《阿鲁沙宣言说明》，第 4 页。（《The Arusha Declaration Teach-in》）

② 同上书，第 1 页。

## 第九章 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

约翰内斯·莫萨雷

### 导 言

有两个“名词”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背景和革命。前者的意思是指1964年1月12日以前，桑给巴尔各族人民，特别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后者的意思是指非洲一设拉子党的拥护者以暴力推翻了阿拉伯苏丹连同他的阿拉伯人控制的政府，以及随后在非洲一设拉子党和乌玛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非洲人政府。

政治革命是人类的问题；除非有了人与人的关系，否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而除了人们互相相处的方式以外，难道还有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吗？然而人们的思想信仰和对他们同胞的所作所为，不会也不能改变人的本质。经验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有些关系对人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有些关系则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人的适应性并没有大到可以使他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都无所谓。因此，一切善于思索的人们的任务，就是认清产生消极影响的人与人的关系，采取办法来制止这种关系，并提出方法和手段，鼓励产生积极影响的关系在他们的社会中成长和发展起来。

鼓励产生积极影响的政治关系以及阻止产生消极影响的政治关系有各种不同的手段,如:全民投票、复决、选举或政治革命。前三种通常是和平地进行的,后一种除了通过对立的双方之间的暴力和武装斗争之外,通常是无法解决的。本章所要讨论的是后两种手段,特别是最后一种手段。

在正常情况下,政治革命发生之前,总是先发生诸如示威、不合作、和平抵制、暴动和政治鼓动等抗议行动。然而政治革命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上述这些行动。因为其他抗议形式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现政府修改或废除它的某些政策,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则在于推翻现政府并由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取而代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政治革命常常是通过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的,因为当政的人很少会不竭力抵抗就让出政权的。

## 革 命

### 定 义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政治革命是“在任何国家里,原来被统治的人民彻底推翻了现政府”。革命就是由新政府根本改变被推翻的政府的原则及其措施,特别是关系到本国公民之间以及本国与外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规定的那些原则和措施。

无论是从人的观点或物的观点来看,政治革命是代价昂贵的事。政治革命不是为了无关紧要的事而发动的。政治革命是作为解决关系到管理公众事务的根本问题的分歧而采取



的最后手段。尼雷尔导师指出：“‘革命’这个词之所以往往同武装起义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在任何社会里，真正的分歧的存在造成‘内战’的形势，并往往导致流血的革命。”<sup>①</sup>

当人们在自己的同胞手下忍受痛苦和不公平时，这种忍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断使用武力和暴力，以至超出了这个限度，那就不可避免地迫使被统治者采取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统治者。约翰内斯·麦斯纳<sup>②</sup>说过，没有一个国家能仅仅依靠强权。这个话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因为强权和政治觉悟不是好伙伴。强权往往有碍于公众的政治觉悟，因而有碍于他们维护自己的公共利益的基本道德准则和权利，也有碍于当这些基本道德准则为统治当局所剥夺时以武力对付武力的权利。政治革命往往伴随着暴力和恐怖，因为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疯狂地和顽固地死抱着权力的政治工具和他们的神圣财产不放。桑给巴尔革命前的形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桑给巴尔的金字塔社会是由三个明显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是最下层的、最贫穷的阶级；亚洲人是商业中等阶级；阿拉伯人是统治的地主贵族阶级。拉斯基说过：

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严重的不平等使得社会的基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穷人所渴望的自由，是能够享受他们的统治者所享

① 尼雷尔：《自由和统一》，196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96页。

② 麦斯纳：《社会伦理学》（增订版），1965年伦敦出版，第548，549页。  
(Johannes Messner: «Social Ethics»)

受的那些东西的自由。自由的半阴影，自由的目的和生命，就是争取平等的运动。<sup>①</sup>

### 政治革命的概念

同政治革命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一个信念是：人们不但有能力而且有责任来制定、修改和废除那些规定他们的政治关系的法律和制度。这个信念就是：人们要活得有意义，有目的，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这个目的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们就应当主动采取措施越过一切阻力来促其实现。这些措施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在社会上创造有利条件，保证个人和社团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参加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第二，清除阻挠这种自由参加的障碍。

人们认识到，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他们需要组织和协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工作。政府是负责作出有关组织和协调这些工作的决定的国家机关。政府本身不是一个目的，而是组织和协调人民的个人努力的一种手段，不管这些努力是以个人体力的形式出现还是以他们的财力（表现为货币的贡献即捐税）的形式出现。一旦政府的行动违背了它当初建立的目的时，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政治革命的概念“是以人民拥有绝对主权的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包括下列三项原则：（一）政权的唯一基础是人民的意志；（二）它完全依赖于人民的意志；（三）因此，人民可以

---

<sup>①</sup> 哈罗德·拉斯基：《现代国家的自由》，1961年伦敦出版，第146页。  
(Harold J. Laski: «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随时改组政权”。<sup>①</sup>

## 桑给巴尔和奔巴的各族人民

### 概 况

桑给巴尔和奔巴有四个主要的民族集团：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我们要谈的主要是前两个集团，因为当后两个集团对前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时，它们就会进入舞台的中心。非洲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生的桑给巴尔和奔巴的非洲人，另一类是大陆上的非洲人。土生的桑给巴尔和奔巴的非洲人还分为哈迪木人、图姆巴图人和奔巴人，他们分别集居于桑给巴尔、图姆巴图和奔巴三个岛上。桑给巴尔和奔巴的主要居民集团在1924年、1931年和1948年的人口数字见附表一。

附 表 一\*

种 族	1924		1931		1948	
	人 数	占%	人 数	占%	人 数	占%
非 洲 人	181,279	83.6	184,032	78.2	199,860	75.7
阿 拉 伯 人	18,884	8.7	33,401	14.2	44,560	16.9
印 度 人	12,903	6.0	14,242	6.1	15,211	5.8
科 摩 罗 人	2,506	1.2	2,434	1.0	3,267	1.1
果 阿 人	869	0.4	1,004	0.4	681	0.3
欧 洲 人	272	0.1	278	0.1	296	0.1
其 他	88	—	37	—	287	0.1
总 计	216,797	100.0	235,428	100.0	264,162	100.0

\* 1948年桑给巴尔和奔巴人口调查。

① 麦斯纳：《社会伦理学》，第723页。

除了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以外，第三个重要的社会集团是设拉子人。这三者是桑给巴尔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这三个集团在 1948 年的人口数字见附表二：

附表二\*

社会集团	桑给巴尔		奔巴		两岛	
	人数	占%	人数	占%	人数	占%
设拉子人	81,150	61.2	67,330	60.2	148,480	60.8
非洲人	37,502	28.3	13,878	12.4	51,380	21.0
阿拉伯人	13,977	10.5	30,583	27.4	44,566	18.2
总计	132,629	100.0	111,791	100.0	244,420	100.0

\* 来源同上。

应当注意到，桑给巴尔的大陆非洲人为奔巴大陆非洲人的两倍多。在桑给巴尔，阿拉伯人的人数不到大陆非洲人的一半，而在奔巴，情况恰恰相反。认识到这个事实有助于了解奔巴的设拉子人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对待大陆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态度为什么有根本的不同。在整个民族主义、政党冲突和选举运动的时代，桑给巴尔和奔巴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竞相争取设拉子人的支持这个中心进行的。

### 主要的居民集团

(一) 哈迪木人。据约翰·格雷爵士说，“哈迪木人是在不同时期从大陆来到桑给巴尔的，他们是大陆上许多不同部族的后裔。一个共同的联系使他们具有团结的意识，这就是

他们承认‘琼贝’或‘姆威尼姆库乌’(伟大的君主)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唯一统治者”。<sup>①</sup>哈迪木人是桑给巴尔主要的土著居民。他们大半住在这个岛的南部、东南部和东部。乌恩古扎一乌库乌、基津卡齐、伯韦朱乌和奇瓦卡是哈迪木人聚居的中心区，他们的人数在1924年、1931年和1948年分别为17,052、28,511和41,766。

在桑给巴尔成为阿拉伯人的殖民地以前，哈迪木人由一个“姆威尼姆库乌”统治，他在若干“马舍哈”的协助下管理他的领地。这个领地分成若干个村，每个村由一个“舍哈”<sup>②</sup>管辖。早在1828年，阿曼教长赛义德就要求哈迪木人承认他对桑给巴尔的统治权。赛义德同“姆威尼姆库乌”举行了谈判。据说双方达成了协议，内容是姆威尼姆库乌把他的一部分政治权力交给阿曼教长赛义德，后者则给予前者经济上的补偿。

不过，谈判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姆威尼姆库乌”要么接受赛义德的条件，要么就得经受一场他深信阿拉伯人必然取胜的征服战争。因为，在谈判期间，赛义德的全部舰队就排列在海岸边，只要一接到通知立即可以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姆威尼姆库乌”只有屈服。这就是桑给巴尔被赛义德领导下的阿曼阿拉伯人公开变成殖民地的开始。

(二) 图姆巴图人。根据约翰·格雷综述的一份关于图姆巴图历史的抄本，<sup>③</sup>在希兹拉历法六百年(公元1204年)，

① 格雷：《中世纪至1856年的桑给巴尔史》，1962年伦敦出版，第159页。

② “马舍哈”(masheha)、“舍哈”(sheha)均斯瓦希里语，意为酋长、头人、领导人。——译者

③ 格雷：《中世纪至1856年的桑给巴尔史》，第16—17页。

巴斯拉国图迪地方的阿布达利或阿拉威部族的苏丹尤素福·本·阿拉威来到图姆巴图岛。据说现已毁坏的马库塔尼城就是他建造的，这个结论还有一个更引人入胜的事件。据说当尤素福苏丹在马库塔尼定居时，有一个名叫冲果的非洲人从大陆移居到图姆巴图岛南端一个叫做冲果韦的地方。苏丹想要杀死这个新来的人，但后者躲藏起来。不久，苏丹和马库塔尼的人民遭到阿拉伯人的侵袭。阿拉伯人毁掉了这个城市。大多数居民被杀死或被抓去当奴隶。幸存的少数人同冲果的人合在一起，他们的后裔就是现在图姆巴图岛的人民。因此，根据这个传说，图姆巴图人的祖先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人数在1924年、1931年和1948年分别是26,382、34,975和46,131。

当赛义德来到桑给巴尔时，图姆巴图由本地的“舍哈”统治着。“舍哈”这个职位可以由妇女或者男人担任。其中有一个“舍哈”叫姆瓦娜·纳·姆瓦娜，是个妇女，她嫁给了哈迪木的“姆威尼姆库乌”。然而这个婚姻并没有使这两个集团合并起来。阿拉伯人想把图姆巴图置于哈迪木的“姆威尼姆库乌”的统治之下，以便他们可以通过他来控制图姆巴图。阿拉伯人的这个企图终于实现了。因为姆瓦娜·纳·姆瓦娜的最后一个孙子死后，继任者是一位名叫姆塞伦的人，他是由赛义德·本·苏尔坦或他的儿子和继承者马吉德任命的。因为姆塞伦不是世袭家族出身，所以他被置于哈迪木族的“姆威尼姆库乌”哈马迪之下，哈马迪死于1865年。哈马迪死后，桑给巴尔苏丹写了一封信承认姆塞伦是哈迪木族的新统治者阿哈

默德手下的“舍哈”。<sup>①</sup>

(三) 奔巴人。奔巴人和图姆巴图人一样,他们的祖先是非洲人和亚洲人。公元十二世纪初,从波斯的设拉子来的移民开始到达奔巴。从大陆上来的是讲班图语的人,特别是塞格朱部族的人。在葡萄牙统治桑给巴尔和奔巴期间(1498—1668年),从阿拉伯和其他亚洲国家流入这两个岛屿的新移民大大减少了。这使早先来自波斯的移民和土著非洲人之间更多地通婚,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非洲人和亚洲人混血的民族,但是他们宁愿称呼自己是设拉子人。

奔巴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形式是很分散的。上面是“迪瓦尼”,<sup>②</sup>在他手下设若干“舍哈”。“舍哈”是一个村的统治者,“迪瓦尼”则管辖若干个村。

奔巴特有的独立精神迫使他们要求赛义德·本·苏尔坦的援助,借以摆脱马兹鲁伊人对奔巴的干涉。据说赛义德同恩格瓦查尼和阿瑟马尼两个“迪瓦尼”率领的奔巴代表团签订了下述条约:

“迪瓦尼”恩格瓦查尼和“迪瓦尼”阿瑟马尼来到马斯喀特并同赛义德达成如下协议:如果赛义德驱走马兹鲁伊人,他们将是他的同盟者,同他一心一德;他们将下令人民向赛义德纳税,此项税款将以酥油和席子交付;赛义德将被允许在他喜欢的任何地方进行建筑。赛义德表示

<sup>①</sup> 格雷:《中世纪至1856年的桑给巴尔史》,第169—170页。

<sup>②</sup> “迪瓦尼”(Diwani),斯瓦希里语,意为长官、大人、参议。——译者

同意。本协议使双方成为兄弟。凡看到本协议的人均受本协议的约束，必须遵照本协议行事。签订者：姆威尼·沙梅·瓦·姆威尼·沙梅、国王阿里和恩格瓦查尼·马卡梅·迪瓦尼。<sup>①</sup>

在打败马兹鲁伊人以后，原来在奔巴岛作战的赛义德的士兵有很大一部分在岛上定居。其中有的同当地妇女结婚，有的则回家把眷属搬来。新的居民得到了土地种植丁香。正如在桑给巴尔的情况一样，总的结果是，土著居民被新来的人赶到较为贫瘠的东部。不过，由于奔巴的肥沃土地的分配比桑给巴尔的分配较为公平，因此奔巴居民不象桑给巴尔那样尖锐地反对这种征用土地的形式。

(四) 设拉子人。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也被称为哈迪木人、图姆巴图人、奔巴人或阿拉伯人。有的作者曾经建议采用这样的称呼：哈迪木—设拉子、图姆巴图—设拉子和奔巴—设拉子。有的则认为桑给巴尔和奔巴的哈迪木、图姆巴图和奔巴等三个土著“部族”是设拉子人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三个“部族”，也就没有什么“设拉子”人。特别是在区分大陆非洲人(他们一向被称为非洲人)和土著居民(哈迪木人、图姆巴图人和奔巴人)时更是如此。在进行这种区分时，土著居民就被称为设拉子人。设拉子人也喜欢用这个称呼以便把自己同大陆非洲人区别开来。在1924年、1931年和1948年，这两个岛上的设拉子人分别为26,430、40,891和175。1931年至1948年之间设拉子人数骤然减少。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

<sup>①</sup> 格雷：《中世纪至1856年的桑给巴尔史》，第114—115页。



种骤然减少决不是由于死亡或者移居外地，而仅仅是由于同一个人更换了他的族籍罢了。

在桑给巴尔，非洲人的过去是耻辱和卑贱——当奴隶。因此，设拉子人自然竭力避免被看作是大陆非洲人或是与大陆非洲人有关系的人。在民族主义和政党斗争的时代，阿拉伯人控制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由于设拉子人不愿意同大陆非洲人站在一起而在选举运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把大陆来的人描绘成设拉子人和阿拉伯人一向和平相处的国土上的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从而得以利用设拉子人的这种分离情绪作为赢得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宣传在奔巴岛和图姆巴图岛的设拉子人中间特别有成效”。<sup>①</sup>

“设拉子人尽管在人数上占多数，却经常是桑给巴尔政治中动摇不定的因素。一部分人（图姆巴图和奔巴的设拉子人）比较支持阿拉伯人，因而也就比较支持苏丹和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另一部分人（桑给巴尔的哈迪木—设拉子人），支持来自大陆的非设拉子的非洲人；第三部分人则力图保持设拉子人的特殊身份。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属于这个或那个集团。”<sup>②</sup>例如，1961年1月选举以后，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的三名议员中，有两名加入了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从而使民族主义党的席位从九席增为十一席。另一名加入了非洲—设拉子党，从而使它的席位从十席也增为十

<sup>①</sup> 迈克尔·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1965年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55—156页。

<sup>②</sup> 约翰·奥克洛：《桑给巴尔革命》，1967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第78页。（John Okello: 《Revolution in Zanzibar》）

一席。这就造成了僵局，而不得不在以后六个月内再举行一次选举。

从根本上说，奔巴—设拉子人同哈迪木人在对待阿拉伯人态度上的不同，是由于阿拉伯人在这两个岛屿建立统治的方法不同。阿曼的阿拉伯人来到奔巴并在奔巴定居，是赛义德同两个奔巴—设拉子的“迪瓦尼”缔结条约的结果；而在桑给巴尔，当赛义德 1828 年同哈迪木—设拉子人的“姆威尼姆库乌”举行谈判时，他把全部舰队排列在海岸边，准备在必要时动用武力，迫使“姆威尼姆库乌”不得不屈服，否则就要受到军事进攻。

(五) 大陆非洲人。桑给巴尔和奔巴的大陆非洲人来自东非的不同国家。据 1948 年的人口调查，桑给巴尔和奔巴的非洲居民按国籍划分如下表：

附 表 三\*

国 籍	桑给巴尔		奔 巴		两 岛	
	人 数	占%	人 数	占%	人 数	占%
桑给巴尔	81,150	68.4	67,330	82.9	148,480	73.3
坦噶尼喀	17,485	14.7	5,099	6.3	22,584	11.3
肯尼亚	173	0.1	134	0.2	307	0.2
乌干达	411	0.3	55	—	466	0.2
尼亚萨兰	6,131	5.2	2,966	3.7	9,097	4.6
莫桑比克	1,130	1.0	564	0.7	1,694	0.8
非洲大陆 其他国家	12,074	10.2	5,055	6.2	17,129	8.6
不 明 者	98	0.1	5	—	103	—
合 计	118,652	100.0	81,208	100.0	199,860	100.0

\* 桑给巴尔和奔巴 1948 年人口调查。

最近从大陆移入桑给巴尔的移民，多数是种植园工人或城镇的体力劳动者。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丁香收获季节过后总是回到他们在大陆的故乡。后来有些人就在桑给巴尔定居下来并同当地妇女结婚。同奔巴和桑给巴尔本来的居民比较起来，这些人同大陆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958年末，“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的领导机构为了促成非洲—设拉子党和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之间的团结而作的努力，由于这两个党分别代表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敌意而遭到失败。1959年4月中在桑给巴尔举行“泛非自由运动”会议期间，尼雷尔导师指出：“桑给巴尔仍然存在着主人和奴隶的气氛……。”因此，桑给巴尔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为争取垄断政治权力和一旦赢得权力时竭力为保持这种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六) 阿拉伯人。桑给巴尔有四个主要的阿拉伯社会集团。第一，来自哈德拉米海岸舍尔地方的西希里小商人。第二，来自马斯喀特和波斯湾其他地区的阿曼阿拉伯人。这些人在1700年至1850年之间来到桑给巴尔，特别是在阿曼帝国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到桑给巴尔之后。到1964年1月12日为止，他们一直是地主贵族阶级和上层统治集团的主力。第三，远在葡萄牙人进入东非以前就已来到桑给巴尔的阿曼阿拉伯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如马兹鲁伊氏族，同在1741年结束的前亚鲁比王朝有着长久的联系。最后一个集团事实上是一些斯瓦希里人或设拉子人，他们可能具有一些阿拉伯血统，

但其他阿拉伯人没有完全把他们当成同胞。

贸易一直是把成千的阿拉伯人从他们家乡吸引到桑给巴尔和东非各地来的因素（正如阿尔珀斯博士在本书第三章所叙述的那样）。而阿曼帝国定都桑给巴尔则开辟了阿拉伯人把这个岛屿殖民地化的一个新阶段。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sup>①</sup>阿布·赛义德王朝继承了亚鲁比王朝，但是新王朝的权力，直到赛义德于1804年至1856年统治阿曼帝国时才巩固下来。当赛义德忙于在桑给巴尔建立种植园经济，并因而把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到桑给巴尔时，英国人正致力于终止奴隶买卖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英国人逐渐承认了阿曼统治者对东非海岸的一般宗主权。在这个时期，他们认识到桑给巴尔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问题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赛义德的最重要的臣民同时也是东非最大的奴隶贩子。而且，桑给巴尔的全部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在桑给巴尔利益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1841年，哈默顿海军上校作为英国的第一任代表来到桑给巴尔，两年后他成为英国驻该岛的领事。英国人同赛义德及其继承者（马吉德和巴加什）之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并签订了若干条约，主要的目的在于终止奴隶贸易。阿拉伯人的利益得以巩固的全部戏剧性的高潮，也许要算阿里·本·赛义德苏丹在1890年同英国政府缔结一项条约，使他的王国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地。

<sup>①</sup> 疑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误。——译者

英国在桑给巴尔建立统治以及英国在同其他国家瓜分东非时必须解决的外交问题，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这里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英国政府很重视桑给巴尔的统治阶级，在它的殖民地机构中只吸收这个统治阶级的人参加。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桑给巴尔的官僚机构有了很大的发展，阿拉伯人被大批地招收到政府部门任职。正如洛夫柴所说的：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官方（英国）继续把桑给巴尔看做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它有计划地优先派阿拉伯人担任高级官职。英国人同时通过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和不同的薪金等级等种种办法，积极鼓励阿拉伯人参加政府工作。阿拉伯政权在英国到来之前只有苏丹和为数有限的侍从军官以及代理人，在英国到来之后就扩大成为一个由许多经过训练的熟练的阿拉伯专业人才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sup>①</sup>

直到1968年，英国政府继续支持赛义德的后裔。当桑给巴尔最后一个阿拉伯苏丹贾姆希德·本·阿布达拉于1964年1月被废黜时，英国政府不但让他住在英国，而且决定在他居留英国的余生中给予他和他的家属经济上的支持。英国政府为此目的拨出了十万英镑，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这件事情说：“英国政府决定供给这位前任苏丹一笔养老金，这是承认他们对他负有特别的义务。”<sup>②</sup>

<sup>①</sup> 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第62—63页。

<sup>②</sup> 《基信现代档案资料》，1963—1964年度，20076. A。（《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七) 印度人。移居东非的大多数印度人来自印度的西部和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桑给巴尔和东非其他港口与城镇成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商业集团。他们至今在坦桑尼亚仍然和过去一样是贸易、商业和金融界的主人。在赛义德把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到桑给巴尔之后，他们在桑给巴尔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佩尔格莱夫写道：

赛义德知道，不管他本族的臣民有多大的本领和事业，除非他们同印度商人合作并接受印度商人的领导，他们的商业交易决不会取得真正的重要地位，因此，他运用自己的各种手段来引诱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和马斯喀特的孔卡人，并且用绝对的容忍、特别的豁免和经常的恩宠，把这个港口变成一个半印度人的殖民地。<sup>①</sup>

(八) 欧洲人。这个集团主要是英国人，特别是在革命以前。从数量上说，他们向来只占人口的0.1%。但是从1890年11月起至1963年12月桑给巴尔独立以前，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这个岛屿的主人。他们几乎全都从事行政管理和外交工作。他们中间基本上没有人在桑给巴尔定居。他们的人数在1924年、1931年和1948年分别为272、278和276。

---

<sup>①</sup> 佩尔格莱夫：《东非的亚洲人》，19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页。  
(Pelgrave in George Delf: «Asians in East Africa»)

## 社会团体

### 阿拉伯人协会

这个组织原先是为阿拉伯奴隶主争取赔偿而成立的，这些奴隶主由于废除奴隶贸易而受到了损失。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反英的，因为英国人是推行反对奴隶贸易的政策和活动的倡导者。后来随着协会的发展，它扩大了活动范围，代表桑给巴尔阿拉伯人的一般利益。这个协会的核心始终是由最富有和在桑给巴尔居住年代最久的阿拉伯家族组成的。

只要英国在桑给巴尔的殖民政策是保护和维持阿拉伯的寡头统治，不实行宪法改革，阿拉伯人就会十分满意和高枕无忧。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英国开始实行民主政策并且保证要引导桑给巴尔保护地走向独立。华尔特·库茨爵士<sup>①</sup>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立宪建议，要用较为民主的办法从各个部族社会中选择桑给巴尔立法议会代表，这就为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的寡头统治开了红灯。“这意味着，这个社会集团如果要保持他们的上层地位，就必须无限期地推迟独立”，从而使英国人的存在能够防止阿拉伯少数和非洲多数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是制定一项不是平等主义的政策”。<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寡头统治知道，他们最好是在桑给巴尔兴起强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之前，就把政权牢牢地掌

<sup>①</sup> 英国总督。——译者

<sup>②</sup> 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第130页。

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也意识到，他们的事业不仅需要从自己的阿拉伯同胞那里，而且需要从非洲人那里赢得更广泛的支持。酋长阿里·莫辛和阿摩亚·扎霍尔就持有这种意见。

### 非洲人协会

非洲人协会成立于1934年，它的主要支持者是大陆非洲人。它成立以后很快就要求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正式承认它为团体会员。在桑给巴尔，非洲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互相对抗的。当阿拉伯人知道英国人已准备不管阿拉伯人同意与否都要实行兰金的立宪建议时，他们就决定鼓吹和推行“立即独立”的政策，以便在出现强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之前就把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相反，非洲人则要求把独立推延到他们能够同阿拉伯人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管理公共事务的时候。正是这个原因，泛非主义运动和其他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在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运动的初期，很难断定究竟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还是非洲一设拉子党真正代表桑给巴尔人民的利益。

1958年9月中在姆万扎举行的“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不得不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到桑给巴尔调查和评价这两个政党提出的要求。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人也感到难于向大会代表们讲明这一事实：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是桑给巴尔殖民主义的代表。这意味着非洲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赶走英国人以及它始终保存的阿拉伯政权。



因此，非洲人协会准备接受兰金的建议，即立法议会的半数议员将按照种族的系统来提名。缺乏教育和经济支持是非洲人进步的主要障碍。而阿拉伯人则比非洲人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经济实力，同时他们在许多方面又受到较好的教育。

非洲人协会要求结束阿拉伯人的统治，在立法议会中增加非洲人议席，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取消一切歧视措施，以及给予非洲人在商业和其他经济方面以便利条件。

### 设拉子人协会

设拉子人协会首先于 1939 年在奔巴成立，随后它的活动扩展到桑给巴尔。它的目的在于维护非洲土著居民（哈迪木人、图姆巴图人和奔巴人）的利益。奔巴的设拉子人一贯坚持他们的立场，反对鼓励非洲人协会同设拉子人协会合并的政策。因此，1957 年初这两个协会实行的部分合并，只限于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协会。奔巴设拉子人协会的领导人甚至没有参加达成部分合并协议的会议。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奔巴—设拉子人对阿拉伯人和大陆非洲人的态度，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或哈迪木—设拉子人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一般说来，奔巴—设拉子人和图姆巴图—设拉子人是亲阿拉伯的，如果不是完全反对大陆非洲人的话，也多少是有点反对大陆非洲人的；而哈迪木—设拉子人则同大陆非洲人保持友好的关系。

## 印度人协会

印度人协会成立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初期。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印度人的商业和金融业的利益。它一般不参与政治，除非它认为它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才出面活动。例如在债务问题争论期间就有过这样的事。印度人协会在反对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负债的阿拉伯地主的斗争中，甚至还动员印度国大党来支援它。当印度国大党在印度组织抵制桑给巴尔丁香的运动时，印度人协会在桑给巴尔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 政党政治和选举

###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形成和政策

(一)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形成。大约在1955年中，正当阿拉伯人协会抵制立法议会的运动达到高潮时，基姆贝一萨马基地区的一些村民成立了一个政党，称为“桑给巴尔苏丹臣民族主义党”。它主张多种族主义，要求举行普选和独立。1955年12月，阿拉伯人协会同民族主义党建立了非正式联系。1956年1月，当华尔特·库茨爵士正在进行调查以便提出关于拟议中的改变立法议会非官方议员选举方法的建议时，民族主义党的一些领袖向这个爵士提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人们发现他们的意见和当时拒绝同英国官员打交道的阿拉伯人协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从那时起，这两个组织

有了更为正式的接触，从而使民族主义党的政策往往越来越取决于阿拉伯人协会的领导人。

当英国政府宣布它将继续推行兰金的建议，把立法议会的议席扩大到十二个，其中只有一半议席将按种族提名，另外六个议席将根据有限制的选举权进行普选时，阿拉伯人协会不得不放弃抵制，出来参加竞选。阿里·莫辛和阿摩亚·扎霍尔已经认识到同民族主义党结盟对于他们事业的重要性。“在民族主义党正式成立之后不久，阿拉伯人就开始公开参加这个党，而且很快就成了它的真正领袖。阿里·莫辛和阿摩亚·扎霍尔（阿拉伯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另一名民族主义成员）是它的第一批阿拉伯籍党员……他们将它改名为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并把它从一个农民联盟变为一个阿拉伯人控制下的城市民族主义运动”。<sup>①</sup>

（二）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政策。自从阿拉伯领导人制服了“桑给巴尔苏丹臣民民族主义党”，攫取了它的领导权，并把它改名为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以后，这个党一直是阿拉伯寡头统治的工具，他们利用它在某种程度上操纵了并且希望继续操纵桑给巴尔的政治。阿拉伯寡头统治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永久保存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的政治、商业、地产和司法部门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都远远多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知道，太露骨的种族政治是行不通

<sup>①</sup> 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第153页。

的，因此他们鼓吹多种族主义，并坚决反对任何想按照种族界线来解决桑给巴尔民族问题的政策。在阿拉伯少数人享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情况下，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任何旨在提高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的地位的行动，必然会削弱阿拉伯少数人的特权。

因此，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目的是要在强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就把政权从英国人手里夺过来。它的目标就是永远保持阿拉伯少数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对非洲大多数人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桑给巴尔在英国人的指导下逐渐朝着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向前进，阿拉伯人渴望从包括非洲人在内的桑给巴尔其他种族集团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因此，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宣传的是多种族主义，而实行的却是种族主义。

### 乌玛党的成立及其政策

在1963年7月选举前夕成立乌玛党，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内部长期持续的思想冲突的结果。它的言行一贯存在矛盾，这也是导致成立乌玛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矛盾事实上是使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实际分裂的导火线。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巴布批评民族主义党在候选人和大多数居民属于同一种族的选区另外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政策。巴布和莫辛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对立使争吵公开化，终于导致民族主义党的分裂和由巴布领导的乌玛党的成立。

民族主义党内部，特别是莫辛和巴布之间，还日益激烈地

进行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莫辛和议会党团顽固地坚持这个党从宗教信仰脱胎出来的关于民族集团的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包含着极端保守的社会和政治观点。巴布和有斗争性的集团则越来越被共产党中国和古巴的革命社会主义所吸引。他们强烈反对莫辛和民族主义党内阁部长们的伊斯兰教观念，因为他们确信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立场的产物。<sup>①</sup>

乌玛党显出它比任何其他反对党或反对派更有能力，它的组织工作更是好得多。乌玛党得到从民族主义党分裂出来的、追随巴布的若干派别的支持，还得到原来就反对民族主义党但缺乏能言善辩的代表和明确的思想（这两方面乌玛党是都具备了的）的一些派别的支持。革命以后，非洲一设拉子党同乌玛党立即实行合并。

### 非洲一设拉子党的形成

（一）关于非洲一设拉子人的团结问题。非洲一设拉子人团结的根本问题是党在对待阿拉伯人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桑给巴尔的非洲人必须紧密团结起来以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和建立一个非洲人的政府。但是设拉子人，特别是奔巴的设拉子人，既不能支持大陆非洲人也不能支持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为摆脱阿拉伯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奔巴有些设拉子人甚至认为，由阿拉伯人担任奔巴和桑给巴尔的合法统治者是

<sup>①</sup> 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第258页。

上帝的意旨。

英国人把设拉子人同大陆非洲人当做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集团来对待，这种做法更加扩大了这两部分人之间的裂痕。1934年非洲人协会成立和1939年设拉子人协会成立以后，这两个协会经常在立法议会中为分配非洲议员席位问题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二) 非洲—设拉子联盟的成立。只要大陆非洲人和设拉子人继续分裂，阿拉伯人就必然成为这两个岛屿的主人。1956年，一些政界领导人呼吁桑给巴尔的大陆非洲人和设拉子人忘掉他们的种族争吵，结成反对阿拉伯人的统一战线。这些呼吁得到大陆非洲人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的赞成，但是图姆巴图和奔巴的设拉子人却不那么赞成。

1957年2月，即在7月大选之前几个月，非洲人协会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协会的领导人之间达成了合作协议。非洲—设拉子联盟成立了，但两个协会仍保持他们各自的独立性。非洲人协会主席阿贝德·阿马尼·卡鲁姆阁下被选为联盟的主席，桑给巴尔设拉子人协会书记塔比特·坎博被选为联盟的总书记。

(三) 非洲—设拉子党的成立及其政策。在1957年7月的大选中，非洲—设拉子联盟在竞选的六个议席中赢得了五个议席，第六个席位被一名穆斯林同盟的成员拿去了，他是在印度人商业中心石头镇当选的。大选以后，原来由非洲人协会和设拉子人协会合并建立的非洲—设拉子联盟改名为非洲—设拉子党，两名当选的奔巴设拉子人协会的会员在立法

议会中以非洲—设拉子党党员的身份就职。应当看到的是，尽管实行合并，奔巴设拉子人协会的组织仍然原封未动，它后来就成为建立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的组织基础。

1957年7月大选以后，非洲—设拉子党不再是代表那些想要推迟独立的人们的政党。这个党的领导人已经使他们的宗旨和目标同其他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宗旨和目标相一致。非洲—设拉子党攻击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在就业机会方面实行种族歧视。

自从现在的这个所谓代议政府在我们的亲友的缺乏考虑和不友好的合作下成立以来，填满政府部门一切职位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和露骨了……征聘广告上会这样说：“首要条件必须是殿下臣民……，必须会阿拉伯文。”那么是谁被任命呢？于是手忙脚乱的步调、迫不及待的勾结出现了，一些知心朋友和亲戚被任命、提拔和晋级了……名义上是桑给巴尔化，实际上是阿拉伯化……。

我们忠告那些与这些不光彩的行动有关的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希望所谓的代议……政府会及早采取措施来铲除它下面生长着的丛莽和荆棘，否则上面所引的格言将是它的报应。<sup>①</sup>

1962年中，经过1961年1月和6月的两次激烈的竞选以后，由于选票箱未能把政权交给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党（非洲—设拉子党）的手中，非洲—设拉子党的幻想完全破灭。

<sup>①</sup> 1962年3月15日非洲《祖国报》。

非洲人的政治调子变得更加尖锐了。卡鲁姆阁下在一次措词十分强硬的讲演中说：

我们说，英国政府对待这两个岛屿的非洲人民从来就是不公正的，它使我们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当英国政府承担起保护这两个岛屿的责任时，它的脑子里打算保护的只是少数外来移民中的一小部分人……英国政府使这一小部分人狂妄自大和自私自利……

因此，我们现在明确地宣布，除非是非洲人占支配地位的政府，任何别的政府都是大多数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如果有任何人梦想英国在离开这两个岛屿时会把政权交给在三十万居民中只占四万二千人的外来移民，那就让这个人或这些人丢掉这种想法吧……

因此，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决不允许在这两个岛屿发生南非和苏丹已经发生的事情……，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这就是民主。<sup>①</sup>

### 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的形成及其政策

将近 1956 年年底，当设拉子领导人关于是否加入非洲人协会和成立拟议中的非洲—设拉子联盟的辩论达到高潮时，三个设拉子领导人成立了一个称为“人民党”的政党。这三个领导人，两个来自奔巴岛，名叫香特和穆萨，一个来自桑给巴尔岛，名叫塔佐。这个党的目的在于维护设拉子人的独立性，避免

<sup>①</sup> 1962 年 5 月 17 日非洲《祖国报》。



受阿拉伯人领导的民族主义党或非洲人协会的控制。随后，1959年，这三个领导人又参与创建“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

我们已经提到，尽管非洲人协会和设拉子人协会共同成立了非洲—设拉子党，但是奔巴设拉子人协会的组织仍然原封未动。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成立以后，奔巴设拉子人协会立即同它合并。因而人民党一成立就利用了奔巴设拉子人协会原有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机构。

### 选 举

1957年7月大选以后，在桑给巴尔很难把政党之间的分歧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加以区别。省当局在1958年度的报告中说：

1958年这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桑给巴尔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商人、农民、工人、渔民甚至家庭主妇都受到影响。乡下的村民互相进行争论。葬礼和宗教仪式都受到敌对政党的抵制；妇女甚至当掉她们的衣服来筹措参加政治会议的车费。……

上述情况造成数百家阿拉伯人商店关门，许多非洲居民被赶出阿拉伯人的种植园，敌对政党的党员互相抵制对方驾驶的公共汽车，同时还造成码头上的危险形势。在桑给巴尔码头区成立的两大工会中占多数的非洲—设拉子工人，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党工人”渗入码头区。<sup>①</sup>

在6月大选期间和大选以后，当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和

<sup>①</sup> 桑给巴尔和奔巴省当局1958年度报告，第1, 2页。

非洲—设拉子党的拥护者之间发生殴斗时，种族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洛夫柴写道：

乱子的根源在于桑给巴尔政治的本质，特别是在于党员的组成是根据、或被认为是根据种族来划分的，结果使桑给巴尔人的政党冲突几乎很难同种族冲突区别开来。……1961年，在六个月内进行了两次激烈的竞选运动，人们对于胜败可能产生的重大后果充满了忧虑，造成了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气氛。<sup>①</sup>

附表四提供了1961年1月、6月和1963年7月大选的概况：

附 表 四

大 选	非洲—设拉子党		民族主义党		人 民 党	
	票 数	占 议 席 %	票 数	占 议 席 %	票 数	占 议 席 %
1961年1月	36,698	40.2 10	32,724	35.8 9	19,451	17.0 3
1961年6月	45,172	49.9 10	31,724	35.0 10	12,411	13.7 3
1963年7月	87,085	54.3 13	47,950	20.8 12	25,609	15.9 6

1961年1月大选以后，两大党对人民党的议员进行拉拢，结果人民党的三个议员分裂为两派：一人加入非洲—设拉子党，另两人加入民族主义党。分裂的事实证实了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在政治上对于加入民族主义党还是加入非洲—

<sup>①</sup> 洛夫柴：《现代非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1963年6月第1卷，第2期，第206—207页。

设拉子党摇摆不定。分裂使立法议会陷于僵持状态。双方在议会中各占十一个议席。政府在议会中得不到多数，无法执行任务。因此同年6月又举行新的大选。

在6月大选中，民族主义党和人民党结成竞选联盟，这就是说，非洲—设拉子党的候选人在任何选区中不是同民族主义党的候选人竞选，就是同人民党的候选人竞选。而后两个党的候选人之间则不在任何选区互相竞选。由于民族主义党和人民党结成了联盟，他们共获得十三个议席，非洲—设拉子党获得十个议席。为了避免再发生1月大选后的僵局，这次增加了一个选区，使议员的总数为二十三人。民族主义党—人民党联合政府就这样产生了。

这是桑给巴尔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开始，因为非洲—设拉子党在1961年6月大选中所获得的票数比其他两党加起来的票数还要多一千零三十七票，在1963年7月的大选中则多一万三千五百三十六票。

非洲—设拉子党特别恼火的是，划分选区时明目张胆地采用不公平做法的一个事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商业中心石头镇是肯定会选举民族主义党候选人的，它被分为南、北两个选区。在桑给巴尔岛，举1961年1月大选为例，石头镇两个选区的选民分别为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和一千零八十人。除了科亚尼选区只有二千一百四十六个选民之外，即使把石头镇的两个选区合并为一个选区，它在两个岛屿（桑给巴尔和奔巴）中也是选民人数最少的一个。因为除了科亚尼选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选区的选民人数是在三千人以下的。但是石头

镇两个选区的选民合起来才有二千四百七十五人。这个数字还不到查亚尼选区或姆科科特尼选区选民人数的一半，前者有五千五百三十七个选民，后者有五千四百四十六个选民。而奇瓦卡、马扎杜齐、拉哈—莱奥和弗奥尼选区的选民也都在四千人以上。非洲—设拉子党在这些选区中的候选人均以压倒多数当选。

在1961年1月大选中，非洲—设拉子党获得了总票数的40.2%，在同年6月大选中获得了49.9%，在1963年7月大选中则获得了54.3%。然而在这几次大选中，非洲—设拉子党都不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因此，正如克莱德·桑加指出的，对于非洲人来说，12月10日是阿拉伯人的独立节。“随同1963年12月10日独立节到来的是骚乱的不祥预兆：桑给巴尔的许多（非洲—设拉子）地区没有升旗；出租汽车司机把这一天称为‘阿拉伯人的独立日’；一位老园丁对我的父亲耳语说：‘不久要流血了’。”<sup>①</sup>

### 1964年1月12日革命

没有两次政治革命是完全一样的。政治革命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并且是由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信仰的人所领导的。我们可以举出引起桑给巴尔革命的许多最有可能的直接原因，但是必须考虑到的问题，是自从第一个非洲人被阿拉伯人作为奴隶输入桑给巴尔以来非洲

<sup>①</sup> 约翰·奥克洛：《桑给巴尔革命》，第21页。

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整个关系。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漫长岁月里，非洲人内心深处的失望和因为受屈辱而造成的人格上的伤害，给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关系留下了很深的伤疤。

调整在总人口中占多数的非洲人和居于少数地位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关系，是桑给巴尔革命领导人的主要动机。但是非洲一设拉子党的领导人知道，如果不取得政权作为按照人民的愿望来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工具，就不能实现桑给巴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有效改革。所以汤马斯·弗兰克写道：

桑给巴尔人民在三次选举中连续遭到失败，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政府，使立宪手段失去了引诱力。旧政权在新宪法刚实施三个星期之后，就决定开始镇压反对派，看来证明了通过合法手段来进行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同时，苏丹的政府还在向国外购买武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不立即动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象主人似的关心那部宪法，因为它无论如何总是我有过的第一部宪法。但是，如果上星期日我是一个桑给巴尔人的话，我也会是一个革命者。

对于宪法的律师来说，他们主张采用合乎宪法的手段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当没有希望通过法律来实行有秩序的改革时，法律就会被推翻。桑给巴尔证明了我们的观点。<sup>①</sup>

<sup>①</sup> 约翰·奥克洛：《桑给巴尔革命》，第22—23页。

## 结 束 语

桑给巴尔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横扫全球的解放力量进展过程的一个部分。人们总有一天会拒绝被他们的同类当作东西和牲畜来看待。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建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为人类服务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让人类崇拜的。

现在变得颇为迫切的一件事情是，那些负责管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众利益的人们，应当牢记他们执行任务的权力是人民给予他们的，而且人民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要求受到这种委托的人们对人民负责。今天，任何帝王或独裁者如果认为他将终生如此，那他实在是太乐观了。但是如果这个帝王梦想他的儿子或女儿将作为帝王或王后度过他或她的一生的话，那就更是过于乐观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不容误解的特点，就是所有地方的人民正在夺回被帝王、苏丹和酋长们所窃取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就是要依靠人民的共同努力来决定该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不论这些努力是以个人体力形式出现，还是以表现为捐税的财力形式出现。

现在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了，人民正在开始拒绝任何自封的帝王、苏丹或酋长在沒有人民的同意下滥用人民的共同努力。任何人如果不正视这个明显的征象，必然要自讨苦吃。依靠选择父母而掌握政权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 第十章 从独立到自力更生

莱昂内尔·克利夫

### 独立的挑战

1961年12月9日坦噶尼喀获得政治独立。值得注意的是，坦噶尼喀不同领导人之间和种族集团、部族集团或者宗教集团之间，在独立时没有因为谁应当在新的国家中掌权的问题而发生冲突。正如我们在本书前几章中可看到的，这种在新兴非洲国家中少有的团结程度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坦噶尼喀人口的构成情况，使得这个国家的许多小而分散的部族中间，没有一个集团由于人多、经济发达、或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能够支配或者想要支配国家的政治。斯瓦希里语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既为政治中枢的城市各族人民提供了共同文化，也为领导人提供了能够同农民群众交谈的共同语言。特穆博士在前面已经谈到了非洲民族联盟如何以组织的形式体现了这种团结，如何从县以下一级到全国的中心建立了领薪金的联盟官员和代表委员会的组织网。

党的中心目标是重新获得独立，而这个目标又是建立政治团结的中心点。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正如特穆博士强调指出的，独立只不过是意味着国家可以自由地寻找进一

步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过去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些问题正以新的面貌出现,而随着独立的到来又出现了新的、严厉的挑战。在国内问题上,领袖们已把注意力转向建设国家的伟大任务上。争取改良的步伐加快了。非洲民族联盟的口号已改为“自由和工作”,尼雷尔立誓“要在十年内努力完成我们的殖民统治者在他们统治我们国家的整个时期没有做到的大多数事情”。这个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了,但是现在必须锻造一个更加巩固的国家。仅仅防止任何怀有不满情绪的地区集团、种族集团、宗教集团或者上层集团中某些野心勃勃的人从国家分离出去,或者防止他们控制整个国家,那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大家都对国家效忠,从而产生一种使大家团结起来的动力,并用这种动力来执行建设任务和对付前进途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在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实现团结是比较容易的。一旦国家取得了独立,原来促使大家团结的主要因素不再起作用时,新的国家还能不能团结一致?由于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新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我们已经提到过进入现代商界和教育界为自己寻找机会的改良派和反对殖民地世界不平等现象的平等派之间的紧张关系。独立以前,非洲的人民,无论是改良派或平等派,农民或商人,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都一致主张国家的发展不应当是为了外国的利益,或是为了享有特权的外族移民的利益。假定有一个非洲人的政府为要促进更大的发展,它是否可能有组织地分配独立所带来的利益,从而保持团结一致呢?



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独立并没有立即带来预定的利益,因为殖民主义的枷锁还没有完全解除。正如兰杰教授在前面已经指出的,独立只不过是“扭转殖民时期一些非自愿的变革”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能够开始朝新的方向前进之前,公民们必须接管政府机器和其他国家机构。捐税必须征收,机关必须办事,公路、学校、医院和其他服务部门的业务必须照常进行,因此就必须找人来做这些工作。新的责任产生了,坦噶尼喀的新主权意味着国家现在必须自己负责对外关系。在这以前,同外国的来往,以及这些来往对坦噶尼喀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英国人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关于移交政权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谈。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非殖民化后并不单单是找一些非洲人来代替原来的政府机构执行任务。殖民主义者占领期间,殖民主义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已经留下了烙印,这个烙印不会随着政治独立的到来而自行消失。即使政治结构,大部分也是由英国人创建的。独立时的宪法就是由英国殖民部起草的。虽然坦噶尼喀由于它的国际地位从来没有正式置于英王的统治之下,可是它在成为独立国家时却是一个君主国,由英国女王以大英联邦首脑的身分担任元首。宪法规定设立一个内阁和一个“威斯敏斯特”<sup>①</sup>型的立法议会,而且宪法中关于内阁和议会关系的规定,是以存在互相竞争的政党制度为前提的。政府机关已经有人任职,而且这些文官是按英国官僚机构的标准任免和提升的。

<sup>①</sup> 指英国议会。——译者

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经济及其对坦桑尼亚社会的影响，是一个远比政治机构的组织形式更为重要的遗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坦桑尼亚领导人注意的是这种经济的两大要素。第一，已有的发展往往只是使小块地区得到某些进展。这种进展只是在有数的几个城镇和一些特别肥沃的地区。这些现代化的小块地区的直接利益大半为居民中的少数人所享受，而且他们多数不是非洲人。第二，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经济的派生物而发展的，因而它附属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说明我国经济的这两个特征所包含的意义对我们将是有益的。

正如我们在艾利夫博士写的一章里所看到的，英国为了使殖民地自养，不象在肯尼亚那样，只把重点全部放在外国移民的农业上，它同时还把它认为合适的一些地区的农民强行纳入商品经济。1960年农产品的出口总值，大约一半是欧洲人和亚洲人拥有和经营的庄园和大农场生产的，这些庄园和农场所占有的土地约为土地总面积的1%。非洲人生产的商品作物中，将近四分之三来自维多利亚湖周围的五个产棉县和四个主要种植咖啡的县（布科巴、阿鲁沙、乞力马扎罗和农圭）。其他五十个县生产的总值为五百万英镑多一点。然而，即使在运气好的县分里，我们也已经看到商品作物生产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供应市场的农业生产分布的不平衡，意味着有些地区和家庭比其他地区和家庭更容易得到商业、运输以及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行业的利益。除了有限的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等部门外，制造工业也是很小的。

的,而且大部分是由外来移民或外国大公司所拥有和经营的。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分享到从这些发达的小块地区得来的财富和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

例如在 1960 年,大约只有两万非洲人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先令以上,其中一半以上是政府公务员。在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的教师、商人和运输商是不住在主要城市的。这些人是政治领导骨干的主要来源。属于这些特权经济集团的人,多数是因为受过教育而取得这种地位的。这种教育以西方为榜样,它强调欧洲的观念和个人奋斗的思想。在总人口中占相当比重的人同现代经济的关系比上述这些人疏远一些。他们或者是低工资收入者(1960 年,在三十万名工资收入者中,有一半从事农业,主要是种植西沙尔麻),或者是一直生产商品作物的农民。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在独立前的几个月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了。当时大约有五十万人(大部分在中央省)在遭到严重旱灾之后领取饥荒救济。

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卷入殖民地经济而在物质上得到多大好处,但是他仍然受到这种经济的影响。如同整个国家一样,农民是否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外的少量东西,也要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在独立前后的好多年内,这种依赖性使农民通过更加辛苦的劳动得到的增产,被棉花、咖啡或腰果的降价所抵销了。商品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民同土地和邻居的关系变得更商业化和个体化了。这种殖民地经济的遗产,甚至影响到一些领导人和外国顾问对于发展的想法。他们认为,取得经济进步的途径是集

中资金再建立一些经济发达的小块地区，因而他们就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筹措资金来对公路、学校、工厂、住宅和其他工程进行投资。可是这种资金的唯一来源是外国公司的投资或外国政府的贷款。

坦噶尼喀就这样面临着建设国家的一系列新的艰巨任务。它的公民们必须接管殖民政府。必须建立适合国家特殊情况与需要的新机构和配备人员。它必须投入并适应一个经常在政治上怀有敌意和经济上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必须把人民锻造成一个民族，而且实现高度的团结，从而为促进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必须正视的最严重的问题也许是：究竟是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某些普遍的改善呢，还是使发展只对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有利？

以上这些问题是每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坦噶尼喀仅有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也许是它的资源开发得更差一些，而且受过教育的人才比它的东非邻邦更少一些。它的有利条件是上层内部和各个种族集团间的裂痕并不严重，而这种裂痕正是许多非洲国家曾经触到过的礁石。虽然坦噶尼喀面临的挑战是其他国家也有的，但是当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国家已经建立的机构和它为了对付这些挑战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我们将会看到，坦桑尼亚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 移交政权

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实际接管政府机器，用一个词来说，就是“非洲化”。事实上，除了实行政府机关的非殖民地化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因为欧洲人走得快，接替工作跟不上。从各个县抽调来的人数不多的非洲人，在政府机关担任了各部的高级领导职位。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教育界的合格人士，也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这样就立即出现了许多空缺。事实上，1962年有四分之一的文官职位没有人担任。非洲中等学校教师人数降到三十人以下。因此，虽然实现了政治独立，教育坦噶尼喀年轻人的工作却交给了外国人。此外，由于坦噶尼喀自己负责对外关系，驻外使馆、驻联合国代表机构以及外交部的新职位都需要人。

由于人们认识到各个县必须拥有民族主义代表的特殊重要性，原来农村地区政府部门中人数不多的非洲干部被提升之后，农村缺乏干部的情况就显得特别严重。人们还认为，仅仅把原来省级殖民政府非洲化，由足够数量的有资格的坦噶尼喀人来代替英国官员，那也是不够的。于是决定任命政治家担任地区和各县的专员，来管理原来的省和各个县，他们象部长一样，各由一名行政官员协助。此外，把以前专员的职权分散，司法权由兼职的法官接管。凡是还没有县议会的地方，都建立了县议会，它们的自治权多于原来的土著当局。

因此，在实行自治的头几个月，大量的非洲人担任了部

长、文官、外交官或政治专员等新的职务。商业和其他私人组织的“非洲化”，进展得没有这样快，尽管几个国际性大公司已经看到雇用非洲高级职员作为“橱窗装饰”的好处。有些地区采取其他非洲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没有使非洲人自动地处于和他的前任同样享有特权的、也许还剥削别人的地位。从非非洲人手里接收商业部门和一些加工工厂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合作社而不是发展非洲的私营商业。非洲其他一些地方实行了发展私营商业的办法，其结果是形成本地的资本家阶级。

总之，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大部分迅速实现了非洲化，商界上层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迅速地实现了非洲化。现在，控制着小规模的现代化部门和主要机构、享受着比普通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高许多倍的极少数人，已不再是清一色的非非洲人了。当然，有一些人把非洲化的过程，看作主要是为他们本人提供占据特权地位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使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对人民负责的一种手段。而那些地位稍低、没有提升得那么高的人，则对这种情况很恼火，他们要求加快非洲化的速度。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的一些人看来是这样想的。他们还想要过快地提高工资，而其结果往往使就业人数减少。一些工会领导人在这方面以及别的方面，发现他们同以前密切合作过的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越来越不一致。某些议员和非洲民族联盟的有势力人物以及朱贝里·姆顿武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在诸如就业和公民资格等问题上，同这种普遍存在的斗争性较强的“非洲主义”情绪发生了共鸣。1962年后期，一度（多少有些不乐意地）出任坦噶尼喀驻伦敦高级专员的前

铁路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卡桑加·图姆博成立了人民民主党。非洲国民大会、人民民主党和其他萌芽时期的反对集团，力图把对非洲化、对工会的地位以及对1963年生效的剥夺酋长一切官方职权的措施等等的不满情绪集中起来。但是，当他们为了争取支持而向各个集团的一切怀有微小不满的人呼吁时，常常因为向利益对立的各方都乞求支持而得不到什么信任。

1962年初，尼雷尔辞去了总理的职务，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打消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对非洲民族联盟政府的政策的这些批评和反对。曾经领导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并在不久以前担任非洲民族联盟副主席的拉希迪·卡瓦瓦接任政府的首脑，并在同年年底担任副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他把政府的责任交给别人，是为了更集中精力于党的工作。大概可以这样说，他在担任总统之前的十个月中，大部分时间是用于重新整理他自己的思想，并争取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些思想，而不是真正用于改建党的组织。总之，在1962年11月总统选举中，他获得了97%的选票，表明他在国内的威望丝毫没有降低。

重新考虑非洲民族联盟的任务仍然是必要的。在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乌呼鲁”之后，一方面由于许多有能力的领导人都被吸收到政府里去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目的和纲领，党的机器在衰弱下去。起先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努力是任命地区和各县的专员担任非洲民族联盟的专区或县级组织的当然书记。而作为非洲民族联盟今后工作的指针，联

盟指示这些专员更多地重视动员人民进行建设工作。由于这些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努力，也由于实现独立而激发起来的普遍热情，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自助工程项目、垦殖区计划和其他自发的建设活动。但是党的积极分子大半不习惯于同地方政府的各种机构合作。正如特穆博士所指出的，他们过去常常怀疑政府官员的发展计划，而后者反过来则继续怀疑政治活动和政客。这种留传下来的怀疑，使许多项目缺乏密切配合的计划，或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许多这样的建设项目缺乏经费或人员，或是碰到意外的障碍；有些建设项目则由于缺乏材料供应或技术指导，或者由于项目本身不合适而不能进展。这并不是说有许多项目是无用的，也不是说人民没有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在1962年以后，对这些活动的管理大大加强了。这些活动至少必须经过地区一级管理发展计划的特别委员会批准。如何鼓励并充分调动人民自发的热情，同时又指导他们，使他们的精力能够符合建设性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依然是发展中的坦桑尼亚所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

## 国家的安全

1964年初，因为非洲化问题和其他事情而产生的敌对情绪爆发了，从而导致了影响整个东非的一系列危机。

1月20日，坦噶尼喀陆军士兵发动兵变，接管了一切主要政府建筑物，并逮捕了军官和一批平民。不管这次兵变的导火线是否由于尼雷尔总统主要从考虑效率出发而试图控制



非洲化的速度，总之参加这次兵变的人主要是对继续留用许多英国军官(他们把这些军官驱逐出境了)以及对自己的薪饷太低表示不满。虽然这些士兵很快就返回兵营，他们在一个星期内被解除了武装，最后被开除了，主谋者则被监禁起来。这次事件和与此有关事件的影响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国家更加关心安全问题。兵变表明，一小撮武装人员的阴谋行动或不负责任的行为，能够使整个国家受到危害。几天前在桑给巴尔发生的事情已经进一步表现出枪杆子的威力，当时非洲一设拉子党的少数拥护者发动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当然那里总的政治形势是爆炸性的。兵变蔓延到了肯尼亚和乌干达，这就有力地表明，新获得的独立很容易陷入险境。它同时表明，大陆上有人准备利用这种形势来制造骚乱甚至接管政府。最后，坦噶尼喀勉强地要求英国军队进来解除兵变部队的武装，这说明了又一个教训：一旦小国发生骚乱，要不让大国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直接的反应是更换军队中的全体士官，从党员和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团员中抽调新人来代替他们，想这样来建立一支更忠诚的军队——人民防卫队。政府还设法加深士兵的责任感，任命了政治委员和实行了政治教育计划。许多工会工作者和其他被怀疑为图谋推翻政府的人被拘留了。那些被证明没有牵连的人很快就释放了，但是主要嫌疑犯过了两年以后才允许他们过平民生活。在这个危急的时期，政府乘机改组了工会运动，成立了单一的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它的财政收支受政府监督，主要官员由政府任命，并成为非洲

民族联盟的附属组织。事实上，非洲民族联盟在前一两年已经对其他组织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妇女组织和合作社也都被组织到单一的全国性联合会里面，成为党的附属组织。

在年底以前，国家的完整又受到新的威胁。这一次威胁是来自国外的。出现这些外来压力的原因之一，是坦噶尼喀于1964年4月同桑给巴尔合并。首先应该了解一下这种合并的背景。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知道，桑给巴尔是在主要代表有特权的和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统治阶级当政时取得独立的。这个政府只得到少数选民的支持。1964年1月12日起义导致了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这次革命力求把非洲人从占有大部分土地和其他国家资源的小集团的剥削下解放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府，必须立即对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非洲化”。要迅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由国家接管象码头和电力局这类大企业，把它们变为公营事业，至于大规模的丁香种植园和椰子种植园及其土地，则或者分配给无地农民，或者改为国营农场。新政府还必须面对另外两个有关的问题：它急于想得到国际承认来协助它建立“合法地位”；它缺少可靠的有经验的人材，因为阿拉伯人实际上垄断了官僚机构的职位。西方国家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桑给巴尔革命，更不用说对它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桑给巴尔为了执行建设任务，自然要接受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东德的援助。

桑给巴尔的新政府更感兴趣的是同大陆结成联盟，特别

是因为非洲一设拉子党一向同非洲民族联盟有牢固的联系。由于桑给巴尔被迫依靠东方的援助，从而招来西方的怀疑和敌视，它面临着仍然不稳定的国内形势和互相敌对的外部压力。坦桑尼亚大陆必然被看做是援助和合作的一个源泉。在革命的日子里，大陆的警察就被派往桑给巴尔协助维持法律和秩序。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后来改称坦桑尼亚）诞生后，允许在桑给巴尔设立一个负责某些对内事务的政府，联合共和国的政府则将逐渐接管全国的其他事务，同时处理大陆的一切问题。这个协定类似北爱尔兰同联合王国其余部分之间存在的协定。建立联合共和国的协定同时保证尊重双方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如果不是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分为二，而西德政府（它同坦桑尼亚大陆有外交关系）又坚持别的国家不得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要做到这一点本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实际上西德就是坚持坦桑尼亚必须放弃同东德的关系，而东德曾经是桑给巴尔革命的最有益的朋友。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达成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妥协的解决办法，而在这期间，坦桑尼亚得不到德国已经答应的一些援助。这就使坦桑尼亚再一次看到，发达的国家准备怎样使用压力来增进它们自己的利益。

在英国军队离开坦噶尼喀并由尼日利亚军队接替之后，外交压力增加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担心东方国家的大使馆和联合共和国政府的一些桑给巴尔成员，扩散西方国家所谓的“共产党的”影响。坦桑尼亚从1964年开始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一种更积极的不结盟立场。用尼雷尔总统的

话来说,这意味着采取一些疏远西方、接近东方的步骤,以便更靠近中间。于是它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并且随着坦桑尼亚和中国领导人的互访而从中国得到一笔巨额贷款。同时,坦桑尼亚深深卷入了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势力。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对白人政权斗争的前进基地。这个事实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它把解放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达累斯萨拉姆。从1964年以来,由于尼雷尔总统毫不含糊地反对英国关于在沒有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情况下宣布罗得西亚独立的建议,同时由于坦桑尼亚积极支持莫桑比克的解放运动,这就使坦桑尼亚和那些不大关心反对非洲白人统治的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了。由于美国干涉刚果,由于反对美国所谓“共产党颠覆活动”的越南战争日益扩大,世界形势看来也证实了坦桑尼亚对于西方干涉的担忧。这种担忧使人相信在1964年年底传出的关于美国阴谋反对这个国家的谣言。自从那时以来,关于葡萄牙发动报复性进攻的担心更有可能成为事实了,因为当时莫桑比克解放运动从坦桑尼亚南部边界渗入葡萄牙殖民地的活动,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因此,1964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并且就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年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了,在国家建设的任务中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内动乱和外部压力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决不能认为他们的新国家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是不成问题的。人们还认识到,鉴于世界政治的分裂性质,以及坦桑尼亚对类似解放非洲等问题所承担的义务,要想在国

际争端中避免站在哪一边，从而避免遭受冷战参与者的胁迫，那是困难的。

## 锻造新机构

作为现代世界中的一个独立国家，坦桑尼亚在某些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受到更多的影响。每当坦桑尼亚关心解放非洲的斗争，并力图在国际争端中采取独立方针时，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坦桑尼亚人已经记取了历史上的团结的经验，他们现在比过去能够更好地武装自己，顶住外部的压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 1905 年反对德国人失败的教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成长，以及 1964 年的动乱，所有这一切表明，只用一种共同的感情或“意识形态”把人民团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有效的组织使人民能够共同行动。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和统一的工人团体这两个组织，以实现更有效的合作的经过。同样，如果要正确地执行国家建设的各项伟大任务，也必须建立有效的机构。

在独立的时候，国家继承了两套不同的机构：一套是殖民政府的各种机构；一套是民族主义团体，主要有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工会、合作社和妇女团体，这些团体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因此，有许多十分重要而实际的问题必须解答。例如，怎样使这些至今还是各自独立而又常常互相对立的机构的活动协调一致？正式政府机构应当执行什么任务？群

众团体的责任范围又应当是什么？特别是，非洲民族联盟已经实现了争取自由的主要目标，它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如果现在党应当关心国家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非洲民族联盟自己要创办和经营各项建设计划，或者仅仅是鼓动群众的热情来实现政府要办的计划？首要的是，怎样恢复非洲民族联盟的有缺陷的机构，使它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建设计划的新任务？在移交政权和国内安全已经巩固之后，就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上述的某些问题上了。

非洲民族联盟继续在一些地区直接创办许多建设项目，主要是自助项目和垦殖区计划，维多利亚湖区的移民农场是垦殖区的另一种形式。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事实再一次证明，党的特长是宣传和动员群众支持广泛的建设计划，而不是管理复杂的建设计划。从1964年后半年起，非洲民族联盟建立了小组，这有助于提高党在基层的组织工作效率。非洲民族联盟的党员每十户成立一个小组，并选出一名组长，他既是同非洲民族联盟和政府机构的主要联系人，又是出席高一级的非洲民族联盟组织的代表。同时，党还使组织员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他们的任务是组织人民进行建设。从1965年以来，党的总部得到了加强，主要办法是从政府部门调来有经验的行政官员。起初，在有效地实行这种小组制度的地方，常常发生新的问题，因为小组领导人常常侵犯乡村发展委员会的职权，这些委员会从1963年以来就有了，它们的工作是协调发展计划和促进自助计划。最后采取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重新改组乡村发展委员会，把所有小组的领导人都包括进去。因此，在

这个基层组织中，党和地方政府的机构溶合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知道，早些时候党和政府是如何通过设立地区和地方的专员而建立联系的。这些专员既是本地区行政当局的首脑，又是非洲民族联盟的书记。这种把党和政府联结起来的过程，在 1968 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县级以下的行政工作人员也和专员们一样，成为党的分区书记，从而把两种任务结合在一起。大、小酋长已经在 1963 年废除，当时对这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一次重要改革，撤销了那些部分地是根据他们的传统地位由当局任命的官员，同时设立了对县议会负责的分区一级和村一级的执行官来代替他们。另一项革新是成立了县一级和专区一级的发展委员会，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党和行政当局合作，而且使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和民办机构共同合作执行发展计划。这些机构的建立是同全国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工作的进程相联系的。1964 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关于各级党和政府完全合并的可能性问题，曾经在一个受命就坦桑尼亚一党制形式提出建议的总统委员会上进行了详细讨论。在 1963 年非洲民族联盟年会批准了关于国家应当在宪法上只承认一个单一政党的意见之后，这个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讨论。这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保证组织上更加统一（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党），而且是为了保证党不再被迫处于守势从而在辩论或选举中用纪律约束党员。为了不想妨碍成立东非联邦的谈判，以及当时同桑给巴尔实行联合的谈判，加上国内安全受到威胁，委员会的工作拖延了。委员会最后在

1965年提出的报告，是以三个基本决定为依据的。第一，他们考虑到非洲民族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议会有有一个根本不同的任务：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广泛的政策方针”，而议会的任务是“通过立法措施来实现政府的政策”。因此，他们不主张非洲民族联盟同政府机构完全合为一体。他们建议非洲民族联盟应当继续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尽可能多地从各个阶层吸收支持它的原则声明的人参加，而不是作为一个“上层分子”的党，把党局限于“意识形态上忠诚的”、执行领导任务的集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由于党力求制定一种更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后对上述提法作了一些修正。委员会的第三个建议所根据的原则是，党提名的国民议会、地方政府和党机关的候选人之间应当进行竞选。

上述的最后一条原则，在1965年9月第一次实行了，当时有一百零七个议会席位是经过竞选的。经过非洲民族联盟的县代表会议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严格挑选，每个选区推举了两名候选人。然后在同一个非洲民族联盟的讲台上，把这些候选人介绍给群众，让选民在他们中间进行最后选择。这个独特的制度，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效果。它保证这一批当选的议员（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公共生活的新人），在经过艰苦的竞选斗争之后知道，他们如果要想保住议席，就必须反映选民的愿望。此外，竞选运动直接吸引很多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这有助于提高群众的自信心。这种被称为坦桑尼亚一党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后来同样应用于地方议会的选举。同时，非洲民族联盟从地方基层组织领导人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



的各级负责人的选举,也变得更加公开了。

## 意识形态和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非洲民族联盟和整个国家如何越来越关心发展的任务。许多新的工厂、学校、住宅区和其他建设计划,在独立以后的年代里就已开始了。随着196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又努力对这些发展作出规划,既要防止资金浪费,也要防止用这些资金去同时进行过多的建设项目。除了这种合理化的安排之外,直到1966年,很少想过应当给哪一种发展计划以优先权,也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些变革所带来的利益应当如何分配。尼雷尔总统曾经一再谈到关于保持非洲传统的无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他之所以拒绝两党制的主张,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两党制只适用于有阶级的社会。然而殖民地社会确实是存在阶级区分的,而且多多少少是和种族区分相适应的。非殖民化和非洲化并不能自动地使利益得到更为平等的分配。我们已经看到非洲化以及随着商业和政府的扩大而增加的许多职务,如何导致了一个非洲“上层分子”阶层的迅速成长。高、中级文官人数从1961年的一千多一点,增加到1968年的六千二百人;每月收入二百先令以上的公民人数,到1968年已经超过一万人,比1960年几乎增长了六倍;收入超过一千先令的人数几乎每年增加一倍。

总的说来,新的上层分子往往利用他们新的财富来享受奢侈的、高人一等的的生活方式,以及购买地产和企业股票。以

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总的发展进程，使上述趋势成为可能。同时，这种趋势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总的发展进程。1960年至1966年，制造业每年增长16%，而农业生产每年只增长4.3%。现代化部门收益的增加，意味着城市的巨大发展速度同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很不相称。上层分子普遍把他们的钱投资于发展中的城市房地产（那里的地租和房租较高）和企业部门。许多城市工人，虽然没有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收入也比大多数农民的收入高得多。农村中有些人比他们的邻居富有，常常雇用临时工或长工，有时还拥有较多的土地，有商店、卡车或公共汽车。特别是在人烟稠密的地区如阿鲁沙、乞力马扎罗或农圭，由于实际上实行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而产生了一个无地的阶级。这些地区往往就是那些已经发展了商品作物生产以及社会服务等各种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地区。因而那里也拥有相当比例的新的上层分子，而同时它们又往往是最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地区。

这样，农村和城市人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小农和农场主之间，特权的官僚与商人和群众之间，迅速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过程。尼雷尔总统和其他致力于传播无阶级社会思想的人，所以特别关心这个过程，是因为全国拥有财产的上层分子、农村商人和大农场主，同掌握政治权势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部长们、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和高级文官们在企业中拥有投资，他们也就处于可以左右政策的地位，使政策有利于拥有这些利益的那部分人。在殖民时期，由于禁止文官

们参加政治活动，使那些有独立事业收入来源的人们，已经在非洲民族联盟的地方机构中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些官员越来越利用他们在政府、党和合作社中的地位，来为他们自己在农业或企业中的利益服务。

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冲击了某些集团在独立前后由于国家的发展而获得的特权地位，采取这些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开除那些反对服国民兵役的学生。1967年2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阿鲁沙宣言》，提出了主要的政策改变。这些平等主义的措施包括削减从总统开始的各级政府雇员的过高的“殖民地官员”薪俸，以及禁止在私营企业中持有任何股份或雇用劳力(季节性的农业工人除外)的文官、议员或非洲民族联盟的负责官员继续任职。把开发城市地区的资金转用于农村地区，同时在农业内部，集中力量全面促进小农生产而不是促进只对少数农场主有影响的、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计划。打算逐渐地把农村人口重新组成“乌贾马”<sup>①</sup>式的村庄，人们将在公有的土地上共同劳动，以便农村的发展使整个村社得到好处，而不只是少数个人得到好处。教育制度的行政管理、课程和基本概念已着手进行彻底改革，以便把教育从殖民地的遗物变为在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准备生活的一种手段。在各个阶层中，特别是在那些幸运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都强调合作与平等的生活方式的新思想，和为大众利益作出牺牲的必要性。现在人们也已经认识到，既然

---

<sup>①</sup> “乌贾马”(ujamaa)，斯瓦希里语，原意为亲戚关系、集体关系，这里含有“社会主义”的意思。——译者

学校的大多数毕业生都不可避免地要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学校就应当使他们有更好的准备，以便他们通过农业劳动为自己和为他们所在地区的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

《阿鲁沙宣言》是对坦桑尼亚，甚至也是对整个非洲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力求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发展的纲领。前面我们除了谈到极有限的发展之外，还单独提到过坦桑尼亚继承的殖民地经济的第二类问题——依赖世界经济的问题。《宣言》在“自力更生”的标题下，建议为国家的发展采取一种新的战略，以减少这方面的一些弱点，使坦桑尼亚的进步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少受国际资本主义利益的摆布。人们认识到，发展计划必须依据本国的资源来实现，外国的援助只是额外的红利，而不是左右我们行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坦桑尼亚是缺少资金的，因而不能把资金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今后将把重点放在主要依靠人民劳动力的许多小规模的建设项目上；将由人民自己负责这个以发展农村为主的计划，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让政府来创办。强调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方面，是决心由本国人控制一切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根据这个决心，国家接管了一切外国银行和其他外国工商业公司，使它们成为完全国有或者部分国有的企业。

坦桑尼亚已开始进入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它按照人民认为是正确的、公平的方式，按照非洲土著社会的本质，沿着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路线来改造它的经济和社会。如果不首先解决本书先前谈到的一些问题，要采取这个新的、艰难的

步骤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问题是：实现某种程度的民族统一；比较稳定和有力量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人民参加，同时又能充分地加以控制，以便有可能制定协调一致的计划；制止领导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公众压力的约束；维持国内秩序和抑制外部的压力。即使如此，挑战还是极其严重的，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努力还有可能引起新的危机。外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利益将会造成威胁，坦桑尼亚所有期望在社会上获得特权地位的人们，也会造成威胁。这些因素突出地表明，坦桑尼亚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无论如何，建设一个公正和繁荣的社会的挑战是振奋人心的，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很少国家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

## 参 考 读 物

### 一、一般性和地区性的著作

阿布达拉·本·赫梅迪·阿杰米:《基林迪情况》,1962年东非文学局出版。这是香巴拉法庭的一位斯瓦希里官员大约在1900年记录的桑巴拉族地区基林迪王朝历史的斯瓦希里原文和英译本。(Abdallah bin Hemedi l'Ajemy: «Habari za Wakilindi, The Kilindi»)

亚伯拉罕斯:《尼亚姆维济的政治组织》,1967年剑桥出版。这是1957年至1960年在卡哈马和塔波拉附近工作的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著作。本书有一章谈殖民前的背景。(R. G. Abrahams: «The Political Organisation of Unyamwezi»)

阿尔珀斯:《东非的奴隶贸易》,1967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坦桑尼亚历史协会第3号论文。(E. A. Alpers: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拉甫·奥斯廷:《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史前札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非洲政治初探。(Ralph A. Austen: «Notes on the Prehistory of TANU»)

东非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的刊物:《阿扎尼亚》第1, 2, 3卷。(«Azania I, II, & III») 第1卷刊载有H. 萨顺关于恩加鲁卡的报道;第2卷刊载有R. C. 索珀关于坦桑尼亚东北部铁器时代早期陶器的报道;第3卷刊载有B. M. 法甘、J. E. G. 萨顿和A. 罗伯茨关于伊伏纳和乌文扎盐场的报道。

贝克:《坦噶省经济社会状况报告》,1963年达累斯萨拉姆政府印刷厂出版。一份有独到见识的官方报告。(E. C. Baker: «Repor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anga Province»)

诺曼·贝内特:《东非历史研究》,1963年波士顿出版。第一篇《尼亚姆

- 维济的米兰博》，根据欧洲人写的材料讨论了米兰博的对外关系。还有 E. J. 索通于 1880 年所写的关于《姆威尼·姆瓦娜和桑给巴尔苏丹》和《尼亚姆维济史》的笔记。(Norman Bennett: «Studies in East African History»)
- 奇蒂克: «“设拉子”对东非的殖民地化》，载《非洲历史杂志》1965 年第 6 卷第 3 期。(H. N. Chittick: «The ‘Shirazi’ Colonization of East Africa»)
- 马克斯·格鲁克曼: «部族社会的政治、法律和礼仪》，1965 年牛津出版。对于非洲国家的一般问题和政治组织的其他形式感兴趣的人，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特别是书中关于“国家和国内斗争”的一章。(Max Gluckman: «Politics 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
- 柯尔: «东非史前时代》，第二版，1963 年纽约出版。1964 年伦敦出版。本书关于石器时代的论述较好。(M. C. Cole: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
- 汉斯·科里: «布科巴地方志》，1958 年姆万扎出版，斯瓦希里文与英译文对照。这个调查概况主要是依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写成的。(Hans Cory: «Historia ya Wilaya ya Bukoba»)
- 汉斯·科里: «苏库马土著政治制度」。1954 年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的鹰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原为政治报告，但它包含有殖民时期前的政治组织的一些有用的知识和关于早期历史的推测。(Hans Cory: «The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ukuma»)
- A. T. 卡尔威克和 G. M. 卡尔威克: «江河地带的贝纳族区》，1935 年伦敦出版。本书主要是一部研究人类学的著作，但它有几章关于贝纳历史和传统政治的有用资料。(A. T. and G. M. Culwick: «Ubena of the Rivers»)
- 埃布纳: «恩戈尼族史》(从桑格阿佩拉米霍的本笃会得到的油印材料)。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桑格阿区恩戈尼族的情况特别有用。(E. Ebner: «History of the Wangoni»)
- 福特和霍尔: «卡拉圭(布科巴县)史》，载《坦噶尼喀札记和记录》，1947

- 年12月。这是一本根据文学资料和地方传说写成的简要材料。(J. Ford and R. de Z. Hall: «The History of Karagwe (Bukoba District)»,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24 [Dec. 1947], 3—27)
- 弗里曼—格伦维尔: «东非海岸», 从第一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文件选集, 1962年牛津出版。(G. S. 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 弗里曼—格伦维尔: «基尔瓦岛的法国人: 十八世纪东非历史的一个插曲», 1965年牛津出版。(«The French at Kilwa Island: An Episod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ast Africa History»)
- 格雷: «中世纪至1856年的桑给巴尔史», 1962年伦敦出版。(J. M. Gray: «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
- 哈罗和齐尔弗合编: «东非史», 第2卷, 1965年牛津出版。(V. Harlow and E. M. Chilver[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I»)
- 卡尔·赫尔堡: «在维多利亚湖以西殖民地边界传教», 1965年隆德出版。布哈亚福音派新教会。(Carl J. Hellberg: «Missions on a Colonial Frontier West of Lake Victoria»)
- 海登: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建设国家: 坦桑尼亚农村政治发展情况», 1968年隆德出版。本书包含有很有参考价值的布哈亚政治史。(G. Hayden: «TANU Yajenga Nchi: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
- 约翰·艾利夫: «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坦噶尼喀(1905—1912年)», 196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是研究德国殖民政权的著作, 但内容包括有关于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资料。(John Iliffe: «Tanganyika under German Rule 1905—12»)
- 卡贝亚神父: «姆特米·米兰博», 1966年东非文学局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用斯瓦希里文写成的, 作者本人是尼亚姆维济人, 材料取自口述材料和一些书面材料。(Fr. J. D. Kabeya: «Mtemi Mirambo»)
- 马丁·卡扬巴: «非洲问题», 1947年伦敦基督教文学促进社出版。本书叙述了卡扬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是作者于1939年去世之前不



- 久写成的。(Martin Kayamba: «African Problems»)
- 伊萨利亚·基曼博:《坦桑尼亚帕尔区政治史》,1969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Isaria N. Kimambo: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 莱斯利:《达累斯萨拉姆调查》,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一次社会调查,但其中有关于这个城市历史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J. A. K. Leslie: «A Survey of Dar es Salaam»)
- 洛夫柴:《桑给巴尔革命的背景》,1965年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出版。(M. F. Lofchie: «Zanzibar: Background to Revolution»)
- 卢西·迈亚:《原始政府》,1962年企鹅出版社出版。尽管书名如此,本书是一本关于东非殖民地时期以前各种类型的政治组织的十分有用的调查材料。书中多数事例虽然取自乌干达、卢旺达和肯尼亚,但许多问题和形势的论述是同坦桑尼亚相关的。(Lucy Mair: «Primitive Government»)
- 姆希纳编:《米纳基圣安德鲁学院史》,1965年内罗毕朗曼斯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基温加尼学院和它的学生开始讲起。(J. E. F. Mhina [ed.]: «A History of St. Andrew's College, Minaki»)
- 尼雷尔:《自由和社会主义》,1968年达累斯萨拉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Julius K.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 尼雷尔:《自由和团结》,1966年达累斯萨拉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Freedom and Unity»)
- 奥古特和基厄兰合编:《东非古代史》,1968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和朗曼斯出版社出版。(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 罗兰·奥利弗:《传教会在东非的作用》,第二版,1965年伦敦朗曼斯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关于教会的一般历史。(Roland Oliver: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
- 奥利弗和马修合编:《东非史》第1卷,1963年牛津出版。(Roland Oliver and G. Mathew[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I»)

- 博斯南斯基编:《东非史序曲》,196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M. Posnansky[ed.]:《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
- 兰杰:《坦桑尼亚的非洲教会》,1968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坦桑尼亚历史协会第5号论文。(T. O. Ranger:《The African Churches of Tanzania》)
- 理查兹编:《东非的酋长》,1960年伦敦出版,这本论文集主要是论述殖民地统治下的变化,但有一些关于殖民地时期以前哈族、哈亚族、津扎族和苏库马族的政治组织的简要情况。(A. I. Richards[ed.]:《East African Chiefs》)
- 安德鲁·罗伯茨编:《1900年以前的坦桑尼亚:七个区的历史》,1968年东非出版社出版。每个区各由一位最近记录了口头传说的学者负责进行研究。(Andrew Roberts[ed.]:《Tanzania before 1900: Seven Area Histories》)
- 安德鲁·罗伯茨:《尼亚姆维济贸易》,载 J. R. 格雷和 D. B. 伯明翰所著《殖民地时期以前中非和东非的贸易》,1969年伦敦出版。(《Nyamwezi Trade》, in J. R. Gray and D. B. Birmingham:《Pre-Colonial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 凯瑟琳·斯塔尔:《乞力马扎罗查加族史》,1964年海牙出版。本书系根据书面材料进行广泛研究并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对查加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写成。(Kathleen M. Stahl:《History of the Chagga People of Kilimanjaro》)
- 史特兰德斯:《葡萄牙统治东非时期》。J. F. 瓦尔瓦克翻译, J. S. 柯克曼编辑,1961年内罗毕出版。(J. Strandes:《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 萨顿:《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观点看东非海岸》,1966年内罗毕出版,坦桑尼亚历史协会第1号论文。(J. E. G. Sutton:《The East African Coast: A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view》)
- 特里明厄姆:《东非伊斯兰教》,1964年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出版。伊斯兰教历史和实践的初步调查。(J. S. Trimingham:《Islam in East Africa》)

莫尼卡·威尔逊:《尼亚库萨的宗教礼仪》,1959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叙述殖民统治和基督教教义对尼亚库萨社会和信仰的影响。(Monica Wilson:《Communal Rituals of the Nyakusa》)

## 二、游 记

包曼:《乌桑巴拉及其内陆地区》,1891年柏林出版。内容包括有对庞加尼河流域及其人民和历史上重建香巴拉国的生动的描述。

(O. Baumann:《Usambara Und seine Nachbargebiete》)

热罗姆·贝克尔:《非洲生活》(共两卷),1887年巴黎出版。贝克尔是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尔德的国际非洲协会的代表,他曾帮助在坦噶尼喀湖的卡雷马建立该会派驻机构。他提供了关于尼亚姆维济地区的许多情况,包括1880至1882年间塔波拉和米兰博的首府的情况。(Jerome Becker:《La vie en Afrique》)

理查德·伯顿:《中非湖区》(共两卷),1860年伦敦出版。本书叙述伯顿和斯皮克于1857年至1858年旅行坦噶尼喀湖的见闻,包括他们所遇见的许多酋长和部族的大量有用的情况(和意见)。书中还有伯顿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来的关于其他地区状况的大量材料。本书于1961年由纽约地平线出版社出版。(Richard F. Burton:《The Lake Region of Central Africa》)

理查德·伯顿:《桑给巴尔的城市、岛屿和海岸》(共两卷),1872年伦敦出版。第2卷有关于沿海城镇和前往内地的商队组织的记述。伯顿还到过乌桑巴拉。(《Zanzibar: City, Island and Coast》)

卡梅伦:《横越非洲》(共两卷),1877年伦敦出版。卡梅伦曾于1873年至1874年从桑给巴尔经塔波拉和乌季季到刚果。(V.L.Cameron:《Across Africa》)

埃尔敦:《在东非和中非山湖之间旅行和调查》。埃尔敦于1877年从尼亚萨湖以东地方北上时游历了南部高原,他访问了尼亚库萨和桑古酋长梅雷雷。(J. F. Elton:《Travels and Researches among the Lakes and Mountains of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约翰逊:《我的非洲回忆录》(威斯敏尼斯特,中非大学传教会出版,日期

- 不详)。本书是许多教会回忆录之一，它是改良时代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W.P. Johnson: «My African Reminiscences»)
- 奥托·克尔斯滕: «冯·德根东非游记(1859—1865年)»(第1和第2卷), 1869—1871年莱比锡出版。本书记述了德根男爵在东非和印度洋探险的经历。德根曾于1861年和1862年访问过香巴族和查加族。(Otto Kersten: «Von Der Decken's Reisen in Ost-Afrika in den Jahren 1859 bis 1865»)
- 克拉普夫: «在东非……旅行、调查和传教», 1860年伦敦出版。本书关于克拉普夫1848年访问乌桑巴拉的金韦里·耶·纽姆巴伊的记述尤为珍贵。(J. L. Krapf: «Travels, Researches, and Missionary Labours……in Eastern Africa»)
- 戴维·利文斯敦: «利文斯敦最后日记»(共两卷), 哈勒编, 1874年伦敦出版。利文斯敦于1869年横越刚果经过短途旅行访问了乌季季, 1871年再访乌季季并在那里会见了斯坦利。1872年他同斯坦利到塔波拉, 然后又南下经过卡雷马和乌菲帕到赞比亚东北部。(David Livingstone: «The Last Journals of David Livingstone»)
- 斯皮克: «尼罗河源探险日记»(J. H. Speke: «Journal of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1863年伦敦出版。1860至1862年斯皮克和格兰特在从桑给巴尔到乌干达和尼罗河的途中, 经过塔波拉、乌津扎和卡拉圭。(格兰特著有«A Walk Across Africa»一书, 1864年伦敦出版。)
- 斯皮克: «尼罗河源发现记», 1864年爱丁堡出版。本书包括有斯皮克和伯顿1857年至1858年游历坦噶尼喀湖的简述, 以及斯皮克后来独自游历维多利亚湖的简述。(«What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 斯坦利: «我怎样找到利文斯敦», 1872年伦敦出版。斯坦利在书中记述了他1871年至1872年从海岸到乌季季来往的经过。(H. M. Stanley: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 斯坦利: «穿行黑暗大陆»(共两卷), 1872年伦敦出版。1880年和1890年另出版合订本。本书叙述斯坦利于1874至1876年从桑给巴尔

去乌戈戈, 经过尼亚图鲁和苏库马到维多利亚湖和乌干达; 又经过卡拉圭和萨布瓦到尼亚姆维济西部, 并到乌季季、坦噶尼喀湖和刚果。(《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约瑟夫·汤姆森:《访问中非湖泊归来》(共两卷), 1881年伦敦出版, 汤姆森于1879至1880年从海岸旅行到南部高原和坦噶尼喀湖南端, 然后经塔波拉回来。(Joseph Thomson:《To the Central African Lakes and back》)

蒂普·蒂卜:《蒂普·蒂卜自传》(斯瓦希里文, 英译者 W. H. 怀特利), 1966年东非文学局出版。蒂普的自传特别有助于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坦桑尼亚西部的情况。(Tippu Tip:《Maisha ya Hemed bin Muhammed el Murjebi yaani Tippu Tip》)

卡尔·费尔滕编:《斯瓦希里人游记》, 1901年哥廷根出版。本书包括五篇斯瓦希里人十九世纪后期旅行内地的游记。德文译本由林顿·哈里斯翻译出版(出版日期和地点同上)。(Carl Velten[ed.]:《Safari za Wasuaheli》)

### 三、传 记

安德里亚·卡杰雷罗:《他的一生》, 1960年伏加教会出版社出版。(Andrea Kajerero:《Maisha Yake》)

曼弗雷德·马本多:《一位同生共死的非洲朋友》, 威斯敏尼斯特, 中非大学传教会出版。出版日期不详。(Manfred Mabundo:《An African David and Jonathan》)

穆塔哈巴:《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画像: 阿里·米格约传》, 1969年内罗毕东非出版社出版。坦桑尼亚历史协会第6号论文。(G. R. Mutahaba:《Portrait of a Nationalist: The Life of Ali Migeyo》)

马杰里·佩勒姆编:《十个非洲人》, 1936年伦敦费伯出版, 本书包括马丁·卡扬巴的自传。(Margery Perham [ed.]:《Ten Africans》)

沙班·罗伯特:《我的一生》, 1949年伦敦纳尔逊出版。(Shaaban Robert:《Maisha Yangu》)

玛丽·塞霍扎:《萨姆威尔·塞霍扎》, 1938年桑给巴尔中非大学传教会

出版。(Mary L. G. Sehoza; «Samwil Sehoza»)

#### 四、报 纸

除上述书籍外,凡想多了解关于殖民时期情况的人,最好是阅读当时的斯瓦希里文报纸。

这些报纸不容易找到,现将其中最重要者的出版地点和创刊日期刊列如下:

«报道者»(«Msimulizi»), 1891年桑给巴尔出版。

«每月新闻»(«Habari za Mwezi»), 1895年马吉拉出版。

«领导者»(«Kiongozi»), 1905年坦噶出版。

«沿海和内地»(«Pwani na Bara»), 1910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

«我的朋友»(«Rafiki Yangu»), 1910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

«今日事»(«Mambo Leo»), 1923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

«祖国报»(«Kwetu»), 1937年达累斯萨拉姆出版。

## 译名对照表

(以中文笔画为序)

### 二 画

人民党 “Ittihad ul’Umma”  
 人民民主党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PDP)  
 人民防卫队 Peoples’ Defence Force

### 三 画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  
 大裂谷 Rift Valley  
 大、小堡垒 Husuni Kubwa and Ndogo  
 土耳其警察 Turkish Police  
 干达(族) Ganda  
 上帝最后教会 Last Church of God  
 下议院(英国) House of Commons  
 下萨尼亚 Sanya Chini  
 乞力马扎罗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梅鲁区 Kilimanjaro-Meru area

乞力马扎罗公民联合会 Kilimanjaro Citizens’ Union  
 乞力马扎罗土著合作联盟 Kilimanjaro Native Co-operative Union  
 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协会 Kilimanjaro Native Planters’ Association  
 马拉维湖 Lake Malawi  
 马查梅 Machame  
 马钦加 Machinja  
 马菲亚岛 Mafia Islands  
 马关瓜拉 Magwangwara  
 马吉拉 Magila  
 马加亚 Magaya  
 马戈梅尼 Magomeni  
 马圭尔博士 Maguire, Dr.  
 马亨格(族) Mahenge  
 马及马及起义 Maji Maji rising  
 马吉德 Majid  
 马卡尼亚 Makanya  
 马孔戈洛 Makongolo

- |  |  |
|--|--|
| 马坎吉拉 Makanjila                                     | 马西图(族) Masitu                              |
| 马康迪(族) Makonde                                     | 马斯韦图 Maswetu                               |
| 马库阿(族) Makua                                       | 马库塔尼 Makutani                              |
| 马昆加尼亚, 哈桑·本·奥马里<br>Makunganya, Hassan bin<br>Omari | 马萨伊(族) Masai, Wamasai                      |
| 马莱马 Malema   | 马萨西 Masasi                                 |
| 马伦格拉 Malengela                                     | 马希纳, 曼吉 Mashina, Mangi                     |
| 马兰帕卡 Malampaka                                     | 马斯喀特 Masqat                                |
| 马拉维人 Malawian                                      | 马塔卡 Mataka                                 |
| 马利奔加(舞) Malipenga                                  | 马坦戈(族) Matengo                             |
| 马姆巴 Mamba  | 马修斯上校 Mathews, Col.                        |
| 马姆布韦(族) Mambwe                                     | 马修斯将军 Mathews, General                     |
| 马尼亚尼亚, 卡普恩古 Ma-<br>nyanya, Kapungu                 | 马托拉酋长 Matola, Chief                        |
| 马尼亚拉湖 Lake Manyara                                 | 马托拉, 塞西尔 Matola, Cecil                     |
| 马兰古 Marangu  | 马托拉, 莱斯利 Matola, Leslie                    |
| 马腊 Mara  | 马图姆比(族) Matumbi, Wa-<br>matumbi            |
| 马雷尔勒, 曼吉 Marealle,<br>Mangi                        | 马伍吉 Mavuji                                 |
| 马雷尔勒, 汤马斯 Marealle,<br>Thomas                      | 马津德 Mazinde                                |
| 马萨雷先生 Masare Mr.                                   | 马兹鲁伊(族) Mazrui                             |
| 马萨西—恩丹达区 Masasi-<br>Ndanda area                    | 乡村发展委员会 Village De-<br>velopment Committee |
| 马香博, 保罗 Mashambo, Paulo                            | 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br>sailles            |
| 马松博 Mashombo                                       | 卫理公会 Wesleyan Church                       |
| 马斯瓦 Maswa  |  |
| 马塞科 Maseko   |  |
| 马舍哈 Masheha  |  |

## 四 画

- 巴布, 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哈  
默德 Babu, Abdul Rahman  
Mohamed
- 巴奇维济 Bachwezi



- 巴加莫约 Bagamoyo  
 巴加莫约—达累斯萨拉姆海岸地带 Bagamoyo-Dar es Salaam Coastal Strip  
 巴干达 Baganda  
 巴赫塔(家族) Baheta  
 巴希 Bahi  
 巴尔奇 Baluchi  
 巴马拉基(独立运动) Bama-laki  
 巴纳迪尔(海岸) Banadir  
 巴普图 Baputu  
 巴加什, 赛义迪 Barghash, Saidi  
 巴赛义迪 Basaidi  
 巴斯拉(国) Basra  
 巴西塔(家族) Basita  
 巴苏库马 Basukuma  
 巴特科(家族) Bateko  
 巴塔卡联合会 Bataka Union  
 巴图塔, 伊本 Battuta, Ibn  
 贝克, 杰罗姆 Becker, Jerome  
 贝纳(族、地区) Bena, Ubena  
 比利时人 Belgian(s)  
 比哈拉穆洛 Biharamulo  
 比萨(族) Bisa  
 比托(王朝) Bito  
 开普敦 Cape Town  
 文扎(族) Vinza  
 专员 Commissioner
- 扎霍尔, 阿摩亚 Zahor, Amour  
 扎拉莫(族、地区) Zaramo, Wazaramo, Uzaramo  
 扎拉莫人联合会 Wazaramo Union  
 中非洲 Central Africa  
 中非大学传教会 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 (UMCA)  
 “中非拿破仑” “Napoleon of Central Africa”  
 中东 Middle East  
 中央理事会 Central Council  
 中央省 Central Province  
 中国 China  
 中国人(的) Chinese  
 中桑杰 Sanje ya Kati  
 孔卡人 Concan  
 孔多阿 Kondoa  
 孔多阿协会 Kondoa Association  
 分区执行官 Divisional Executive Officer  
 公务员协会 Civil Service Association  
 公民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itizens Union  
 丰迪, 沙勒 Fundi, Saleh bin  
 丰迪基拉 Fundikira

- |  |  |
|--|--|
| 戈戈(族、地区) Gogo, Wago-<br>go, Ugogo              | guru Land Usage Scheme                         |
| 戈洛拉 Golola                                     | 乌尼亚尼耶姆贝 Unyanyembe                             |
| 戈比 Gopi  | 乌桑巴拉协会 Usambara As-<br>sociation               |
| 戈岑,冯 Gotzen, von                               | 乌希隆博 Ushirombo                                 |
| 太特(族、地区) Tete, Utete                           | 乌约伍 Uyovu                                      |
| 日本人 Japanese                                   | 乌约瓦 Uyowa                                      |
| 开赛 Kasai                                       | 乌文扎 Uvinza                                     |
| 内罗毕 Nairobi                                    | 瓦斯科·达·加马 Vasco da<br>Gama                      |
| 内拉 Nera  | 瓦卡蒂,丰迪 Wakati, Fundi                           |
| 内瓦拉(族) Newala                                  | 瓦米河 Wami River                                 |
| 牛津 Oxford                                      | 瓦利(头人) Wali                                    |
| 牛津英语辞典 Oxford Eng-<br>lish Dictionary          | 瓦托利索 Watolizo                                  |
| 乌玛党 Umma Party                                 | 瓦苏亚(族) Wasuya                                  |
| 乌菲帕 Ufipa                                      |  |
| 乌恩古扎乌库乌 Unguja Ukuu                            | <b>五 画</b>                                     |
| 乌桑吉体育福利俱乐部 Usan-<br>gi Sports and Welfare Club | 本巴(族) Bemba                                    |
| 乌干达 Uganda                                     | 本德(族) Bende                                    |
| 乌干达铁路 Uganda Railway                           | 本笃会 Benedictine(s)                             |
| 乌坎加 Ukanga                                     | 本笃会代理主教 Benedictine<br>Vicar Apostolic         |
| “乌呼鲁” Uhuru                                    | 圣经 Bible, Word of God                          |
| 乌季季 Ujiji                                      | 圣战 Jihad                                       |
| 乌卡米联盟 Ukami Union                              | 圣灵会 Holy Ghost Fathers                         |
| 乌卡姆巴人协会 Ukamba<br>Members' Association         | 平布韦(族) Pimbwe                                  |
| 乌兰加(河) Ulanga                                  | 布罗克,贝弗利 Brock, Bever-<br>ley                   |
| 乌卢古鲁 Uluguru                                   | “布古里,摩尔人村” “Bucury,<br>a village of the Moors” |
| 乌卢古鲁土地利用计划 Ulu-                                |  |

- |                                 |  |
|---------------------------------|--|
| 布干达(族) Buganda                  | 布云古(族) Buyungu   |
| 布干多 Bugando                     | 布津扎 Buzinza  |
| 布冈巴 Bugomba                     | 丘莫 Chumo   |
| 布格赫 Bughe                       | 东非洲领地联盟 Closer Uni-<br>on of the East African Ter-<br>ritories   |
| 布古菲 Bugufi                      | 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br>Pan-African Freedom Move-<br>ment of East, Central and<br>Southern Africa (Pafmecca) |
| 布古鲁尼 Buguruni                   | “东非人” “Zinjanthropus”  |
| 布哈 Buha                         | 东非联邦 East African Fe-<br>deration  |
| 布哈亚 Buhaya                      | 东非种植园公司 East African<br>Plantation Co.   |
| 布卡拉 Bukara                      | 东非保护地 East Africa Pro-<br>tectorate  |
| 布科巴 Bukoba                      | 东非联盟 East Africa Union   |
| 布科巴哈亚人联盟 Bukoba<br>Bahaya Union | 东非海岸热病 East Coast Fe-<br>ver   |
| 布科累 Bukole                      | 东德 East Germany  |
| 布科梅 Bukome                      | 东圭族地区 Udongwe  |
| 布洛,冯 Bulow, von                 | 安科累 Ankole   |
| 布曼加 Bumanga                     | 汉德尼 Handeni  |
| 布姆布利 Bumbuli                    | 汉加扎(族) Hangaza   |
| 布恩古(族) Bungu                    | 汉萨同盟商人 Hanseatic Mer-<br>chants  |
| 布尼奥罗 Bunyoro                    | 可兰经 Koran  |
| 布尼温古 Bunyungu                   | 古巴 Cuba  |
| 布隆迪 Burundi                     | 古吉拉特人 Gujerat  |
| 布赛义德(王朝) Busaidi                |  |
| 布萨姆比罗 Busambiro                 |  |
| 布塞加 Busega                      |  |
| 布希姆巴 Bushimba                   |  |
| 布辛戈 Bushingo                    |  |
| 布什曼人 Bushmen                    |  |
| 布什曼种 Bushmanoid                 |  |
| 布图恩德韦 Butundwe                  |  |
| 布尤戈马 Buyugoma                   |  |

永恒友谊(条约) Eternal Friendship	Apolo
外交部 External Affairs Ministry	卡哈马 Kahama
弗里斯巴赫中尉 Fliesbach, Lt.	卡赫 Kane
弗里曼-格伦维尔 Freeman-Grenville	卡希吉 Kahigi
弗兰克, 汤马斯 Frank, Thomas	卡科科 Kakoko
弗雷尔镇 Freretown	卡昆古鲁, 塞梅 Kakunguru, Semei
加德齐马 Gadzima	卡拉马, 巴齐 Kalama, Pazi
加拉甘萨(族) Galagansa	卡尔本, 冯 Kalben, von
加维, 马克斯 Garvey, Marcus	卡勒拉(舞) Kalela
加塞泽 Gasetze	卡勒梅拉 Kalemere
加图马 Gatooma	卡伦加 Kalenga
加齐 Gazi	卡伦津人 Kalenjin
加丹加 Katanga	卡梅内 Kamene
印度 India	卡姆巴人 Kamba
印度人 Indian(s)	卡米(族) Kami
印度人协会 Indian Association, The	卡奥勒 Kaole
印度穆斯林 Muslim Indians	卡皮利马头人 Kapilima, Jumbe
印度的印度国大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of India, The	卡普乌菲 Kapuufi
印度洋 Indian Ocean	卡拉圭(王国) Karagwe
卡巴塔 Kabata	卡里亚库 Kariakoo
“卡菲尔” Kaffir	卡鲁姆, 阿贝德 Karume, Sheikh Abeid
卡朱卡 Kajuka	卡索格拉 Kasogera
卡富罗 Kafuro	卡萨苏拉 Kassasura
卡格拉 Kagera	卡西姆, 穆哈默德 Kassim, Mohamed bin
卡格瓦, 阿波罗 Kaggwa,	卡维隆多人 Kavirondo
	卡瓦瓦, 拉希迪 Kawawa, Rashidi

- 卡扬巴, 马丁 Kayamba, Martin  
 卡森贝(王国) Kazembe  
 卡米西, 弗朗西斯 Khamisi, Francis  
 兰金 Rankine  
 兰比亚 Lambya  
 兰杰教授 Ranger, Prof.  
 民族主义自由派 Nationalist Liberals  
 左手派 Left Hand  
 右手派 Right Hand  
 立法议会 Legislative Council  
 卢亚普拉 Luapula  
 卢根巴 Lugemba  
 卢巴—隆达 Luba-Lunda  
 卢克勒勒 Lukelele  
 卢库勒迪 Lukuledi  
 卢蒙巴街 Lumumba Street  
 卢古鲁(族) Luguru  
 卢古鲁土地利用计划 Luguru Land Usage Scheme  
 卢欣达 Luhinda  
 卢旺达 Rwanda  
 卢旺达—布隆迪 Rwanda-Burundi  
 卢韦吉拉 Rwegira  
 卢沃马 Rwoma  
 白衣神父 White Fathers  
 史密斯桑德(湖) Smith Sound  
 艾利夫博士 Iliffe, Dr.  
 尼尔森 Nielson  
 尼日利亚人 Nigerians  
 尼罗特人 Nilotes  
 尼梅克瓦科, 穆哈默德·恩加诺加 Nimekwako, Mohamed Nganoga  
 尼亚库萨(族、地区) Nyakusa, Wanyakusa, Unyakusa  
 尼亚库萨—恩贡德地区 Nyakusa-Ngonde region  
 尼亚姆库巴 Nyamkuba  
 尼亚姆万加(族) Nyamwanga  
 尼亚姆维济(族、地区) Nyamwezi  
 尼亚姆维济—苏库马地区 Nyamwezi-Sukuma area  
 尼安贾兰 Nyanjaland  
 尼安扎(族) Nyanza  
 尼亚萨 Nyasa  
 尼亚萨湖 Lake Nyasa  
 尼亚图鲁(族) Nyaturu, Wanyaturu  
 尼雷尔 Nyerere, Mwalimu  
 尼卡人 Nyika  
 尼桑巴 Nyisamba  
 尼图姆巴 Nyitumba  
 尼兰巴人 Wanyiramba  
 尼乌姆巴—亚—穆恩古 Nyumba ya Mungu  
 尼温古·亚·马韦 Nyungu ya

- Mawe  
 尼桑祖人 Wanyisanzu  
 北非洲 North Africa  
 北卡维隆多中央协会 North Kavirondo Central Association  
 北马腊 North Mara  
 北帕尔 North Pare  
 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旧世界 Old World  
 皮卢拉 Pilula  
 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龙博 Rombo
- 六 画
- 亚伯拉罕斯 Abrahams, R. G.  
 亚洲 Asia  
 亚洲人 Asian  
 亚洲的 Asiatic  
 亚鲁比(王朝) Yarubi  
 守望楼教会 Church of the Watch Tower 或 Watch Tower Church, The  
 安果拉 Angola  
 安科累 Ankole  
 安戈维 Angovi  
 邦德(族) Bonde, Bondei  
 冲博,约瑟夫 Chombo, Joseph  
 冲果 Chongo  
 冲果韦 Chongowe
- 西西(族) Cisi  
 西希里人 Shihiri  
 西纳 Sina  
 西姆巴 Simba  
 西姆班韦内 Simbamwene  
 西托莱, 恩达巴宁吉牧师 Sithole, Rev. Ndabaningi  
 西非洲 West Africa  
 西非洲人 West African  
 西非洲兄弟们 West African Brothers  
 西德 West Germany  
 西德政府 West German Government  
 西印第安人 West Indians  
 西湖地区 West Lake Region  
 西方殖民主义 Western Colonialism  
 刚果 Congo  
 刚果人 Congolese  
 划界委员会 Delimitation Commission  
 多埃(族) Doe  
 多多马 Dodoma  
 多多马分会(非洲人协会分会) Dodoma Association  
 多罗加 Doroga  
 吉丘鲁, 詹姆斯 Gichuru, James  
 吉达茅萨 Gidamausa

- 吉泽克 Giesecke  
 吉库尤(族、地区) Kikuyu, Kikuyuland  
 吉库尤中央协会 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  
 齐巴 Ziba  
 齐古阿(族) Zigua  
 列宁 Lenin, V. I.  
 伦敦 London  
 伦瓜 Rengua  
 回教徒 Mohammedan(s)  
 同龄村 age-villages  
 老莫希 Old Moshi  
 关瓜拉 Gwangwara  
 达累斯萨拉姆 Dar es Salaam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Dar es Salaam  
 达累斯萨拉姆高等法院 High Court, Dar es Salaam  
 伊古尔威比人 Igulwibi  
 伊汉吉罗 Ihangiro  
 伊拉拉 Ilala  
 伊利乌夫, 苏罗门 Eliufoo, Solomon  
 伊普利 Ipuli  
 伊兰巴人 Iramba  
 伊兰巴—伊姆比区 Iramba-Iambi area  
 伊兰吉 Irangi  
 伊拉库(族) Iraqw
- 伊林加 Iringa  
 伊林加药水浸洗牛羊计划 Iringa Dipping Scheme  
 伊桑加 Isanga  
 伊森加 Isenga  
 伊西凯 Isike  
 伊西米拉 Isimila  
 伊斯兰教 Islam  
 伊斯兰教的 Islamic  
 伊斯兰化 Islamisation  
 “伊松戈·英达西” “Isongo Indasi”  
 伊伍纳 Ivuna  
 伍格哈 Vugha  
 约翰内斯 Johannes  
 约翰斯顿 Johnston  
 红海航行要览 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  
 朱尔克, 卡尔博士 Juhlke, Dr. Karl  
 朱吉拉(运动) Jujila 或 Jwi-ywila  
 朱吉利亚 Jujilia  
 麦斯纳, 约翰内斯 Messner, Johannes  
 麦金农, 威廉 Mackinnon, William  
 托勒密 Ptolemy  
 托管理事会 Trusteeship Council

托萨马甘加 Tosamaganga  
 托管地 The Mandate  
 托管领地 Trust Territory  
 廷迪加 Tindiga  
 米金达尼 Mikindani  
 米库库尤姆布 Mikukuyumbu  
 米兰西 Milansi  
 米兰博 Mirambo  
 地方志(县志) District Books  
 地理学 Geography  
 地方专员 Area Commissioners  
 地区专员 Regional Commissioner(s)  
 “河一湖”尼罗特人 “River-Lake” Nilotes  
 汤戈尼 Tongoni  
 汤加人 Tonga  
 农圭 Rungwe  
 设拉子 Shiraz  
 设拉子人 Shirazi  
 设拉子人协会 Shirazi Association  
 华尔特·库茨爵士调查团报告  
 Sir Walter Coult's Commission Report

## 七 画

阿布·赛义德王朝 Abu Saidi  
 阿布达利 Abdali  
 阿布达拉, 约翰纳 Abdallah,

Yohannah B.  
 阿布希里·本·萨利姆 Abu-shiri bini Salim  
 阿布希里(族) Abushiri  
 阿布希里起义 Abushiri rising  
 阿布尔—马瓦希布 Abu'l-Mawahib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修尔期” “Acheulian”  
 阿奇西人 Achisi  
 阿哈默德 Ahamed  
 阿贾义教授 Ajayi, Prof.  
 阿里·本·哈桑 Ali bin Al-Hassan  
 阿尔珀斯博士 Alpers Dr.  
 阿尔萨斯 Alsace  
 阿拉伯 Arabia  
 阿拉伯的 Arabic  
 阿拉伯化 Arabised, Arabisation  
 阿拉伯人协会 The Arab Association,  
 阿拉伯—非洲关系 Arab-African relations  
 阿拉伯—斯瓦希里影响 Arab-Swahili influence  
 阿鲁沙 Arusha  
 下阿鲁沙 Arusha Chini  
 上阿鲁沙 Arusha Juu  
 阿鲁沙宣言 Arusha Declara-



- tion
- 阿瑟玛尼“迪瓦尼” Athmani  
Diwani
- 阿曼 Oman
- 阿曼人(的) Omani
- 伯顿 Burton
- 伯韦朱乌 Bwejuu
- 库茨爵士, 华尔特 Coutts, Sir  
Walter
- 库巴依, 弗雷德 Kubai, Fred
- 库拉西尼 Kurasini
- 库图(族) Kutu
- 库什特族(库什特语) Cushites,  
Cushtic
- 县志(地方志) District Books
- 县专员 District Commissioner
- 县议会 District Councils
- 县公署 District Office
- 连加利莱 Lyangalile
- 远东 Far East
- “灵巧人” “Handy Man”,  
“Homo habilis”
- 希马(族) Hima
- 坎多罗 Kandoro, S. A.
- 坎博, 塔比特 Kombo, Sheikh  
Thabit
- 改良时代 Age of Improvement
- 凯尔特人的酋长 Celtic Chief-  
tains
- 克利夫 Cliffe, L.
- 克林巴群岛 Kerimba Islands
- 克瓦加金加 Kwagakinga
- 克拉夫, 路德维格 Krapf, Lud-  
wig
- 克雷莱 Krelle
- 克韦雷(族) Kwere
- 纳萨 Nassa
- 纳马特瓦 Namatewa
- 纳坎, 巴纳巴 Nakaam, Bar-  
naba
- 纳特龙湖 Lake Natron
- 沙里富, 姆达奇 Sharifu,  
Mdachi
- 沙瓦亚湖 Lake Shawaya
- 利图希 Lituhi
- 利文斯敦 Livingstone
- 利文斯敦山 Livingstone Mo-  
untains
- 利瓦利 Liwali
- 利瓦勒 Liwale
- 纽约 New York
- 努比亚人 Nubians
- 泛非主义 Pan-Africanism
- 泛非代表大会 Pan-African  
Congress
- 泛非自由运动, 东非、中非和南  
非 Pan-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of East,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Paf-  
mecca)

泛非主义运动 Pan-Africanist Movement	苏丹 Sudan
泛东非联盟 Pan-East African Union	苏丹人 Sudanese
泛伊斯兰教 Pan-Islam	苏丹, 桑给巴尔 Sultan of Zanzibar
劳姆博士 Raum, Dr.	苏丹, 阿尔—卡萨姆·苏莱曼 Sultan Al-Kasam b. Sulaiman
里希特 Richter	苏丹, 加迪 Sultan Gadi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苏丹, 曼古恩戈 Sultan Mangungo
社会主义和农村发展 Socialism and Rural Development	苏丹, 马孔戈洛 Sultan Makongolo
“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 “Socialism and Self-Reliance”	苏丹, 姆索维罗 Sultan Msovero
肖姆维人 Shomvi	苏丹, 詹希德·本·阿布达拉 Sultan, Jamshid bin Abdallah
肖纳 Shona	苏丹, 赛义德 Sultan, Seyyid Said bin
肖特神父 Shorter, Father	苏丹, 阿里·本·赛义德 Sultan, Ali bin Said
辛达诺, 哈诺克 Sindano, Hanoc	苏丹, 沙瓦亚 Sultan Shawaya
辛吉达 Singida	苏丹, 西安尼加罗 Sultan Sinyangaro
苏布瓦(族) Sumbwa	苏丹, 尤素夫·本·阿拉威 Sultan, Yusuf bin Alawi
苏迪史 History of Sudi, The	汤姆逊, 约瑟夫 Thomson, Joseph
苏迪 Sudi	汤戈尼 Tongoni
苏库马(族、地区) Sukuma, Wasukuma, Usukuma, Sukumaland	汤圭 Tongwe
苏库马维多利亚合作联合会总会 Victoria Federation of Co-operative Unions in Usukuma	
苏库马发展计划 Usukuma Development Scheme	

沃尔弗勒姆中尉 Wolfrum Lt.

## 八 画

“非洲主义的” “Africanist”

非洲化 Africanisation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非洲人协会(桑给巴尔) African Association (Zanzibar)

非洲基督教改良者 African Christian Improvers

非洲人商会 African Commercial Association

非洲人植棉者协会 African Cotton Planters Association

非洲伊斯兰教 African Islam

非洲穆斯林 African Muslims 或 Muslim African(s)

非洲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非洲人协会 Chama cha Umoja wa Watu wa Afrika

非洲人协会 The African Association (见“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条)

“非洲人协会东非主席联席会议” “East African Presidents' Conference for the African Association”

非洲史国际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frican History

非洲民族教会 The African National Church

非洲—设拉子党 Afro-Shirazi Party

非洲—设拉子联盟 Afro-Shirazi Union

林迪 Lindi

林迪古代史 Ancient History of Lindi

林波波 Limpopo

英国东非公司 British East Africa Co.

英国领事 British Consul

英国总领事 British Consul (General)

英属东非洲 British East Africa

英国独立工党 British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英国女王 British Queen, Queen of England

法国 France

法国白神父 French White Fathers

耶稣堡 Fort Jesus

耶稣会派 Jesuit

肯尼亚 Kenya

肯尼亚非洲人联盟 Kenya African Union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 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KANU)	Antiquities Department
肯尼亚—坦桑尼亚边界 Kenya- Tanzania border	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 (简称非洲 人协会) 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 (TAA)
昆杜奇 Kunduchi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简称非 洲民族联盟) 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TANU)
茅茅 Mau Mau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县代表会 议 District Conference of TANU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之声 Sauti ya TANU
昌冈贝 Changombe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年会 TANU Annual Conference
奇尼, 萨尼亚 Chini, Sanya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团 TANU Youth League
奇佩塔 Chipeta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全国执行 委员会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ANU (N. E. C.)
奇朋达 Chiponda	坦噶尼喀全国穆斯林联盟 All Muslim National Union of Tanganyika
奇朋德, 萨姆威尔 Chiponde, Samwil	坦噶尼喀陆军 Tanganyika Army
奇蒂穆库卢 Chitimukulu	坦噶尼喀劳工联合会 Tangan- yika Federation of Labour (TFL)
奇蒂克 Chittick, H. N.	坦噶尼喀高级专员 Tanganyika
奇瓦卡 Chwaka	
奇韦济 Chwezi	
国防条例 Defence Regulations	
国会议员 Member(s) of Par- liament	
国民议会 Parliament	
坦噶 Tanga	
坦噶俱乐部 Tanga Club	
坦噶省政府 Tanga Provincial Office	
坦噶青年同志俱乐部 Tanga Young Comrades Club	
坦噶尼喀湖 Lake Tanganyika	
坦噶尼喀文物部 Tanganyika	

High Commissioner	欣延加 Shinyanga
坦噶尼喀罐头食品厂 Tanganyika Packers	直立人 Homo erectus
坦噶尼喀统一党 United Tanganyika Party	季季(族) Jiji
坦噶尼喀领地非洲公务员协会 Tanganyika Territory African Civil Service Association (TTACSA)	姆万加(国王) Kabaka Mwanga
坦噶尼喀非洲工人中央协会 (TAWCA)	姆瓦娜·纳·姆瓦娜 Mwana na Mwana
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Tanganyika Workers (NUTA)	姆巴杜洛 Mbadulo
坦桑尼亚—乌干达边界 Tanzania-Uganda border	姆巴加(族) Mbagwa, Wambaga
帕甘 Pagan	姆巴鲁克 Mbaruk
帕尔(族、地区) Pare	姆巴西(族) Mbasi
帕尔,(北) Pare, North	姆贝加 Mbega
帕尔,(南) Pare, South	姆贝古 Mbegu
帕齐, 基拉马 Pazi, Kilama	姆贝尼(舞) Mbeni
“帕齐的贡税” Hongo la Pazi	姆比鲁(贡税) Mbiru
欧洲 Europe	姆贝比 Mbeya
欧洲中心论者的 Eurocentric	姆博济 Mbozi
欧洲化的企图 Europeanizing attempts	姆邦布韦 Mbombwe
“欧洲人的仆役工会” “The Union of Europeans' Boys”	姆博科穆 Mbokomu
含族的 Hamitic	姆布卢(族) Mbulu, Wambulu
欣达(王朝) Hinda	姆布卢发展计划 Mbulu Development Scheme
	姆布格韦(族) Mbugwe, Wambugwe
	姆布古(族) Mbugu
	姆本加 Mbunga
	姆布瓦马吉 Mbwamaji
	姆布瓦纳, 姆韦尼 Mbwana, Mwenyi
	姆布韦尼 Mbweni

姆查佩(运动) Mchape	姆希威 Mshwi
姆奇尔瓦 Mchilwa	姆谢瓦 Mshewa
姆奇—温贾 Mchi Winja	姆肖佩(王国) Mshope
姆干达(舞) Mganda	姆肖佩—姆戈尼 The Mshope Mgoni
姆干达人 Mganda	姆西里 Msiri
姆加奥—姆瓦尼亚 Mgao Mwanya	姆索维罗 Msovero
姆根德 Mgende	姆辛达吉 Msindaji
姆坎巴人 Mkamba	姆坦加塔 Mtang'ata
姆克瓦瓦 Mkwawa	姆特瓦纳 Mtwana, Mwinyi
姆库鲁—姆瓦马 Mkuru Mwa- ma	姆特瓦拉 Mtwara
姆卡拉马 Mkalama	姆坦巴利卡 Mtambalika
姆卡西瓦 Mkasiwa	姆特梅拉 Mtemela
姆库济 Mkuzi	姆特马·姆坦格拉 Mtema Mtengera
姆克瓦贾 Mkwaja	姆顿武, 朱贝里 Mtemvu, Zu- beri
姆拉洛复建计划 Mlalo Re- habilitation Scheme	姆特曼加尼 Mtemangani
姆利马 Mlima	姆图姆贝依 Mtumbei
姆里马海岸 Mrima coast	姆特瓦帕 Mtwapa
姆洛伊 Mloi	姆瓦利西 Mwalisi
姆潘达沙洛 Mpandashalo	姆瓦姆班贝 Mwambambe
姆甘加(巫医) Mganga	姆瓦娜·姆库鲁 Mwana Mkuru
姆潘加拉拉 Mpangalala	姆瓦尼亚 Mwanya
姆普瓦普瓦 Mpwapwa	姆万扎 Mwanza
姆普瓦普瓦协会 Mpwapwa Association	姆万多山 Kitumbi(Hill) Mwa- ndo
姆兰加 Mranga	姆万扎—布科巴区 Mwanza- Bukoba area
姆兰格 Mrange	
姆塞伦 Msellem	

- 姆韦姆贝一金扬加 Mwembe-Kinyanga
- 姆韦拉(海岸) Mwera
- 姆亚 Mya
- 姆朱里, 穆萨 Mzuri Musa
- 图姆博, 克里斯托弗·卡桑加 Tumbo, Christopher Kasonga
- 图纳利亚西泽酋长 Tunalya-size, Chief
- 图恩杜鲁县 Tunduru District
- 图鲁(族) Turu
- 图鲁起义 Turu rebellion
- 图西(或巴图西) Tusi or Batusi
- 图迪 Tudi
- 图里、图利(族) Turi, Tuli
- 图姆巴图(族) Tumbatu
- 图姆巴图—设拉子人 Tumbatu-Shirazi
- 图库尤(族) Tukuyu
- 图库, 哈里 Thuku, Harry
- 金布(族) Kimbu
- 金瓦尼 Kimwani
- 金韦里·耶·纽姆巴伊 Kimweri ye Nyumbai of Usambara
- 金韦里·马古伍 Kimweri Maguvu
- 金加 Kinga
- 金加卢 Kingalu
- 金戈 Kingo
- 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 Kinjikitile Ngwale
- 金沙萨 Kinshasa
- 金亚希 Kinyashi
- 庞达, 阿里 Ponda, Ali
- 庞德 Ponde
- 庞加尼 Pangani
- 庞加尼河 Pangani River
- 庞古蒂尼 Pungutini
- 佩拉米霍 Peramiho
- 佩尔格莱夫 Pelgrave
- 奔巴(人、岛) Pemba
- 奔巴协会 Pemba Association
- 奔巴—哈迪木人 Pemba-Hadimu
- 奔巴—设拉子人 Pemba-Shirazi
- 奔巴人民党 Pemba People's Party
- 波斯 Persia
- 波斯湾 Persian Gulf
- 波斯王阿里 Shah Ali
- 波戈罗(族、地区) Pogoro, Upogoro
- 波戈罗族协会 The Pogoro Association
- 波马(人) Boma(s)
- 彼得斯博士, 卡尔 Peters, Dr. Karl
- 拉哈—莱奥 Raha Leo

拉马达尼, 阿里 Ramadhani, Ali  
 拉姆赛上尉 Ramsay, Capt.  
 拉姆赞 Ramzan  
 拉斯—马利贝 Ras Malibe  
 拉普塔 Rhapta  
 拉斯基 Laski, H. J.  
 罗伯茨, 安德鲁 Roberts, Andrew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舍哈” “Sheha(s)”  
 舍尔 Shehr  
 迪戈 Digo  
 松佐(人) Sonjo  
 松纳(起义) Shona

## 九 画

美洲 America(s)  
 美洲黑人 American Negro  
 美国 United States  
 柏林会议 Berlin Conference (1884—85)  
 柏林 Berlin  
 柏林路德派教会 Berlin Lutheran Mission  
 柏林路德教学校 Berlin Lutheran Schools  
 柏林路德派教徒 Berlin Lutheran(s)  
 查布鲁马 Chabruma

查加(族、地区) Chagga, Wachagga, Uchagga, Chaggaland  
 查加民主党 Chagga Democratic Party  
 总统委员会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总理 Chancellor  
 科摩罗群岛 Islands of Comoro  
 科里, 汉斯 Cory, Hans  
 科伊萨(族) Khoisan  
 科扎(族) Khoja  
 科亚尼 Koani  
 科冈戈 Kogongo  
 科伊南格, 姆比尤 Koinange, Mbiyu  
 科勒洛 Kolelo  
 科洛格洛 Kologelo  
 科农戈(族) Konongo  
 奎罗 Kwiro  
 奎奎 Que Que  
 洛(族) Luo  
 洛族节约运动 The Luo Thrift  
 洛夫柴 Lofchie, M. F.  
 洛基拉 Lokila  
 洛林 Lorraine  
 哈(族、地区) Ha, Waha, Uha  
 哈德拉米海岸 Hadhrami Coast  
 哈迪木人 Hadimu  
 哈迪木—设拉子人 Hadimu-



Shirazi	省当局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哈马迪 Hamadi	省府 Provincial Chief Town
哈默顿海军上校 Captain Hamerton	省专员 Provincial Commissioner
哈丁格爵士, 阿瑟 Hardinge, Sir Arthur	俄国 Russia
哈亚(族、地区) Haya, Wahaya, Uhaya	俄国人 Russians
哈亚—津扎族土邦 Haya-Zinza States	革命委员会 Revolutionary Council
帝国特许证 Schutzbrief	施密特博士 Schmidt, Dr.
帝国委员会 Imperial Commission	施图尔曼, 弗朗茨 Stulhmann, Franz
帝国政府 Imperial Government	修吉, 贾伊拉姆 Sewji, Jairam
独立 Independence	香巴(族) Shambaa
独立节 Independence Day	香巴拉族(的) Shambala, Shambalai
柯克爵士, 约翰 Kirk, Sir John	香特 Shamte
酋长 Mkuu, Mwinyi(Mwenye)	香加(族) Shanga
南代特 Nandette	祖鲁(族) Zulu(s)
南罗得西亚 Rhodesia, Southern	祖鲁·加马 Zulu Gama
南非洲 South Africa	津扎(族) Zinza
南部高原 Southern Highlands	津巴(族) Zimbab
南瓜战争 War of Pumpkins (Ngondo ya Mayowa)	津巴布韦 Zimbabwe
首相 Prime Minister	津给人 Zinj
首席部长 Chief Secretary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省委员会 Provincial Board	威廉三世, 弗雷德里克 Wilhelm III, Frederick
省际委员会 Inter-Provincial Board	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威利斯 Willis, R.
	威尔逊, 戈弗雷 Wilson, God-

frey	埃塞俄比亚人 Ethiopian
威尔逊, 莫尼卡 Wilson, Monica	埃亚西湖 Lake Eyasi
威尔逊调查团 Wilson Commission	恩加鲁卡 Engaruka
威尔逊报告 Willson Report	恩加雷—南尤基区 Engare-Nanyuki area
威斯曼少校 Wissmann, von	恩开尔敦 Enkeldoorn
威图少校 Witu, Major	恩丹达 Ndanda
保护制 clientship	恩达加拉 Ndagara
保护军 Schutztruppe	恩特米(或穆特米) Ntemi (or Mutemi)
费根 Fagan	恩德贝勒(起义) Ndebele
费厄曼教授 Feierman, Prof. Steven	恩加兰贝 Ngalambe
封迪基拉 Fundikira	恩加伦瓜 Ngallengwa
赛义德, 巴加什 Barghash, Saidi	恩金多(族、地区) Ngindo, Wangindo, Ungindo
十 四	
班图(族、语言) Bantu(s)	恩戈达姆蒂图战役 Ngodamtitu
班图化 "Bantuized"	恩戈菲山 Ngofi Mountain
班扬人(的) Banyan(s), Banyan(s)	恩戈戈塔 Ngogota
班扬博人 Banyambo	恩戈米勒 Ngomile
俾斯麦 Bismarck	恩贡德 Ngonde
哥伦布 Columbus	恩戈尼(族、地区) Ngoni, Wangoni, Ungoni
海岸 Coast	恩戈尼人(布冈巴的) Ngoni of Bugomba
埃明帕夏 Emin Pasha	恩戈尼人(姆肖佩的) Ngoni of Mshope
埃及 Egypt	恩戈尼, 马塞科 Ngoni, Maseko
埃及人 Egyptian	恩戈罗恩戈罗 Ngorongoro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 Ethiopian Church	恩古鲁赫 Ng'uluhe
	恩古尼 Nguni

- 恩格瓦查尼·迪瓦尼 Ngwachani Diwani
- 恩杰卢(王国) Njelu
- 恩金乔 Njinjo
- 恩冲贝河 Njombe River
- 恩朱纳基 Njunaki
- 恩坎西 Nkansi
- 恩萨拉拉 Nsalala
- 恩塔尔六世 Ntare VI
- 恩塔尔二世(布隆迪的) Ntare II of Burundi
- 恩图姆瓦 Ntumwa
- 恩泽加 Nzega
- 莱斯利 Leslie
- 莱伯特 Liebert, von
- 桑给巴尔革命 Zanzibar Revolution
- 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 Zanzibar Nationalist Party
- 桑给巴尔苏丹臣民民族主义党 Hizbu l'Watan l'Rait Sultan Zanzibar
- 桑给巴尔和奔巴人民党 Zanzibar and Pemba People's Party
- 桑达维 Sandawe
- 桑加, 克莱德 Sanger, Clyde
- 桑古(族) Sangu
- 桑吉(族) Sangi, Wasangi
- 桑比罗(族、地区) Sambiro, Usambiro
- 桑萨马 Sansama
- 桑巴拉(族、地区) Sambara, Usambara
- 桑格阿 Songea
- “桑给帝国” “Zanj Empire”
- 泰晤士报 The Times,
- 泰塔(族) Taita
- 泰塔山 Taita Hills
- 泰塔山区协会 Taita Hills Association
- 格瓦萨, 吉尔伯特 Gwassa, Gilbert
- 格里泽 Griese
- 格韦洛 Gewello
- 格韦诺(族、地区) Gweno, Ugweno
- 格雷爵士, 约翰 Gray, Sir John
- 索登男爵 Soden, Baron von
- 索贾拉 Sojala
- 索马里 Somalia
- 索马里人(的) Somali(s)
- 铁路工人联合会 Railway Workers' Union
- 爱尔兰 Ireland
- 诺诺 Nono
- 夏尔河流域 Shire Valley
- 朗海尔德, 威廉 Langheld, Wilhelm
- 朗斯代尔, 约翰 Lonsdale, John
- 莫辛, 阿里 Mushin, Sheikh Ali

莫埃韦 Moewe  
 莫霍罗 Mohoro  
 莫希 Moshi  
 莫希—基鲁亚边境 Moshi-Ki-  
 rua border  
 莫伦古埃 Morengue  
 莫罗戈罗 Morogoro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莫桑比克岛 Mozambique Is-  
 lands  
 莫桑比克解放运动 Mozambi-  
 que Liberation Movement  
 (Frelimo)  
 特瓦或特瓦奇 Twa (or Twachi)  
 特穆博士 Temu, Dr.  
 根德瓦 Ghendewa  
 贾弗特, 基里洛 Japhet, Kirilo

### 十一画

基亚姆特瓦拉(族) Kiamtwara  
 基安贾(族) Kianja  
 基安戈, 卡梅利厄斯 Kiango,  
 Mzee Camelius  
 基巴塔 Kibata  
 基比 Kibi  
 基邦多 Kibondo  
 基博肖 Kibosho  
 基干达 Kiganda  
 基戈勒 Kigole  
 基戈马 Kigoma

基扎, 克莱门斯 Kiiza, Klemens  
 “基拉米亚” “Kilamia”  
 基兰加巴纳 Kilangabana  
 基勒马 Kilema  
 基齐(族) Kichi  
 基姆贝—萨马基地区 Kiembe  
 Samaki area  
 基利马廷德 Kilimatinde  
 基洛萨 Kilosa  
 基尔瓦 Kilwa  
 基尔瓦基西瓦尼 Kilwa Kisi-  
 wani  
 基尔瓦基温杰 Kilwa Kivinje  
 基林迪 Kilindi  
 基林迪情况 Habari za Wakil-  
 indi  
 基马兰多, 约瑟夫 Kimalando,  
 Joseph  
 基马拉温加 Kimalaunga  
 基纳曼加(王朝) Kinamanga  
 基曼博博士 Kimambo, Dr.  
 基帕拉帕拉 Kipalapala  
 基普戈, 姆齐·纳索罗·哈桑  
 Kipugo, Mzee Nassoro Has-  
 san  
 基罗圭 Kirogwe  
 基萨本戈 Kisabengo  
 基沙基 Kisaki  
 基生格 Kisenge  
 基西朱 Kisiju

基西马尼—马菲亚 Mafia	Kisimani	维东达(族) Vidunda
基苏穆 Kisumu		曼达拉 Mandara
基塔拉 Kitara		曼达瓦 Mandawa
基图姆比—姆万多 Mwando	Kitumbi	曼加蒂 Mangati
基乌曼加奥 Kiumangao		曼耶马(族) Manyema
基温加尼 Kiungani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基温杰 Kivinje		曼甘贾人 Manganja
基万加 Kiwanga		曼科隆戈 Mankorongo
基韦勒 Kiwele		曼汉加 Manhanga
基齐巴 Kiziba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基津卡奇 Kizimkazi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基温古 Kyungu		萨阿达尼 Saadani
基督 Christ		萨达尼 Sadani
基督教(基督教徒)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萨加拉(族、地区) Sagara, Usagara, Wasagara
基督教差会 Church Mission- ary Society		萨卡利洛 Sakalilo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萨马基, 基姆贝 Samaki, Kie- mbe
菲阿, 埃里卡 Fiah, Erica		萨梅 Same
菲帕(族、地区) Fipa, Ufipa		萨莫亚 Samoa
菲帕, 皮卢拉 Fipa, Pilula		萨顿博士 Sutton, Dr.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隆古人 Lungu
盖塔 Geita		隆达 Lunda
黄金海岸人 Gold Coast Native		梅利 Meli
康博, 哈米斯 Khombo, Hamis bin		梅林德 Melinde
维多利亚湖 Lake Victoria		梅鲁(族) Meru, Wameru
		梅鲁自由公民联合会 Meru Citizens' Union of Freemen
		梅鲁土地事件 Meru Land Case
		梅雷雷 Merere

梅凯尔中士 Sergeant Merckel  
勒托,冯 Lettow, von

## 十二画

博加罗,加斯帕 Bocarro, Gasper

博马 Boma

博马尼,保尔 Bomani, Paul

博马斯 Bomas

殖民部 Colonial Office

殖民大臣 Colonial Secretary

斐济岛 Fiji Islands

富奥尼 Fuoni

黑利戈兰条约 Heligoland  
Treaty

凯尼 Keni

湖省 Lake Province

湖省种植者协会 The Lake Pro-  
vince Growers' Association

温德 Winde

普法伊尔,格拉夫 Pfeil, Graf

普古 Pugu

普兰坦,克莱斯特·赛克斯  
Plantan, Kleist Sykes

普林斯,冯 Prince, von

葡萄牙 Portugal

葡萄牙人 Portuguese

鲁瓦哈河 Ruaha

鲁菲季河 Rufiji

鲁哈加 Ruhaga

鲁欣达 Ruhinda

鲁恩迪(族) Rundi

鲁夸(湖) Lake Rukwa

鲁马尼卡 Rumanika

鲁苏乌比 Rusuubi

鲁伏河 Ruvu River

鲁伍马河 Ruvuma River

谢尔,冯 Schele, von

谢布戈 Shebugho

谢库瓦伍 Shekulwavu

森博扎 Semboja

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人 Swa-  
hili, Waswahili

斯韦图 Swetu

斯坦利 Stanley

斯塔尔,凯瑟琳 Stahl, Kathleen

斯蒂尔 Steere

斯比斯,卡西安 Spiss, Cassian

塔波拉 Tabora

塔波拉学校 Tabora School

塔佐 Tajo

塔托加 Tatoga

塔图亚 Tatua

塔维塔 Taveta

塔图鲁(族) Wataturu

蒂普·蒂卜 Tippu Tip

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瑶族 Yao

割礼 Initiation ceremonies

琼贝 Jumbe(s)

越南 Vietnam

奥金加·奥丁加 Oginga Odinga  
 奥杜瓦伊峡谷 Olduvai Gorge  
 奥利弗教授 Oliver, Professor  
 R.

奥内科, 阿钱 Oneko, Achieng  
 奥里奥(氏族) Orio  
 奥尤博 Orombo  
 奥托, 奥古斯特 Otto, August

## 十三画

蒙巴萨 Mombasa  
 蒙巴萨—乌坎巴—吉库尤族地  
 区商路 Mombasa-Ukamba-  
 Kikuyuland trade route  
 蒙克拉罗 Monclaro  
 蒙加洛 Mongalo  
 新街 New Street  
 新尼亚姆维济族协会 New  
 Wanyamwezi Association  
 塞瓦人 Cewa  
 塞格朱人 Segeju  
 塞霍扎, 萨姆威尔 Sehoja, Sam-  
 wil  
 塞勒, 姆恩瓦 Sele, Mnwa  
 瑞士本笃会 Swiss Benedict-  
 ines  
 解放委员会 Liberation Com-  
 mittee  
 路德会教徒 Lutheran(s)  
 雷萨鲁拉 Lwesarura

## 十四画

赫赫(族、地区) Hehe, Wahe-  
 he, Uhehe  
 赫里, 伯瓦纳 Heri Bwana  
 赫鲁 Heru  
 豪尔, 马丁 Haule, Martin  
 赛德 Syde  
 赛克斯, 阿巴 Sykes, Abbar

## 十五画

德尔加多角 Cape Delgado  
 德拉曼 Draman  
 德国人 Wadachi  
 德(国人)阿(拉伯人)冲突 Ger-  
 mano-Arab clash  
 德(国人)赫(赫族)冲突 Ger-  
 mano-Hehe clash  
 德葡条约 Germano-Portuguese  
 treaty  
 德国东非公司 German East  
 Africa Co.  
 德属东非洲 German East Af-  
 rica  
 德国 Germany  
 德国摩拉维亚教派 German  
 Moravians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Kaiser Wil-  
 helm II

德国殖民地开拓协会 Society  
for German Colonisation  
德国种植者公司 German Plan-  
ters Company  
聪慧人 Homo sapiens  
摩加迪沙 Mogadishu  
摩尔人 Moor(s)

## 十六画

霍弗 Hopfer  
霍屯托人 Hottentots  
穆特萨(国王) Kabaka Mutesa  
穆干达 Muganda  
穆欣杰 Muhinje  
穆汉布韦 Muhambwe  
穆科塔尼 Mukotani  
穆孔多阿 Mukondoa  
穆利迪(运动) Mulidi Move-

ment

穆南卡,博克 Munanka, Bhoke  
穆尼古姆巴 Munyigumba  
穆萨 Musa  
穆西亚尼 Musiani  
穆斯林 Muslim  
穆索马 Musoma  
穆塔坦布瓦 Mutatembwa  
穆祖拉 Muzura  
赞比西河 Zambezi  
赞根达巴 Zwangendaba

## 十七画

戴维森,巴兹 Davidson, Basil

## 十八画

魏勒,卡尔 Weule, Karl